

布哈林文集


郑异凡 主编

社会主义及其文化

SHEHUIZHUYI JIQI WENHUA

【苏】尼·伊·布哈林 著

郑异凡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Voice Of Marxism-Leninism
Group Of EBOOK*

制作

ISBN 978-7-229-10195-4



9 787229 101954 >

定价：38.50元

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布哈林文集

郑异凡 主编

社会主义及其文化

SHEHUIZHUYI JIQI WENHUA

【苏】尼·伊·布哈林 著

郑异凡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主义及其文化/(苏)布哈林著;郑异凡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229-10195-4

I. ①社… II. ①布… ②郑… III. 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研究—苏联 IV. ①G1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8574号

社会主义及其文化

SHEHUI ZHUYI JIQI WENHUA

[苏]尼·伊·布哈林 著 郑异凡 译

责任编辑:吴立平

责任校对:李小君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吴庆渝 刘 颖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俊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9.25 字数:290千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0195-4

定价:38.5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布哈林文集》出版说明

布哈林是苏联的重要理论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曾被列宁誉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后被含冤处死，1988年获平反。《布哈林文集》共收录了4本著作。列宁批注本《过渡时期经济学》，本书首次把布哈林原著全文与列宁对该书的批注合并在一起出书，从而清楚地展示了列宁和布哈林的完整思想，尤其是对研究列宁的思想有重要价值。其他三部著作是布哈林1937年含冤入狱后，在监狱的一年时间里凭记忆写作的，是苏联解体后发现的狱中手稿。这三部著作是：(1)《社会主义及其文化》，布哈林从1920年初就开始思考和研究社会主义及其文化，本书对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和文化有重要参考价值；(2)《辩证法概论》，布哈林吸取了列宁的批评意见，对一系列哲学问题做了新的深入的阐述，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苏联时期的哲学思想有重要价值；(3)《时代》，一部自传性的小说，以俄罗斯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20世纪前后革命前俄国的真实图景。这四部著作是研究布哈林和社会主义思想史的重要资料。

“布哈林狱中遗著”序

郑异凡

布哈林狱中遗著共三本：理论著作《社会主义及其文化》和《辩证法概论》、自传体小说《时代》，手稿于1937年2月到1938年3月在狱中写就，历经半个多世纪才得见天日。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生于1888年。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在革命遭遇危难之际的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他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敢于“反”列宁，即同列宁争论的人物。十月革命前，在国家问题上、在俄国革命的阶段问题上，他同列宁有过分歧，革命胜利后，在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在工会问题上也同列宁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然而争论归争论，一旦通过争论达成共识（错误也并不总是在布哈林一方），他们又齐心协力地投身于革命的共同事业之中。在十月革命的风云激荡年代，布哈林是莫斯科武装起义的领导核心之一。在十月革命后的十几年里，布哈林是理论宣传工作的掌门人，主持过共产国际的工作。他没有担任政府部门的工作，其身份始终是政治局委员和《真理报》主编！他写出了得到列宁好评的《共产主义ABC》和总体上得到列宁肯定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布哈林善于总结吸取教训，自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他又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为新经济政策宣传、论证和发展的重担，不惜为此同斯大林闹翻，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最后招致杀身之祸。这

是一个为信念而奋斗终生的人，甚至在他向斯大林“求情”的时候，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大事业”，还想利用自己的“余生”去劳改营再干25年，在那里建大学、地方志博物馆、技术站，或者建研究所、画廊、民族学博物馆、动植物博物馆，办集中营杂志报刊，“为进行一项拓荒者的奠基性的文化工作”，“战斗到最后一息”。布哈林不明白，斯大林不会允许他哪怕多活25天，斯大林的“大事业”需要布哈林的血去贡献祭坛！布哈林不理解，因为1925年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曾经信誓旦旦地向“新反对派”声明：“你们要布哈林的血？要知道，我们不会把他的血给你们的！”布哈林有理由相信这个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所作出的庄严许诺！然而，自1928年同斯大林发生争论之后，对他的迫害有增无减。1937年2月底，布哈林在参加联共（布）中央二三月全会的时候，被直接投入监狱，一直关押到1938年3月，经公审后枪毙。

布哈林早就想写一本关于文化问题的专著《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文化问题》，其中的一章《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曾发表在1922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见《布哈林文选》上册）。在被捕前，他开始收集资料，准备写法西斯主义和文化。布哈林的妻子拉林娜回忆说，布哈林被捕后，她根据布哈林所开的书目，往卢比扬卡监狱送去1936年在柏林购买的德文书籍，供布哈林在狱中写作《法西斯主义下文化的退化》一书。《社会主义及其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危机和社会主义》的第二卷；其第一卷在被捕前已经完稿，布哈林在狱中写给妻子的信中，特别嘱咐把它找出来，说“如果丢失了，那太可惜了”。确实可惜，稿子在抄家时被没收，至今下落不明。布哈林在被捕后于1937年3月26日动笔写第二卷，在4月7日以后的某天完成。

1937年6月布哈林在起诉书上签了字，签字后布哈林获得纸张和书籍，开始写作《辩证法概论》。此书完成于1937年11月7—8日。

1937年11月12日，布哈林开始写作自传体小说《时代》。1938

年1月15日，布哈林在给妻子的信中说，转交的手稿中有小说的头七章。他以为以后不可能继续写下去了，所以在第七章末尾写了“完”字。实际上，在这以后他还有2个月的时间继续写作。

布哈林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是20世纪的百科全书派人物。他对理论问题极感兴趣，在世纪之初他对当时出现的经验批判主义就有着“某种异端的偏爱”，一个20来岁的毛头小伙子“读遍了用俄文出版的所有这方面的书籍”。他利用流亡国外的机会，深入钻研政治经济学。他爱好艺术，他同列宁的第一次见面，列宁是把他当作“年轻的画家”接待的。30年代有一位苏联画家甚至劝他抛弃该死的政治，去当专业画家！他给我们留下的著作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政治经济学、哲学、政论、文艺评论、诗歌、小说等等，还有由他起草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大量文献。以短短的50年生命，在紧张繁忙的斗争和工作中，能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如许之多的文字遗产，这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是不多见的。布哈林拥有严谨的理论思维，也具备丰富生动的形象思维，能写像《过渡时期经济学》这样深奥的理论著作，也能写像《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这样的既有理论深度又浅显易懂的通俗著作，还能写像《时代》这样的生动描绘世纪之交的俄国外省和莫斯科风情的文学作品。也许是他还记住列宁在“遗嘱”中对他不懂辩证法的批评，他在狱中所写的哲学著作特别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最重要的是不要把哲学著作弄丢了，这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写成的，我往那里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同我过去的著作相比，这是非常成熟的作品，并且与那些著作不同，自始至终贯穿着辩证法。”

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就是这个被列宁誉为“不仅是党的最宝贵和最大的理论家”，“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的布哈林，最后竟被关进了“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在监狱里，他利用这个“闲暇”，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给我们留下这三部弥足珍贵的著作。要知道，在这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布哈林得到的不是

“创作假”，他的主要任务不是创作，而是写供词，进行对质。这三本书如果让一个熟练的翻译家来翻译，一年时间也是远远不够的！

什么是天才？这就是天才！什么是悲剧？这就是悲剧！——按照鲁迅的说法，悲剧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对苏联社会存在的这种不仅布哈林一人遭遇的悲剧，布哈林在这些著作中没有也不可能作专门的评述，他显然并不想在狱中同斯大林争论。但是在《时代》中，我们看到对沙皇镇压的猛烈抨击。

在小说《时代》里有伊万·安东内奇（实际上是布哈林的父亲）同斯拉维扬斯卡娅（纳塔利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的一段对话，谈到了沙皇当局对知识分子的镇压，她发出这样的感慨：“一个民族的头脑不停地被人砍掉，这个民族还能生存下去吗？”

让我们来读一读这段对话：

“我自己也搞不明白，究竟应当走哪一条路。只知道最一般的否定的道理：该反对这个野蛮的专制制度……我常常觉得，社会上甚至对罗曼诺夫君主制度的反文化性质都估计不足……这是老实话……所有优秀的头脑，民族的精华不是统统被绞杀了吗？只要稍稍显出一点才华，露出一点天赋，就被拿去砍了头……这些事情大家都是知道的，要是仔细计算一下呢？普希金是流放、禁止、猝死，莱蒙托夫是流放，被谢林^①认为是最聪明的人才之一的恰达也夫^②几乎按沙皇的旨意被关进疯人院，波列扎耶夫^③在兵营里受尽了折磨。您还记得那篇《被囚禁的易洛魁人之歌》吗？”

“记得。‘我要死了。我交出这具没有人保护的身体，证明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1775—1854）——德国哲学家，古典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② 彼得·雅可夫列维奇·恰达也夫（1794—1856）——俄国宗教哲学家。

③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波列扎耶夫（1804—1838）——俄国诗人，1826年因为写了讽刺诗而被充军。

刽子手的可耻！……’”

“对……一个伟大的天才……车尔尼雪夫斯基服苦役。皮萨列夫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禁五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押上枪决的刑场，后来又被关进死屋。屠格涅夫，连屠格涅夫也被监禁过。赫尔岑先是关监狱，后来流亡国外。雷列耶夫^①被绞死。拉季舍夫^②被流放之后，又服毒自杀……还有被处死的基巴利契奇，他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多么了不起的科学家啊！……再说托尔斯泰，他被搜查……而他是世界级的天才人物！还有不久前发生在高尔基身上的事件，多么让人气愤……进监狱是不消说的了……他不止一次蹲过监狱。”

“您说的是科学院的事吗？”

“是呀……院士们是好样的！连契诃夫这个谦谦君子也火冒三丈了！您读过他给院长那个善于阿谀逢迎的自由派贵人的信吗？”

“读过……”

“嗯……您看，俄罗斯的天才人物不断被德国男爵出身的宪兵头子们，本肯多夫^③之流、杜贝尔特^④之流，还有列文达利之流，这些罗曼诺夫家族的杂种们所消灭……您倒说说看，一个民族的头脑不停地被人砍掉，这个民族还能生存下去吗？……民众，农夫，工人就更不消说了……不，锅炉会爆炸的……而且很快就要爆炸了……”

纳塔利娅·德米特里耶夫娜站起身来，激动地在屋里来回走着。伊万·安东内奇沉默不语。

“纳塔利娅·德米特里耶夫娜，您把这一切都看得很认真

① 孔德拉季·费奥多罗维奇·雷列耶夫（1793—1826）——俄国诗人，十二月党人，北方协会会员。

② 亚历山大·尼古拉那维奇·拉季舍夫（1749—1802）——俄国革命思想家、作家、革命思想传播者。

③ 1826年起任宪兵司令。

④ 1835年起任独立宪兵队参谋长兼管第三厅。

吗?”

“我还不是一具僵尸。但我是袖手旁观的，伊万·安东内奇……啊，我的托夏一定会有所作为……如果他能够活下去，而且参加了革命的话，我毫不怀疑他会参加革命……也许到那时他会弥补我的罪过，我的小市民习气……可是同时我自己又感到害怕——这样做的命运也几乎是确定无疑的……即使能取得胜利，活下来的人也寥寥无几……”^①

布哈林在最后的时日如何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时代》里的一段描写，也许能够给读者一些暗示：

有一天，科里亚^②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忽然碰上了一段文字，深深地打动了她。这是《少年》中的一段，描写未来的人们失去对上帝和永生的信仰，丢掉了这一条令人宽慰的千年古训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孤苦伶仃的人们立刻会更紧密地互相挨得紧紧的，”读着读着，科里亚的心抽紧了。“他们会手拉着手，明白如今只有他们彼此相依为命了。那伟大的永生的思想已经消失了，必须找到替代它的东西，于是从前对那永生的神强烈而伟大的爱就转移到大自然，转移到世界，转移到人，转移到每一棵野草身上。他们越是逐渐认识到生命的短暂和有限，也就越情不自禁地爱上土地和生命，这是一种特殊的爱，而不是早先的那种爱。他们会在大自然中察觉和发现早先不曾料到的现象和奥秘，因为他们会用新的目光，用情人看心上人的目光来观察大自然。他们会觉醒过来，急切地互相亲吻，急切地相爱，因为意识到来日不多，意识到这就是他们还能够做的事情。他们都为别人而

① 布哈林《时代》，第277—279页。

② 科里亚是小说《时代》里的主角，即布哈林自身。

工作，每个人都会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分给别人，并且因为能够付出而感到幸福。每个孩子都会知道并感觉到，世上的每个人都像是他的父母，每个人看见落日时，都会想：‘即使明天是我的末日也不要紧，虽然我死了，可是他们还全部活着，他们死后还有他们的子女。’他们都活着，彼此仍然相爱，而且为别人而担忧这个想法会取代在冥界相见的想法。啊，他们会急切地相爱而消除自己心中强烈的哀愁。他们会为自己而自豪，变得勇敢大胆，但是会因为别人而变得畏怯；每个人都会为别人的生命与幸福而提心吊胆。他们相互都是温情脉脉，不会像现在那样因此而感到羞惭，他们彼此会像孩子一般的亲热。他们相见时，会用深邃的、沉思的目光注视着对方，目光里含着钟爱和愁绪……”

科里亚目不转睛地读完了这段话。他兴奋极了……他找到了！而且是没有上帝。说得多好啊！多么鲜明！……

陀思妥耶夫斯基拨动了科里亚心中最脆弱的那根弦，于是弦声响了，他听到了非尘世的绝妙音乐，这音乐总有一天会降落人间……可是它会怎样落下呢？……于是又开始了痛苦和疑惑……要知道那时的人们将不再是今天的人们，那时会是……科里亚眼前立即出现了阿拉克切耶夫^①、萨尔台奇哈^②之流的人物、刽子手、凶狠的沙皇、毫无怜悯心的压迫者……部队，还需要把地球打扫干净……“不知道忧伤和愤怒的人，不会爱自己的祖国。”^③

丢掉对“上帝”的信仰，抛弃对永生的追求，认清生命是短暂

① 阿·安·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俄国伯爵、将军、亚历山大一世时专横残暴的宠臣。

② 达·尼·萨尔台奇哈（1730—1808）——莫斯科省波尔多斯克县女地主，折磨死100多名农奴。

③ 布哈林：《时代》，第342—343页。

和有限的，泰然面对死亡，寄希望于明天——“即使明天是我的末日也不要紧，虽然我死了，可是他们还全部活着，他们死后还有他们的子女”，会把地球打扫干净的！这恐怕也就是布哈林临刑前的心态！这不是抗争，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祈望。

关于布哈林的著作，我国从1980年代初起陆续出版了他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共产主义ABC》、《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的三卷本《布哈林文选》（1981），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的一套布哈林多卷本文集，在80年代初是空前的，在苏联解体后的今天恐怕也可以说是绝后的——世界范围内的布哈林热已经过去，人们对布哈林的故乡也已失去了兴趣。

我们编译《布哈林文选》的时候自然不知道在斯大林的秘密档案库里还保存着布哈林处在“生与死之间”的一年时间里写下的三本著作。1992年我去莫斯科访问，专门去“俄国现代史文献收藏和研究中心”查阅布哈林档案，但在“布哈林卷宗”里几乎一无所有，唯一一份有分量的文件还是拉林娜·布哈林娜凭记忆写下送赠的布哈林的《致党的新一代领导人的信》的打字稿。

苏联时期的档案资料曾几经浩劫：斯大林镇压高潮期间，曾大量销毁手稿文件；1941年希特勒进攻莫斯科期间，内务人民委员部也销毁了大量文件；据说，斯大林逝世时在混乱中一些人也曾大量销毁档案资料，1991年“8·19”事件期间也有一次销毁了一批档案文件。值得庆幸的是，斯大林时期还是保留了不少文件，原因之一是一些文件上盖有图章：“永远保存”在内务部和斯大林档案库。这部分文件现在保存在总统档案库。布哈林的三本遗著即属此类。

1937年2月27日布哈林被捕，在狱中度过了12个月，在卢比扬卡监狱写了这三本书和一扎抒情诗。手稿立即被当作“绝密”文件送交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斯大林，藏之于斯大林的绝密档案库，也许斯大林是其唯一的一名读者。遗稿得见天日，是布哈林的亲属和美国的布哈林问题专家斯蒂芬·科恩多方努力的结果。

众所周知，斯蒂芬·科恩是布哈林政治传记《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作者，从1975年起同布哈林一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在续写布哈林传的时候，他发现布哈林有可能在狱中写下了什么东西，但直到同戈尔巴乔夫的一名助手私下谈话时才得知存在四份手稿的事实，于是，他开始以布哈林的亲属——妻子拉林娜和儿子尤里的名义搜寻手稿。戈尔巴乔夫对他的请求表示同情，但无能为力，因为他卷入了党内争取对“党的档案”的控制权的斗争。不久，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丢掉总统职务，也失去了对克里姆林宫总统档案的控制权。1992年，拉林娜已年近80。她委托斯蒂芬·科恩为其代理人，以自己是布哈林所有文字材料的合法继承人，因此有权查阅一切与其案件有关的档案的名义，授权科恩查阅所有与布哈林有关的档案。原内务部档案库迅速给予肯定的回应，但科恩仍然无法进入藏有布哈林以及其他重要人物档案的总统档案库。1992年，在公开审讯苏共的时候，科恩找到叶利钦的一个亲密助手，他被拉林娜想要知道自己丈夫悲惨命运的要求所打动。经他的联系，数周后四份手稿的复印件送达布哈林亲人手里。小说《时代》于1994年由“进步”出版社出版。其余手稿，包括哲学和文化的著作随后以俄文和德文出版。据布哈林女儿古尔维奇说，诗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工编辑，暂时不能发表。另外一些重要文件遗失或被销毁，其中就有布哈林论述文化的第一卷手稿，这是在被捕前夕完成，在搜查住宅时被没收的。

1919年6月初，“五四”运动蓬勃发展之时，北京大学等校700余人被捕，陈独秀写《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以鼓舞学生。文中写道：

“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价值的文明。”

布哈林一生曾多次进出这两个“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参与了“真文明”的创建。可惜的是在斯大林的监狱里，他再也没有可能从监狱出来再进研究室，而是把监狱和研究室合二为一了。

一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是千千万万革命战士流血奋斗的历史。我们看到有不少仁人志士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牺牲在对敌斗争的战场。而有的革命战士在敌人的牢房里，还给后人留下不朽的诗篇，发人深省的著作，最著名的在中国有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在德国有卢森堡的《论俄国革命》，在意大利有格兰西的《狱中札记》。他们在战场上拼搏之后，利用狱中的“余暇”，反思过去，展望未来，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给后人留下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这恐怕也是他们的敌人所始料不及的。但是在“自己的”监狱里，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时间里争分夺秒地写下三本巨著，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甚至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但愿也是绝后的——我们不希望再看到此类悲剧的重演。

布哈林遗著的翻译出版，得到了布哈林女儿古尔维奇-布哈林娜、德国贝格曼教授、俄国彼得堡大学希拉科拉特教授、我国著名出版家沈昌文先生和中央编译局殷叙彝教授的大力协助。古尔维奇-布哈林娜还专为《社会主义及其文化》中文版写了序言。对他们为中国出版布哈林遗著所提供的帮助，谨表衷心的感谢。

2006年11月于北京

斯·尼·古尔维奇-布哈林娜：致中国读者^①

亲爱的中国读者！

摆在你们面前的是1937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在位于卢比扬卡广场的苏联监狱中写就的一本书。1937年，在我国历史上是政治镇压的象征，而这一年恰好是十月革命的20周年。布哈林关在狱中，这仅仅是20世纪的谬误还是大悲剧的标志？陷入刑讯室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列宁“遗嘱”中被叫做全党所喜欢的人，而在亲近的朋友圈子里被称作“革命的金童”。

在狱中手稿里，尼·伊·^②对自己的一生和工作、对自己从事的社会主义理想和苏联新社会建设过程的研究进行了总结。我们这些后代在被叫做社会主义的社会崩溃的痛苦年代读他的书，思考他对20世纪出路看法，我们在思考和探寻中找到过去同现代的联系。

尼·伊·是在思想上处于极端可怕的条件下来写作的。是否会留他一命？或者对他来说值得为大事业做出牺牲？尼·伊·认为这是社会主义下刷新人类的办法。如何拯救，如何保护家庭和众多的亲

^① 斯维特兰娜·尼古拉耶夫娜·古尔维奇-布哈林娜（1924—2003）——布哈林和第二任妻子古尔维奇的女儿，历史学博士。在1937年的恐怖年代改用母姓。曾在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习，1946年被开除。1949年被捕，被判处流放5年（在新西伯利亚区的皮赫托夫卡村）。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遇赦获释。1954年毕业于高尔基大学历史系。1956—1960年为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在该所工作。1988年，我在联邦德国参加布哈林问题国际研讨会时与她认识，后来曾两次在莫斯科拜访过她。这篇序言是她特意为本书中国版写的。

^② 布哈林女儿对父亲的尊称。

人？如何在文中避免出现会被刽子手利用的疏忽？如何保护自己的著作以免失踪？让我们读一读在总统档案库中同书的手稿保存在一起的札记，这是他用铅笔写在纸上，供自己用的：

1. 狱中思考。时限 *citta dolente*^①。
2. 生死之间。
3. 如果死的话，你带着什么去死？为什么而死？特别是在目前阶段。
4. 如果能活，怎么活，为什么而活？
5. 抛弃个人的一切。
6. 在这种和那种情况下都是一个结论。
7. 国际斗争的反应。

这些思想同尼·伊·在 1938 年法庭上的最后陈述相呼应。1938 年 3 月 15 日，他遭枪决。

* * *

“社会主义和文化”这个题目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1922 年起的著作中占重要位置。1922 年 10 月 9 日，他在大剧院举行的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作“工人革命时代的文化问题”的报告，10 月 11 日报告在他主编的《真理报》上发表。以后在《消息报》和《真理报》上发表了有关论文。1923 年 2 月 4 日，尼·伊·在彼得格勒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的大报告，这是在大学生大会上作的，据报纸报道，有六千人与会。报告以小册子出版并立即被译成德文。

关于自己的著作，尼·伊·事先通知了列宁：“……我现在趁空写‘工人革命中的文化问题’的小书。有好多问题想同您谈谈，因为许多问题都是新的，非常难。但不敢给您添麻烦。”^②

从这时起到 1928 年（含），每年都有新作问世，往往出几版并

① 意大利语：苦难所，地狱。

② 布哈林致列宁（无日期）。АП РФ，ф. 47，оп. 1，д. 2，л. 5。

翻译成多种外语。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是作为狱中手稿前身的那些著作，即涉及作为人类历史中的新时代、作为文明的新文化的社会主义问题。例如：《论我国革命的性质和在苏联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列宁格勒 1926 年）、《列宁主义与文化革命问题》（1928 年）。^① 1929 年，尼·伊·在政治上失败，中断两年之后，又重新出现这一题目的文章，但涉及的问题扩大了。在 20 年代主要问题是“革命与文化”，30 年代则成了“社会主义及其文化”、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些年的主要文章是发表在《消息报》上的（1934 年 3 月 6、18、30 日）《资本主义文化的危机与苏联的文化问题》。此文是尼·伊·1936 年 4 月 3 日在巴黎所作的大报告《当代文化的基本问题》的基础。这一报告是狱中手稿的直接前身。^②

“社会主义及其文化”的题目是怎样产生的？是什么促使尼·伊·认真研究这一问题的呢？他本人提出这些问题并给予了回答。问题早就出现，革命后在争论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可能性的时候重新提了出来。在俄国，资本主义没有达到发展的高级阶段，落后于欧洲和美国，而政权已经落到无产阶级手中（以布尔什维克党为代表）。1923 年 2 月 4 日，尼·伊·在彼得格勒说，在 20 年代初俄国和国际革命进入了放慢前进速度的阶段，1921 年俄国放弃了军事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布哈林对大学生们说：“我们的敌人……作出了所谓共产主义破产的极端结论……”，断言“正如社会民主党人所期待和所预言的，大规模的历史实验以失败和破产告终。”^③ 作为破产证明的另一个论据是革命的成本。巨额成本有说服力地证明暴力革命是欧洲社会党所不能接受的，在俄国这样的国

^① 尼·伊·布哈林：《列宁主义与文化革命问题》，《真理报》1928 年 1 月 28 日；文集《革命与文化》，布哈林基金会莫斯科 1993 年版，第 119—140 页；《布哈林选集》，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68—390 页。

^② 见尼·伊·布哈林：《狱中遗稿》第 1 卷《社会主义及其文化》，第 253 页。附录：《当代文化的基本问题》。

^③ 尼·伊·布哈林：《革命与文化》，莫斯科 1993 年版，第 31—32、35 页。

家是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的。^①

尼·伊·对“我们的部分同志和工人阶级中的部分人对我国内外方针的正确性”所发生的疑问和动摇感到不安。人们怀疑，“我们的敌人是不是对的，在我们面前是不是存在难以解决、难以克服的危险？”尼·伊·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我们党的全体代表，无论如何都必须对这些大问题做出坚定的回答。因为我们的命运首先取决于在我国条件下文化问题的解决。”^②尼·伊·直至自己生命的最后时日都在解决这一问题。

列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文化水平（在夺取政权之后）可以通过另一个革命——文化革命来取得。布哈林肯定，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将在文化上成长起来，成为组织者。“过渡时期的作用恰恰在于，让工人阶级成熟成为能够管理社会的阶级，然后融入共产主义社会之中，那时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被废除，旧的阶级划分的残余将会消失。”^③

狱中手稿的目的、任务，总的讲还是和过去一样，给社会主义的批评者以全面的答复。尼·伊·捍卫的是作为思想、学说、理论和作为其具体体现的在苏联经过20年发展的社会主义。^④他断定，社会主义创造了新文化和新文明，它把人类从资本主义的罪恶和矛盾，从其所固有的危机和战争，从法西斯主义中解放出来。十月革命20年之后，尼·伊·不仅证明革命本身是可能的，而且证明在苏联卓有成效地继续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可能的。作者认为，社会的发展趋势就是其证明。问题在另一方面——说服欧洲和美国的社会主义和民主力量，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支持苏联这个反法西斯强国。这位

① 尼·伊·布哈林：《革命与文化》，莫斯科1993年版，第39、49页。革命的成本，这就是大量的人员死亡和生产资料的破坏。见郑异凡《布哈林论稿》北京1997年版第109及以后各页（中文版）。

② 尼·伊·布哈林：《革命与文化》，莫斯科1993年版，第34页。

③ 列宁：《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3卷。布哈林《革命与文化》，第50页；《布哈林文选》，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88年版，第287页。

④ 尼·伊·布哈林：《社会主义及其文化》，第125页。

社会主义理论家是在争取民主同盟者（按照 1935 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人民阵线政策的决议）。可以问，手稿的这一立场是否具有实践意义？要知道，手稿的命运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存入秘密档案库。也许他在内心深处希望能影响斯大林的选择——同谁结盟，是同希特勒结盟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还是同后者结盟反对希特勒？历史自己做出了选择——反对希特勒。1938 年的审判给布哈林提出了一大堆罪名，手稿成了证明其无罪的有力证据。

在我们时代流行一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学说是一种乌托邦。而试图实施社会主义更是乌托邦。所建设的一切，所做的一切，都不符合学说，不是来自学说。因此，我们对狱中手稿里的“布哈林选择”感到兴趣。至于乌托邦，现在如不予理睬那会是轻率的。合理一些的做法是去研究：人类历史上以往的所有乌托邦（其中包括狱中所写的）都应是仔细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没用的东西。尼·伊·的著作有助于理解人们在生活和头脑里所遇到的 20 世纪的乌托邦。尼·伊·嘱咐我们要不妥协地反对法西斯主义，要坚持人道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国家民主化的现实目标。

* * *

作者解释的第一个问题是评价苏联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标准。尼·伊·坚持研究问题的历史方法：社会主义不是作为“绝对理想”的现成的产物诞生的，它是发展中的、建设中的社会，不断地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社会主义理想也不是一个停滞的绝对物、不运动的“理想社会”，它经历不同的实现阶段，朝共产主义方向发展。标准还是存在的，主要就是由其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社会类型所达到的高度。社会主义应有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因而居民拥有较高的生活水平；社会的人道性质、文化水平、各种关系（个人、社会组织、整个社会、国家）的性质亦应如是。

按照主要标准比较两种制度，其结果并不令人感到宽慰，尼·伊·在为我们的落后解释时提出的理由是社会主义还年轻，他寄希望于劳动生产率的高速度发展。论据似乎是无可争议的。后来，

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尼·谢·赫鲁晓夫指靠高速发展生产，宣布“目前这一代苏联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中”。他也错了。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有效的，而不是挂在口头上的口号，只有在能真正实现对人的关怀的物质条件出现的时候才会“浮现出来”（布哈林语），因此还是一个年轻的口号。发展的趋势应当显示出社会人道性的发展方向。

在布哈林那里，个人决不是在庞大的国家机器中知道自己位置的一颗螺丝钉，它完全附属于整个机器及其主人，随时准备被扔掉。把人们连接在一起的组织，也决不是从领袖通向听话的群众的斯大林那著名的“传送带”，而是一种集体，它使个人在精神上得到发展，使其身心向美好的方向发展。尼·伊·认为，在他那时代已经显示出集体主义优于个人主义。这位囚徒在梦想未来的新社会。“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崭新的和具有历史特点的人道主义。这里第一次创造出不是畸形片面的“经济型”的人，而是完整社会中的有血有肉的完整的人……“在人与人关系的所有领域中立足于个人尊严和对个人的尊重的共同性、团结、友爱、高尚的利他主义（不是作为强制的规范，而是成为本能）、友好、爱心、人性，一切为了社会的英雄主义和高超的才能——这就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最大特点。”^①

在战争中，在战前和战后，“新人”确实经受了英雄主义的各种各样的考验。布·奥库贾瓦的一首著名歌曲中唱道：“我们不惜任何代价。”可悲的是当局不惜以人的生命为代价。决定劳动生产率的各种因素中并不处于最后一位的，也是检验社会主义性质的标准的因素，正是人的自由不自由。

* * *

“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被取消”——1923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① 尼·伊·布哈林：《社会主义及其文化》，第195—196页。

就这样说过。^① 在结束狱中手稿的时候，他又回到“国家消亡”问题上来，这个问题对他来说特别重要，他以此在逻辑上完成了对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考察；这个问题对于为尼·伊·辩护具有巨大意义，因为它驳斥了斯大林关于1916年就国家与革命问题争论中尼·伊·持“反列宁主义”立场的歪曲论断。当代研究者认为，布哈林“像列宁一样是国家主义者”。^②

恩格斯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公式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后国家的民主化过程，国家政权放弃强制和暴力的职能。^③ 这一过程的次序是这样的：“首先消亡的是最尖锐的外部强制工具——陆军和海军；其次是惩罚机关和镇压机关系统；再其次是强迫性的劳动等等。”列宁提出另一种次序：首先是强迫性的劳动，其次是惩罚机关和镇压机关系统，最后是陆军和海军。^④ 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列宁认为社会主义下“国家的消亡”是共产党人的最终政治目标。有一个矛盾——怎么可以把对暴力革命的推崇同国家“消亡”的理论放在同一个理论之中呢？这个矛盾的解决非常简单：按照恩格斯的看法，资产阶级国家不是“自行消亡的”，而是被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消灭的”。消亡的是革命后的无产阶级国家或者半国家。^⑤ 夺取政权后不久，1918年1月24日，列宁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说：“我们真正有了这样的政权组织，这种组织清楚地表明，我们正在向完全取消任何政权、任何国家过渡。”他补充说，这还不会很快做到。^⑥ 在1918年，列宁有8次谈到国家消亡问题。

如列宁所说的，包括马克思在内和以他为首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为自己提出的目标已经在1919年写入俄共（布）新党纲和共产国际

① 尼·伊·布哈林：《革命与文化》，第50页。

② C. B. 丘丘金：《列宁和布哈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左翼》，见《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争论问题》，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153页。

③ 《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122—128页。

④ 《列宁全集》，第60卷，第319页。

⑤ 《列宁选集》，第3卷，第122—128页。

⑥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73页。

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献之中。列宁的提纲被收进他在代表大会的报告之中，其中包含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它对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尤为重要）——“立即”：“苏维埃民主……已经立即开始了使一切国家完全消亡的准备工作。”^① 提纲成了共产国际的正式文件。在根据布哈林报告通过的《共产国际行动纲领》中写明，无产阶级专政将逐渐消失，国家将消亡。^② 共产主义社会将是没有国家的社会。

尼·伊·是认真对待这些文献的，不是把它们看作是空洞的宣言。他关心着手采取措施开始实现民主化。1924年，他在给捷尔任斯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我们应当尽快转向较为‘自由’的苏维埃政权形式：少一些镇压，多一些法制，多一些讨论、自治（在党的领导下……）等等。得到您赞同的我发表在《布尔什维克》上的文章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方针……问题具有原则意义，这就是事情的关键。”^③ 向政权和党提出社会生活民主化的问题，这是尼·伊·无可置疑的功绩。

由于离目标还很遥远，列宁所指出的矛盾在理论上就不存在了，只有在共产主义下才有可能达到这一目标。而在目前，“无产阶级专政”应当为巩固苏维埃国家工作。尼·伊·认为，这就是任务的辩证统一。无产阶级专政“作为集中的暴力……最终将消灭任何暴力”；作为国家政权，“它为一切国家的死亡做准备”；“它在为自身的存在而斗争的时候，它也同时在消灭自身的存在”。^④ 这些写于20世纪之初，1920年的话，听起来是多么奇特的预言（但完全是另一种含义）！

预见到即将发生的战争，在无情的暴君专政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等待自己的末日。在这种情况下尼·伊·完成了论社会主义的著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94页。

②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莫斯科“党的出版社”1933年版，第187页。

③ 《独立报》1997年9月11日。见西蒙·赫罗莫夫的文章。

④ 尼·伊·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政治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89年版，第168页。

作，赞颂党的领导作用，梦想新的人类、未来的美好的新人。

“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到无国家的社会，其高度组织性失去了任何强制的性质；‘政治’永远消失，消失的还有等级制、权力、法律、法、军队、监狱、法院，以及对人的发号施令。……在下两个争取社会主义世界胜利的五年计划里将实现另一个大跃进，从社会主义的人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向无须任何笼头、任何强制规范、任何国家、任何政党的人的跃进。”^①新人将除去来自旧世界的恶习：“……妒忌、奸诈、阴谋诡计——这一切作为心灵运动和行为动机将无法理解；贪图权力、虚荣心、妄自尊大、降服他人、控制他人的爱好将消失。甚至在过渡时期有时在客观上是有益的一些特性（例如权力范畴内的思维）也将过时和消失，因为甚至人与人之间‘狼的争斗’之遗迹也将完全消失。”^②

已经不年轻的人的这种幼稚是否有点奇怪，还是另有原因？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人类是否变得好一些了？有人性一些了？我们，我们这一代历经沧桑，难道都明显地全向好的方向变了？我们现在的人正如我们的先辈一样，多数人离理想境地还很远。倒是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思想和灵魂之中存在着对生命、自身、祖国和全人类的希望。要知道，出身和自我教育使得这位梦想者身上没有它所列举的人身上的不良品质，正是他准备着迎接未来的社会。而我们这些后代，是否看到诱人的地平线，是否迎向它，甚至明明知道它不让人们接近？怎么办？是停下来还是前进？行路者能开辟出道路……

斯·尼·古尔维奇-布哈林娜

① 尼·伊·布哈林：《社会主义及其文化》，第214页。

② 尼·伊·布哈林：《社会主义及其文化》，第159页。

目 录

郑异凡：“布哈林狱中遗著”序 /1

斯·尼·古尔维奇－布哈林娜：致中国读者 /1

第一章 论历史观点和评价的历史标准 /1

第二章 社会主义文化的物质基础 /13

第三章 创造完整的人 /26

第四章 民族文化问题和完整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建立 /40

第五章 创造完整的人类 /55

第六章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多样性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
多样性 /70

第七章 个人与社会的问题 /80

第八章 平等与等级制 /93

第九章 自由问题 /105

第十章 进步问题 /117

第十一章 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的风格 /129

第十二章 论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 /141

附录 布哈林：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 /157

布哈林：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 /180

布哈林：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 /213

布哈林：当代文化的基本问题 /226

尼·布哈林给安娜·米海伊洛夫娜·拉林娜的信 /250

安娜·拉林娜：关于尼·伊·布哈林的绝笔信 /253

弗·赫德勒：布哈林狱中遗稿首次问世感言 /260

跋 /271

人名索引 /273

第一章

论历史观点和评价的历史标准

在本书第一卷我们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瓦解和崩溃过程——从其物质基础开始到其意识形态创造的顶峰结束；我们还考察了资本主义的疯狂企图，想在法西斯主义的基础上摆脱这震撼整个资本主义文化大厦的危机。这种准出路，这种可怜的疯狂的充满血腥的出路，这种幻想的出路，这种注定要遭到世界历史性的破产的出路，它的内部矛盾，它的严重欺骗性，它那可耻的骗人的假面具，它那骗子的本性——所有这一切的基本特点和典型特征我们都看到了。当时我们只是草草地涉及社会主义所提出的解决当代所有令人烦恼的问题的现实的具有生命力的解决方案。在这里，我们将全面地阐述这些解决办法。这些解决方案现在无需胡编乱造。因为社会主义实际存在于苏联已经将近 20 年了，这是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烈火中诞生的新事物的制度，它为自己的存在和发展而斗争，获得了光辉的胜利并且成为人类社会历史进化中的无可争议的决定性的因素。需要看到这种发展的真正趋势，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这里已经是自觉地和有组织地——产生和成长的，这与资本主义条件迥然不同，完全摆脱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引导全人类走上与资本主义敌对的崭新的历史发展新道路。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在不同然而相似的封闭的发展和死亡的圈子里兜圈子，没有力量在奴隶占有的基础上从特殊的商业——“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过渡到新的

发展阶段。其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就是流传如此广泛的（从巴比伦到希腊人和罗马人）注定的历史循环理论，从神话中的“黄金时代”（“*aurea prima sata est aetas*”——奥韦狄乌斯）直到悲惨的覆灭的结局。从封建主义突破到资本主义之后，雇佣劳动、机器技术等等为另一种类型的历史运动创造了新的基础，非常奇特而又前所未有的基础。与过去的历史相反，这一运动的矛盾不是以历史团团转的办法得到解决的，而是让这些矛盾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从而创造新的，更高类型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

在这里社会主义绝不是以现成的形式诞生的，就如“绝对理想”那样，或者像从海浪泡沫中诞生的阿佛罗狄忒那样。它本身是发展中的历史因素，其发展的出发点取决于内外环境及其具体历史条件。它在成长。它在斗争。它在建设。它在取得胜利。它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等等。

由此可见，从超历史的观点、静止的观点，从直接用某种绝对的和冻结不变的标准去看待现实存在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都是极端愚蠢荒唐的——不管这种不变的标准看起来像什么，也不管它叫做什么。

早在科学共产主义作为理论学说出现之际，其天才的奠基人就提出同空想社会主义者相反的“理想”的历史标准，彻底摧毁了他们的偶像化的超历史的绝对主义，这种绝对主义把自己来自唯心主义和唯理论观点的原则推广到整个社会发展的本性上去，而有时直接碰到“神的计划”，碰到 *civitas Dei*，极乐的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诚然，流行于欧洲、亚洲，流行于古代、中世纪的以往的世界末日论和千年王国论的全部构想、关于地上“天国”的众多学说、关于“救世主”的全部学说（所谓 *сотериология*），都有大小不等的社会运动为基础，在宗教的外衣下反映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然而，只有像桑巴特这类当代颓废派资产阶级的恶毒告密者，才会把这些古代的愿望同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混为一谈。巴比伦的占星术和中世纪的炼金术毕竟不是现代天文学和现代化学。现在只有在欧洲的法西斯派的骗子才用星星来占卦。

科学共产主义彻底考察了理想、人的类型、文化价值、美德等等的

历史相对性质。但决不要忘记，与此同时，它并没有摒弃社会类型本身之高低这一检验的标准，认为在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人类发展可能性的扩大，可以也应当就是这种标准。换言之，历史相对性本身在这里并没有变成让其崇拜者对之顶礼膜拜的绝对物。对问题的这种辩证提法是唯一正确的提法。

“社会主义理想”，即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是马克思根据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趋势，其中包括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及其特殊的阶级利益的动因的考察而“得出”的。但是就是在这里，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没有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停止不动的绝对物，不是一种完成的、不变的“理想社会”、历史的终点，一切运动都就此停结，出现一个不变动的、死一样的静止、绝对的静态的王国。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天才地描绘了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及其向共产主义的运动的 basic 特点。不仅如此。关于共产主义本身他也不否认它的继续发展，例如可以援引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自由的议论，他说：真正自由的王国是在工作日极短的物质生产必然性的彼岸。但他不想像神那样预言，而只是提出科学的预见。那时还没有供作出预言的资料，目前也没有。因此，社会主义也就是历史地运动着的东西，而不是僵化死板的“绝对理想”。

如果这对社会主义以后的发展阶段来说是正确的话，那么这对其初级阶段也同样是正确的。整个过程正是发展过程，在不同种类和不同类型的斗争中的发展过程。而在社会主义诞生的时候，并且是在一个国家中诞生的时候，残酷的阶级斗争时期（内部和外部的）是为期多年的，甚至是几十年的时期，在这条道路上历史的曲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存在极其大量的强有力的“使事情复杂化的因素”，使发展脱离设想的“理想”轨道的“令人愤慨的东西”。

社会主义的发展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有原则的不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发展具有自发的、非理性的性质。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则是越往后越能按照一定的计划进行，依靠日益增长的组织力量，其概括表现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斯大林说：“计划，这就是我们。”此话表

达的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是资本主义制度所根本无法做到的。但这绝不意味着此公式中隐藏着胆大妄为的纯唯意志论。相反地，顾及客观因素是这一公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需要理论。而斯大林的领导正是表现了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辩证法，总是能掌握事物的尺度，彻底利用具体的形势，确定各项任务的排序，及时改变口号，即从一个任务和口号转向另一个较为高级的任务和口号，从来不忽视整个发展前景。

对某些发展阶段来说，由此必然产生其一定的历史片面性。但是只有沉湎于唯心主义抽象思维的经验之中的人，或者认为伟大的历史变革会在田园诗般的和谐基础上进行的庸人，才会把这看作是反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论据。在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时期“要求”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同时解决所有的问题，这确实是可笑的。相反地，争取军事胜利的任务和“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在当时是唯一正确的。这是历史所必需的列宁的“环节”。对“军事片面性”的批评只能出自蠢人或者公开的敌人之口。但是 *mutatis mutandis*^①，同样也要说一下今后发展的各个时期或者“阶段”，并且是在两种含义上：一个含义是在经济政策范围内各项任务的排序，另一个是在经济任务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其他领域的总和之间的范围内各项任务的排序。自然，对这些原理也不能作简单的、庸俗的和绝对的理解。问题并不是只保留一项任务而完全勾销所有其他的任务，而是把某一中心任务提到首位，是协调和确定从属关系，使所有其他任务服从此中心问题的解决，它是贯穿整个相应发展时期的。

因此，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是自发进行的，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和国家政权的自觉策略中得到了直接的体现。

要理解任何一个发展阶段的历史“意义”，不仅要联系其孤立的具体状态，还要把它与过去和以后的状态联系起来考察。只有从这种理解出发，从对事物的这种完整的观点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然而，许

① 拉丁语：作相应的变更。

多批评苏联社会主义的人（国外的和国内的）发出的数以百万计的批评之箭全都未中靶的，因为都出自另一些前提，这自然是有其社会阶级根源的。

在经济领域，例如把开始新经济政策和取消军事共产主义看作“不是策略，而是演变”。（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那时的中心任务是：同中农和解，与之建立牢固的联盟，千方百计地增加产量。如果仅仅孤立地看待“退却阶段”，不是把它看作进攻的准备（而在列宁看来，后者恰恰是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战略和策略之所在），那自然会把这看作是交出阵地，向资本主义倒退。然而敌人完全打错了算盘。因为他们片面地看待发展的一个阶段，脱离了其与以后阶段的联系。或者举另一个例子——重工业的建设，似乎这一中心任务及其实现意味着消灭轻工业和农业。而实际上这一任务的解决意味着轻工业的极大繁荣和农业在新的机械化的基础上的全面革命，这时农村的阶级斗争、集体化的胜利以及富农的消灭都在新的技术基础上获得强有力的支持。或者再举斯大林提出的从技术转向掌握技术的干部的口号变化为例。不是有人说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忘记了”人，搞机器拜物教？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同样的情景，对一个任务的依靠（历史相对的）被“批评家们”变成了超历史的绝对物，以后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感到痛苦的失望。

马克思认定，资本主义生产是为利润而生产，是为生产而生产。社会主义经济是满足群众需求的经济，是制造“富裕和文明生活”的经济。不过，这种经济——特别是在我们这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在极端艰苦复杂的发展起点上——它在达到能真正开始发挥自己的这一作用的高度之前，需要成长、形成、巩固，通过一系列发展阶段。这也就是历史，具体的过程，而不是抽象的理想图式或者云雾中的海市蜃楼。

同样的东西我们也要用于经济范围之外。例如大家知道的批评社会主义为“肚子的理想”，甚至像海因里希·海涅^①这样的头脑清醒的人物也提出这样的批评。至于敌人就不用说了。我们这里康斯坦丁·列昂

^① 海因里希·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和政论家。

季耶夫断定，社会主义“工作者”的理想是“中等欧洲人”、吃饱的小市民和资产者的理想。尼·别尔嘉耶夫把自己倒向饱食者阵营的原因解释为，似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及其唯物主义等等是资产阶级理论，是著名的“肚子”意识形态。提出“以大炮取代黄油”的当代法西斯理论家，求助于“精神价值”以竭力掩盖自己对物质财富的漠视。我们看到，昂利·伯格森^①鼓吹禁欲主义和素食主义，作为摆脱现代文明罪恶的手段。大家异口同声地猛烈攻击“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因为它似乎出于布尔什维克的“粗陋的唯物主义”而坚定不移地关心物质需求，并且忘记了所有这些“精神价值”的爱好者从相反的阵地向我们攻击。然而，就实质而论，这里没有任何复杂的问题。群众性的精神文化是不可能从贫困中发展起来的。对充饥之物的操心越处于次要地位（因为这个问题可以说将自动解决），就会有越多的自由时间从事其他的工作，“精神文化”就会越发光辉、精美、灿烂地得到繁荣发展。援引美国作为论据，说那里得到强大发展的生产力并没有造成“精神文化”的相应发展，这种论据是缺乏说服力的胡说八道。或者用中世纪的“清高精神”去同资本主义作比较。美国的金融资本是强盗，它使用掠夺的办法使土地贫瘠不堪，使无数的人变成机器和传送带的驯服的附从，使干活的人寿命缩短，使他们变傻。社会主义难道与此有什么共同之处？在社会主义下，机器解放人、解放人力和时间，等等。在中世纪群众处于野蛮状态，而“精神文化”是一小撮教士、王公、贵族的教堂淫乱录（блудословие），即使著名的“骑士”也只不过是酗酒的野蛮动物而已。只有“吃饱的人”，那些不愿意饥民成为饱汉的人，才会鼓吹为了“精神价值”而让群众挨饿。

在这里，苏联社会主义的真正发展用经验展示了，向富裕生活过渡如何同时使精神文化得到群众性的高度繁荣。当然，过去在新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也有过这种发展，但只有在这里，随着向富裕生活的过渡这个过程大大加速了。

^① 昂利·伯格森（1859—1941）——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非理性主义者。

不过，又提出了新的“论据”。文化的群众性乃是其粗放式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文化集约式发展，向纵深的发展；还未出现布尔什维克的普希金、贝多芬、歌德、门捷列夫，等等。但这也是反历史的方法：因为文化粗放式的发展是其大规模的集约式发展的历史前提。简单的概率理论告诉我们，在选择范围扩大的情况下，天才的人数一定会增加。而什么是苏联英雄？这就是本行业的天才。这一过程已经开始，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发展。

在我们物资还不很充裕的时候，难以把对人的关怀提到首位。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把重点放在生产、技术等等上面。特殊的相对的历史技术主义使近视的批评家找到一个借口，使之成为超历史的绝对物：布尔什维克没有取消拖拉机这个圣像，搞“机器宗教”。但机器在我们这里，正如所有其他东西一样，是为人服务的工具，它一旦在广大范围内得到运用，就会为对人的关怀创造真正的（而不是口头的和口号上的）前提条件。绝非偶然，在一定的時候有力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口号，把它当作真正决定发展方向的有效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口号。

我们这里不列举大量例子了，在以后的叙述中将系统地谈及大量相应的问题。我们只需要强调一点，必须历史地，而不是抽象地对待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离开这种方法，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实际过程。而这种认识是作出正确评价的必要条件。

还是回到我们的出发点。当代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整个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大危机。如果作抽象的理论议论，可以提出“运动”的不同可能性：在法西斯主义的基础上战争的再生产和倒退类型的运动，加上生产力的衰落和失去生机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封建化，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进步的发展类型。具体的分析向我们展示，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必然的，因为法西斯主义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一个基本矛盾，而只是加剧这些矛盾；它自身就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和无力的辩证体现：他团结资产阶级大军，同时又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展示出资本主义绝望的危机状态；而社会主义则是在实际中解决这些矛盾。但是否可以说，在客观意义上它要高一些？这

里是不是一种不可比较的社会形态的简单差别？我们在本书的第一卷已经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所说的较高的社会类型，指的是社会发展的较大可能性，及其在各个方面显示出来的活力。其根据是社会劳动生产率所达到的程度，并且所谓“精神文化”的运动取决于剩余劳动和空闲时间的量。较“高”和较“低”的概念从社会本身的观点来看是具有客观含义的：因为在一种情况下基本趋势是灭亡的趋势，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发展的趋势。当然，也可以提出如下的问题：为什么灭亡要比繁荣“坏”，死比生坏，腐烂的气味比花香坏。不过这一问题的答案超出了逻辑范围。人的这种评价标准是非人性的，也就是说，本质上存在致命的矛盾：它们是人类的尘埃、人类社会垃圾的产物，是其自身作为方法论原则的腐朽。

从资本主义危机只能沿着进步路线走向社会主义。作为特殊的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相对历史性及其文化和文化的特殊风格，正是由于这一历史“大旗”才得以展示出来。关于“绝对理想”的任何超历史的和非历史的提法，总是导向也不可能不导向失去任何具体内容的空洞抽象的公式，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把不同的时代置于这种公式和不同的“含义”之中。“尽善尽美”的抽象概念就是这样，视时间的不同往里面塞进各种各样规格的“尽善尽美”；古希腊“真善美”的人的概念就是如此，当时这一概念是有完全确定的内容的，而在“普遍的”形式内则是一种抽象的公式；“自由、平等、博爱”的概念也是这样，这是法国革命提出来的，在这里例如平等实际上指的是在法律面前的形式平等，而在经济领域则存在物质上的极端不平等（而社会主义的平等概念正是意味着消灭阶级和阶级社会）；康德的“绝对命令”也是这样，这里可以放进任何内容，而康德本人放进的是有德行的基督教的资产阶级庸人的准则。如此等等。

为了在这里也找到某种坚实的基础，必须认识我们时代的理想的历史必要性和历史含义，并且从进步的社会发展的观点去评价其内容。如果在目前条件下只有社会主义的运动才可能是进步的运动（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被看作是发展中的因素的社会主义理想就提上了

日程。如果我们历史地考察一下，社会主义在社会生活活动的所有领域，从生活的技术经济方面直到折磨人的高级精神文化本身的问题，解决了那些问题，那么这一原理就会得到充分的和丰富多彩的展示。而目前已经可以作这种历史的分析，这里依据的不仅有资本主义的现实矛盾及其衰落时期导致社会主义的规律性繁荣的分析，还有对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趋势的历史分析，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现在简略地看一下相应的历史路标。

在技术—经济领域，社会主义克服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形式之间的基本矛盾。它把生产力从资本主义的桎梏中（也从小私有者的局限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技术获得了无障碍发展的强大可能性。最重要的生产力即劳动的人，成了历史过程的创造者，显示了以前任何时代所绝对不可能有的创造力。生产成了为富裕和文明生活的生产。群众的组织和生产的计划性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的效率。城乡关系完全变了，城市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吸血鬼，而成为农村的帮助者，以往这经济的两极之间的差别将越来越快地消除，从而极大地加快整个发展进程。等等，等等。苏联建设的每一年都显示了社会主义的这些发展趋势的良好作用，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经济理想能够同社会主义对抗的呢？退回到中世纪？走向死亡？

由于不断的战争，这种死亡威胁着资本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把战争变成了超历史的绝对物。社会主义则是最终消灭战争。这决不是乌托邦，而是现实的发展趋势。这不是超历史的抽象的理想，而是社会主义内在的必然前景，正如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一样。各个时代的一切“和平主义”，从世界主义者的古代和平主义到康德的“永久和平”和最新的自由社会和平主义，统统是乌托邦，因为它们不依靠任何物质力量。在社会主义这里，这些特点是历史地存在的。

私有制和一切形式剥削的消灭、剩余劳动的迅速增加、工作日的缩短等等，在历史上第一次为各种形式的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越来越广泛的和无所不包的民主的形式得到发展，有利于把千百万群众空前地组织起来，促使他们创造性生

活的紧张度得到不断提高。机器、物与被它们奴役的人之间的资本主义矛盾为机器的解放作用所取代，机器成了满足群众需要、减轻劳动负担、保障其创造性休闲的工具。在缩短工作日和计划经济下，最新技术大大扩大了劳动者的整个智力视野，千百万人接受教育和从事创造的可能性、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鸿沟的缩小，确实是在创造新的人类。注定要被法西斯当作奴隶的妇女、被法西斯鄙视为“价值不全”的先前的落后民族，都被大规模地卷入整个伟大的文化交往之中。天才和英雄人物的培育天地、选拔天地大为扩大。英雄主义、建功立业、文化、科学和经济领域的“精英”大量出现，他们不是脱离千百万人的个别分子，不是特殊的种姓，而是人民自身的优秀分子。进步从空洞的公式变成千百万人感受得到的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每一个工作者都感觉体验得到自由，这是其自身发展、丰富其生活的实际自由，有越来越多的创造性、物质上的富裕、文化的发展、智力视野的扩展、社会积极性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精神享受的获得、自身力量和个性得到发展的感觉等等来充实这种自由。个人第一次作为群众性现象出现，而不再是在不同历史方案中出现的上层奴隶主的个人。不同代人之间的联系是建立在新的家庭和彻底消灭妇女的不平等地位的基础上的，它在特别关怀儿童和消灭削减“新生命生产”的根源的情况下得到发展。奴隶主宗教的世界观被作为糟粕抛弃了。科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通过技术、农艺学、教育，等等，科学直接同实践结合于革命改造世界的统一事业之中。科学资料的增加同保守的思维形式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矛盾，在这里是靠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的。如此等等。

不过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也就是在历史中，找到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合理答案。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在阶级关系变动中和它所面临的任务的基础上得到发展：这表现在苏维埃民主的扩大以及对宪法作相应的修改之中。但我们简略列举的任何一个问题实际上都只能历史地解决，不会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我们以最一般的问题即关于社会劳动生产率问题为例。我们把它作为比较不同社会类型、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的标准。但是否可以平面地、非历史地、非辩证地把这一标准用于发展中的

社会主义呢？如果我们把国内战争年代，甚至恢复时期，甚或再稍迟一些时期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去同相应的欧美系数作比较，那么我们得到的答案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但这个答案实质上即历史地是错误的，因为它拿不可比的东西作比。在稍稍具备和平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表明，社会主义能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这正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在社会劳动生产率上一定能全面“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新的社会类型的高度本身，从其物质基础开始，也是历史地展示的，虽然在理论上早已预见到这一事实。我们再以自由的多方面表现为例。如果说的是政治自由和相应的权利，那么，例如在旧的宪法中，与无产阶级相比，为农民规定了某种不自由（不平等）的东西，现在这些东西被取消了。如果就发展的自由，最现实最重要的自由而言，那么在还存在贫困、资金缺乏、学校不能正常教学等等情况下，这种自由受到了物质条件和可能性的实际限制。随着国内富裕生活的发展，自由开始越来越扩大。用黑格尔的语言来说，它在“形成”。在这个基础上，在消除阶级过程的基础上，无阶级性的个人在诞生，这种个人的精神内容越来越丰富。社会主义竞赛在日益发展，其类型在历史地不断提高，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着人才和英雄的选拔，其人数越来越扩大。

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最主要的条件是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特别是法西斯的存在，因为法西斯是反对社会主义和“全体进步人类”的疯狂战争。这种特殊的环境给社会主义的发展留下了特别的印记，包括建设强大国防力量的必要性，国家机关相应的多环节的结构，严格的铁的纪律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措施。阶级敌人的代理人在这种包围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主子。

这种历史时期应当予以消除，也能够消除，但只有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取得绝对胜利的情况下才能做到。因此，提到历史日程上的不是鼓吹普遍的爱，而是鼓吹对苏联的热烈的爱国主义，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强大力量。攻击苏联的“军国主义”，这就意味着在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面前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因此，不能从“永恒”标准（这

种标准只要稍微批判地碰它一下，就会立即烟消云散)的观点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而必须历史地提问题，作出历史的评价。由此直接间接得出的结论是要全力加强苏联的国家政权，这是当前的绝对任务，是日后“国家消亡”的历史前提。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社会主义“理想”作历史评价是件复杂的事情。一方面，历史地提出作为比资本主义高级的新的社会结构的一般社会主义问题(可有条件地称之为“最终目的”)；另一方面，历史地提出社会主义的实现程度问题，这完全取决于社会主义的具体发展条件。这涉及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也涉及形态各异的精神文化。但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应当联系以前的和以后的阶段来观察，这样才能看清其作用和历史意义。正是这种联系使历史成为历史，成为统一的过程，而不是把不同时间的碎片机械地拼接在一起的东西。

以上发挥的原理是具体分析社会主义文化问题的必要条件，因为在这一分析中我们依据的是苏联的实际历史经验及其无比丰富的内容。

第二章

社会主义文化的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前提和 *primum agens* ^①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经济发展的性质、类型、规律性本身都发生了变化。

第一，在这里国家是经济、法的主体，但不是立即就完全成为这样的。它的这一特点处于发展和生长之中。但无论如何已经掌握了经济生活的“命脉”，这改变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因为这里基础的决定性部分同上层建筑融合在一起了，政治在相当程度上成了经济的政治和对经济的管理。

第二，与此相联系的是整个发展进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资本主义及其“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通过市场的联系，“整体”的无组织性体现了自发的、非理性的和不合逻辑的发展过程；这种发展的规律性凌驾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代理人之上，常常以其“自然规律”的“自发力量”压垮他们（例如危机，谁也不愿意有，但它们根据严酷的规律性不断发生）。社会自发力量作为一种外部的盲目的力量与人们对立，以其无个性、不取决于人的意志而显得无比有力。

在社会主义下，社会自发性的非理性在逐步消失。经济的组织性越多，其社会主义成分越强，计划原则越有效，合理自觉的建设就能越快

^① 拉丁语：先驱。

地排挤掉商品社会的非理性和“自流”的残余。

在这里无需谈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和社会主义成分增长的具体历史，现在它实际上已经成为苏联唯一的（而不仅仅是决定性的）生产关系类型。从这个观点看，具有特殊意义的是消灭富农这个阶级和农业的全盘集体化。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就说过，农业的改革和土地私有制的消灭应当成为未来变革的基础，否则就意味着马尔萨斯牧师是对的。在我们这里就明显地看到（斯大林当时看到了这一点），发展工业和生产力极低的“小农和极小农”经济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向机械化的大农业过渡成为最迫切的历史需要。在解决这一任务中（在反对富农的尖锐斗争中）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因为这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最困难最严重的问题。

这样一来，社会主义计划就成了无所不包的国民经济计划，发展的非理性就被从根本上击败和消除。根本改变（同资本主义相比）城乡关系对整个经济发展进程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马克思指出，这种相互关系是整个时代的标志。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的关系类型，其基本趋势是消灭这种历数世纪之久的对立。

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城市是农村的剥削者。对中农、贫农和雇农来说，农村曾经是贫困、经济落后、技术落后以及各种各样不文明的王国。一系列因素加强了这种“愚昧的农村生活”并把它固定下来。城市既集中了经济实力，也集中了整个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与这种传统完全决裂。各种各样的哲学家有一种理论，认为农业在技术上的落后是由生产过程有机性质所造成的农业的内在特性；^①以恰亚诺夫教授为首的富农思想家的所谓“俄罗斯学派”规定了农业企业的有限的自然“最佳”规模；一批人为中国劳动密集型的手工的小经济鼓吹和唱赞歌；有人拥护所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等等——当拖拉机和收割机开进田野的时候，不久前还发挥重大作用的田界被消灭了，所有这些都遭到了可怜的失败。农业的落后并非无法克服的、永远如此的天生的生

^① 爱·大卫：《社会主义和农业》；谢·布尔加柯夫：《资本主义和农业》第2卷。见列宁的光辉著作《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

物学特性，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功能，是其社会特点，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了这个特点。因此（技术、农艺学和畜牧学、评估、计划、群众的组织性、有文化的和文明得多的新型工作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再生产和城乡周转的观点看，这意味着工农业之间的真正相互帮助的长足进步，农业本身（在技术、组织、工作方法、社会联系等方面）越来越成为工业的一个新的大部门。由此社会主义积累得到巨大的增长。这就是经济发展的现实趋势，与此相伴的则是文化发展的相应趋势。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已经消失的寄生阶级的非生产性消费的消灭、先前落后的民族边远地区的迅速振兴、社会主义的联合原则、地区分工的实施（产棉区）、科学的大量运用、同技术保守主义的坚决斗争——所有这一切大大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效益。

整个国民经济的革命化是在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工业的巨大增长的基础上进行的。整个工业的发展、轻工业的发展、农业的机械化和化学化、交通的发达、国家的电气化——所有这一切都是以重工业的发展为出发点的。这正是解决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改造任务的关键之所在。

然而最重要，应当置于首位的是劳动者自身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消灭剥削，在于“人手”变成了人、集体的创造者和组织者，变成了为自己工作的人，变成了自身“命运”的自觉生产者，变成了打造自身幸福的真正工匠。由此发掘出工人阶级和被剥削农民阶层在被迫劳动的状况下所无法想象的那种能量。这是基本的和决定性东西之所在。归根结底，这实例经验揭示了一个事实：社会主义能够达到较高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因而达到较高的文化发展阶段。奇怪的是，甚至善意的苏联生活研究者也不能真正完全地理解劳动者的这种全新的地位，这全部热情、激情、英勇精神、胜利的最终源泉。例如韦伯夫妇在其《苏维埃共产主义》^①这部大部头的细心研究著作中，对这一点没有给以特别的关注。而看不到这一点就根本无法理解我国社会主义时代所

^①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Soviet Communism*. Two volumes. Longmans, Green and C. London. 1935.

呼吸的那种“总的气氛”和“社会气候”。

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历史发展和增长，它从点变成片，即实际上成为唯一的（如果撇开细小的个体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方式”，在这里城乡之间的“商品流转”是在国家操作和苏维埃商业（不通过中间投机商）的基础上完成的，随之而来的是阶级的重组和重新划分，并且这里的基本趋势是消除阶级之间的界限，即趋向于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①

不过，这里反对苏联的是它的死敌，他们断言我们这里形成了新的统治阶级，它是集体的剥削者，掌握着国家政权。这是官僚和新贵族。

我们从理论、从苏联生活的真实事实和发展趋势，来分析一下这种反革命攻击。

首先，稍微谈一下这些绝顶聪明议论的理论根源。在本书的第一卷我们已经提到维尔弗雷多·帕雷托^②的理论——“精英轮回理论”，这一理论把社会的变更仅仅归结为一个领袖或一批领袖的更替，而不涉及阶级之间的根本关系。这显然是一种荒谬的理论。之所以荒谬，是因为在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过无阶级的领袖，其政党也同样如此。政党是阶级中最自觉的部分，政党不能脱离阶级。在新的时代，领袖是政党的领袖，领袖也不能脱离政党。因此，一个新阶级的领袖不会具有实际权力，如果阶级不能胜过他们（这些领袖）的话。关于党对阶级专政问题上常见的愚蠢议论（例如安德列·纪德先生的叛徒理论），就在于（除了其他方面）阶级的党在这一理论中被错误地同这个阶级割裂开了，而实际上党是阶级的引导和领导力量。

不过，也许过去的党发生了社会转型，变成了新的社会组织，变成了新的阶级？还在战前，罗伯特·米歇尔斯教授先生（从那时起他不体面地完成了从所谓“革命工团主义”向地道的法西斯主义的转变）就写道：“对这一点的怀疑是完全正确的，仔细思考这种怀疑就会完全否

① 关于这一点详见斯大林论苏联新宪法的报告。

② 维尔弗雷多·帕雷托（Vilfredo Pareto, 1848—1923）——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数学派代表人物，洛桑大学教授。

定无阶级国家（社会。——布哈林）。对巨额资本（生产资料。——布哈林）的管理，……至少给予行政官员以和拥有私人资本，即私有财产相同的权力。”

因此，这里从一开始就“证明了”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在其位置上应是完备的、“理想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特殊剥削制度。问题何在？

问题在于，是否确定实际上的行政统治阶层是一个同其他诸阶级（或一个阶级）利益对抗的特殊的封闭的阶级，或者这个阶层仅仅是整个阶级、人民、千百万劳动者的先进部分。米歇尔斯认为，第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永恒的、必然的，其论据是“群众不内行”，永远应当由“内行”行政官员来统治他们。然而从阶级观点看，这里应当这样提问题：实际上的统治阶层是不是一个封闭的教育垄断者（也就是获得这种“内行知识”），或者这是一种归根结底按定量分配的教育过程的特殊量子力学，能消除群众的“不内行状态”。一眼就可以看清楚，罗伯特·米歇尔斯先生之流在纯理论上主张群众永远处于奴隶状态，而这并不是出于什么必然的合理的前提。

现在，我们来看看苏联发展的实际进程和实际发展趋势。

第一，生活比枯燥的抽象公式要丰富多样得多。首先，关于谁管理（用米歇尔斯的话说）“巨额资本”问题，这本身要比把它装入可怜的抽象公式复杂得多。在我们这里，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 and 服从全国计划的集体农庄手里。但我们的国家本身不是自在之物，它不像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凌驾于社会之上。在我们这里，国家性正在转变为社会性，而无数社会性质的组织同时就是国家的外围组织。因此百万劳动者不仅仅是国家施加影响的对象，他们自身就是国家。在这里，国家不是“我”，而是“我们”，是数以百万计的城乡劳动者。因此，在不同程度上管理生产资料的是集体农庄庄员大会及其管理委员会、工人大会、生产会议、经理、突击手代表会议、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代表大会、集体农庄突击手代表大会，以及社会自治的其他机构、形式、类型，其总体就形成了苏维埃民主。自然，管理的层次不同，形式不同。自然，存在机关的

坚强骨架，这是国家管理的脊梁，丰富全部管理，并依靠群众活动的的所有其他形式。只有瞎子才会否认群众已经卷入这一过程。

其次，突击队员、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是否与外界隔绝？这里的基本发展趋势是什么？只要提出这一问题，就可以看到这一领域发展的特点。这样做的动机是各种各样的：好一些的工资（不封顶的计件工资制），提高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得到社会的各种承认（“光荣的事业、荣誉的事业、英勇豪迈的事业”），对公共利益的认识，等等。正如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在这里可能性并不受特殊体力状况的限制（如纯粹的体力）。进程的动力是毋庸置疑的——愈来愈多的城乡劳动者投身于这一进程。

换句话说，技术提高的过程——生产文明以及“劳动力”的相应成长过程，越来越文明的，能从事越来越高的生产率生产并相应地提高自身生活水平（物质的和精神的）的文明工作者的成熟，都不是单一的和均衡的前进过程。全体群众都在提高，但在这种共同提高中也出现不均衡地，分别进行，但越来越广泛地提高劳动者技能的过程。这样，发展的基本趋势不是使阶层与世隔绝并把它变成“新的阶级”，而是恰恰相反，越来越广泛地吸收越来越多的劳动群众。

第三，新的“内行的”知识分子阶层是否是自我封闭的呢？众所周知，苏联在发展中从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中提拔了大量的这种知识分子阶层：“工程师、技术员、农艺师、研究者、教育家、医生——这些全都是“新人”。他们是否脱离全体群众？这里的基本趋势是什么？回答是毫不含糊的。一年一年地有越来越多的人从各种高等学校毕业。知识分子“精英”越来越成为群众的，他们同群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四，公务员和党员阶层是否首先是自我封闭的？他们直接决定什么样的政策？这里的答案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发展的整个历史不仅说明形式上消灭了教育的垄断，而且说明培育出来的愈来愈多的“有教养的”和“内行的”群众队伍正在蓬勃发展。苏联党和政府的政策竭尽全力以最终消灭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与此同时，也全力提高千百万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同等劳动在收入上的不平等在目前时期是提

高生产力的刺激手段，而按需分配则将消除报酬或生活水平上的不平等。

因此，对问题的具体考察，揭示了所谓在苏联形成了凌驾于群众之上的阶级——“新阶级”的说法是一种诬蔑性的废话和纯属废话的诬蔑。这无非是法西斯和托洛茨基对伟大的社会主义劳动国家的诋毁。

在这一领域的基本过程，是形成社会主义文化和创作工作者的无阶级社会的过程。

现在苏联已经以经验证明非凡的发展速度。社会主义经济的优势（劳动者的新地位、消除技术发展的束缚、大型经济、新农村、另一种城乡关系、经济的计划性、消灭寄生性消费、大规模运用科学等等）导致：（1）生活水平的提高；（2）增加文化需求的基金；（3）缩短工作日。

对这些似乎起码的东西需要从我们所关心的文化问题的角度作具体的解释。

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生活水平的提高。这要通过需求在量的增长及其多种多样的质的增长。产生新的需求和新的生产部门。对文化用品的有效需求在大规模增长。在资本主义下，群众性的需求是极为有限和稳定不变的。在社会主义下，群众的需求及其增长是发展的主要动力：这是整个生产过程的直接目的。资本主义有其“天然的消费体系”，历史的具体的体系：这明显地分为奢侈品和大众消费资料。社会主义努力把奢侈品也变成大众消费品。资本主义把文化用品主要集中在城市，而社会主义把它迅速扩大到农村；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反过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等等，等等。

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的增长使用于满足文化需要的基金得到增加。全国的总预算可以把愈来愈多的钱用于教育（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卫生、科学、艺术等等事业。其中包括具备机械化基础的文化部门：书籍和报刊（机器印刷）、广播、电影等等。文化革命的加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个过程的机械化，它同时也保证了伟大的人民性和群众性。

最后，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使我们得以缩短工作日。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这导致失业。在苏联完全消灭了（abolition）……失业（“技术性的”和“周期性的”）^①，同时把工作日缩减为7小时。缩短工作日的趋势是社会主义的优点之一，从一般文化，特别是“精神文化”的观点看，具有非同小可的决定性意义。生产的机械化导致生活的非机械化，因为这给休息、在各种领域的创造、社会活动、深刻思考、教育、艺术享受等提供了可能性。

但这里产生一个问题。近来流行区分文明和文化，这我们在本书的第一卷已经看到。还在1913年的社会学家代表大会上，阿尔弗列特·维贝尔^②就把文明看作文化的外在（物质）方面。他继续写道：“但我们现在感觉到，文化高于这一切，我们所说的文化的发展指的是某种别的东西……只有在生活超越自身的需要和功利的时候，只有这时候才会有文化。”许多批评苏联的人唱的大体上也是这种调子，他们断定，我们在苏联走的是一条“外在的文明”道路。我们本应在别的地方谈这个问题，但由于这里专门谈到了文化的物质基础问题，所以必须给予回答。

在俄罗斯文献中，像彼·雅·恰达耶夫这样的超“精神”思想家曾经给这一问题以回答。他在第二封“哲学书简”中写道：

“我记得，您过去曾很有兴味地读过柏拉图的作品。请回想一下，古代世界哲人中最富理想、最注意文采的人多么关切地让自己哲学戏剧中的人物生活在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对生活福利漠不关心（我们中某些人把这归功于自己），这确实是一种厚颜无耻的表现。延缓我们进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在艺术中得到反映。”^③

不难理解，从群众性的角度（而不是从单个例外的角度）看，在原始穴居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任何“精神文化”可言的。后者要求有

① S. and B. Webb. l. c., vol. II. p. 1124.

② A. Weber; *Der Soziologische Kulturbegriff. Verhandlungen des II. Deutschen Soziologentages*. Tübingen. Deutschen Soziologentages. Verl. Mohr. 1913. S. 10, 11.

③ 彼·雅·恰达耶夫未出版的《哲学书简》。《文学遗产》1935年第22/24期，第21页。

时间，首先是空闲时间，也就是说，要有高水平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其次，它同除了最原始的要求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要求的不发达的个体是不相容的。扩大需求和充实官能的物质生活（暂称之为“物的文化”），同“精神生活”（暂称之为“思想文化”）没有丝毫矛盾。根据对罗马帝国，或者当代没落的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主义”的分析得出的相反的结论，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因为在这里大量的“外在的”、物的文化（alias“文明”）是立足于非常特殊的基础之上的：社会上层是寄生地存在于食利和追逐股息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他们的唯一追求；与此同时，对群众来说大量的物品实际上是得不到的，而接近他们的物（机器）则是恶魔似的统治着劳动者，打击他们，使其疲惫不堪，变成一个零件、“生产成本”的一个要素、号码。因此，这里的问题并不是“外在文明”自然而然地阻碍“精神文化”的出现，而是资本主义文明，资本主义对物的使用践踏、压制和扼杀千百万的人。

社会主义发展并且还要无限发展“外在”文明。从消费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意味着（动态的）高度多样性，但这是对全体而言的，不是对像资本主义那样的“双重预算”社会而言，在这里与一些人毫无节制的寄生型的奢侈生活并存的是另一些人的无限贫困和不自愿的劳动。禁欲主义，不管是佛教的还是基督教的，或者其他类型的，如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清教徒的吝啬一样，都是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各种形式的直接或间接禁止肉欲在思想上都是同对精神和肉体的二元论相联系的，它宣布“欲”是完全罪恶的东西，宣布整个感性世界是宇宙中的罪恶一隅，是宗教幻想对人的心灵施加的可怕悲观的压制。因此为欲和感性世界恢复名誉历来是作为理论的社会主义（甚至在其萌芽状态）的一个内容，例如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体系。海因里希·海涅在其《论浪漫派》中就基督教写道：

“我说的是这样一种宗教。其主要教义是谴责任何欲求，它不仅赋予精神以凌驾于欲求之上的最高权力，甚至为抬高精神而力求消灭它……我说的是这样的宗教，它以其世上一切财富都是有罪的、要像狗一样的驯服和天使一样的耐心的学说而成为专制的忠实支柱。现在人们

认识了这种宗教的实质，他们再也不会花钱去养活天国，他们知道，欲求中也有好的……正因为我们现在完全懂得了这种唯灵论的全部后果，可以认为，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世界观的末日到了。”^①

自然，这种意识形态并没有成为统治阶级自身的行为准则，他们甚至过分地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日常生活中的感官享受，在衰落时期甚至出现了特殊的“生活无聊”（*taedium vitae*）。例如，我们在罗马帝国衰落时期就看到过这种现象。例如斯多葛派的哲学家、富翁塞涅卡在《致李锡尼的信》中写道：

“难道你有什么东西能使你免于死亡？你享受过所有的一切，这些享受只是推迟你的死亡。其中没有一种对你来说是新鲜的，这一切已经使你感到厌烦。你知道葡萄酒的滋味和蜂蜜的滋味，所以喝一百瓶还是一千瓶难道不都是一样的。牡蛎和龙虾对你来说也是一样。由于你的奢侈生活，在未来的岁月中已经没有你所不知道的东西……要知道，你所以能推迟死亡，不是因为你舍不得市议会、集会，甚至大自然。你舍不得抛弃的是肉市，不过这一切你已经遍尝了。”

但不要认为这种情绪仅适于（或可能适于）感官的物质文化。作为某种对比，我们在这里援引米·奥·格尔申宗《两个角落的通信》中的一段话：

“人类的智力（*sic!*——布哈林）财富，几个世纪所积累和沉淀下来的丰富的成果、知识和珍品，最近像令人不愉快的负担，像过于沉重、过于闷热的衣服一样，使我感到难耐……我觉得，如果能沉入勒忒河，把所有的宗教和哲学体系、所有的知识、诗学都给忘得一干二净，像第一个人那样赤身裸体地走上岸，那该多么幸福啊……”^②

因此，问题根本不在于在物质感性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外在文

^① 布哈林是凭记忆援引的。原文为：“我说的是这样的宗教，其基本教义是谴责任何欲求，它不仅承认思想领导欲求，而且为了抬高思想而竭力贬低欲求；我说的是这样的宗教，它宣扬世上的所有财富都是罪恶学说，要人们像狗一样的驯服、像天使一样的忍耐的学说，这种宗教是专制制度的忠实支柱。现在人们认识了这种宗教的实质，已经不可能指望上天去安抚他们，他们知道，物质并不都是魔鬼，其中也有好的东西……正因为我们现在完全懂得了这种绝对的唯灵论的全部后果，所以我们坚信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世界观的末日到了。”

^② М. О. Гершензон. Переписка из двух углов. М. 1920.

明”和“精神文化”之间似乎存在的和一切时代都必然有的反比关系。问题在于，在没落时代特殊的制度（塞涅卡的奴隶制，格尔申宗的资本主义制度）导致反创造的、单纯消费的、软弱无力的有关寂寞无聊的和死亡的意识形态。这是寄生性的蜕化，是某种消费类型，而不是整个消费增长所致。

社会主义是满足群众需求的经济。但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类型同蜕化为寄生性消费者的类型有天渊之别。社会主义是消费、生产和各种（智力的和感情的）创造的统一。因此诸如伯格森反对发展需求的论据简直可笑，尤其可笑的是用这些论据去反对群众。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来。格尔申宗的“裸人”无论“身体”还是“心灵”都是赤裸裸的。只是在获取物的劳动过程中，建设“外在文化”的过程中，他才开始说话和思想。他对世界的外部认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产生了他“精神”认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但阶级社会的社会劳动分工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简单地说，就是干活的人不思想，思想的人不干活。一部分人的劳动是另一些人闲暇（和从事智力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是片面的）的基础。黑格尔在《哲学史讲义》中论及苏格拉底时清楚地写道：

“他的主要工作是教哲学，或者准确点说，他同所有的人和每一个人进行交流的哲学生活，这种生活表面上与一般雅典人的生活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通常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市场上，而不务正业，无所事事，或者在公共体操场闲逛……或者……相互闲扯，这种谈话的方式只有在雅典的生活条件下才有可能，因为在这里大部分工作是由奴隶完成的……”^①

不言而喻，这种雅典方式同学者认真工作的资本主义时代是不一样的。但就是他们的工作（如果撇开空泛的烦琐哲学和特殊的意识形态，而主要就自然科学而论）也是以工人和农民的物质劳动为基础的。没有发达的技术（“外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不可能有科学及其强大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义》。全集第10卷第2册，莫斯科1932年版，第43、73页。

的实验技术。如果没有发达的和雄厚的技术基础，怎么可能有现代微物理学和微型力学？而这是高水平的“精神”文化。

但这里常常做出完全确定的概念置换。“精神”文化的含义：（1）或者是唯心主义的神秘的抽象的唯灵论的文化思潮，也就是把一种个别现象当作整体；（2）或者是比起面向外部世界来更多地面向人的文化（相对而言），它加深对人，而不是对宇宙的思考；（3）或者是上两种的混合物。

在分析社会主义文化的物质基础时，这个问题也值得谈一谈。

实际上，例如我们可以说，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神学等等所起的作用要大于资本主义时代；在古埃及，在国家、在整个文化中神权的成分是很大的；在印度，这种神权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反对感觉世界的意识形态特别流行，等等。当然，不要夸大和想象，例如认为埃及或者印度那些杰出的建筑是同任何工艺无关的，人们仅靠宗教过活。相反地，从他们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可以看出其统治阶级以及相应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唯灵论性质。权威、官阶、等级制、惩罚的恐怖、各种奇迹和地上统治者的神性（在其后面直接站着的是威严的天神），在当时的文化条件下，这是使群众服从的必不可少的手段，正如在现代通过报刊以及强大的印刷技术所散布的幻想和谎言一样。社会主义是否需要这种“精神文化”的尺度呢？不言而喻，这种尺度是同它极为敌对的：宗教神秘的处世态度和世界观永远完蛋了。

关于面向人的问题要复杂一些，资本主义确实把人“给忘了”，因为建立了系统的、每时每刻的奴役、瓦解和欺骗他们的复杂的自动实施机制。另一些生产方式（加上“唯灵论的”文化）用各种各样的“精神科学”（其中包括像印度的意志的练习、暗示等等）去锻炼国家的祭司，把群众变成宗教恐怖和绝对无知的对象，从宗教恐吓的角度炮制出极其复杂的“对人的关怀”。“奇迹”和恐吓的配合是这种面向“人”的特点之一。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同所有剥削制度完全对立的。它没有把物质需求的发展同精神需求的发展对立起来，没有把物质创造过程同精神创造

过程对立起来，没有把面向外部世界同面向人的世界对立起来。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同圣经所说相反，人通过技术延伸了自己的自然器官。人通过科学技术再一次延伸了器官，并且“延伸”了自己的意识，极大地丰富了意识，扩展了对世界的认识。在发展自己的感觉需求的同时，人也在发展自己的认知需求、自己对世界的艺术审美关系。社会主义的特性使得这个过程成为无限的过程，因为资本主义的束缚已经解除；它不可能导致寄生，因为它把物质劳动和智力劳动联合在一起，确定了生活的创造性质；把面向世界同面向人综合在一起，着眼于人类社会生命内容的发展，其全部可能性的发挥；保障以尚未解决的新任务去取代业已解决的任务；使思维和意识摆脱宗教神秘性质的幻影；提供创造性的闲暇时间，从而保障个人的发展，使之符合个体的具体任务和爱好；建立大型的“精神文化”，它符合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尺度，其特点以后将作分析。

如今，在苏联我们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看到，不仅技术和经济的发展速度，而且文化发展的速度都在加快（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劳动者的个性得到发展，个性的内容得到丰富；伴随“外在文明”成果的是精神文化的发展；对物的关怀直接为“对人的关怀”服务；“精神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在缩小意识的宗教神秘的发育不全的形式；需求（物质的和精神的）的扩大提高而不是降低了社会生活的紧张度；创造性的努力在发展，而各种寄生生活的残余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在消失。

总之，伴随着伟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建设的是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

第三章

创造完整的人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人是“社会的动物”。马克思发展了关于“社会的人”（vergesellschafteter Mensch）的出色学说。但在阶级社会，在作为阶级社会的最后一个历史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社会化本身，他的存在和意识的普遍社会联系是一种极为矛盾的现象，在这里联系本身同时也是对立。人实际上是分裂的：按照阶级及其对抗的社会存在、在生产和分配中的对抗的作用、对抗的生活、利益、心理以及社会意识的所有形式来划分的。按照劳动分工分为几大块及其派生的小块：在城市是都市主义的畸形人，关在石头的斗室，脱离大自然，神经衰弱，歇斯底里，生活在全然人工环境之中；在乡村是眼界狭小的乡村畸形人，“农村生活的白痴”；“智力工作者”不同物质世界保持富有活力的接触，只在抽象世界中活动，对他们来说，此抽象世界（概念、数学公式、各种各样的符号）变成了世界的真正实体；“体力劳动”的工作者被剥夺了从事智力劳动的可能性：他们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制，文化上受排挤，因为统治阶级掌握了整个教育的垄断权。并且，在这几大块内，劳动分工又把人继续分下去：在体力劳动者中间，专业化的过程把劳动作业分解为许多由于单一而显得呆板的简单的动作，把工艺过程变成流水作业，这样，工人变成了制造非常细小的零件的工人，其工作失去了任何思想内容；另一方面，工人通常一辈子都固定在这种

工作上，遭受奴役，工作日甚长，生活水平极低，还不断遭遇失业。智力劳动领域的专业化产生了一分再分的许多细小的科学部门和“实用”知识部门（技术、医学、教育等等），它们没有统一的目标，也没有统一的方法。在艺术领域，这种专业化在经验和生活极端狭窄的情况下导致对艺术的阉割，使其内容极端细碎和贫乏。

这样，资本主义用统一的生产方式把人们连接在一起，与此同时，又把他们分解切割成许多部分，一批批的人变成单一的和细小的职能的体现者，而这些职能又在这些人身上获得人格化^①。相对地说，他们全都是畸形人、残疾人、片面的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使他们失去灵魂，失去创造力。这就是为什么复杂而又丰富的资本主义文化是一种压迫多数群众的外在力量，甚至对那些接近统治阶层的智力工作者来说也同样如此，由于不掌握综合的方法，工程师往往不理解哲学家、诗人或者艺术家在数学家眼里则是疯子，等等；不言而喻，上述大的劳动分工部门之间的距离非常巨大；而阶级这个资本主义结构矛盾的最高表现形式，它在各个方面都具有可以感觉到的根本矛盾的、对抗的和相互敌对的意识形态。

在本书的第一卷我们看到，法西斯主义关于“总体性”（整体性）的叫嚷不仅没有消灭人类社会存在的这种四分五裂现象，人的这种分裂现象，反而把它作为“阶层”、“社团”等等肯定下来，使之规范化，力求使这些按职级划分的等级变成“新的”奴隶主法西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的范畴。

社会主义在这里实现了根本的转变，它把人连成一体，创造了真正完整的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职能，具有愈来愈多的历史的发展的（关于这一点应当永远记住）充实的生命和丰富多彩的生活。

消灭阶级、消灭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的趋势，计划经济和继续消灭劳动分工的趋势，这一切是形成完整的人的基础。这里需要指出其发展的基本特点。首先需要谈谈计划原则的作

^① “……人不能为其存在营造和谐的氛围，而只能成为自身工作的印记。”（弗·席勒，关于人的审美教育的信。）

用。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说过，社会主义计划本身并不是靠一个法令就产生的，它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而逐步成熟来的，当它由一种成分变成一片的时候，计划就变成无所不包的了。但切勿忘记，计划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不是一成不变的绝对的东西。

现在，从我们所关心的角度来看计划经济和国家计划问题。计划是社会生活活动所有领域各种各样数据的结合、综合。仅仅其经济（准确点说，技术—经济）方面依据的也是对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以及社会科学的全部数据的权衡估量。关于生产布局依据的是地质学、研究原料或燃料的专门学科，还要考虑种族和民族因素，从全国经济的观点出发按不同时段对各种方案进行分析，考虑到军事战略因素，等等；选定新的工厂、新的工艺流程和新的机器问题；关于培育动植物的新品种；关于农业的形式和方法、机器和肥料的类型；关于工资形式、地区的专业化、劳动力的熟练程度，等等——所有这些极端复杂的机制都要以各种学科千万种数据为依据。但是计划不是这些数据的简单记录，它是依据严格的科学计算制订出来的完整的统一体，它要求先研究出有机统一的数字系统，从高效益观点选取出的数量和质量指标的最佳结合。这不是唯意志论地玩弄数字游戏，因为这里的一切都立足于对客观数字的计算，立足于科学和科学的预见。但这又不是对存在所作的静止的消极的直观，相反地，这是集中地征服存在，超出其范围，取得新东西，追求新目标，向前推进。

所以，计划是联结和综合。由于我们说的不仅是经济计划，而是全面的计划，所以这里也包括文化发展基础的计划安排——既着眼于文化的物质基础，也着眼于干部（关于高等学校和高等技术学校学生的名额，这需考虑不同种类智力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必要比例，同发展的需求相适应），还要着眼于选题问题（例如科学研究题目的计划安排，或考察工作，或地质、大地测量、气象服务的计划安排）。换句话说，社会主义计划同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和乌托邦的“计划资本主义”的可怜的幻想的计划）相反，它动态地确定了社会多方面的生活功能之间的相互联系，把这些功能综合于一个包含差别的多种多样的统一之

中，社会主义计划是培育人的基础，人们按照计划工作，应当了解这种相互联系，也就是说，从而摆脱片面性和单一性。

但这里事情还有极端重要的一个方面必须予以注意。就实质而言，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能驾驭发展进程的。揭示其客观的因果和功能的规律性并没有使之具有驾驭它们的能力，因为它们是自发的、非理性的、不合乎逻辑的。这里，具有目的性的主体是单个的企业或者托拉斯，目的明确的主体是单个的企业或者托拉斯，体现理性原则（从资产阶级观点看）的国家政权没有能力（根本不能）从整体上把握整个过程。从具有局部的、无政府状态的和矛盾性质的目标产生了一种后果，如我们所知道的，其客观含义往往会去反对目标明确的主体自身（个别的人、托拉斯、国家）。因果序列在内容、形式和时间上都同目的序列不相符合。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情况全然不同。我们看到，计划是以对大量的各种数据进行科学计算作为出发点的。计划将来（一年，或者五年，或者 n 年时间单位）增长的部分也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依据对各种可能性进行估算的结果，即依据科学的预见。然而，这种观点立即具有积极的意志性质：这不是对存在所作的消极静观的反映，不是数据的复制，而是行为的规范。换言之，因果序列这里立即转换为目的论语言，积极确定目标和积极完成。由此得出如下结论：社会主义计划是培育既思想又行动的人们的基础。这一点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个类型具有巨大意义，因为它消灭了分裂现象——分裂为“智力”和“意志”，一部分人拥有或强或弱的直观的理智职能；而另一部分人则意志坚强行动果敢，划定认识和卖弄“自在之物”的康德们（他们并没有触及这种“自在之物”）；另一部分是实际的工作者（他们实际上把这种“自在之物”转变成工业、农业、实验科学，等等）。因此，在社会主义下，客体不仅仅是理论认识的客体，也是（理论的和实践的）掌握的客体。理论同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实践是理论的出发点。在实践和自身工作的基础上掌握事物的理论丰富了实践，使之更富有成效。如此等等。这里我们可以写出这种相互影响的循环公式：实践—理论—实践₁；实

实践 I—理论 I—实践 II；实践 II—理论 II—实践 III，等等，这里象征性地描绘了这种效益的增长。相应地，主体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掌握对象，思考对象并改变对象的主体，是智力的和意志的主体，观察的和行动的，并且理论观察自身必然失去其直观消极性质，认识到自身富有生机的实践价值；另一方面，实践行动因有了理论之光而失去了盲目性。

最后，社会主义计划预先规定了劳动者的闲暇时间，创造了发展艺术和艺术创作的基础，又不让它局限于狭小的范围。这样就为对世界的艺术和审美关系的发展，为精神文化沿着合理和可能的发展路线发展提供社会空间（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这里只是对计划问题作最一般的说明。然而，只有作具体全面的揭示才能充分展示出它的意义。这里首先要看到，全国性计划是按照社会工作的不同环节和部门直至生产和文化的基层单位展开的：工厂、矿山、铁路、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学校、研究所、实验室、剧院、博物馆等等，等等。这种大规模（enormous）的计算，按照韦伯的说法，“在任何国家都是超出常人的能力的”^①，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却是可能的。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这里进行“计算”的不仅是狭义上的国家行政上层，参加“计算”（要说得更广泛一些——“计划”）的有大量的人民群众：集体农庄庄员、庄员大会、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突击手、农业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手、机械工、机器拖拉机站、工厂工人、其“著名人物”、工长、车间主任、技术厂长和厂长、生产会议，等等，等等。当斯大林说，“计划，这就是我们”，这里的“我们”包括积极的、思考的、作计划的、进行计算的、行动的千百万群众。计划在我们这里之所以是现实的有效，正是因为它不是只由上头制订，由上头强加的官僚主义的计算结果，而是立足于实际上的全民计算的结果，每一个生产和文化建设的基层单位都向共同事业提出过自己的意见。

但从改造人的观点看这意味着什么呢？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试把

^① S. and B. Webb, *Lc.*, p. 1123 (vol. II).

现在人的类型同过去的作一比较，从最落后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地带的农业开始。

首先，看看旧时代的“中农”。有个德国牧师 A. L. 胡埃特在 1920 年出版了一本专著《论农民心理》（第 2 版）^①，书中歌颂农民的保守主义、因循守旧、吝啬节约，“他们生活中的问题，宗教和道德问题、艺术问题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问题”，“总的说来并不多，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代代相传”，对此作者感到高兴。如果看看我国革命前的农民（同德国农民相比他们更加落后），那么这些特点表现得更加严重。需要揭示其具体表现。在技术领域，我们使用的是简陋原始的犁、大镰刀；在经济领域，是贫穷可怜的“农户”经济；在文化领域，是野蛮状态的文盲，下流的酒馆、教堂、拳斗、根据“宗法家庭”的规矩野蛮地打女人的耳光（“母鸡不是鸟，女人不是人”），其智力眼界不会超出自己的“村口”。局限性、狭隘性、保守、文盲，这就是日常生活的基本特点，只是由于极度贫困。在无产阶级的良好影响和领导下掀起的反对地主的革命起义的结果才摧毁了这种生活。而同这些已经消失的心理类型相比，当代集体农庄庄员又是什么样的呢？在技术领域他们拥有机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各种各样复杂的专业机器，有人工肥料，有农业和畜牧业操作法。直接属于此类的还有科学：“农舍实验室”、试验田、展览会等等——所有这一切已经超出农村的常规。在经济领域，他们打交道的是大型经济，往往是综合体类型的，同其他集体农庄、区、市、整个国民经济、国家以及自己的宅旁园地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必须把这些关系转化成数字的语言，进行计算、评估。他们必须参加计划的制订，该计划包括对技术的考虑、科学的数据、以前的经验、总计划的方针、大量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他们要根据劳动日来计算自己的工作量，计算其他庄员的工作量，还有农艺师、医生、畜牧师、教师、机械师、钳工、电工的工作量。他们邀请城里的讲师、演员和艺术家来农庄。他们参与各种各样的小组活动——从政治常

^① A. L. Houet: *Zur Psychologie des Bauerntums*, 2. Aufl. Tübingen, Verl. Mohr, S. 29.

识到文学小组，他们常常组织艺术工作室、集体农庄剧院、图书馆、实验室和试验站。他们成长为突击手、农村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现在还经常接受继续教育的专门课程。他们的子女往往成为医生、技术员、工程师、农艺师。他们同城市的联系不断增长，包括政治联系、技术联系、经济联系和文化联系。他们的民间艺术以强劲的势头注入总的潮流，同时接受较为复杂成熟的艺术样式的影响。往昔的保守主义消失得无影无踪。其社会生活的物质技术基础在飞速发展，犹如一支巨大的革命化力量——由发展中的重工业带来的一股推动力量，因为社会主义大型经济的经济形式提供了迅速发展的空间。以往的保守主义、局限性、“农村的愚昧生活”的基础统统被夷为平地。这把集体农庄庄员纳入总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贯彻工作，这就使他们内心得到全面的发展。不言而喻，这里对问题也要采取历史的态度，也就是要 *im Werden*，在形成、发展中看待这些现象，而不是把它们看作是完成的和终结的东西。但毫无疑问的是，存在社会主义的大趋势，它消除人的狭隘、片面和残缺。

现在我们来看看城市，首先是工人阶级。俄国过去的工人类型：他们有相对高的觉悟（这是革命斗争经验造成的），但技术文化和一般文化非常差，受强烈的农民心理影响（特别是在纺织工人、乌拉尔工人、顿巴斯工人中间）。在社会主义建设、在伟大的阶级搏斗和大规模建设的时代，工人阶级成了一个大国的创造性的集体组织者。这里无需描绘这一“改造自身本性”的具体过程，这是马克思这位共产主义的天才预见者早已讲过的，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这里说的是历史，是运动，而不是业已完成、完结的东西。为用文件来证明，可以引用工人的集体著作《曾经有座高山》^①，它可以作为这一出色的历史转变的生动例证。不过还是让我们看看现有的东西。在政治领域，工人阶级让自己的先进部队直接去管理国家的整个机体：一大批行政人员、红色经理、工程师、军队的全体指挥员，等等，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原来的工人。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他们没有脱离全体群众，没有封闭在一个什么阶级、

^① 马·高尔基等编：《曾经有座高山》。

阶层或团体之中，他们与这些群众“血肉相连”。而全体群众也参加管理，从而大大丰富了自己的经验。组织素养、技巧，对社会联系的理解，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发展。工人成了“国家的人”（在这个词的好的意义上，而不是坏意）、第一流的组织者，是积极的、实践的、意志坚强的和越来越文明的人。在技术和技术文化领域，我们有了第一次转变。通过直接工作的经验，通过社会主义竞赛和斯达汉诺夫运动，通过基本技术的学习，通过无数的学习班、讲习班、指导、试验工作、国家技术考试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形式；通过工厂的技术计划实践、发明创造、生产会议、小组活动、实验室工作，等等，等等，工人掌握了全新的技能，掌握了最新技术、新的工艺过程、完全不同的劳动作业节奏和速度。为避免任何误解需要说一下，在这一发展阶段我们出现了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由于使用新机器、新工艺过程和新的工作方法，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专业化的发展目前是在如下形式和如下条件下进行的，其专业生产的片面性被其他非常有力的因素所填补。这就是，第一，计划型的经济使工人的取向远远超出其“工作岗位”、机床、机组的范围；工人为工厂、为整个国民经济、为全国编制计划，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他们很了解各种各样的社会联系，经济、技术和科学等等的作用；第二，工作日的缩短使工人有可能吸取与以往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无可比拟的丰富的印象、知识和经验。在休假日期间接近大自然、参观游览、全国旅游、各种形式的体育锻炼、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乡村接触；在工厂开展群众性的航空和跳伞运动；大大提高对文学以及一般艺术的兴趣（绘画、戏剧、音乐、歌曲；工人写书；工厂和地区艺术展；工人剧院，等等）；对科学的兴趣的极大增长，其中包括通过技术对自然科学的兴趣的增长——所有这些因素和趋势都具有头等意义。在国内战争和恢复时期无产者的先进阶层走遍了全国，如果说这时期工人的普通生活经验极大地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得到了锻炼，那么在改造时期文化得到令人惊奇的发展，使苏联现在的工人成为崭新的人，他们迎接越来越高级的任务和目标：他们在工作、管理、思想和艺术创造。

庸人们还是会说，文化的水平、集约的程度在这里还不是很高。不过我们还是要再次强调使用历史方法的必要性。已经完成了巨大的飞跃。发展速度非常之快。出现加速发展。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这一过程的全部世界历史意义？难道这里还触摸不到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接近？这是社会进步发展最深刻的问题之一。

在科学劳动领域也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和计划经济一起，科学（通过其代表）认识到自己具有充满生命力的不可或缺的社会功能。一般说来，完全脱离社会生活的所谓“纯粹科学”，即“自在”的科学，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这种错觉的产生完全是由于过细的劳动分工造成的，科学研究功能被隔绝在孤立的部门，完全脱离了外部其他社会生活；这种种情况下科学的主体，其代表，会看不到毕竟把科学同物质生活的实践联系在一起不可避免的客观联系，哪怕是中间环节建立的联系。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使这种联系变得极为密切，极为显著。这样，科学获得了自己的社会自我认识。科学与实践之间最密切、直觉和有计划的相互作用（并且具有群众性的社会规模），提高了整个创造性的建设过程的效率。而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所关心的角度看，即从造就完整的人的角度看，这里消除了智力劳动工作者脱离生活的局限性。这样一来，来自下头，来自物质劳动的趋势与来自上头，来自理论劳动领域的趋势就合流了。

新知识分子的无数干部已经经过新高等院校的学习，在这些院校里，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是教学的基本方法论原则。

下面还需要谈一个问题，这就是妇女的地位问题。我们应当从培育完整的人的角度稍微谈一下这个问题。资本主义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而法西斯资本主义则有意识地加强）如下的社会分工：妇女的职能是性、生儿育女和厨房。伴随着女工和女职员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通常是：1. 参加社会生活的圈子比男人小；2. 作为获取补充收入手段的卖淫广为流行。在上层阶级里，妇女扮演的角色是满足性的需求的工具，同时也是一种奢侈品。社会主义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与资产阶级的漫画描绘相反，社会主义决不鼓吹消灭性的差别及其后果；但是社会主义

力求消灭这种卑鄙的劳动分工——它奴役妇女、使之成为床上和厨房的附属品，正如资本主义把男工（常常也把女工）变成没有心肝的机器的附属品一样。苏联的经验清楚地展示，在田野、工厂、实验室、剧院舞台、国家机关、地质考察、航空、跳伞运动——到处都有大批的妇女参与其间，在我国无数人群中她们与男人一起具有无愧的光荣的地位。斯达汉诺夫女劳动英雄，如同我们勇敢的女跳伞运动员和飞机驾驶员一样，闻名全国。还有什么比航空和从令人眩晕的高空跳伞更“男性化”的事业呢？而女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手呢？女实验员呢？“切柳斯金”号^①中的女探险家呢？一句话，女劳动者遭受附加的压迫，其智力眼界极其狭窄，使她们成为“婆娘，而不是人”，男女之间这种历史分工在我国迅速消失，在母权制时代之后首次树立了妇女的人的尊严和人的完全的价值。

最后，需要说一下我们的军队。那里的生活面似乎应当是极其狭隘的。但问题在于，军队的社会主义性质使之与资本主义的军队和俄罗斯帝国的旧军队全然不同。这种旧军队是建立在使人变傻的残酷的机械训练上的，它消灭士兵的任何个性，使士兵同居民隔绝，蓄意使士兵的智力眼界变得狭隘无比，等等。采用这种训练法是为了掩盖和抹煞基本上是农民的士兵群众同贵族地主军官团之间的阶级矛盾。红军跟它的无产阶级指挥人员之间是根本不存在这种现象的。军队是建立在全面学习、全面发展战士的个性并与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建立最密切联系的基础之上的。除了熟练掌握全部军事技术手段外，苏联军队认为人及其全面的文化发展，直至艺术发展，具有巨大意义。因此我们的军队成了一所大学校，它同阿拉克切耶夫^②主义是直接对立的，那是法西斯制度的特点，它使士兵变得愚蠢，失去人格，只会盲目执行长官的命令。而在我们这里纪律具有自觉的性质，即这样一种性质，在其后面的是对社会联系和

^①“切柳斯金”号——苏联轮船，1933年初试图在一个通航期内从摩尔曼斯克穿过北海路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

^②阿·安·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沙俄专制制度代表人物之一，亚历山大一世时期任陆军大臣，以专横残暴著称。阿拉克切耶夫主义指军警暴虐制度。

政治规范的理解，这些东西符合红军战士群众自身的利益。我们军队出名的不仅是自己的技术，还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图书馆、剧院、展览馆、卓越的乐队、合唱队、高级文化之“家”，自己同工厂、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联系，战士的文化水平及其个性的发展、主动性和勇敢无畏。所有这一切是资本主义军队所根本达不到的，其军队的理论家或者是主张建立一支按阶级挑选的机械化的“小型军队”（富勒的理论），或者主张（在群众性军队的情况下）施行机械训练，使士兵的个性和自觉得不到发展。

可见，就是在这一领域社会主义走的是一条新路：这里也是在培育越来越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

这样，社会主义在下列基础上创造有完整价值的全面发展的人：

1. 消灭阶级；
2. 消灭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趋势；
3. 消灭城乡对立的趋势；
4. 千百万人实行的计划经济；
5. 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和文化的发展；
6. 缩短工作日；
7. 继续消除整个劳动分工的趋势。

关于最后一点需要说几句。大家知道，马克思不止一次地谈过在共产主义下消灭劳动分工的问题。这自然并不意味着消灭各种不同的生产部门、机器和工艺过程的专业化。这意味着消灭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这样一种状态，即某些人群几乎一辈子从事同样的一种工作。如我们目前在苏联所看到的，缩短工作日使得有可能从这一端开始克服劳动分工的限制性作用。而极其强劲的工艺过程的自动化趋势（这里专业化的自动机制取消了对其进行调节的简单职能），使得今后有可能从生产这一端消除劳动分工。一般教育和工艺教育足以保证在物质生产的各种领域中的工作，重心将越来越转向诸如发明、实验科学和技术之类的高创造性工作。但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未来的音乐”，虽然现在我们已经听到其主旋律。

全面发展，掌握全部文化遗产，批判地予以改造，迅速地前进运动而不是倒退，不是怀疑主义，不是“传道书”，不是“*vanitas vanitatum et omnia vanitas*”（“尘世空虚，四大皆空”）——这就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乐观主义的基础。它在按照另一种（反颓废主义的）标准发展，并且还将继续发展。黑格尔在一个地方机智地指出：“把认识到一切皆微不足道看作是最高智慧，这实际上也许是某种最深刻的生命，但这是空的深度，这种深度在阿里斯托芬的古典戏剧里有时可以见到。”^①而对社会主义来说，问题不是“空的深度”，而是成长中的人的生命的深度，它以绽开的新的花朵展示自身的全部天分。

这里还要谈一个问题。这里说的是不是要培养一种划一的、统一规格的，所谓“中间的”、“匀称的人”，他们身上什么都有一点：一点技术、一点科学、一点美学、一点“真”、一点“善”、一点“美”；这里说的是不是要建立一种普遍的局限性的王国，虽然是在新的基础之上（在这里自满自足的“完整的”人将不把自己的新、“完整”、贫乏、特殊的物质和精神富裕，看作是已消失的“匀称”中的相对小的一份）？只要一提出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出否定的答案。满足现状和停滞的滋长是一种社会寄生现象，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社会主义文化的积极创造性质导致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新发展，并且这种需求变成了一种真正的追求。社会主义培养一种坚强的性格。狭隘的“斗室”原则被推到次要地位。劳动在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生命活动的必要功能，不再是旧含义上的劳动（劳动是负担，劳动是该诅咒的，劳动是受罪）。就是现在劳动也已成为“荣誉的事业，光荣的事业，豪迈的事业和英雄的事业”。日益增多的闲暇本身就是创造性的闲暇，其现实的发展趋势现在已经看得见。难道在苏联能看到哪怕满足现状和“死水一潭”的影子吗？相反地，看得到文化发展的加速进程。文化闲暇时间在生活比重的提高，也是展示自己的天赋、特殊才能、性格、对某种创作活动的爱好的基础，怪才沙尔·傅立叶当年对这一点是非常关心

^① 黑格尔：《黑格尔全集》第10卷，第48页。

的。还是要说，当这些强烈的爱好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从热衷于勇敢的飞行到热衷于象棋文化——熟练的脑力组合分析的手段之一），难道还没有清楚地向我们展示这种现实的趋势？这里过程的辩证法是这样的：消灭人的残缺不全的缺陷的趋势同时也是揭示其特殊爱好和才能的趋势。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强有力地发展（它大大高于资本主义那破纪录的速度）的基础上，这一过程得到蓬勃发展。怎么会有停滞和静止呢？哪儿来的带有千篇一律的均衡匀称的局限性的“中间状态”的人？

造就完整的人，使其获得个人发展的可能性，这就会使人与人之间获得最大限度的相互理解和共同行动。换句话说，只有完整的社会才会有完整的人。这一原理同文艺复兴或古希腊时代存在“和谐的人”这一事实毫不矛盾，同出现像歌德或我们的普希金这种本时代多方面的天才的现象毫不矛盾。因为我们说的是群众，而不是“精英”这种从小圈子里挑选出来的人。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是人数不多的社会上层人物，希腊“理想的”人（被后世极度理想化）是以奴隶劳动为前提的（这一切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有很好的反映），歌德对德国来说是一个例外（并且不仅仅是对德国）。

人与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及其相互理解是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社会性”（Gemeinschaft）的基础；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团结”的基础；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统一，深刻的、内在的、“有机的”团结的基础。而这又是深刻感受同“整体”，同其他人，同人类社会中的同志的联系的基础。现代资产者因过度享受而感到厌倦的冰冷的意识形态为“精神”（“Seele”和“Geist”）被霸占而失去“灵魂”感到伤心哭泣；它到过度兴奋的神秘论和神秘论的过度兴奋中，到充满血腥和欢歌“理性的”（施宾格勒）和“诗意的”（约斯特之流）暴虐狂的喜悦中去寻找失去的“心灵的温暖”。社会主义也在发展这种情感生活，但同法西斯的情感思想截然相反，它把天国降到地下，在地上历史地实现神的理想，实现真正的人类博爱以取代兽性，使博爱化为血肉、本能，成为情感的基础，成为社会主义的人的“灵魂”。

在这个意义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者阶级的一般历史的两极，可以定义为兽性和首次建立的真正的人性的两极。因此社会主义时代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始了人类的真正历史。亚·谢·普希金关于悲剧曾经说过：

“我们的悲剧是仿效拉辛的悲剧而形成的，它能否抛弃自己的贵族习气呢？它怎样才能从自己节奏鲜明、一本正经、彬彬有礼的对话，转变为人民激情的粗野流露和广场意见的自由抒发呢？它怎样才能突然甩掉卑躬屈膝的习气，怎样才能摆脱那些习以为常的规则和强使俄国的一切适合欧洲的一切的做法呢？在欧洲，从谁那里可以学会人民懂得的语言呢？这种人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激情？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心弦？悲剧在哪儿能找到同情？——总之，观众何在？公众何在？它不会遇到观众只会遇到那个同样狭小的圈子——并且凌辱他们的高傲的习惯（*dedaig-neux*），不会听到同情、喝彩和掌声，只会听到吹毛求疵的、纠缠不休的批评。它面临着许多不可克服的障碍——为了使它能占领舞台，必须改变和推翻几百年来习俗、风尚和观念。”^①

关于“精神创造”的其他许多形式也可以这样说。但普希金没有能预见到主要的东西：那个“广场”、“人民”、其激情、心弦、语言、观念等等的改变，这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发展中出现的。而这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巨型镰刀。

^① 《普希金论文学》“科学院”出版社1934年版，第229、130页（《普希金论文学》张铁夫等译，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第94页。）。

第四章

民族文化问题和完整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建立

“欧洲”和“亚洲”

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居住在苏联辽阔领土上的无数民族之间的和平、合作和密切联系。我们在分析法西斯的提法时看到，法西斯把民族—种族确立为一种历史的永恒的深刻的矛盾公式，无法逾越的自然法则。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教义和实践中，国家只不过是容纳民族机体的器具，这个机体必须保持种族的“纯洁性”，无情地镇压其他民族。按照这种学说，种族的任何“混合”都等于死亡。相反地，最高利益就是高举火与剑去镇压、扼杀和消灭其他（“价值不全的”）民族。

苏联过去和将来始终坚决彻底地贯彻与法西斯主义截然相反的列宁—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原则，苏联的经验出色地清除了法西斯主义血腥的污泥浊水，事实上确立了一百个以上的不同民族的兄弟情谊、友好和共同创造，这些民族就人种起源、地理分布、人数多寡、历史“命运”以及十月革命前的文化水平等等而论，都是非常不同的。在这里，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古代文化接受过东方和古典文化的影响；各中亚大国的继承者接受过中国（汉族和藏族）、印度、阿拉伯的文化影响；白俄罗斯人同“俄罗斯国家”有过痛苦的历史，乌克兰人拥有自己的丰富

遗产，鞑靼人曾经拥有从中国到现今西欧的一部分的广阔领域，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各种各样的民族，还有几十个民族，十月革命前只有人种学家才知道它们的名字，被贬称为“非历史民族”、“历史的渣滓”，它们只配称为殖民对象、“异民族”这种集合名词。民族和文化的巨大多样性！现在的事实是所有这些民族的文化发展；事实是它们的和平共居；事实是它们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事实是他们互相联系的发展；事实是，在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多样性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统一、完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在作为社会主义处世态度和世界观的特点的起导向作用的占优势的思想成分统一的情况下，民族内部的巨大发展以及与此同时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异常加速，是苏联发展的无可争议的特点。这一过程的物质基础是民族平等政策和给落后民族以积极的物质支持政策：原沙皇移民区的工业化、劳动的机械化、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支持、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迅速发展，等等。

不同民族有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给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留下印记的自然条件的特点（例如比较一下北极的涅涅茨人和阿扎尔人）；经济革命发展的起点上的特点（社会经济成分，它们之间的结合，不同的方案）；其具体发展的历史；生活习俗的特点，其他民族的具体影响；语言，特别是艺术语言（形象、隐喻体系，其民间起源）；由具体的历史发展特点所造成的意识形态创造方面的特点（一直到宗教和哲学体系）；文学语言、文字、艺术形式和符号的特点，等等。这些特点在内部是相互联系的，其总和就构成了该文化在其民族特点之下的形态学上的统一。各种文化的基本形态学类型也就是不同经济社会形态的文化，对此需作出相应的历史评价；但由于经济社会形态本身具有不同的民族（或者是民族综合的）方案，因此民族的方案可以看作是经济社会形态的表现形式。因此有了斯大林的著名公式：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指的是苏联）。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相应的“认知方式”（“Vorstellungsweise”），其特有的特殊文化风格和占优势的特殊的意识形态。我们发现地理位置、种族等等极为不同的氏族社会在生活习俗和

宗教观念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在极不相同的民族和国家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经济、生活、政治制度、习俗、道德理想、叙事文学、一般艺术、基本宗教思想，等等，等等之中，有许多典型的共同之处。相似的“生产方式”具有相似的“认知方式”。但这种“一般”表现于“个别”和“特殊”之中。不同民族的具体历史决不会像完全一致的过程那样重复，在各个方面都是如此，从自然条件起直到意识形态的升华形式，都存在独创性、民族的个体的特点，有时还是非常巨大的；过程不会相同，这些过程的强度不会完全一样：相应的阶段、时期、周期的长短不会一样；发展的环境、历史前后关系不会一样（例如形形色色的军事布局），等等。

苏联各民族和文化合作的前提是依靠相应的阶级力量，依靠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共同利益。这种被压迫阶级的革命社会斗争已经有几个世纪的传统，它处在无产阶级，特别是政治上最为发达的俄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这种斗争在伟大事业的建设时代在宏伟的创造性劳动中，包括文化建设中得到了继续。

到处建立了最完善的新技术基础。但由于苏联不同加盟国家和不同民族有特殊的生产领域，所以其劳动工具、原料和工艺过程都是不同的（摩尔曼斯克沿岸的渔业和磷灰石、乌兹别克的植棉业、欧洲亚热带的柑橘种植业）。到处都在同一种经济关系类型基础上形成同样的生活风习。但这在生活中也是以独特的形式出现的：房子的建造使用不同的材料、采用不同的建筑形式，具有不同的民族风格，它们反映了历史环境条件和整个发展的特点；在两性关系上消除各种有害的残余（在东方，有伊斯兰教的多妻制，“带面纱的长袍”；“抢婚”；血仇的残余；在俄中央地区，有妇女在家庭中的不平等，但程度不同，这里没有东方的特点，等等）。通过学校、各种著作向各地传播文化，等等；学校传授的是同样的基本思想和知识。但语言不同，民族—历史传统、民间口头创作、壮士歌和神话、文化影响、形象和比喻的形式不同，利用这些东西去培植新的社会主义意识，而从这里最后还是必然会出现新的共同的概念和形象，用自己的语言或者用国际术语来表达（例如“电话”、“无

线电”、“拖拉机”、“康拜因”等许多技术名词)。

对过去历史上落后民族的实际帮助，其国家存在的政治形式（加盟共和国、一般民族共和国、自治区以及其他政治自治的形式）；民族发展的完全自由，民族平等、友好、兄弟情谊、相互尊重等等，在苏联实际上形成一种新的民族关系，过去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从来没有过，现在（除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存在的民族关系。古代的任何多民族国家都用火与剑去镇压被征服的统治国家和民族：罗马彻底摧毁了迦太基的布匿文化的伟大中心；亚述当年摧毁了巴比伦这个古代的世界中心。成吉思汗无情地践踏了那些被征服民族。埃及的法老对非洲的各部落毫不客气。就是在相对短期内形成古代大帝国和相对和平的时期，许多民族实际上也只不过是胜利的残暴国家和残暴民族的贡臣而已。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对希腊人来说领袖，而对野蛮人来说则是统治者。”资本主义基督教国家的殖民政策就其斩尽杀绝的力量而言，同亚述或者巴比伦国王的政策没有什么区别。众所周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是如何以基督的名义去镇压美洲高度文明的印第安部落的；英国人在印度干了些什么；欧洲人在非洲对黑人部落都干了些什么；他们是怎么野蛮地破坏伟大中国人民的文化的——20世纪初欧洲联军烧毁了中国文化的无价古迹和图书馆。当代现实通过中国、阿比西尼亚、西班牙的呼声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文明的暴行，这些暴行是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上和实践上）的对数还原。反犹主义、反黑人意识形态（美国）、形形色色野蛮的沙文主义，这一切都是与当代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野蛮行径。

苏联及其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展示了史无前例的崭新的民族关系的范例，展示了它们联合为复杂但完整的苏维埃民族的范例，在这里其各不同人种和国家—民族组成部分的多样性并不是对抗的。苏联不存在殖民地，所以也不存在宗主国。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彻底消除了旧世界的这两极。绝非偶然，在保存资产阶级政权的前沙皇帝国的某些地区，民族之间仍存在对抗（例如波兰对立陶宛）；相反地，在民族文化迅猛发展的情况下，在苏联，过去的被压迫阶级甚至消除了最激烈的民

族纠纷的策源地（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突厥人，俄罗斯人和鞑靼人，“雅利安人”和犹太人，等等）。根据苏联宪法，鼓吹仇视人类和沙文主义是要受刑事惩罚的罪行。总之，民族文化的发展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并且许多民族在苏维埃基础上才第一次摆脱了没有历史的状态，在苏联较发达地区的帮助下第一次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以及用文字书写的作品。社会主义敌视任何贵族倾向，其特点是竭力唤起甚至最落后的人们（粗工、乡村、妇女、“厨娘”、以前最受压迫和镇压的民族，等等），消灭这些阶层意识中欧美著作作用弗洛伊德的术语表达的“残缺综合征”，即意识中受损害的感觉。社会主义在崭新的基础上唤起个人（但不是个人主义！）尊严感和民族（但不是民族主义！）尊严感。从发展民族文化的角度看，尤为重要的是在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迅速造就多种多样的民族干部（从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到哲学家和诗人）：在北极的涅涅茨人中间，在中亚的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中间，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一过程。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潮流依靠的是被打倒的资产阶级残余，其本身也已被无产阶级专政所摧毁，这种潮流表现的根本不是民族文化的繁荣，而是一种来自自身历史传统中的反动因素以及国外某一帝国主义集团的意志的反社会主义取向。

我们已经说过，随着苏联民族文化的繁荣的是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这种文化具有多样的民族实在（ипостаси）。这种一般包含特殊，而特殊包含一般和统一。统一的是社会主义的文化类型，从基础直到上层建筑。甚至极为可敬的资产阶级研究者就此写出什么样的蠢话，从以下例子可见一斑。

著名的英国教授阿尔诺德·汤因比^①认为目前有5种文明：西方文明（欧洲、北美、海洋和港口城市），然后是伊斯兰、印度教、远东和“正统基督教”文明。我们这里不去谈论形形色色标准的幼稚性，也不谈论宗教标准。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存在20年的时候通过东正教去评价苏维埃文明，这是值得深思的！更有意思的是，阿·汤因比用来为自

① Arnold Toynbee: *Outline of History*.

己的提法论证的是，按照他的看法，东正教的残余中包含有共产党人的要求：“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被英国历史学家变成东正教徒的《哥达纲领批判》的作者会对此说些什么呢？

不过，我们还是言归正题。

所以必须看到文化的接近过程，在民族多样性的情况下文化趋向统一的发展。物质基础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精神基础是社会主义“认知方式”，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伟大的意识形态是新宗教的那些头脑有病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大量议论统统都是废话。就像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或者共产国际纲领一样，这里没有宗教的东西。但是这是伟大的学说，它一旦掌握了千百万群众，就变成了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大大超过了，比如说，当年的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是另一类的问题，同前面的问题在逻辑上毫无关系。生产方式和认知方式的这种统一，对于形成统一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决定性意义。

然而，事情并不仅仅限于此。在各民族之间物质和政治交往日益增长的基础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统一，整个“整体”目标的统一的基础上，我们首先看到各种文化间的相互认识、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无与伦比的增长。

社会主义使苏联的所有民族彼此开放。这是事实，它通过无数的形式表现出来。需要看到，土库曼和乌克兰、塔吉克斯坦和格鲁吉亚、莫斯科州和阿塞拜疆、西伯利亚和比罗比詹等等的集体农庄的庄员们，在做出重要的共同决定的代表大会上是多么相互尊重和合作；或者看看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工人；或者看看以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多语言代表为象征的全体苏联人民，这里出现的是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苏维埃知识分子这新的三位一体，要看到这一切，才会相信民族之间建立了全新的密切的兄弟关系。莫斯科（1936年）民族艺术周（哈萨克、乌克兰、格鲁吉亚，等等），或者莫斯科各剧团到俄联邦以外的巡回演出，或者大量翻译著作（普希金的著作几乎被译成苏联的所有语言，III. 卢斯塔维里的《虎皮武士》被译成俄语等多种语言，塔·舍甫琴柯著作的广泛

传播), 或者介绍大量的民族史诗、还活着的民间诗人、歌谣、舞蹈、民间口头创作, 等等, 这一切难道不是各民族文化关系上的一个根本变革? 这里的问题不是“介绍”语言学家、专家、文学家以及其他假绅士。问题在于这是个群众现象, 是文学形象、思想、习惯、各种民族艺术的全民大传播。

关于科学我们就不必说了, 这里任何一个领域的任何一项成就都会被大家所采用, 中央科学机构的勘查工作帮助最边远地区发现大量的财富(科拉半岛、库兹涅茨克地区、卡拉干达、阿尔泰、科雷马等地), 这里在全苏范围内制订科学工作的计划。我们也不去说统一的教育培养体系、科学方法的统一、世界观的统一, 这是众所周知的。不过还必须强调这种统一的伟大意义。在以往最大的几种意识形态中, 甚至在古代伟大的宗教—哲学天体演化论中, 或者在所谓“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伊朗宗教)的观念中, 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阶级分化。这里第一次创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大规模的实践激情, 并且由于阶级界限的消除, 这是具有全民意义的。在过去所有“唯一”的意识形态中民族界限具有重大意义, 甚至在控制了许多民族的情况下, 它们的“世界主义”实际上也消失了(例如我们想想基督教神父在世界大战中的行径)。这里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掌握了所有的民族和种族, 最重要的东西是国际主义, 这是无法摧毁的, 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历史冲突, 它一分钟也不会消失。

我们举了“民族文化周”、巡回演出等例子, 但这只是个别的例子。要记住, 所有这些日常工作, 即整个建设创造过程——在田野和工厂、学校和实验室、戏剧舞台、书刊以及发行几百万的报纸, 等等——都是沿着国际主义的轨道运动的, 起推导作用的(包括整个创造过程)是统一的、非常团结的、思想一致和行动一律的党。

米·伊·罗斯托夫采夫^①教授先生根据“最新的”法西斯理论断言(或者几乎断言), 民族混合、群众掌握了文化, 文化就会被毁灭。这

^① 见 M. Rostovtzeff: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Roman Empire*. 转引自韦伯, 第1120页。

种理论以古代伟大文明的毁灭为例去“教育”目前这一代。然而，没有比“对历史的这种法西斯主义理解”更平淡无味的了。古代文明的毁灭是由于奴隶社会的内部的矛盾和无休止的战争。古代的大暴君——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罗马帝国都是泥足巨人。世界大专制国家的产生（居鲁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或者帖木尔王朝）都是短时间的历史现象。这些世界性的构成物包括各种各样和互相矛盾的因素（有阶级的，也有民族的），通常都是在其相应的“大征服者”死亡之后瓦解的。^①把这一切同社会主义相比，这就等于给钢铁治疗流行性感冒。社会主义具有根本不同的内部结构。现在经验证明，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群众掌握文化都极大地提高了发展速度，并且越来越向深广发展。而从另一方面讲，像法西斯那样保持“种族的纯洁”，不许群众接受文化，真的会毁灭全部文化的——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最有组织和最强大的力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话。

任何民族都存在一定的文化继承性。把它们联合起来，促使相互理解的，首先是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历史斗争传统。这种斗争的英勇精神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源。这种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统治阶级（封建主、王公、祭司和沙皇）意识形态的压制。但现在它走出了密室，成为民族史诗中的主要思想。

现在我们转向过去和现在以不同面貌（在不同的时间里）出现的引起热烈争论的问题，这我们在本书的第一卷已经看到，这就是作为某些文化大问题的“欧洲”和“亚洲”问题。

在俄罗斯著作中，大家知道，这一问题成了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间热烈争论的对象。

西方派的取向，总的说来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接受相应的国家存在形式及其“自由”和全部西欧文化，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以此同俄国的农奴制和“亚细亚方式”相对抗。然而，西方派的左翼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从空想社会主义观点对它进行了批判，

^① 见图拉耶夫：《古代东方史》，第1、2卷。

而这种社会主义本身又被看作是（完全有道理的）西方文明的合法产儿，是它的最后的、最进步的成就。相反地，斯拉夫派捍卫俄国发展的“独特”道路，认为俄国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它不走西欧走过的道路，那里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个瘟疫”，充满发财、对抗、阶级敌对的气氛，可怕的灾难正在临近。斯拉夫派中有许多人认为，俄国经济中有非常稳定的农奴制宗法关系，专制制度被看作是凌驾于阶级之上的，依靠人民的社会君主政体，拜占庭的“正统思想”（“东正教会”）被看作是“俄罗斯国家”这种“独特”结构的基础之一。在接近他们的康·列昂季耶夫（关于此人我们已经提到过）那里，对拜占庭文化的崇拜达到了极端。不难理解，斯拉夫派是从反动观点，从贵族地主和贵族的观点批判“腐朽的西方”的。

十月革命后，“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发挥了一套观点，认为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是半亚细亚性质的特殊产物（“鞑靼社会主义”、“突厥斯坦毛拉的社会主义”）。关于十月变革的“粗陋的”左翼民粹主义的阐释，在亚·勃洛克那里还借助于这样一种“特殊的”解释。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把布尔什维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和巴库宁主义的混合物，而其资本主义老板则视之为“亚细亚瘟疫”。而另一方面，俄国那些有修养的侨民（例如弗兰克教授、伊林教授，等等）断定，布尔什维主义是从西方进口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倒在罪恶卑微文化上的不信神的腐朽的西方，奖给了东正教的俄国这种致命的病症。

最后，另一方面，关于“欧洲”和“亚洲”问题是同资本主义文化总危机联系在一起，因为高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圈里那些感到绝望的首领们开始到东方神秘主义那里去寻找摆脱对崩溃时代的焦急不安心情的避难所，他们把“*ex Oriente lux*”^①的口号重新提上日程。

这就是用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问题的总的框架。

但这同伟大的历史变革的真正议题有什么关系呢？其关系如下：

第一，苏联位于欧洲和亚洲的辽阔土地上，其地理、人种志、历

① 拉丁语：“光明来自东方。”

史、社会学和政治都涉及“欧洲”和“亚洲”。

第二，苏联联合了欧洲和亚洲文化的各民族，这些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历史传统。

第三，苏联位居“西方” *par excellence*^①和“东方”（中国、印度）之间的大块土地上。

第四，苏联迟早要面临把欧亚大陆两种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问题，这是胜利的社会主义的组织力量，是其物质和思想基础。

作为政治派别的布尔什维主义是战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时代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一种国际运动。从遗传学，从起源看，它当然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在俄国，列宁在同巴枯宁主义、民粹主义的斗争中发展了它。在欧洲，列宁（后来还有斯大林）在同“西欧”社会民主党及其叛徒的机会主义斗争中发展了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它在原俄罗斯帝国的领土上得到发展，但这不是由于俄罗斯民族特殊的民族救世主义使然，而是具体的历史条件造成的，这些条件使俄国无产阶级第一个给予资本主义以打击。苏联的社会主义继承了人类的全部珍贵成果。它吸取了第一流的欧美机器技术、实验科学、艺术和哲学的大量成就，按照自己的方式，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不是反对人，而是为了人，使用这些机器，同时批判地改造西方的精神遗产。但它不能持“雅利安”观点，甚至地中海的观点，抛弃所有东方珍贵的东西。不是自原始时期开始的和神秘的形而上学的，甚至不是生物学的和人种学上的“人种特性”，而是历史条件创造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并且有时差别还很大。无需重申一般的论据（见第一卷关于所谓“种族理论”的分析），我们在这里同意像B. 图拉耶夫这样的杰出专家（而就其世界观而言是唯心主义者）的证词。他就伊朗人和印度人写道：

“伊朗人和印度人是个鲜明的例子，这两个民族是同源的，但在地理和历史条件的影响下，两者不仅不相像，甚至互相对立。辽阔的伊朗，自然条件恶劣，土地贫瘠，气候不适，北有野蛮的汗国入侵，西临

① 法语：多半，主要地。

文明的征掠国家，它不能培育出诗人、苦修教徒和脱离历史生活的幻想家，于是它成了紧密团结的、彻底的不倦的工作者、为生存和文化而斗争的清醒的斗士、警醒的武士和历史活动家的祖国。我们看到的历史上的伊朗人就是这样，他们在宗教中也是这样，可以说，他们的宗教同他们祖国的自然条件是最相当的……把印度人同古波斯人相比，很难令人相信这两个民族是近亲……”^①

这是唯物主义的解释，虽然还不全面，不完善。

如果我们提出“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某些差异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发展的一系列重要特点。亚洲文化（印度、中国）比西欧文化要早得多。欧洲早进入资本主义。亚洲文化在特殊的神权统治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基础上存在的时间极长，各种关系稳定不变；农民战争导致同样的循环重复。欧洲在转向机器技术之后其整个生活获得了不断革命化的基础。在亚洲，特别是在印度，在社会关系很少变动、种姓划分和神权政治的基础上具有重大作用的是宗教—哲学上层建筑。在欧洲，在突破寺院的中世纪之后，实验科学被提到首位，为制造物件而研究外部世界。在亚洲，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政权必须建立一套“奇迹”体系去反对感性世界的规律性，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修炼有助于控制自身机体（瑜伽和托钵僧的“奇迹”）并能影响他人的（催眠术）特异功能。而欧洲的取向不是发挥人的某种特性，而是生产新而又新的东西，积累和增加资本。在亚洲，感性一直观原则具有巨大意义。在欧洲，对待外部世界采取计算的、理性的和比较积极的态度。如此等等。

为避免误解，我们这里必须指出极其重要的两点：第一，应当永远记住，不同的最重要基础是资本主义前的亚细亚关系的长期性，还有与（如埃及）灌溉系统和神权统治相联系的特殊形式；第二，在现实中间问题要复杂得多，为了标示某些典型特征我们提供的是简化的公式，自然未能展示出各种关系的全部多样性。在中国实际生活的规范是很高的，但它们在“神的计划”的控制之下。印度是最具唯灵论文化的国家，

^① B. 图拉耶夫：《古代东方史》，第2卷第145页（图拉耶夫，B. 《古代东方史》第2卷第145页上无此引文。）。

然而我们在这里却能找到几乎所有欧洲哲学的流派，当然，有其自己的形式，有不同的社会比重。

那么，从胜利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看，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

显然，首先动的创造原则应当是“欧洲的”原则，这指的是社会主义不仅要取得技术和实验科学的“遗产”，而且还要继续下去。社会主义在这里取消了束缚发展的全部枷锁。它把视野彻底地向前推进，对那些反对机器、科学、理智、计算、乐观主义、进步，等等反动的哭号，它是本能地持反对态度的。它只是把这一切变成为人服务的工具，变成人类真正进步历史的手段，摆脱自己的“史前”时期。

但这是否意味着伟大的亚洲人民的文化特点中没有对人类的继续发展有益的（往往是也许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呢？我们认为这种想法意味着持狭隘的观点，思想上陷入拙劣的“欧洲主义”，非常接近于特殊的欧洲沙文主义，在逻辑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亚洲文化存在了几千年，有着杰出的建筑、灌溉技术、大量的古代发明（在中国有印刷术、造纸、火药，等等，其发明大大早于欧洲）、发达的医学、催眠术、令人惊服的艺术创造和极有意思的哲学体系，仅仅这些事实就足以批驳那种常见的轻视态度。自然，我们并不需要什么神秘论（印度的和欧洲的神秘论，像雅科布·伯麦的神秘论，黑格尔对此人赞赏有加，虽然实际上只不过是患有精神病、文化粗浅、有野蛮人思维的人的呓语而已，这种人离印度哲学那些精致的问题相去甚远）。继承文化，就意味着对它进行批判改造。如果社会主义抛弃这笔巨大的遗产，那是毫无道理的。

通常狭义上的 *orbis terraum*^① 文化传统。这首先是以希腊为中心的地中海文化区。众所周知，马克思（完全有理由）盛赞希腊文化、希腊哲学、希腊艺术。然而，埃及、亚述、巴比伦、伊朗、赫梯文化等等的全部意义；印度、中国等文化，得到（而且还不是全面的）阐述要迟晚得多。大家都知道《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希腊悲剧作家和哲学家，但为什么不知道印度人的史诗呢？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②

① 拉丁语：地球。

② 吉尔伽美什是苏美尔国（公元前 28 世纪）乌鲁克城半传说性的君主。

中国和印度的哲学家们？令人倾倒的埃及的无价雕塑？印度的建筑？阿拉伯科学的伟大成就？印度的诗学和法学？最后全部基本文明的历史，关于这些文明，现在通过大量的发掘已经有可说道的东西了。难道这种历史不值得注意吗？但是问题并不局限于遥远的过去：中国的神话、日本的诗歌、印度的当代文学——所有这一切都具有生动的现实的意义。尤其是亚洲文化的历史是同居住在苏联亚洲地区和高加索的许多民族的历史有直接联系的（例如，比较一下印度和伊朗对绍塔·卢斯塔维里^①美妙的格鲁吉亚史诗的影响）。对地中海的资产阶级欧洲人的意识来说，东方是“遥远的异国”和“神秘之土”，就像对古代的莫斯科人来说所有的外国人都是“德国人”，即异类。^② 不过，该脱掉“地中海”取向的襁褓了，要记住，这只不过是一角而已，诚然，这是人类的杰出创造。

由此产生了苏联独特的历史地确定的文化作用。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不像殖民者，也不像遥远的异国和神秘之土的探寻者那样对待所有这些文化。因此只有社会主义能够从继续推进的观点，利用越来越强有力地驾驭外部自然的力量，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提供“欧洲”和“亚洲”的合题。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苏联各民族问题上来。众多民族文化的高涨表现在对自身历史的兴趣上，这些历史通过各种渠道融入苏联历史。决非偶然，斯大林同志指出，苏联历史就是各民族的历史。这表现出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良好的基本趋势。民族文化的高涨、地方志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紧张研究（从其自然财富到不同形式的多民族而又统一的文化），这一切不能不对以后的全部历史发生良好的影响。

一个反动的侨民流派（所谓“欧亚派”）也提出“欧洲”和“亚洲”问题。但他们依据的部分是法西斯的地缘政治学及其范畴，认为欧亚统一的基础是东正教的统治，是神权的社会君主制的“民主”（恺撒

① 绍塔·卢斯塔维里——12世纪格鲁吉亚诗人，史诗《虎皮武士》的作者。

② 这里布哈林用了两个相近的词：“немец”（德国人）和“немой”（直译为“哑巴”，但从字形看，又是“不是我的人”）。

的“民主的”)原则,加上狂暴的反欧洲原则。这些先生们至少迟到了半个世纪。如果说“密涅瓦^①猫头鹰”只在傍晚飞出,那么欧亚派的“猫头鹰”飞出时已经是凌晨了,这时已经清楚真正的历史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在下列基础上:

1. 统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
2. 统一的全苏经济和文化计划;
3. 统一的主导意识形态;
4. 对落后民族的兄弟援助;
5. 民族文化的巨大发展;
6. 其相互联系的巨大发展;
7. 全国和地方的自治;
8. 联盟内的国家统一;
9. 消除阶级界限。

在这些基础上,统一的苏维埃民族在成长,其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犹如历史的酵母那样得到迅速的发展,这是多种多样的、统一的文化——就其民族形式而论是多种多样的,而就其社会主义性质而论则是统一的。

苏联向全世界展示了民族间的兄弟情谊和统一的范例。这不是空想的唯理论者的抽象的世界主义,这些人看不到民族的真实特征。这不是鼓吹 *Ubi bene ibi patria*^② 口号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它在共同的英勇斗争中和同样英勇的创造中建立了劳动者的共同祖国,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建立了它,这是世界历史的强大力量,是劳动者的希望,所有被压迫民族的希望。

这样,社会主义在造就完整的人,也在创造完整的国际文化。

(完)

① 密涅瓦——罗马神话中的科学艺术女神、女战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

② 拉丁文:“哪儿好,哪儿就是故乡。”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内部监狱

1937年3月“26”日

公文

第1477号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四处处长

三级国家安全委员

库尔斯基同志：

送上被捕人尼·伊·布哈林的著作九个半张，请处理。同时附上读过的三本书：斯特凡·茨威格、阿·列日涅夫、席勒。

附原文。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内部监狱典狱长

国家安全上尉：

(米龙诺夫) (签名)

第五章

创造完整的人类

在苏联缔造统一的苏维埃民族——社会主义民族，这不仅是统一的完整的人类的雏形，而且部分地解决了这个大问题。

我们在本书的第一卷已经看到，最初提出的统一的人类的构想是不正确的，因为不符合那时的历史现实。甚至古代和中世纪的最庞大的统一——庞大的居鲁士东方王朝，或者亚历山大·马其顿王朝，或者罗马帝国，或者帖木尔王朝，或者查理大帝王朝——都没有囊括“全人类”，并且也缺乏统一的密切联系的生产关系的基础，所以它们很快就瓦解了。

不是作为生物学类型，而是作为社会学的统一物的人类，是在形成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情况下首次形成的。这是资本主义创立的，对这种创立过程《共产党宣言》中已有精彩的描述。

但资本主义的人类“统一”是非常相对的统一，是充满血腥和矛盾的统一，这些矛盾必然炸毁，并且现在已经在炸毁这种统一，因为现在存在两种制度：真正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和正在瓦解的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按几条线四分五裂：按国家这条线分裂，国家之间处于严重对抗的状态；按阶级这条线，其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按民族这条线，民族之间斗争激烈；还可以按宗主国和殖民地这条线分，按上面分析过的职业和专业分化这条线分，如此等等。

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趋势引发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其中包括表现为竞争的矛盾。国际文化发展的趋势带来了沙文主义蒙昧主义的特殊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而法西斯主义有意识地大大加剧这些反趋势，它在自己的旗帜上公然写上：“战争”，包括其全部反文化后果。

对待真正统一的人类问题，就如对待所有的社会问题一样，不应当从抽象的唯理主义观点出发，而应当从历史的观点出发。如果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整个时代，那就不难得出结论，像不止一次指出的那样，这个时代是在世界许多事件的隆隆声中揭示世界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的资本主义形式之间深刻矛盾的时代，这里包括所有制关系（首要的），即阶级间的关系、国家间的关系（即“国际”资产阶级的国家——有组织集团之间的竞争关系，这和所有制关系同样有密切关系），等等。国家疆界成了生产力继续发展的桎梏。帝国主义，特别是法西斯帝国主义打算通过一系列野蛮的灭绝性的战争，让所有的民族服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同样，它打算无情摧残有头脑的工人先锋队，把整个无产阶级变成顺从的贱民等级，以此解决阶级矛盾。

不言而喻，这不是解决客观的完全成熟的历史任务的办法。相反地，这是企图给社会的机体戴上新的枷锁，把它捆得更紧，甚至不惜以无休止的、用全部新技术装备起来的战争去毁灭全部文化相威胁。

而把人类真正联合起来的客观历史任务仍然存在，与过去的所有历史时代相反，它具有解决的物质前提：作为统一的人类的基础的强大的（技术和人力）生产力，在以百万计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群众，而无产阶级是变革，“革命实践”的积极的革命改造因素。

因此，人类的社会主义统一任务不仅是思想家的主观理想，甚至不仅是革命群众主观的集体目标，而且是客观的历史任务，是由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自觉体现和实现的客观的历史必然。

苏联的胜利，它的成长，它那不断增强的力量是这一事实的体现。无产阶级在非常落后的国家的胜利，这个落后的国家变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先进国家，在不小的程度上是由一系列的国际环境造成的：欧洲和亚

洲的革命危机、殖民地的动荡、帝国主义敌对国家中的不和与争吵、干涉者和白军的野蛮纲领和实践、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不稳、群众中的广泛反战情绪和他们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好感、资本主义“精神文化”的危机，等等。但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因素是社会主义客观必然性的标志。在为苏联社会主义而斗争的20年里（这时历史特别为“布尔什维克占卜吉凶”），多次出现的一系列历史偶然性，无非是那些阻挠社会主义取得普遍全面胜利的因素的必然性的表现。因此，把苏联看作是“历史的曲折”，没有比这更荒谬的历史了；相反，历史是曲折的历史。社会主义新关系的结晶不仅已经开始出现，并且得到加强和发育成熟的社会主义已经占领了辽阔的地理和历史空间。

但由此产生了关于人类联合口号的非常特殊的声音、非常独特的历史色彩：它依据的是历史的必然性，群众的物质力量以及苏联所拥有的丰富经验。这是特殊的历史的各种情况的凑合，对它不能用“*pax romana*”或者“希腊化时期”、斯多噶派世界主义时代或第一批基督教徒时代（“希腊人中无犹太”），甚至康德梦想的“普遍和平”之类的标准。新时代要有新鸟，新鸟要唱新歌。

与此有关的还有使用“人类”、“人类利益”之类术语的合理性问题。大家知道，过去是怎么滥用此类名词的，它们抹煞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基本力量的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作用和意义。所以现在必须大力强调斗争的阶级性质和意义。不过现在已经从全人类命运的角度清楚地确定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即确定了这样一个事实：无产阶级的特殊的独特的利益是和全人类发展的利益一致的。而从另一方面讲，由于苏联是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产儿，是新人类的一部分，因此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整个进步人类”的利益是同苏联的利益一致的。苏联的许多愚蠢的敌人正是不懂得这一点（装成不懂得），他们用“民族局限性”这种反革命的意识形态来解释伟大无产阶级国家的政策。

资产阶级思想家眼光狭隘，而在法西斯主义那里甚至缩小到野蛮的程度，他们得出一条原理，说战争是一条必然的“自然法制”，永恒的、不变的、绝对的法则。但我们现在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

从切身经验看到、知道这种超历史的理论纯属废话。在苏联疆域内有许
多民族，许多国家，但它们紧密友好地联合在一起。不难看出：
(1) 不同民族劳动者的利益不是对抗的，这里没有竞争的余地，而只
有合作、协作的位置；(2) 在为劳动者政权的存在而斗争的过程中，
战胜资产阶级的利益以高度的权威要求联合起来；(3) 最伟大的建设
过程中克服困难的利益同样要求联合起来；(4) 防御外敌的国防利益
也坚决要求联合起来。而这是更广泛的，即从世界范围内提出社会主义
问题的一种模式。因此，不管法西斯阵营的蠢人和庸人及其应声虫怎么
叫嚷，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下民族关系具有友好和平性质的论断是在
逻辑上、经验上得到证实的。

但这里还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国家疆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
障碍，那么苏联是怎样确定这种国家疆界的？此外，苏联怎样在作为其
成员国的那些国家之间设立内部疆界的？这是否在疆界上表现了民族局
限性，并在再造导致资本主义毁灭的那些关系？

如果对这一问题采取唯一正确的即历史的观点，那么问题的解决就
非常简单。因为并不需要多么高的智慧就可以理解，在同资本主义包围
作斗争的过渡时代，需要疆界是为了消除疆界，正如需要无产阶级专政
是为了消除任何国家；需要红军是为了最终消除任何军队；需要社会
主义国家的国防是为了消除所有的“国防”和所有的战争；需要阶级
斗争是为了最终消灭阶级。历史过程的辩证法正是这样。至于苏联内部
的国界，它体现了各民族的独立性和自治，消除民族间不信任的残余，
而另一方面，这些国界仅具有纯行政性质，一点也不影响统一的全苏计
划工作的执行。

全人类的联合，实质上是缔造完整的人类，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最
伟大的一个任务，这是一切任务中最高尚的、最崇高的任务。只有社会
主义能解决这一任务。为实现这一崇高的任务，成千上万杰出的勇敢无
畏的革命战士献出了生命。然而，资产阶级社会全部的腐朽与伪善正是
表现于此，其意识形态拒绝承认这种斗争，认为这是“卑鄙行为”，而
柏拉图的那个奴隶主贵族“国家”的理想，尽管具有奴隶制的和外省

的私人的局限性质，但却把它抬得很高。

社会主义人类第一次找到了自己作为人类的位置，并且是全方位的：作为目的本身，作为统一的人类，作为完整的人类，作为发展中的人类。它摆脱了物质的和精神的枷锁，摆脱了旧世界的拜物教，其中包括宗教，和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说法相反，宗教并非各种“精神文化”和所有“高尚精神”的基本标志。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关于宗教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①

因此毫不奇怪，社会主义精神文化是反宗教的。但它并不因此而不存在，在文化上不发展，这种文化要比资本主义的精神文化丰富得多。

人类的联合为生产力的发展，为技术的发展创造了闻所未闻的强大基础。这里根本清除了资本主义的所有枷锁，其中包括边界，也包括战争。这意味着全然不同的可能性。与军国主义、战争、竞争、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大量非生产性开支消失了。技术的无限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合理配置不同的生产部门、合理的电气化、科学的普遍应用、人类天才迅速发展的强大力量的利用，统统成为可能的了。

在智力领域，这意味着在眼界大大开阔的情况下刺激所有科学的发展。社会的技术基础的发展为实验科学的专门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基

^① 卡·马克思：《黑格尔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453页。）。

础。仅合理地科学开发尚未或很少研究的领域（这些领域现在往往是资本的垄断集团不让研究的或者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的）的要求就给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植物学、动物学等等提出了新任务。仅科学援助世界落后民族的要求，就引发了大规模扩大人种学、历史学、语言学、艺术史学研究的需求。仅调整经济发展基本调节方向的需求，就要求大大扩展经济学、统计学、数学。如此等等。从地球的角度看，新的大规模认识外部世界的要求，也相应地提供了庞大的基础去全方位地扩大智力的视野，而腾出时间和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强化，将提出越来越遥远的任务和越来越“崇高”的宇宙问题。宗教形式将被看作是历史的客体，就像我们现在看远古时代的石像那样。智力文化的财富将得到迅速增长，因为它摆脱了拜物教和宗教的枷锁，这种枷锁就是把神作为无限创造研究的极限。

在情感领域，既然问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站在世界台阶上的社会主义就是全人类亲密友好的文化。在目前发展阶段，社会主义鼓吹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但是在敌视社会主义敌人的同时，还鼓吹所有民族和种族劳动者的友好团结；这种仇视本身同时也是全人类团结与爱的历史前提。仅仅用抽象的唯理主义观点看这些范畴，就不能在这里看到合理的现实的辩证法。但全人类亲密友好的文化在“斯大林的苏联各族人民友谊”中已经具有相当发展的形式和体现，它同任何形式的宗教都毫无共同之处。然而，人们往往把人类关系中的高尚行为与宗教对它的赞许混为一谈。恩格斯当年曾经指出，费尔巴哈身上唯心主义的残余就表现在它把性爱、友谊、同情、舍己精神等等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都归之于必须得到无神的“新宗教”的赞许，因为他认为宗教的本质乃是联系（来自 religare—联系）。^①但无神论的宗教是 *contradictio in adjecto*，圆的正方形，语言的（并且是无害的）游戏。与此同时，法西斯主义一面大谈“心灵”、“精神的东西”，一面鼓吹和实施仇视人类、战争、食人，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鼓吹和实现各族人民

^① 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34页。）。

的友好、和平、全人类的团结、人与人之间高尚崇高关系的文化。当代共产主义科学、辩证的唯物主义以无比的理想主义作为自己实践的等价物——准备以最伟大的英雄主义去为人类所曾提出的最崇高的理想而奋斗。而“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而把唯心主义理解为美德、普遍的人类爱的信仰。总之，对‘美好世界’的信仰，——他在别人面前夸耀这个‘美好世界’，但是他自己至多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才相信这个‘美好世界’，这时，他由于自己习以为常的‘唯物主义的’放纵而必然感到懊丧或遭到破产”。^①

恩格斯的这一精彩评述现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过时，因为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关于“高尚精神”的号召与它在当代世界各地鼓吹的公开的兽行之间的矛盾。

在艺术审美领域，人类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联合使内容和形式都得到极大的丰富。如果在感性物质、理性、情感的尺度上整个生活得到发展并有极其丰富的内容予以充实，那么这就不会不在艺术创作上得到反映。全世界的全部遗产都被纳入文化交流之中。物质现实的全部财富，整个世界社会生活，其全部优秀精神，各民族的全部多样性，建设生活和文化的整个英勇精神，人与人团结精神的空前增长，人与人之间真正合乎人性的“联系”，提出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任务，摆脱痛苦、束缚和与商业投机相联系的庸人行为、*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②——这一切难道没有为艺术描绘提供新的强大的推动力？而在新人类中创造新人本身呢？恩格斯就文艺复兴时代写道：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大人物不曾作过长途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创造领域上放射出光芒（尤为突出的是这不仅表现在理论生活，而且也表现在实践生活中）。烈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32—234页。

^② 拉丁语：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个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阿尔勃莱希特·丢勒是画家、铜版雕刻家、雕刻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马基雅弗利是国务活动家、历史学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撰作了成为十六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那时的人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分工所具有的那种摧残人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但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为自己时代的利益生活着，参加实际斗争，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整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充实和力量。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如伊拉斯谟）。”^①

恩格斯就是这样谈论文艺复兴的，这里说的实际上是社会上的一批高智力的上层人物。而我们这里说的却是全人类的群体，并且是建立在无比丰富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之上的。结论是不言自明的。

世界社会主义伟大的、卓有成效的、极其崇高的任务，是把所有落

^① 这是布哈林根据记忆援引的。准确的引文为：“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和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烈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个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阿尔勃莱希特·丢勒是画家、铜版雕刻家、雕刻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撰作了成为十六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那时的英雄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但它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61—362页）

后民族，直至所谓“野蛮人”提到历史生活上来，提到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度上来。社会主义绝对不能持历史命定的观点，例如我们的天才批评家维·格·别林斯基在其正统的黑格尔时期就持这种观点。别林斯基追随西欧的榜样写道：“一些民族注定在人类中起第一流的作用，这是世界历史民族；另一些注定起一般的历史作用；第三种是微不足道的偶然的民族，在历史上注定不起任何作用，也许除了转眼即逝不留痕迹的灾变。”^①不是“命运”而是具体的历史条件使许多“非历史”民族在历史上不再存在。而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条件把所有的民族提高到发展的最高阶段，使他们成为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参加者，犹如现在苏联的范例以经验所证实的那样。

别林斯基关于西方派“优雅的爱好”的说法也是不能令人同意的：

“所有伟大的、高贵的、人性的、精神的东西都是在欧洲的基础上发芽、成长，以缤纷的色彩开花并带来丰富的果实的。生活的多样性，两性之间良好的关系，讲究的风俗习惯，艺术、科学，对大自然的盲目力量的征服，对物质的胜利，精神的凯歌，对人性的尊重、人权的神圣，一句话，人为人自身的尊严而引以为荣的东西，被人看作是自己对世界的贡献的一切，把自己看作是神的爱子和接受神的慈悲的人——所有这一切都是欧洲生活发展的结果。人性的一切都是欧洲的，而欧洲的一切都是人性的。”^②

我们已经看到，早期别林斯基的亲欧激情是毫无根据的，是极端夸大的，它同我们时代、资本主义没落和欧洲法西斯黑暗的时代的事实极端矛盾，这个黑暗时代的整个生活形式都在驳斥这《涅伊斯托维·维萨里昂》充满诗意的歌。他对问题的提法在他的时代具有合理的内核（同俄国的“亚细亚性”作斗争），而现在从任何角度看都已过时。因为，正如 A. 列日涅夫所正确指出的，“西方派风解了，它最多只不过是一种修辞的时髦语。有一个时候它是一个内容很有分量的大字眼，而

^① 维·格·别林斯基，4卷本文集，巴甫连科夫出版社，圣彼得堡1896年版第2卷，第604—605页。

^② 维·格·别林斯基，4卷本文集，第198页。

现在几乎什么意义也没有了。它只是资产阶级美言巧语、标新立异的反映。不，不是西方主义，而是国际主义——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这不仅是因为所包含的文化范围不同，而且还因为对待文化的态度本身也是不一样的。那里是文学游戏，赏玩，异国风味，这里是兄弟关怀，认真严肃、价值的交换，文化的接近，从它们的混合物中产生内容和风格上新的统一的文化。”^①

如果我们划分现有的大文化区，那么可以分为：1. 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年轻但在发展之中；2. 其余六分之五土地上的资本主义文化，其下又可以分为 a. 欧洲文化，b. 美国文化（“美国主义”），c. 亚洲文化（印度和中国）和 d. 各种混合型文化（日本、南美、非洲、澳大利亚）。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文化我们已经说过，这里我们首先想说一下西欧和美洲（即美国）的区别。

西欧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区别（或者说直到最近的区别）在于，最近一统天下的是所谓“美国风”。简而言之，美国文化较倾向于技术，较为直观，较为讲究狭隘的实用主义；而欧洲文化较多“精神的东西”；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在欧洲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作用要深于并大于美国。

但这只是大致的东西，需要较为详细地揭示这种区别的内容，其历史根源，其历史变化。

美国历史的发展没有封建主义的大包袱；它掠夺印第安人的“自由”土地，不向封建土地占有者缴纳贡赋，因此，工资水平相当高，对技术进步的刺激很大，发展速度很快。这里的人才选拔也很特别：大批意志刚强、敢作敢为、富于冒险精神的人蜂拥而至，由于没有封建纹章，缺乏传统，欧洲对这些人来说“太狭小”了。因此可以理解，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即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遗产）的作用同欧洲中世纪的神学文化相比是很小的，全部生活建立在鲜明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在弱肉强食的斗争中更多的人有机会“出人头地”，由此出现不可思议

^① A. 列日涅夫：《论艺术》，国家出版社，莫斯科1936年版，第92页。

的实践主义和狭隘的功利主义（time bs monry）。美国（除南北国内战争外）迄今为止都不知道（相对地，同欧洲相比）大规模的社会震动。因此他们的意识形态陷入非常实际的实验科学之中，而没有深入到社会学科的深处和存在的“终极问题”。其统治阶级被赤裸裸的攫取钱财的狂热所吞没，而为了掌握群众，他们发行大量的黄色报纸，甚至宗教也采用适于大众服务的街头宗教骗子和先知的形式作为补充。有钱人进口“精神文化”，而美国的博物馆则充斥从世界各地运来的这种文化的文物。

欧洲的资本主义文化是建立在封建基础之上的。在其经济中封建庄园至今仍起巨大作用（自然是经过变形的）。此外，欧洲还是古代世界的继承者。它是在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和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它自古以来就奉行殖民政策和从事大规模的世界贸易。这一切扩大了视野。因此在两种意义上“精神文化”要丰富得多：在继承的意义上和“自力挣得”的意义上，后者是从较为复杂、较为“批判的”和较为多样的关系中必然产生的。

在东方（在亚洲），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看到的，本土文化所强烈表现出来的唯灵论性质是同神权—封建—种姓制的社会结构有密切联系的。这（在现代资本主义范围内）同美国相比是另一个极端。

不过必须指出，最近一段时间里美国的状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深刻的危机笼罩了这个原来的“繁荣”国家，因此这里也出现了存在的各种根本性问题。美国第一次沉迷于流行的爱好之中（例如弗洛伊德主义），但它也有自己的思想流派（例如以凡勃伦为首的技术专家治国派、生物学中与伊·巴甫洛夫学说类似的所谓“行为主义”），它推出一批有影响的作家，以最善于思考的学者为代表，开始克服“实用主义”；此外，还应当指出一个非同寻常的现象，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大兴趣。最近几年，美国的著作（广泛意义上的）大量出版，这是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状态，同苏联作用的增

长相联系的思想大清理。在经济领域统治阶级提出民主化的“禁酒的^①法西斯主义”（罗斯福总统的“新纪元”），虽然对许多人来说其含义尚不清楚。美国关于“计划资本主义”乌托邦的著作大量出版。对目前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日常生活、家庭、意识形态的批判占重要地位，出现动荡。而甚至在美国，共产主义也已不再是 *quantite negligible*^②，作为发展中的社会力量有了自己的地位。因此可以说，从文化的角度看，美国明显地“欧洲化了”。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记住，在文化上欧洲自身现在已经分成几个部分，欧洲的法西斯部分代表的是这样一种文化——反文化的新玩意儿，它在目前正在改变其文化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面貌。

涂上神权色彩的封建主义与最新式的垄断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奇妙共生是现今日本文化的基础，这里还要加上非常强烈的法西斯倾向和深刻的内部危机，以及革命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在这里，丰富的封建文化同现代的技术和实验科学折中地混合在一起，并且资本主义的整个文化危机因补以日本的特殊危机而变得更加尖锐。

如果说，我们在苏联看到了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并且历史地必然存在的五种成分的制度变成了统一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提出了更为宏伟的任务。印度、中国、荷兰印度、非洲（从埃及到南非和刚果）等等，提出了难以事先预见到解决办法的诸如经济、日常生活、种族和文化等多种多样的任务。并且不同的解决方式将取决于历史改造过程的具体方式。但是其基本原则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早已在理论上预见到、列宁和斯大林制定出并为苏联千百万群众的实践经验所证实，这是清楚的。经验证明，这里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宏伟的任务将能得到解决。

很难想象这一切意义是多么巨大。例如，在世界其他地区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强有力的支持下出现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复兴，这意味着什么呢？国家的工业化、合理的技术完善的灌溉系统和劳动的机械化

① 1920—1933年美国有禁酒令，其俄文为 *сухой закон*。此处 *сухой фашизм* 疑与此有关。

② 拉丁语：微不足道的。

加上化学的运用，为千百万的人消灭在大自然面前的奴隶地位，从黑色的“土地统治”下解放出来。正如社会主义经济把广大群众从封建主、资产者、高利贷者、军阀、寄生虫国家的沉重剥削中解放出来一样。合理的社会主义文化把他们从奴隶式的思维、观点、规矩中解放出来，那时关于“家谱”、“贵族等级”、对下等人的鄙视等等封建概念都将被打破，^① 那时孔夫子的规矩将化为乌有：“若有利于君之名声，虽诬蔑、杀身在所不辞……此乃敬也”，^② 或“不服从乃最坏之恶行”；^③ 那时“小人”与“君子”之间的对立将会消失；^④ 那时伟大的中国人民将摆脱暗号式的“中国文字”，使用现代书写形式，振兴自己的数千年文化传统，使之同强大的欧洲社会主义潮流汇合。顽强、勤劳、无畏、对历史的记忆，中国人民的全部天才都将在新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只有无头脑的宿命论者才会认为所有“古老的”民族必然灭亡。灭亡是历史条件的一种功能，正如民族的复兴一样。将近四亿的中国居民将在同其他社会主义民族友好合作下创造真正的奇迹。这将极大地改变世界的面貌，因为这是地球人口的四分之一。

关于印度也应这么说，茫茫林海孕育了光辉的古代文化的遗迹，在英国宗主国文明之手的控制下同时也成为猿猴的栖身地。随着摆脱帝国主义，种姓制度在瓦解——在这种制度下，婆罗门的粪便被视为圣物，人数众多的一些阶层（“首陀罗”、帕里亚）被看作“贱民”，得离他们60英尺；在这里，宗教根据“灵魂转世”（samsala）和“报应”（karmen）的学说惩治违背种姓制度丑恶规定的人。^⑤ 在这里，古代文化的真正成果是向群众关闭的，或者长满遗忘的青苔，起作用的是“独特性”的反动的一面，在这里，社会主义注定要去复兴三亿人民及其全部

① 见 G. Simmel. *Soziologie*. (顺便说说贵族) S. 737 ff.

② 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Tübingen. Ver. Mohr., 1920. B. 1. S. 419.

③ 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Tübingen. Ver. Mohr., 1920. B. 1. S. 447.

④ 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Tübingen. Ver. Mohr., 1920. B. 1. S. 454. (以上三段话未找到中文原文出处。)

⑤ Max Weber, l. c., B11. *Hinduismus und Buddhismus*, SS. 46, S. 117-121.

潜在的创造天才。

黑色人种将第一次真正拥有文化。从“进步的”美国资产阶级开始，现代的资产阶级庸人不知道，有一个时候黑色的努比亚人曾经统治过整个伟大的埃及，他们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同样，法西斯不学无术之辈也想不到，犹太人的字母（“алеф”，“без”，“гимел”，“далет”）通过希腊文（ α ， β ， γ ， δ ）传到欧洲，现代的天文历系源于巴比伦人——闪族人的历法，还有其他许多东西，其中包括宗教（关于宗教他们听说过，但不敢搞大规模的非基督教化）！对美洲、非洲和波里尼西亚来说，这将是一个无可比拟的大事件。这里非常鲜明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公式“人种无差别”的全部意义。让法西斯主义像莎士比亚的人物查理三世那样宣布：

“莫让喋喋不休的梦呓使我们丧胆；
良心无非是懦夫们所用的一个名词，
他们害怕强有力者，借它来做搪塞；
钢筋铁骨是我们的良心，刀枪是我们的法令。
向前进，奋勇作战，我们去冲锋陷阵；
即使不能上天，也该手牵手进入地狱门。”^①

法西斯主义的镰刀碰上了社会主义的坚石。而只有通过社会主义的大门各族人民才能进入“天堂”。过去所梦想的，“在模糊的远方所预见的”，所预言的，清醒的思想家们、最热烈和高贵的心所感伤的东西，现在都正在我们眼前实现。苏联各族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人类世界性联合的伟大开端。

从为这些最广泛、最深刻的世界历史任务而进行的英勇斗争的角度看，我们俄国1905年的唯心主义者的论断，当代的社会主义的批评家又在重复的过时论断是多么可笑。例如H. 明斯基写道：

① 《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卷，第455页。

“难道你们没有看到，社会主义者—工人和资本家—花花公子的生活目标是一样的，两者都拜倒在消费品和舒适生活之前，两者都力求增加消费品的数量？”“新的社会舆论既不创造新的道德，反而把我们引入物欲的密林深处。”^①

真正的历史过去和现今是怎样嘲笑这些可怜的反社会主义的猛烈攻击的！我们面临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当前的历史任务的规模又是多么宏伟！为取得胜利，值得活着和奋斗下去！

^① H. 明斯基：《未来的宗教》，圣彼得堡1905年版，第287、288页。

第六章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多样性和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多样性

社会主义（包括 in abstracto^① 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具体社会主义）的无数批评家提出反对它的一个论据：似乎它——社会主义，消灭一切差异，使之统统成为灰色的、单调的，消灭生活的多样性，其美的财富，即实质上扼杀生活。

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值得提出并给予回答。

如果看看批评家先生们所举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如此钟情的是资本主义剥削原则所带来的多样性。实际上，社会主义消灭的是何种多样性呢？它消灭阶级、摧残人的终身职业制和专业制的多样性；它消灭穷人与富豪、奢侈与赤贫的反差、统治与服从、危机与繁荣、教育与文盲这种该死的多样性；它消灭工作与失业、寄生与消费不足、血腥的战争与卑鄙的和平这种多样性；它消除城市与乡村、纯洁与肮脏、香与臭、健康与瘟疫、宗主国与殖民地、僧侣与俗人这种“多色彩”；它消灭政党、意识形态、大量对抗这种多样性以及与之相应的整个上层建筑对抗型的多样性；它消灭历史民族与非历史民族、平等民族与不平等民族的划分；它消灭对妇女的各种形式的卑鄙奴役；最后，它还消灭固

① 拉丁语：抽象的。

定下来的社会等级制（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等等。

在资产者老爷看来，这是灾难和疯狂行为。法西斯主义就是这样！它巩固这种“多姿多彩”，这种“丰富的色彩”，这种“绝妙的价值等级”，这个有许多善恶树的天堂（!!）！

可以说，社会主义确实消灭这种多样性，并且要彻底消灭。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恶劣的多样性，它意味着千百万人生活内容的贫乏、极端的单一，同时在颓废美学下资产阶级及其“精英”各种各样的 *fleurs du mal*^① 的多样性。所有现今闪现的法西斯主义的前驱和目前的法西斯偶像——若泽弗·德·梅斯特尔、尼采、利奥季耶夫、罗森贝格、阿拉基等等——他们这些人都主张剥削社会的这种奴隶式的多样性。

然而，“多样性”与多样性是不同的。存在不同质的多样性，它们有不同的类型，多样性的不同尺度，它对统一性的关系的不同种类。

让我们试从这种观点，从多样性观点来看看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什么（假定关于消灭剥削型的多样性问题已经解决）？

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直接自然环境（地球）无疑会给予更为多样的印象，因为 *orbis terrarum*^② 使每个人的眼界扩大到天体上去。在资本主义社会，大量的市民根本就不认识大自然，不会区分白柳与白杨、鹞和鹰、鲈与鲑，往往以伤风感冒的眼光，或者（在“为自然而忧愁”的时候）怀着无力的感伤主义，从抽象的和病态的幻想的角度去看整个自然。另一方面，大量农村居民关于自然的观念不超出村里的栅栏，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会超出附近的外省小城。因此，对极其大量的资本主义居民来说，自然仅仅是自己的那一小块微不足道的（因而不能提供任何多样性）东西。只有美国的百万富翁和英国的勋爵才能到地球的各个角落去旅行，排遣寂寞，享受“自然和狩猎”的乐趣。资本主义人类中的大多数人几乎被不自愿的劳动占据了一辈子（只有睡梦除外），被终身的劳动分工束缚在固定的地方：生产的标准、广泛意义上的工作场

① *Fleurs du mal* ——恶之花。出自法国诗人 Ch. 波德莱尔的文集《恶之花》（1857年）。

② 拉丁语：地球。

所，“locus standi”，^①这基本上就是进入其生活经验领域的一部分“外部自然界”或者“领土”（这里的例外是“活动的领土”，例如水手这个专业，不过其经验范围主要还是局限于港口城市的小酒馆和妓院）。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全然不同。生活条件、日益加强的世界文化交流、人类的统一、空闲时间、劳动分工的消灭、体育和群众性的旅游等等，把大自然越来越多的多样性及其财富（实利的和审美的）引入数量越来越多的人群经验领域之中。我们在苏联国内已经亲眼看到这种趋势。人数众多的地质考察等参加者、北极探险家、登山运动员、各种“竞赛”的参加者、在克里木和高加索休养的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从南端调到极北、从西方调到东方的组织员、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手、飞行员、开垦新土地的先锋人物，等等——这一切全都是群众性现象。试比较一下过去的情况：有多少莫斯科“省”的“农夫”过去见过雪山、冰川、大海？过去没有这样的人。过去有多少彼得堡的工人知道天山的“高峰”或者阿尔泰山脉？要知道，我们才过了20年，而其中许多年还用来同武装干涉和自卫作斗争，在大破坏后获取最起码的生活资料。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休闲时间、消灭终生固定在某一工种现象，等等，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由此必然产生为人服务的大自然的越来越多的多样性（而不是对我们面临的文化问题采取漠不关心袖手旁观态度的“自在”的自然）。

不过，对此可以反驳说，人的统治的加强同时也在消灭大自然本身的客观多样性。泰奥多尔·莱辛教授在我们引用过的著作中鲜明地描绘了人所起的野蛮毁灭作用，他们已经消灭了大量美好的动物种类，扼杀了这些物种多样的辉煌，他们野蛮地砍尽大片土地上的林木，使这些地区干旱无水，把生机变成死亡。这一切有一半是对的。说一半是因为没有把人所创造的多样性计算在内（例如“人工”培育的新的动物物种，特别是植物物种，人工造林，缺水地区的灌溉，等等）。而实质上正确的另一半也不一定要发生在社会主义（即其社会规模是合理的）经济

① 拉丁语：站立的地方。

条件之下。资本主义野蛮地对待自然（伐尽森林，消灭动物，破坏肥沃的土地，正如野蛮地消灭殖民地人民或者野蛮地毁灭无产者的劳动力一样）。社会主义在其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把丰富大自然和大自然的多样性当作自己的一项自觉的任务，把这看作是发展完整的人的重要条件之一。自然保护区、造林、合理的森林经济和水务经济、城市的绿化、动植物保护、以社会主义的文化的态度对待大自然，视之为生物生命、健康、艺术享受的伟大源泉——这一切在社会主义总的文化中都具有自己的地位。在我国的卡巴尔达^①，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是苏联最先进的，那里建设了电站和农业城，有高度的机械化，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对自然的合理保护，包括其资源和多样性。总之，社会主义意味着在人的大量直接经验中，即在人类一般生活中，大自然多样性的增长。

在人工的实物界领域，多样性的趋势是无可争议的。在全面电气化的一元趋势下，生产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和“智能化”。科学技术手段分得越来越细。我们在另一个地方已经详细谈过，消费手段的发展异常迅速，在数量上，在质的多样性上都是如此，尽管整个消费过程不具有非常讲究的寄生性质，像法国作家著名的小说《相反》^②中所描绘的。可见，生产设备，即劳动所提供的创造的愉悦的手段，情感物质愉悦的手段，同世界历史发展以前所有阶段相比得到了空前发展。这里多样性的增长是无可争议的，以后我们可以不再谈这个问题了。

理论掌握对象的多样性、智力任务的多样性也有巨大的增长，就其类型而言在不断提高。要知道，仅仅行星的研究这一点就扩大了视野，而世界性建设的庞大的实际任务需要相应的科学、科学的不断进步和充实，即多种多样的任务及相应的解决办法的增长。但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对自然的控制力越是强大，就越是要求提出科学的遥远任务，即包括整个宇宙在内的最广泛的研究方向，不仅深水航行和同温层飞行，还有星际交通问题；不仅有蛋白质的合成问题，甚至违背恩格斯的公式“生即

^① 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1922年建立自治州，1936年改为自治共和国，为俄罗斯联邦成员国。

^② 小说《相反》（1884年）是法国作家胡斯曼的作品。

意味着死”，还有不死的生命问题；不仅利用我们现在知道的能源种类，而且解决原子内部的能量问题。没有任何停顿——“美妙的”无穷尽！在这一领域，在智力创造领域多样性的增长是毫无疑问的，这难道还不清楚吗？难道这里没有自己的美学，在量和质上无穷的存在形式，揭示其联系和规律性的美学，创造的美学和“优美的”解决之道的美学，把许多局部的各种解决之道联合成整齐的集合的卓越理论的美学？弗·恩格斯有一句名言说：“正如傅立叶是 a mathematical poem^①，而且还没有失去意义，黑格尔是 dialectical poem^②。”^③ 智力创造有其美学的一面，而其多样性甚至在这一范围内也具有相应的美学价值的多样性。列昂季耶夫先生陶醉于老爷和奴隶的多样性和土耳其后宫与俄国农奴宅旁园地的“美景”，这同社会主义的人相比乃石器时代的野蛮人，摆在社会主义人面前的是他们所征服的土地的全部财富，品种日益增多的创造（感觉的和精神的）的快乐，自然的无限财富，从水下和地下王国惊人的奇迹到遥远天体的光谱，从电子的轨道到通往星际的道路，从自己的亲密友好的小圈子到社会主义的全人类和全世界的统一。

艺术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在多样性的意义上得到非常的发展，因为生活领域本身的富丽和多样有很大的发展。资本主义艺术之所以退化，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把艺术家的生活领域缩小到最低限度，通常把它限制在顶楼、小酒馆以及“amies”^④。资产阶级的最完整最丰富的艺术是不可逾越的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及其“精英”还完整的个性和丰富的生活领域。社会主义不仅恢复生活的多样性，并且第一次为群众创造这种多样性，使之建立在更加丰富的基础之上，具有继续发展的无限可能性。

社会主义弥补劳动分工的片面性，然后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克服和消灭之，这就为人的嗜好的多样性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实际上，在这时

① 一首数学的诗。

② 一首辩证法的诗。

③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1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0卷，第547页。）。

④ 法语：朋友。

的生产中劳动还有一定的强制性，不过已经出现相对多的闲暇时间，这是显示个人特殊爱好、愿望和创造激情的基础；这里从某一时刻起已经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劳动在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然后在遵守一定数量的工作时间的条件下，开始进入自由流动的阶段。然后，消除任何强制性，而劳动变成了在随便任何部门从事的自由创造。在这一基础上甚至在目前的苏联（在这里宪法规定，劳动是必需的），在生产领域也出现越分越细的个人爱好。在意识形态的创造领域也同样如此。这种可能性是历史地产生的：在困难的年月只好采取迅速行动和大量采取平均数来决定往某一项工作投入多少单位的人力和物力。在较高的发展水平上已经有可能采取大规模的方法，但这是有差别的方法，而随着社会主义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形式越来越高的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个人爱好和（归根结底）个人才能的展示就越来越具有群众性。与庸人们的看法不同，毫无疑问，多样化的爱好、气质、激情、性格、个性的发展趋势，乃社会主义内在的趋势之一。但这种多样性和这种不平等（爱好、才能、激情、才干上的不平等）与阶级社会的不平等，与资本主义野蛮的“多样性”毫无共同之处。消灭阶级就是在发展条件上实现平等，消灭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经济不平等。然而，爱好上的不平等和个性上的多样性，这是另一种范畴。这种不平等没有任何对抗的基础。不仅如此，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物质的和精神的的文化是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互不理解、心理上的不协调——他们相互间绝对排斥，“说不同的语言”（康德与厨娘，颓废派诗人与修鞋匠，类型学专家与金属旋工，表现主义雕塑家与樵夫，等等。）这里多样性的增长是在社会主义文化总风格一致的范围内发展的。

由此出现每一个人生活多样性的增长，也就是千百万人生活多样性的增长。向每一个人，也向千百万人展示出大自然、社会、创作活动、艺术的伟大的多样性。这使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法西斯余孽的“贵族”和警察气得发疯。而这实际上又有什么坏处呢？相反，这是人类极其伟大的成就。而那些在这一基础上在不同领域成长起来的天才，将在前所未有的更高的基础上发展。人类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歌德说过，他是“集

体的人”，因为他的创作表现的是大量和他一样的人的经验。但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生活将丰富多彩得多，而其天才将站在更强有力的肩膀之上。如果说海涅与资本主义现在的庸人相反，有这种社会联系感，那么人类历史社会主义时期的天才，不可能产生任何把自己与自己的同志和同时代人对立起来的念头。相互关系的类型全然不同，因为任何个人主义的痕迹都将消失。

社会主义多样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种多样性不是表面上的，不是对人漠不关心的，而是为了人，存在于人自身的多样性，也就是生活的多样性，人自身的完满和丰富多彩。大自然之所以多样并不仅是因为它自身多样，它成为多样也是为了人，因为社会主义的人同它接近，不是锁定在同一个工作位置上。文化的所有客观成果在他们面前不是异己的、外部的和往往是不可理解的力量，而是其自身存在和发展的东西，新任务就是人类创造的共同的生气勃勃的任务。

亚历山大·勃洛克认为，人道主义危机在扼杀人道主义：

“现在我只能指出，全世界都在敲响反人道主义的钟声，我们正处在这种标志之下，我们已经清楚存在人道主义危机；世界在清洗自我，脱去身上的人道主义的文明的外衣……人整个地投入运动，整个身心被卷入漩涡的旋转之中，在这个与宇宙协调的（！）政治和社会革命的漩涡中形成新的人；人道的动物、政治的动物，*zov politikov* 等等，改造成演员——我借用瓦格纳的术语。”^①

这里，“人道的动物”同演员的对立本身就已经是不正确的了。经美学渲染的积极的创造原则可以也将同更高级的新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形式联系在一起，这是从我们的全部论述中得出的结论。大自然愈来愈多的部分进入人的生活领域，自然服从于人，社会生活过程中社会自发力的消失和社会生活过程自觉性（合理性）的确立，人自觉地认定目标，人们在工作 and 思维中的团结，自然和社会的人化，这就是创造性的（演员）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基础。

^① 亚·勃洛克：文集，第11卷，第234页。

我们还没有涉及一个极端重要的同民族和种族有联系的多样性问题。在前几章我们看到，社会主义解放他们，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把它们综合成为社会主义内容的文化的统一类型。然而，在世界不同部分之间日益密切的相互联系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到历史继续发展的某一点上这种多样性是否会消失呢？是否会最终产生共同的语言呢？由于性的接触，是否会产生各民族纯生物学上的混合？最后是否会形成在这种意义上的统一的人类？这里是否会给人类生活的丰富多样带来损失？

我们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中这个时代迟早会到来。不过民族多样性的消失会由于生物因素无限丰富的结合，即在这新的整体中天赋、性格和气质多样性而得到补偿。埃及的法老只同亲姐妹结婚。希特勒分子禁止同非雅利安人结婚。但我们知道人种的混合会带来多么奇妙的产物：普希金、茹可夫斯基、仲马。拉法格也是一例。过去的活语言将变成死语言。但在某一个时候产生的新的共同语言将极大地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他们总体力量的加强将反映在整个生活的多样性的巨大增长上。

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把人们分开。这是由不和谐的喊声、喧嚷、尖叫组成的混乱。社会主义的多样性把人们联合在一起。这是创造的胜利的交响乐，是响彻云霄的赞歌。共产主义使生活以及创造的功能极其丰富多彩，大大扩大生活的世界，为人们身上的个人爱好、才干、才华、天才的发展提供无限的可能性。把未来的人设想成会行走的，没有欲望的计算机是极其荒唐的。将出现有不同的爱好和强烈激情的各种各样的人。生活中的悲剧因素不会消失。但这将是“乐观的悲剧”——对原则上可以解决，但还没有解决的越来越崇高的任务这种创造过程中的痛苦。普希金说过，不仅诗歌，而且几何学也需要灵感。列宁说过，科学也需要幻想。在存在发展的无限可能性的社会中，任务和生活内容的伟大多样性，是人们自身无限多样性的前提，而这些人相互之间又是通过密切的全人类的友好关系联系在一起的。

原始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它是机器的共同性（“Gemein-

schaft”)原则的高度体现。但这实际上是人群,即没有分化的、没有分解的整体,还没有从灰色的一片中分出任何集团和任何个人。这里只有“我们”,没有任何多样性。

发展的以后几个阶段(包括奴隶制社会灭亡阶段,也包括通过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阶段)标志着社会分化,即多样性的产生和发展,并且发生分化的生活内容是按照分化的社会集团,首先是按照阶级划分的。工种、日常生活、服装、意识形态的多样性,这是阶级和职业的多样性。封建主义或者祭司的神权统治就提供了这种“多样性”的样板,在这里,例如法老被真的当作神的儿子,“距离感”是全部生活关系的基础。等级思想贯穿一切,甚至在艺术中同普通人相比,“有钱有势的人”被描绘成巨人,奴隶的生命等于零。在欧洲的“中世纪”,“距离感”作为封建黑暗势力的表现渗入到整个社会生活之中:“氏族的古老”、“家族的谱系”,只同“相当的人”来往,鄙视“黎民百姓”,等等,这些都是这种多样性的常规和象征,正如他们穿相应的服装一样。使当代法西斯资产者及其仆从感到满足的正是这种“多样性”。对闭塞的贵族地位、镀金的族徽、距离感、接近神、稳定的等级阶梯(这种阶梯可千万别腐朽!)的渴望,这些都是枪炮大王、煤炭贵族和大地主所操心的东西。在垄断阶段之前,在自身存在众多矛盾的多样性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创造了实物世界的伟大的多样性,四分五裂和残废的人的多样性。这样,阶级的多样性在这里才具有特殊的形式。资本主义的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的危机,使法西斯企图把资本主义的多样性纳入封建化形式的铁轨之上。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导致社会主义的诞生。

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正在消灭多样性的剥削形式。但它并不意味着退回到原始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决不把原始共产主义理想化,不把它看作消失的“黄金世纪”。现在的共产主义是建立在技术和文化的全部成就之上的。就其结构而言,它不是回到未分化的整体去,而是建立分化的,即高度多样性的、整体的东西,即分成许多部分的,但却是真正的共同体,并且不是基于“血缘”的共同体,最后,这是规模全然不同的共同体。在这

一点上苏联的经验也是极其有意义的，这里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带有原始共产主义残余的氏族制度的遗迹也包括在内了。其基础被摧毁了，因为新的条件是与个人的同时发展联系着的，它是同血仇、古老的传说、古老的技术以及狭隘的眼光不相容的。

这样，历史的大辩证法是从“Gemeinschaft”^①出发，通过阶级社会，走向新的“Gemeinschaft”；但我们时代的共产主义依靠的是全部历史成果，新的“Gemeinschaft”在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的同时，以巨大的力量把人类的发展向前推进。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内部监狱

1937年3月31日

公文

第1550号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四处处长

三级国家安全委员

库尔斯基同志：

送上属国家安全总局第四处管理的被捕人尼·伊·布哈林的著作九个半张，请您处理。附原文。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内部监狱典狱长

国家安全上尉：

(米龙诺夫)

^① 德语：共同体。

第七章

个人与社会的问题

在西欧和美国，知识分子争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是关于个人^①与社会的问题。在社会大危机时代不止一次出现过对这一问题的兴趣，这时旧的似乎是稳固的（几乎是永恒的）行为规范失去了其重要的地位和公认的性质，它们被撕碎，开始寻找某种新的方针。

首先需要从逻辑方面指出，这一问题通常都是以空洞的抽象的形式提出的，因为是非历史地提问题的，而这一问题的非历史、反历史的提法必然导致空洞抽象地卖弄聪明、“玩弄定义”、纯粹“空话”和经院哲学，一点也没有接近所提问题的真正解决。

到底什么是个人本身，“一般的个人”？是否任何时候都可以谈论个人？在哪些条件下，怎样才可以谈论个人？这些问题似乎是多余的，但具有头等意义。

在原始共产主义，在人群中还根本不存在个人：没有个人，还没有分出个人来，甚至还没有“我”的概念。这自然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作为生物学“个体”的单个的人，但没有作为单独存在的认识自我的个人。因此在这里关于个人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还没有个人，他还没有历史地产生，还不能谈论他，因为他还不是一种现实。

^① 俄文 *личность* 有个人和个体两种意义。布哈林多半是在“个人”的含义上使用此词的。

18 世纪的理论家们对社会的概念是持原子—数学论的立场的，持让·雅·卢梭的“社会契约”学说的立场的，他们的出发点是单个人为了共同利益而联合为人的联盟，即“社会”。因此，在这里历史的出发点是理性地与自己的同类协商建立社会整体的个体。这套理论是幼稚的，这不仅是因为把原始人变成善于计算的外交家，还因为事实上发展的出发点是人群，这是真正的初始社会。不是从个人产生社会，而是从社会并在社会中分出个人——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恩格斯在给彼·拉·拉甫罗夫的信中写道：“我不能同意您认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是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的那种说法。在我看来，社会本能是从猿进化到人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最初的人想必是群居的，而且就我们所能追溯到的来看，我们发现，情况就是这样。”^① 仅这一点就清楚地看出历史地提问题的必要性。

我们继续讲下去。让我们举埃及神权统治的奴隶制度为例。能不能把法老、祭司、大“占有者”、自由手工艺者、奴隶这些个人混为一谈？这些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可言？除了抽象的空话没有任何东西：因为在一端，“个人”是神；而另一端，作为个人什么也不是，因为这种个人在一切方面都等于物。如果口头上把所有这一切联合在一起，那么马上就需要加以区分、分解并具体化，那时得到的就不是单一的答案，而是符合具体历史形势的许多答案。可见，谈论“一般的个人”在这里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样得不出答案：问题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空洞，因为抽象，因为非历史，因为不辩证。同样 *mutatis mutandis*,^② 也可以用于其他阶级社会，虽然需要 *mutatis mutandis*，因为从我们所考察的问题的角度看，不同形式的阶级社会有其自身专有的特点。在雅典是对美好善良的个人的崇拜，但所有从事物质劳动的人都受到指责，甚至按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奴隶也是被排除出社会的。在罗马，奴隶是 *instrumentum vocale*，会说话的工具、物件，而对这个物件的私人所

^① 恩格斯：给拉甫罗夫的信，1874 年 11 月 12 日。（应是 1875 年。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 2 版第 4 卷第 624 页。）

^② 拉丁语：加以相应的改变。

有权被确定为 *jus utendi et abutendi*，也就是对之有权为所欲为。在印度，“帕里亚”是个否定的量，“不洁的人”，任何逻辑的魔法都不能把帕里亚个人与婆罗门个人联合在一起。如此等等。

与封建主义相反，在资本主义下每一个群体中的个人都是这一群体的一个环节，并在这种那种程度上淹没在这个群体之中，资本主义解放了“自由的个体”，实际上就是自由的商品生产者，即大、中、小资产者。其个人极其鲜明地跳上了历史的前台。社会的类型本身是无政府主义加上竞争的斗争，仅仅通过交换这个结子连接在一起，这种社会推出了这种“自由的个人”。在这一点上，过去的任何发展阶段都同资本主义无共同之处。个人在这里不仅微分化了，不仅摆脱了封建桎梏（行会、同业公会、国家监护、教会），而且在残酷的竞争中还使自己同其他同类的个人对立。

然而，我们这里谈到的也只是资产者的个人。而无产者呢？资本主义创造了两本账：在先进国家宣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把无产者变成“法的主体”、“个人”，与此同时在物质上又把他们变成生产工具、“生产成本”、“劳动力”、“工作的零件”。与奴隶和农奴不同，工人认识到作为个人的自身。但此个人的社会地位正好与资本家的个人的地位直接对立。所以这里也不能谈一般的个人：缺乏这样做的任何历史前提，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按阶级划分的个人，而没有“一般的”个人。

我们举的只是最大的社会划分，实际上问题当然要复杂一些：个人乃是一定的生产方式所特有的阶级——等级制的个人。

果戈理的《下房》中管家说：

“行为举止的要义就是，任何人都应当知道职责。仆人就是仆人，贵族就是贵族，主教就是主教。要让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可以说：‘不，我不是管家，而是省长或者什么步兵将军。’不过所有的人都会对我说：‘不，你在扯谎，你是管家，而不是将军。’——就这么回事！‘你的职责是管好家，管好奴仆。’——就是这样。‘你的事不是去问

бон жур, комин ву франсе,^① 而是维护秩序和管家。’——就这样！是的。”

社会主义首次消灭仆人制度，还要最终消灭阶级。但由于它是在斗争的历史过程中消灭阶级并建立完整的社会，这就第一次为一般个人问题的提法本身创造了历史的现实的前提：因为（1）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还不存在个人；（2）如我们所看到的，在阶级社会谈得上的仅仅是某一阶级的个人。在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个人之所以能够发展（朝这一那一由该社会的特殊自然条件所决定的方向），是靠压制被奴役阶级的个人直至完全消灭此个人（奴隶）达到的。在社会主义无阶级社会里，个人的成长并不牺牲其他个人，相反地，社会某一圈子里个人的发展会刺激其他圈子里个人的发展。这里不存在这一领域里的对抗，相反地，存在促进文化高涨的总进程的富有成果的相互作用。

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就是历史发展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社会主义发展的结果。因此不可能立即就这样提问题。在直接镇压剥削者地主和资本家的时期，这些人的“个人”并没有发展，得到发展的是工人和农民个人，是他们的丰富经验、主动性、组织才能、文化修养。在消灭富农时期，富农个人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沉重压力之下。但正是这种胜利的阶级斗争造成了向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这时联合了如此之多的人民群众，只要作某些不大的保留就可以提出一般个人问题。

个人的发展，个体性决不能同个人主义的发展混为一谈，这种情况在西方的著作中是经常看到的（这也是安德列·纪德叛徒言论的“理论”根据之一）。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值得较为详细地谈一谈，“一般地”谈，也以苏联具体历史为依据来谈。

个人的发展包括下列因素：（1）认识到作为个人的自身，（2）自身内心的丰富、复杂化、文化、主动性，（3）社会承认作为个人的人（自己的名字，而不是编号、数字、“单位”）。但这种发展可以有不

① 用俄语拼写的法语：“你好，你的法语怎么样。”

同的方向，这取决于社会结构（如果在阶级社会我们说的就是统治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是在竞争的基础上发展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它是在竞赛的基础上发展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是 *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狼的斗争法则”；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工作者之间的团结。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是靠牺牲其他人而取得优越地位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以个人的发展拉动另一个人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者的个人压制无产者的个人；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个人的发展，全体群众，所有的个人都得到发展。如此等等。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中，个人的发展是同“利己主义”、“唯我主义”、个人主义相联系的，即在多少尖锐的冲突、心理上敌视和不相往来的状况下，同把人们分开，使一个人与另一个人隔绝，使个人反对个人这些特点相联系的；相反地，在社会主义社会下，个人的发展促使竞赛的人们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因为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共同的事业、共同的目的、总效率共同取决于劳动的协同程度。

有人会反驳我们说，法西斯主义的情况并非如此，它消灭了自由经商和自由竞争时代的个人主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本书的第一卷已详细讲过。但资本主义并不由此而有所改善，因为法西斯的国家资本主义虽然消灭了个人主义，但它消灭的不仅是个人主义，还有群众个人，把它封闭在自己制度的军营之中；而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纵容自己超人的“精英”的超个人主义，其体现者就是其辩护士、先驱和先知的“淡黄色头发的骗子”。

因此，只有社会主义能解决在反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个人发展的任务，在这里个人在集体中得到不断的发展，在这里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将消失。

根据前几章关于苏联发展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到毫无疑问的、不断的，并且越来越加速的个人发展过程。实际上，如果我们再一次设法把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红军战士和过去的工人、农民和士兵作一比较，并且是从不同民族的角度来看，那我们不难看到个人的巨大发展。过去的士兵是“灰色的牲口”，过去的农民是“穿本色粗呢衣服的群众”，

过去的工人多数是“人手”，像生产工具一样是没有名字的，因为革命过程还没有使他们站起来（这种觉悟的提高以及与此同时个人的发展是变革可能性本身的保证，但这是有其历史界限的）。现在，每一个红军战士都意识到作为个人的自我，每一个工人都具有高度的个人的尊严感，而集体农庄庄员已不像旧时的“庄稼汉”。此其一。第二，“内部世界”本身，也就是说这些个人的内容变得无比丰富了——关于这一点已经谈过，并且这一点也无需作进一步的经验论证：文化的发展、主动性、心理的极大灵活性，等等，全都是我们社会生活中无可置疑的起码的事实。第三，存在公认的事实：不仅有苏联英雄，不仅有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和突击手，而且有所有“有自己的名字的人”，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等等都是全国知名的。这不是埃及金字塔、巴比伦神殿或者欧洲中世纪歌特式教堂的默默无闻的建造者。这是著名的光荣的名字。在这一点上还需再次强调一下，个人的分出和发展过程并不局限于某一活动半径的不变的范围之内，相反地，这个半径在不断扩大，其范围力求包括全体群众，这种情况的社会意义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

这一过程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劳动领域。这是生活的所有领域的共同特征，而如果我们看看过去落后的民族，情况就更美妙了：有多少演员、诗人、歌唱家、艺术家、教育家等等闻名于辽阔的苏维埃国家！这无数的事实是同那些“莫名其妙的个人”的哀号，同助长安·纪德之流的哀号直接对立的！在我们这里，个人是在社会主义尺度下发展的，不可能（即使“想要”）在反社会主义尺度下发展（这按照规则是不允许的，详见论自由的下一章）。全国接受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亿五千万人的道路，在这里每一个人的发展依靠的都是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上面提到的哀号不值得认真对待：它们不是多少能抹煞苏联伟大改造过程意义的论据。在社会主义尺度范围之内，个人的爱好、才干，即个人质的规定性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可能性去充分发挥展示。

因此，在我们这里个人是在集体中成长的。这一点值得我们来谈一谈。

在我们国家，在社会和个人“之间”存在无数的组织，它们在多

种多样的活动中形成了苏维埃民族：这里包括“lose Organisationen”，即常变动的、不大定型的组织（会议、代表会议一类的），生产单位（集体农庄），工会，合作社，大量的小组，科学技术协会，体育组织，last but not least^①党组织加上共青团。“个人”即苏维埃国家的公民加入其中的许多组织，他们在这些组织中，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这些组织，作为个人，作为整体的一员，即社会主义社会整体的成员得到成长。这种普遍多样的组织性是社会主义类型的组织性，是发展的形式，而不是发展的桎梏，是成长的形式，而不是障碍，这种成长是连在一起的成长。在集体农庄，庄员的个人在成长，因为其视野开阔了，变得越来越积极，其主动性在发展，他得到集体农庄生活的整个机制的不断激励。在任何一个小组，在科技、体育运动、艺术小组里，工人、集体农庄庄员、红军战士的个人得到丰富，他们得以向他人，也向自己展示才能、个人爱好和天赋，在这里按爱好所作的选择，等等。党和共青团组织的作用是全方位的，在这里个人的成长得到最鲜明的表现，因为在这里讨论和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并把解决方案最积极地贯彻执行。这无数的所有组织发挥了伟大的教育作用。这里正在创造与“国家性”密切联系并向之转化的“社会性”。

在我们时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西欧存在一种反对任何组织、反对一般组织的思潮，它视任何组织为反人类的、反人性的、反个人的一种生活形式；不仅如此，它还反对任何“客体化”，即反对任何社会发展的产物。这种抽象地（也是相当温和地）反对抽象的组织，是以抽象的个人的名义和为了抽象的个人即一般个人进行的。经过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到这样提问题的幼稚贫乏和内容空虚。我们已经谈过非历史地解释个人的荒谬性。这里需要强调，关于组织问题的这种提法也是荒谬的。中世纪的行会、基尔特等形式在一定的阶段是发展的形式，后来才成为这种发展的桎梏。它僵化了，它同社会需求发生了矛盾，它开始限制继续发展，于是它倒台了。所有中世纪的“联结”形式（不久前还

^① 英语：最后，但并非不重要。

受到前面提到的别尔嘉耶夫这类“暴动分子”赞扬的“本生性”、“等级制”等等)成了墨守成规、因循守旧、“老古董”、压迫的体现,都被一扫而光。社会主义的组织性是个人不断变动、灵活、生长、发展、内心不断丰富形式。无数的苏维埃组织就是无数的实验室,这里不断地产生的不是瓦格纳的“戈蒙库卢斯”——小脑袋矮身子的人,而是创造新事业的新人。这些微观过程也给社会宏观世界提供了自己的成果。因为如果没有人的成长,没有其智力、意志、胆量、坚忍不拔精神的发展,即他们个人的成长,宏伟的建设成果,其规模,其速度,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仅仅根据这一创造的成果就可以看到智力水平和性格的变化,这是在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灵活和不断变动、多形态和多样式、包罗万象的组织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别尔嘉耶夫反对“组织”和“客观化”的暴动,逻辑上会导致“排斥”全部文化成果的裸人,这是米·格尔申宗^①先生在其《两头通信》中所梦想的人。但这种超社会的主体必然会是既聋又哑的傻瓜,因为语言代表的是“客观化”,没有语言就不可能真正形成概念和思维。这样就要倒退到群居生活以前的阶段去。不过这样一来所有的“问题”就全部取消了,因为这里任何意识都熄灭了。这样以“个人”名义发起的“暴动”却导致野蛮地消灭个人。也不能不是这样,因为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得到发展,在社会主义的集体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第一,因为这里第一次创造了一般个人发展的前提(因为每一个人都成了个人)。第二,因为正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特点及其组织形式保证了其迅速成长。

这样,经验证明,一方面,关于抽象的个人和抽象的组织的抽象的提法是毫无意义的;另一方面,在具体历史的社会主义的组织中个人得到发展这一事实。

个人在社会主义集体中成长,而个人的利益是同集体的利益一致的,从物质劳动的“散文”起(劳动在我们这里越来越成为“诗篇”),到为实现人类兄弟情谊的理想而进行的斗争为止,都是如此。但是,别

^① 米·奥·格尔申宗(1869—1925)——俄国政论家、文学史家和社会思想史家。

尔嘉耶夫 *tutti quanti* ①打断我们，提出似乎无可辩驳的事实：争取理想的斗争甚至也会导致个人肉体的死亡，这里怎么谈得上“利益的一致”呢？根据新出现的绝顶聪明的庸人的结论，个人在这里要为“未来的”“社会”和“人类”的莫洛赫②献上牺牲，而它像吸血鬼那样吸干活人的鲜血……

首先，这一切并非新东西（在施蒂纳那里就可以找到）；其次，奇怪的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为庸人的“肚子哲学”开始的思想家们有了反英雄主义的、胆小鬼的、闲散的理想：“不要碰我”。

不过，我们还是来谈谈事情的本题。当我们说个人及其成长等等，我们说的不是生物学上的个体，而是具有一定“内容”的社会学上的范畴。我们认为内心丰富的、完整的、把智力与性格统一在一起的、充满激情的、英勇无畏的个人是较高类型的个人。所有这些特性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得到发展；这些特性本身表现的是有利于社会的倾向，也正因为如此，它们同时得到社会的承认。英雄主义因此得到光荣的花环，它是社会在个人身上的最高表现，丰富了此个人，把他提高到社会的顶端。英雄主义经常与个人肉体存在的危险并存，或斗士的英雄主义与敌人并存，或斗士的英雄主义与盲目的大自然的恶劣的自发力量并存。但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准备冒这种危险，英勇无畏、冷静沉着或奋不顾身的激情等等，就是“伟大的灵魂”，即伟大的个人的表现。去掉他身上的这些特性，他也就失去了丰富的内心：英雄、“伟大的个人”立即降低到只考虑怎样才“不打搅”自己的那种灰色的人、庸人和小市民。

就是说，个人的伟大与否的概念是用社会标准来衡量的。那些在最大程度上体现这种社会原则，即社会发展基本的、长远的和根本利益的个人是最丰富、具有完整价值的、英雄的个人。

可见，这里在社会和个人之间也不存在矛盾。个人并没有使自己成为“牺牲”品，也不期待因给社会提供“资本”而获取奖赏和利息。但由于社会主义个人生来以奋不顾身的勇气为共同的事业而斗争，把这

① 拉丁语：之流。

② 莫洛赫——古代腓尼基等国以活烧儿童为祭的太阳神。

看作是自己的事业，这不是外在的规范，不是可怕的宗教戒律，而是内在的要求，“灵魂”的内在特性，个人自身的特性，是其宏伟的生命之歌，其自身升华之顶点，其英雄之花。

不言而喻，我们这里选取的是一些基本的、典型的发展趋势，它们越过残存的旧传统、风习、偏见、因循守旧的因素、精神上的肤浅、利己主义遗迹、嫉妒心理、自私自利、个人主义以及其他社会主义机体上的胎记，为自己开辟出一条道路。但只有目光短浅、头脑愚笨的学究才会把历史发展的这些沉渣看作其真正的本质和基本产物。

在阶级社会，私有者阶级都有其自己的“伟大的个人”和自己的英雄。例如，《伊利亚特》里的阿基里斯是封建——氏族贵族的英雄。众所周知，他宁要光荣但短命的一生，而不要长命却平庸无光彩的一生。由于我们的生活离那个历史时代太远，所以阿基里斯像是一个既抽象又具体的英雄典型。但如果我们举帝国主义战争中的资产阶级英雄为例，那么他们怎么也不会被看作英雄，因为其“英雄主义”的社会本质是反社会的，是同社会发展的利益对立的，是同广大群众意识相敌对的。所以最深刻的评价标准也表现在这一方面。

苏联社会主义的特殊历史功绩是其亚洲地区个人的发展。这些地方在资本主义“旧制度”下还来不及走到社会的锅底。这里的社会空间在相当程度上还充斥封建—氏族关系。然而，正是资本主义阶段解放了“个人的主动性”，虽然采用的是商贩的、竞争的和个人主义的“狼的”形式。社会主义第一次去发展个人，并且是在全然不同的基础之上的。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形成个人过程的速度之快：总的历史发展条件的强大力量就是如此。“命运，这就是政治”——拿破仑在会见歌德时这样说过。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治决定了苏联各族人民的“命运”，而这个“命运”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所预言的“命运”全然不同。

（顺便说一下，资产阶级文化的创始人在多大程度上高于现在某些冒充内行的法西斯思想家，这可以从例如弗兰西斯·培根对法西斯分子所喜爱的命运思想的态度看出：“用于束缚理智的幽灵（idola）往往有两种。一种是不存在的东西的名称……另一种是存在但不清楚的东西的

名称……第一种概念就是命运，第一种运动……”等等。^①)

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特别显著的特点是确定了个人与群众之间的似乎永恒的对立。这里几乎得出一条规律——群众的发展是同个人的发展成反比的。这种“个人”与“平民”，“思想”与“物质”，“英雄”与“落后群众”两元论的“贵族”原则，是“精神文化”各种各样领域中众多体系的思想轴心，显然是具有某种极其深刻的基础的。我们在这里也应当历史地看待问题，并依据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最终阐明这个问题。

取自力学和物理学的“群众 (масса)”^② 概念本身已经包括 (起源上) 惯性、密实性、消极性的概念。它依靠的是历史地遭压迫、受压制、被剥削、没有文化、受苛待的群众的奴隶状态，统治这些群众的是“Bildung und Besitz”^③。“老爷”个人自然是群众的 (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精神的) 对立面。因此，例如在柏拉图那里，群众是多面多头的怪物；在马尔萨斯那里，群众也是怪物，是“自由的最可怕的敌人” (!)。这里对立的社会含义是非常清楚的，无需加以说明。较为复杂的是下列情况，即在同一个社会群体里的对立：例如歌德及其社交圈子。在这里极有远见的天才的个人在自己的那个圈子里是容纳不下的，而另一方面，他又不那么有远见，还是同这个圈子保持联系，不能转到自己的社会对立面的观点上去。社会“下层”常常染上统治阶级的全部偏见，因为只有在一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在的”阶级才会变成“自为的”阶级，即制定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认识作为阶级的自身，这个阶级有自己的特殊的、专门的利益及由此而来的任务。这时的个人就水平而言是如此完美，越出了这些偏见和整个圈子的界限，把自己同“社会”和作为“平民”的群众对立起来。然而，我们时代的最典型的情况 (而这个问题是最迫切的问题) 在于，思想家——知识分子虽然看到资本主义文化的危机和死胡同，但担心群众会降低文化水平，破坏积

① 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国家出版社1925年版第125页。

② 俄文 масса 有两解：质量，群众。

③ 德文：教养与财产。

累的宝藏（海涅的“阴森可怕的反圣像崇拜者”、瓦列里·布留索夫在转向共产主义之前的“匈奴”）。较为微妙的一种是不理解群众文化水平不仅向广度，而且向深度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社会主义的群众精神文化，即千百万人的大规模改造，是需要时间的；社会主义自身的集约发展（向深度发展）是争取来的，而不能立即进入灿烂辉煌之中；因此，例如这样的前提，如普遍的高等教育、消除“群众的不内行状态”以及他们与先锋队的对立，是个历史过程，其结果是作为群众的群众的消失。如果在这里这些“个人”出来反对群众，这样做就是反对千百万个人发展的可能性。

最后，还有一种情况，群众的最天才的思想家不为这些群众所理解（例如列宁在群众“真心诚意的护国主义”时期，那时多数人支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但列宁并没有因为这种暂时的分歧而得出反对群众的结论；相反地，他号召在群众中进行不倦的工作并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他预见到了群众创造性的大发扬，认为这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从文化的观点看要质量而不是数量，因而依靠的不是群众而是“上等人”，不是“黎民”而是“个人”，不是“群氓”而是“英雄”——就这些问题作哲学议论，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利益的并不漂亮的散文盖上一层意识形态遮羞布。在逻辑上所有这些议论不值一驳。因为：

1. 质量不能脱离数量；
2. 文化在数量上的增长将引起其质量的增长；
3. 数量和质量上的增长将促使整个文化本身出现新质，并且是具有社会规模的，因为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团结、内部的统一和有强大力量的文化，这在基于群众没有文化的分散对抗的社会是无法想象的。

因此，个人成长与群众提高成反比的伪“规律”乃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迷信之一，而这种迷信的社会阶级意义是极其清楚和显然的。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的批评家先生们从这个问题的观点出发贬低群众文化，虽然这一问题的另一面从其内容来说已转变成“精神文化”的风格和类型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这就是：认为或事先认为，社会主义的群众文化之所以同个人的成长不矛盾，是因为

它，这种文化，对“最深奥的”神秘的复明置若罔闻，它否定宗教，因此它不可能深刻，它因此也不可能产生神灵能够依附、可以同神直接交流的“真正的”个人。

确实如此。但我们已经说过，同非宗教的古老时代相比，宗教的古老时代是文化的石器时代。这种宗教标准是极端衰落、悲观绝望的表现。资产阶级在其发展的早期并不是这样说的。其最卓越的代表之一培根就这一问题这样写道：

“处第二位的（谬误的原因）无疑是具有巨大意义的原因。这就是当人类的理性和科学活动最为繁荣的时期，或者哪怕是平常时期，自然哲学并不重视人类的劳动。然而正是这种劳动应当是科学的伟大母亲。因为所有脱离她的怀抱的科学和艺术，虽然能够工作并用于实践，但得不到发展。众所周知，接受并巩固了基督信仰之后，绝大多数优秀人才都去从事神学了。对此给予了最高奖赏；给予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资助；这项神学研究占了优先地位，把属于我们西欧人的三分之一或全部时间都给占去了。”（《新工具》，LXXIX）

现在，中世纪的蒙昧主义者和辩护士号召退回到神学“文化”中去。很清楚，这种文化的英雄是不能在社会主义土壤上成长的。这样的个人确实是同社会主义文化不相容的。因为社会主义文化产生积极、乐观、创造的个人，他有清醒的头脑、坚强的意志和科学的世界观，他敌视任何神学和一切迷信。让那些死人去埋葬自己的尸体吧，我们要为社会主义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而工作。

第八章

平等与等级制

在社会主义下，同个人与社会、社会联系类型等问题有密切关系的是平等问题。在这里，社会主义的敌人（和苏联的敌人）从两个截然对立的立场出发进行攻击，这是在找不到合适的进攻跳板时常有的事。第一，断言社会主义对所有的人都一刀切，社会主义的平等是完全一样的、不存在质的差别的、灰色人群、中间人群、讨食的“老鼠”、阿拉克切耶夫军屯的士兵、尼采对“未来人”的讽刺画、像口袋里的豌豆那样完全一样的人们的平等。第二，断言苏联不存在任何平等：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收入比普通工人要多得多，工资的标准有很大的差异，生活水平完全不一样，实际权利并非人人一样享受，舆论只赞扬自己挑选出来的人，存在新“贵族”等级，等等。

为了解释所有这些问题，按照我们的基本方法论要求，需要看一看平等的要求是怎样地在何种涵义下历史地产生的，作为内容历史地变化的平等，它的意思是什么，它在我们时代又意味着什么，它在苏联是如何实现的。在分析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将对上述“两条战线”上的问题给予回答。在古代，存在奴隶占有关系，国家和民族相对闭塞，一切人之间平等的思想是绝对不能被接受的。基督教最初是被压迫者的宗教，它依靠与当时文化界的广泛联系，吸收了不同民族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因素，提出了一切人在上帝面前抽象平等的世界主义思想，这是同特殊的

сотериология 学说（关于“救世”、关于“神的王国”的学说等等）相联系的。这对严格划分自由人与奴隶、希腊人与“野蛮人”等等的古典观点来说是某种反题。但随着基督教内部的分化，分出凌驾于普通俗人之上的有社会势力的僧侣，基督教变成了统治阶级的宗教，即完全蜕化了，这一个概念的真实含义不再存在了，剩下的仅仅是后来被塞进各种各样内容的某些唯灵论外壳。在欧洲，在伟大的农民国内战争时代，政治和社会（反贵族）内容以新的力量被塞进了此宗教外壳（有许多以“圣书”为依据的教派，例如：“亚当耕田，夏娃织布的时候，贵族在哪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封建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引发了“自由、平等、博爱”（libert, galit, fraternit）的鲜明要求，这成了1789—1793年法国革命的口号。这里抽象的平等被历史地破译为消灭封建特权，法律面前的平等，形式上的司法平等；相反地，无产阶级把平等看作是社会平等，即经济条件上的平等，即消灭剥削，即消灭阶级。

古代世界的奴隶和流氓无产者不能形成自己的社会，他们的原始意识形态因得不到相应的实施而消失了。中世纪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主义，但没有导致农民的胜利（而如果导致了，在这以后就必然会开始资本主义分化过程）。资产阶级依靠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较高生产方式的阶级体现者取得了胜利，它的平等得到了实现：封建的枷锁被打碎，贵族的特权被废除，形式上的法律面前的平等或多或少地得到体现。但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矛盾的发展把作为更高生产方式和群众性的革命改造力量的体现者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问题提上了日程。与此同时，特别坚决地提出经济平等，即消灭阶级。这是资产阶级平等概念的某种反题，资产阶级的平等是形式上的司法平等，它掩饰和隐瞒了物质性质的严重不平。

需要从一开始就说清楚，经济上平等的无产阶级概念同平均瓜分统治阶级的财产毫无共同之处，虽然历史上工人运动也有过这种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在不成熟的无产阶级中的影响的倾向，同样，也曾有捣毁机器的倾向（英国的“鲁德分子”、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等等）。平分财产（不用说，这对机器和大型成套设备在技术上是难以做到的）会把

无产者变成小私有者，因而只会开始新一轮的资本主义发展；反之，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是新的较高的较有生产力的社会类型的基础：这里实现较高的经营管理原则，而无产阶级之所以取得胜利，正是因为它是这较高的历史原则的体现者。

现在让我们谈谈社会主义下一系列对理解问题有重要意义的领域中的平等问题。

平等和阶级。这里谈论的自然只能是消除和消灭阶级。不是阶级平等，也不是阶级平权，而是消除阶级。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的基本任务即消灭阶级，根据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新的生活制度的基础得出的结论。“因此，无产阶级所提出的平等要求有双重意义。或者它是对明显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反应……它作为这种自发反应，只是革命本能的表现，它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找到自己被提出的理由。或者它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它从这种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当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成了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和资产阶级平等本身共存亡的。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①

平等和民族。这里常常把平等同平权、发展条件均等的要求同某些抽象的民族平等混为一谈，尽管既然它们存在，它们就有其质的特点，即质的不平等。“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无产者或理论家想要自己同布须曼人或火地岛人之间、哪怕同农民或半封建农业短工之间的抽象平等；这一点只要哪怕是在欧洲的土地上一被消除，关于平等的抽象观点也就会被消除。在确立真正平等的条件下，这种平等本身就失去任何意义了。现在之所以要求平等，那是由于预见到……即将来到的智力上和道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党的出版社，莫斯科1933年版，第75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448页）。

德上的平等化。”^① 换言之，不能说民族是相同的，即质的完全一样；不能要求他们相同，即它们作为民族各个方面在质上的完全相同。但是，从目前道德和智力水平有差别不能得出这些差别是永恒的结论。相反地，必须拉平发展的条件并由此拉平其水平，同时保存一系列民族特点。

平等和性别。要求不同性别的完全平等，即消灭性别的差异及由此而来的全部后果，是荒谬的。但总的发展条件一样和对这些条件的权利（在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上）则是毫无疑问的（关于权利我们是有条件地历史地说的，只要这种权利还存在；到了发达的共产主义连这些范畴也会消失）。

平等和个人。这里说的也决不是所有的人在各个方面完全一样。这里说的仍然是提供发展的全部条件，消灭特权和各种形式的剥削。但一旦这些前提完全实现了，这种平等的概念本身也就消失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和资源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经过几代的社会发展，人们就一定会认识到：坚持平等和权利，如同今天坚持贵族等等的世袭特权一样，是可笑的；对旧的不平等和旧的实在法的对立，甚至对新的暂行法的对立，都要从现实生活中消失；谁如果坚持要人丝毫不差地给他平等的、公正的一份产品，别人就会给他以双份以资谈笑。”^② 换句话说，当社会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发达的共产主义，过渡到实现“按需分配”的口号的时候，“报酬”平等等等的要求就完全成为没有意义的了。^③ 至于个人在其他方面的平等（才能、性格、爱好等等上的拉平），那完全是

^① 布哈林是凭记忆援引的。原文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无产者或理论家想到要承认自己同布须曼人或火地岛人之间、哪怕同农民或半封建农业短工之间的抽象平等；这一点只要是在欧洲的土地上被消除，抽象平等本身也就失去任何意义了。现在之所以要求平等，那是由于预见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平等要求自然而然来的智力上和道德上的平等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0—671页）

^② 布哈林是凭记忆援引的。原文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和资源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经过不多几代的社会发展，人们就一定会认识到：侈谈平等和权利，如同今天侈谈贵族等等的世袭特权一样，是可笑的；对旧的不平等和旧的实在法的对立，甚至对新的暂行法的对立，都要从现实生活中消失；谁如果坚持要人丝毫不差地给他平等的、公正的一份产品，别人就会给他以双份以资谈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0页）

^③ 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无稽之谈。

这样，我们看到，平等的要求具有合理的根据，有发展的实际历史趋势为依据，就这一点而言，平等的要求就是要求消灭剥削，要求消灭阶级，从而为一切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条件。

由此可见，指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万应的、平均主义的、军营的趋势的论断是荒谬的。

但怎样使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趋势得到实际实现？

这里首先必须懂得，共产主义的前提是生产力、社会劳动生产率达到一定的高度以及作为其结果的产品的丰富。因此，从经济的角度看，社会主义的主要之义就是发挥新制度的优越性，在发展中历史地保证越来越高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因此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发挥刺激生产的所有机制（个人的、社会的、集团的）的作用，就成了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极端重要的任务。

正是应当从这个观点看待苏联不均等的工资问题。这些不均等的工资是和不均等的劳动相适应的。如果我们给不均等的劳动“付给”均等的工资，就会砍去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的直接兴趣的根子。因此这里：（1）没有任何剥削的成分，因为报酬是同劳动的效益相联系的：优秀工作者的高工资不是牺牲他人的劳动，而是靠他自己的劳动获得的；（2）工作者的利益是同整个社会的利益一致的；（3）其他工作者只要好好劳动可以获得同样的，甚至更多的报酬；（4）为促使生产步步高升的竞赛机制建立了物质基础；（5）在这一过程中提高劳动者自身的技能，等等。

因此，报酬的平等将是一种严重的不平等，是不好好工作的那部分人占有好好工作的人的劳动；而另一方面，这意味着生产的停滞，因为这会破坏劳动生产率发展的物质刺激。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在发展条件下消灭任何形式的不平等的最主要的前提。

“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仅能满足最起码的生存需要，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

划分为阶级。在这专门从事体力工作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①

在我们这里，在苏联，过去的统治阶级早已被消灭。但我们这里还不是全体群众都提高到能使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消失的水平；我们这里，还不是所有人都是中学毕业（更不必说大学了）。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到彻底消除“群众不内行”的残余，关于这一点在第二章已经谈过。这是在发展条件下不平等的最重要的历史制约因素，应当予以消除。但消除它们的最主要的决定性的历史前提，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做到既能保证经济需要，又能保证有文化建设，首先是教育所需要的相应的基金。当然，工作者的教育、熟练程度的普遍提高过程不仅仅通过学校。但新宪法把受教育权作为一条极端重要的主体权利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如我们详细谈论过的，党和政府的全部政策都旨在提高全体群众，消除作为全体人民中的一部分或者阶层的“内行”和“不内行”之间的对立。可见，为了在这里也消除劳动分工（虽然不是阶级的），必须迅速发展劳动生产力，而这一点又要求有我们已经谈过的刺激的分子机制。所以，作为劳动平等的工资不平等是在发展的条件下完全实现平等的前提。这就是历史进程的真正辩证法。

① 布哈林是凭记忆援引的。原文为：“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2页）

这样，我们就同时接近另一个问题，关于等级制的问题，它在法西斯的意识形态中起着巨大作用。等级制思想是平等思想的反题，而在法西斯分子那里它是万能的宇宙原则，虽然其根据极其平淡无奇：这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的等级制的强化，等于封建化的“等级”（奥特摩尔·施潘先生的五个等级）。

关于等级制问题需要从不同的方面提问题。

首先，应从阶级角度来提。

苏联是否存在阶级的等级制？不存在这种阶级的等级制，因为阶级界限正在消除。曾经有过这种阶级的等级制，因为无产阶级曾经是统治阶级。这种等级制，用黑格尔的话说，是“正在消失的东西”。

苏联是否存在等级（сословия）的等级制？也不存在，因为等级基本上无非是阶级的法律形式。

苏联是否存在一般的等级制？当然存在。这种等级制在党内存在，它在国家机关内存在，它在军队中存在，它在工会中存在，它在集体农庄、工厂中存在，等等。但这不是阶级的等级制（如果撇开在工人同人民的其他部分之间还存在的界限）。这表现了全体群众中某些部分、阶层成熟程度的不平衡，这是表示目前阶段还需要发展劳动分工。至于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从下列情况就可以看出：党和国家的整个政策、这种等级制的灵活性、其成员的不断变动、不断地从“下层”予以补充、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接近以及吸收大量的人民群众管理全部社会国家事务的伟大过程。

阶级的等级制内部是矛盾的、对抗的，正如整个阶级社会是对抗的一样：这里是相对的统一，它将被自身的矛盾所炸毁。社会等级制的两端有对立的利益，其上各自依靠某种所有制形式，并固定在意识形态中。社会发展的趋势是加剧这些矛盾，从而炸毁整个等级阶梯。苏联的等级制体现了人们的合作，它不是对抗的，其两端并不互相敌对，“上层”只是在种类不同（根据“内行”的程度分）的条件下，即不同阶层的人民由于一系列的历史的原因而成熟程度不一的条件下的整套领导原则的体现。从剥削社会的等级制，社会主义的等级制的全然不同的结

构，可以看到全然不同的发展进程：在剥削社会等级凝固了，上层和下层之间阶梯的距离扩大了。相反地，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群众的普遍提高，这个距离在不断缩小，因为愈来愈多的具体的人们在掌握管理整个社会—国家机制的杠杆。

苏联国家机关的等级制也是同强制性的规范联系着的，这不仅仅对阶级敌人的残余而言，也不仅是由于存在还没有消失的阶级的社会界限，也包括对待各种各样的残余、遗留、传统、动摇等等，甚至对人民的最先进阶层也是如此。这是自我组织和自我纪律加上相应的惩罚性制裁的历史必要的表现。军队中这些因素表现得最为突出，这是它的特殊任务造成的。同还强大的资本主义敌人斗争的因素越强烈，就越需要“权威主义”、严酷的纪律、明确性、齐心协力、行动迅速等因素。从非历史的观点，从理想的绝对物和空话的观点，可以任意攻击苏联的“权威主义”和“等级制”。但这种观点本身是空洞的、抽象的、没有内容的。而这里唯一正确的只能是历史的观点，它从具体的历史形势出发作出合理的规范，得出由历史进程的“大步”所确定的总的目标。在斗争中没有指挥、纪律、服从，那就一定会被击败。在整个过渡时期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意味着彻底毁灭。在资本主义包围和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竭力站起来的条件下，没有集中的坚强的政权，这就意味着毁灭事业。在群众成分驳杂和存在上述因素的条件下，没有领导者的等级制，就意味着什么也建不成。如此等等。列宁不是平白无故地谈到领导者在生产中的专政的。斯大林认为整个政治领导应当是把理论的洞察力与伟大的实干精神和具体性结合起来，根绝各种“做漂亮文章”和不负责任的空洞文章。这就创造了与新的历史任务相联系的有新质的新型领导者。列宁的伟大思想在这里有了具体体现，并且这一切在建设成就和生活（物质和精神）水平的普遍提高中得到了历史的证实。

同剥削社会的等级制相比，社会主义苏维埃等级制的特点是：剥削者的等级制形式妨碍大量个人的成长；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下它帮助这种成长，提高群众的首创精神，支持他们，把个人推上全苏的舞台，赞扬任何领域改善创造过程的任何大胆行动，同墨守成规和因循守旧作

斗争。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苏联不存在逆反趋势、黑暗点、困难的问题。属于等级制问题的例如就有官僚主义问题，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正是官位等级制、国家机关的等级结构极其庞大臃肿、脱离群众、墨守成规和因循守旧、文牍主义、冷漠死板的“办公制度”、失去同生活需求直接联系的趋势，这些需求被写在纸上，通过一级一级的机关，迟迟地以毫无生气的形式送到相应的中央机关。这些趋势是存在的，谁也没有否认。而问题恰恰在于，其一，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部结构以及它对群众的直接依靠、加上这些群众的成长；其次，像党这样生气勃勃、行动坚决的革命改造和创造力量，正在胜利地摧毁这些趋势：等级制的顶层——党和政府的领导——是革命改造、与群众密切联系，同“机关”墨守成规斗争的角色的体现。同群众的最广泛联系的各种各样的无数形式，其自身就是消除等级制的萌芽形式。

卡·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到共产主义下等级制的消失问题，他说得完全对。因为一旦国家政权消失，权力的等级制也将消失。“对物的管理”的集中职能将失去自己的政治外壳。“群众的不内行状态”将消失，正如作为先锋队和领袖相关概念的群众这个概念自身也将消失一样。这是否意味着不再会有较有才干、禀赋等等的人呢？这是否意味着不同的天赋将要消失，大家一下子都成了天才，因此谁也不是天才了呢？当然不是。但社会的认同已经不通过政权的光环来显示，而政权的光环本身也不再存在，而只是个历史的记忆了。天才的诗人也将像学者、发明家和勇敢的探索者一样受到热爱。将会听取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意见，就像病人听取医嘱一样，而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也将因激情（而不是因职业）而得到诗人和艺术家的赞赏，或听取工程技术人员提供的论据和忠告。已形成的共产主义社会将使自己的物质基地发挥某种自动作用，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条件下，也许会把重心转向其他创造领域。大家都懂得管理物的原则，并去履行这种那种职责。将根据爱好和才干由这些或那些人去中央管理机关工作，他们的指示将不是作为强制性的政权的指令，而是像医生的建议或者乐队的指挥那样得到

执行。旧的个体的和极权等级的世界的罪行和错误将渐渐消失：妒忌、奸诈、阴谋诡计——这一切作为心灵运动和行为动机将无法理解；贪图权力、虚荣心、妄自尊大、降服他人控制他人的爱好将消失。甚至在过渡时期有时在客观上是有益的一些特性（例如权力范畴内的思维）也将过时和消失，因为甚至人与人之间“狼的争斗”之遗迹也将完全消失。干才和天才不会按照新的品级表被列入新型等级制之内，这种品级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在物质领域，所有人都将按需得到满足，谁也不会在此词的本意上去“管”这些问题，虽然对物的爱好并不会减少，而是转变成得到美化的较高级的形式；在精神文化领域，任何品级表和等级制都将被看作过于外在的和已为历史超越的东西。在文化交流强化并飞速发展的情况下（广播、电视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远距”通讯手段），谁都可以知道各创造领域中自己所喜爱的人物。格奥尔格·齐美尔^①在其早期著作^②中提出一个原理：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强化是与这些联系的容量成反比的：组成某种统一体的人越多，联系也越窄。按照这种观点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景象，人与人的世界联系将接近于零——这里的容量将多么大而多样化！然而，经济和创造的统一、交往的技术可能性、联系的类型本身、将成为新“人类本性”基础的团结统一的全人类的高涨热情、将成为共产主义全部文化特点的处世态度与世界观的统一，这一切将按另一种方式提出这一问题：因为“范围”（круг）这一概念本身失去了自己的所谓定居点、自己的领土、自己的“旗号”。

但“不要为明天忧虑”。^③今天不能要求明天才能做到的事，但需要以明天的眼光看待今天。历史的辩证法是这样的：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创造特殊类型的暂时的等级制，而这种等级制归根结底是消除一切等级制的工具。

在许多世纪中，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分化出氏族“贵族”，“优秀

① 格奥尔格·齐美尔（1858—1918）——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康德的追随者，教授。

② G. Simmel: *Die soziale Differenzierung*.

③ 见《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第34页。

人物”，他们变成了阶级。劳动分工并发出征服、掠夺、兽行和奴隶，造成了社会等级制。它在埃及、巴比伦、亚述、印度等奴隶制神权国家，在波斯、中国等国家成长为庞大的体系。这种等级制在西欧封建主义具有其特殊形式。这种复杂的等级制度同封建主义一起垮台。资本创造了在法律面前形式上的平等，而“平等哲学”扫除了贵族等级制的“哲学”。但资本主义在工厂中建立了等级制之后，在自身的基础上在全社会建立了这种等级制。它建立了庞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以及从被奴役的殖民地工人到镀金的金融资本主义寡头为止的民族和阶级的等级制。法西斯主义在使这一制度永世长存（企图使之永世长存），从法律上和意识形态上把这种卑鄙的等级制固定下来。然而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引发了愈来愈多的冲突，资本主义的等级制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遭到不可避免的破产。社会主义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群众，为了战斗和建设他们建立了自己的铁的专政。社会主义还建立了自己的等级制，它起先表现了无产阶级的统治，后来则是人民中的先进部分的领导，在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基础上，等级制最终将消除其自身，因为它将同劳动分工一起消失。然而这里也不是简单地退回到原始共产主义的起点上去。因为消灭劳动分工在这里并不意味着生产力的下降，不是微分化的和无穷尽的生产部门的消失，不是退回到技术和经济的原始状态，而是社会生产基础的进一步丰富，以至于劳动分工成为多余的了；因为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水平的下降，文化得到如此长足进步，以至于行政人员的特殊力量等等和等级制成为多余的了；因为在这里社会的统一并不意味着退回到其群居的单一状态，而是文化高度发达的微分的统一，个人得到极大的发展，但消除了任何个人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者（包括傅立叶，特别是圣西门）鼓吹等级制度，认为是社会终极的理想的状态。但正如鼓吹社会主义“新教会”那样，这是社会主义思想不成熟的表现。“有教养人士”的博爱主义特点在这里表现为把旧的范畴移用于新社会。从历史上看这是非常清楚的。但我们不是根据我们古代的前辈的错误，而是在马克思—列宁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发展的真正趋势提出今天的要求的。我们既赞同又反对等级制

这种似乎“不彻底性”一点也没有使我们感到发窘。因为我们持历史观点，同时又持原则立场。马克思—列宁的客观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不是历史学派的客观主义，如马克思所说，历史向历史学派展示的仅仅是自己的背部，犹如以色列的神耶和華向先知摩西展示的那样。马克思—列宁的客观主义揭示通向未来的趋势。积极意志、积极力量、过程推动力的作用点正是在这里。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一方面今天巩固社会主义等级制；与此同时，利用它作为明天消灭它的工具。把这种辩证法看作我们的不彻底性，孺子不可教也。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内部监狱

1937年4月4日

公文

第1629号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四处处长

三级国家安全委员

库尔斯基同志：

送上被捕人尼·伊·布哈林的著作九张，请您处理。

被捕人属国家安全总局第四处管理。

附原文。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内部监狱典狱长

国家安全上尉：

(米龙诺夫)

第九章

自由问题

人类大家庭和人类文化的最大问题之一是自由问题。好像没有一个词得到如此频繁的使用，与此同时，也许没有一个词被赋予如此多义的内容，有时就其含义而言甚至是直接对立的。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而抽象地提自由问题就一定会陷入没有出路的矛盾之中。古典世界的自由，是同奴隶对立的自由。法国大革命所宣布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这是摆脱封建桎梏的自由，贸易、私有财产和剥削的自由，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自由，只骛实利的资产阶级自由，然而却被当作无所不包的神圣原则，当作一般自由。这种自由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以一系列相应的“人权和公民权”为前提的，早先在英国表现为 Habeas Corpus act ‘e’。^① 所谓“民主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等等）是资产阶级民主繁荣时代所特有的形式民主，这种自由对无财产者来说是没有相应的物质内容的，如此等等。不过还流行诸如“自由人民”、“自由国家”等等概念，这同样是极端不确定的概念，因历史支点、具体历史情势的凑合而异。

此地不是再来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地方。我们在这里想揭示苏联实际存在的自由的内容，指出它同以前各时期的联系，阐明其历史意义并在书中看看它的“命运”。为了把问题提得尽可能具体，我们把它分为

^① 人身保护法，1679年英国议会通过的一项法令。

几个小題，这就是：

1. 谁的自由？谁是自由的主体，其体现者？
2. 摆脱什么的自由，摆脱哪些缰绳、桎梏、拘束、压迫、障碍等等的自由？（否定的定义）
3. 在生活的哪些领域的自由，什么自由？（肯定的定义）
4. 什么样的自由，宣言式形式自由还是物质上的自由？
5. 为什么的自由？（社会功能的、社会历史的定义）

首先，我们想在这里谈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上早已充分解释过，但在讨论自由问题时还没有摆在应有位置上的问题。我们这里说的是作为自由主体的整个社会。如我们在其他地方不止一次地指出过的，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有明确目标的主体，它是无主体的，因为就结构而言它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它的规律是自发的规律，就像“大厦倒在你的头上的重力规律一样”（马克思）。这里的发展过程是非理性的。社会及其各个集团和个人无法控制历史过程的潮流：它们同作为客体的潮流是对立的，尽管它们也在“制造历史”。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无数的、多样的、交叉的意志的结果不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理人个人提出的目标：每一个资本家都想要得到更多的利润率，而结果是利润率下降，怎么也无法“预见”；每一个人都想得到最多的利润，并为此发展生产，而结果得到的却是生产过剩危机，生产的破产，商品的贬值，部分竞争者的破产；竞争性的战争导致大规模的革命，如此等等。这就是所谓的“目的的多式生殖规律”（冯特^①），这是资本主义社会非常显著的特点。因此在这里，社会是盲目的，它受控于自身的自发力量，它是不自由的；必然性不是通过它，而是作为其“自身的”但是盲目的力量起作用，犹如劫运这种外部强加的力量与之对立。

社会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体，是有组织的社会，自觉地提出自己的目的并按照一定的计划实现这些目的，是认识历史必然性因而是自由的社会（黑格尔，恩格斯：“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历史的必然性在

^① 威廉·麦克斯·冯特（1832—1920）——德国心理学家、生理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实验心理学奠基人之一。

这里表现为自由，自觉的、合理的社会的创造：这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从必然的王国跃进到自由的王国”。

这样，我们这里拥有了作为自由主体的社会；摆脱社会自身自发力量的自由；历史过程即社会生活活动的基本因素所决定的自由；社会无限发展的自由；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实质性的高度自由。认为这种自由同“事情”无关，通常说的不是这种自由，这是过于“哲学化”的问题，它不具有特别的意义，等等，这些论断是过于轻率了。这种观点是历史的近视。因为社会的合理建设是其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形式的表现，而后者是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的形式；而这又是群体和个人无数的与价值越来越充分的生活活动形式的前提，又是同自由的越来越多样性的形式和领域紧密相连的。

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自由具有具体的历史性质，它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来自社会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取代，来自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性质自身的根本性变化：从否定的角度讲，这是摆脱资本主义自发的盲目的规律性的自由；从肯定的角度讲，这是在认识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建设的自由，这是社会发展的自由。

历史地理解某一现象，这就意味着看到其过去的根源，揭示其通向未来的趋势。就过去而言，社会主义意味着：（1）生产力发展的自由，摆脱妨碍这种发展的资本主义桎梏的自由；（2）摆脱社会自发力量的自由，这一点我们刚刚谈到。如果看看社会主义本身的基本发展趋势，那就不难发现，社会的“合理性”及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就是说，有确定目标的自由，也有摆脱自然的自发力量的自由，并且在共产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对自然的征服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至于对物质生产的关怀退居次要地位；这时可以最大限度地缩短工作日，重心转向自由创造，而不直接取决于对物质“福利”的关怀（不取决于的意思是说，这后一任务可以说是自动解决的）。那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多次提到的自由发展的新阶段就到来了。

作为整体的社会的情况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来谈谈劳动阶级，谈谈无产阶级和在资本主义下受剥削的

农民阶层，等等，即谈谈群众。

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

1. 摆脱剥削的自由；
2. 摆脱政治奴役的自由；
3. 摆脱文化压制的自由。

然而，这些否定的定义应当同肯定的方面一起谈。不过我们事先必须指出几点。

从以上简短列举的自由可以清楚地看出，对剥削阶级来说，这是其自由的反题：剥削的自由、政治压迫的自由、文明压制群众的自由，这是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资产阶级国家相适应的，资产阶级国家是剥削者阶级的组织，垄断教育的组织。随着向社会主义过渡，剥削者的这些自由变成了他们的不自由，与此同时变成了过去被剥削者的自由。在生活的这些领域不可能有既拥抱这一方，又拥抱另一方的这种自由的概念。其次，必须强调这些新自由具有生命力的巨大意义，因为这是千百万人的自由，并且是在生活的极其重要的领域的自由。事情就是这样，这在对这些自由作更详细的解释之后会更加清楚的。

1. 摆脱剥削的自由。这是群众的自由。这是不为阶级敌人工作的自由。这是摆脱危机、失业、饥饿、贫困、漫长的工作日、变成“零件”、变成“生产工具”、变成生产等级制中的最底层等等的自由。这种自由的肯定内容（首先在经济领域）是：

(1) 为自己、给形成为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自己劳动的自由，这是每一个有工作能力的阶级成员的义务；对无产阶级群众来说，这是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都不可能有的自由，因为无产阶级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在资本主义下，为自己工作对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个幻想，因为这里到处是地主、资本家、银行家、高利贷者、富农、商业掮客的各种各样隐蔽的剥削。

(2) 管理生产的自由，决定其方向、其比例、其数量和质量、其时间。

(3) 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自由，这是由为自己劳动这种劳动性质

所决定的。

这样，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无产阶级经济自决的自由，同时对农民的这种自由加以某些限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然后是全体劳动者的经济自决的自由。在苏联所有这些“自由”没有作为自由来表述，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苏联，这是劳动阶级日常生活的起码事实，无需作特别表述，正如谁也不讲用脚走路的自由一样。然而在同资本主义国家比较的时候这一事实就需要表述了，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以法律肯定下来的实际状况是完全同我们相反的。

2. 摆脱政治压迫的自由。这同样是群众的自由。这是摆脱资本主义国家奴役的自由。这是摆脱幻想的平等权利与实际无权状态的自由。这是无产阶级摆脱到处屈服于资产阶级政权的形形色色法律的自由。这是摆脱资产阶级法庭、军队、警察、宪兵等等的自由。这种自由的肯定内容就是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政治自决的完全自由。

- (1) 组织自己国家的自由；
- (2) 管理国家的自由；
- (3) 决定国家在所有领域政策的自由；
- (4) 自我组织的自由（各种类型的劳动者的群众组织）。

3. 摆脱文化压制的自由，这将在取消资产阶级对教育的垄断和消灭资产阶级的“智力统治权”（恩格斯）之后到来。这是摆脱文盲和贫乏的“教育”，摆脱整个低文化技能（从技术到科学和艺术）状态，摆脱资产阶级意识的特殊形式（例如宗教）的自由。这种自由的肯定内容在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文化自决的完全自由，即：

- (1) 通过各种学校获得教育的自由；
- (2) 获得校外教育的自由；
- (3) 获得各种艺术享受等等的自由。

我们这里简短地列举了自由的巨大社会历史意义，这是苏联劳动者作为阶级，或者作为群众，作为集体，作为总体所拥有的种种自由。在谈构成特殊问题的个体自由问题之前，还需要用三言两语来谈一下属于社会另一种组合的大的社会子问题。属于此问题的有作为自由主体的民

族和种族，还有作为人类过去被压迫的一部分的妇女。不难看出，除了上述基本的自由以外，这里还有某种特殊的东西：摆脱民族和种族压迫的自由和摆脱对妇女压迫的自由。正面说，这就意味着民族自决的自由，妇女在男人享受自由的一切领域的自由，包括性（和家庭）自决的自由（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知道这些自由。并且如所周知，妇女构成居民的一半，而几乎在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里民族各异的居民占绝大多数。因此这些自由对地球上的绝大多数居民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也正因为如此，苏联的范例在这一问题上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现在来谈个体自由问题。这里我们还是要预先指出几点，这在我们涉及几个大的社会分支（阶级、民族、性别）的自由问题时已经做过。谢林^①早已提出一个原理：如果某一个体是绝对自由的，那么所有其他个体就会绝对不自由。这非常正确，尤其是如果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有不同阶级成分的社会，为社会主义斗争的初级阶段，这时社会主义还羽翼未丰。

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是，就如黑格尔这样的大思想家也认为，“神圣的”私有制是个体自由的基础。

黑格尔在批评柏拉图的时候，反对在柏拉图的“国家”中消灭私有财产的原则，他写道：

“财产是属于我这个个人的所有物，由于有了财产，我这个个人才取得存在，取得现实性。根据这种理由，柏拉图便取消了财产。但是他没有说明，在发展工商业的过程里如果没有获得财产的希望，如何会产生对于生产积极性的刺激。我之能够占有财产，即在于我是一个人。……唯有个人有了财产，他才有自由。这样我们就看见，柏拉图本人有意识地把主观自由从他的理想国中排斥出去了……按照主观自由的概念，家庭也同财产一样，对于个人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神圣的。”^②

① 弗·威·约·谢林（1775—1854）——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全集第10卷，第218、219页（见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卷，第263页。）。

说柏拉图那里除了上层“统治者”的自由以外一点也没有谈到主观自由，这是完全正确的，黑格尔对柏拉图国家的批判甚至过于温和了。不过认为生产资料（黑格尔说的是土地、带来收益的财产）的私有制是主观自由的基础，这是资产阶级制度辩护士的一种谬误。黑格尔的这一论点全面揭示了资产阶级所理解的个人（黑格尔的“主体”）自由的含义，即它把自由解释为在私有财产基础上活动的自由，即剥削、雇佣、出售、购买、获取利润（Profitmacherei）的自由。个人在这里同财产结合在一起，作为个人没有财产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社会主义制度消灭剥削的自由，消灭私有制，从而社会地消灭剥削者个人以及这种类型的个体自由。因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各种各样活动的自由，乃是千百万劳动者的不自由——这是我们看法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反之，千百万劳动者活动的自由，乃是其活动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那些个人的不自由。两种制度，两种类型的活动，两种不可调和的原则，一种否定另一种，一些人的自由排斥另一些人的自由，因此只要我们稍微历史地，即具体地提问题，普遍自由的概念立即分解，一分为二（黑格尔甚至走到这样的地步，把基于私有制的自由的历史形式看作是“普遍的”，一般主观自由的实体）。

维伯夫妇的“*Soviet Communism*”^①的巨大成就之一（尽管这部精心的巨作有许多大的不足之处）就在于，作者在个人自由问题上摆脱了通常那种表面的，所谓议会竞选式的解释。他们把“最大限度地增加按照个人愿望，为社会个人的整个集体行事的可能性”作为标准，并且指出，这一规范的执行哪儿也没有达到苏联的程度。

我们这里还需要谈谈苏联绝大多数群众兴趣所向、这些兴趣和千百万人所特有的“个体愿望”的范围，即自由的取向本身的问题。问题并非小问题，虽然没有赋予它所应有的那种意义。有一组与活的和具体的，而不是死的和抽象的自由的自由的思想相联系的问题却取决于主体愿望的方向。社会主义的批评者和苏联的批评者，即公开的和隐蔽的资本主义

① 《苏维埃共产主义》。

及其物质形式与“认知方式”的辩护士们所感兴趣的主要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活动自由，用一般自由，抽象的自由这种虚假的名称来掩盖这种特殊的有限的利益和这种特殊的有限的自由。而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来说，社会主义问题是无可争论的。根据千百万群众的经验，经过多年的检验，已经得到证实，社会主义给群众提供了在资本主义下所无法梦想的东西。因此，群众对抽象的自由问题不感兴趣，对鼓吹资本主义或者其意识形态问题反感。他们表示反对，他们把这样鼓吹的自由看作（并且完全有理由）是对他们生活自由的侵犯——对建设自己富裕和文明生活的自由的侵犯。在两种自由的冲突中他们捍卫自己的自由，捍卫千百万个人的自由，反对侵犯群众自由的一小撮人的个人自由。抽象思考的、“普遍公正的”（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上下求索的西欧或美国知识分子认为重心在这些问题上。而对现在谈论的自由首先涉及的那些苏联群众来说，由于讨论的是苏联的问题，他们感兴趣的是另一些自由，总的说就是发展的自由，物质和精神的高度发展的自由。

从个体自由的角度看，这种发展的自由包括哪些内容呢？个体自由同我们在本章开头所谈到的那些群众自由（看作总体的）的关系如何？

对最后一个问题应当这样回答：如果必要，以国家为代表的群众本身会为了千百万人发展的自由而限制个体的自由。（属于人民的）个人必须劳动，这在目前发展阶段是一条法律，即强制的规范。毫无疑问，这是对绝对的个体自由的限制。但这使得“个人”能够享受七小时工作日、定期休假和获得教育等等。另一方面，劳动不仅是义务，也是一种权利：有保障的工作的权利也是一条法律。但这是自由的保障。只要愿意，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工作，他不会遭受失业之苦。每一个人都可以挑选一种工作，一种职业（只要还存在职业）：这是选择劳动的自由，这种自由将越来越多——维伯说得对，在苏联工作中的多样性超过其他国家。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生产中以及在国家中沿着（暂时）还存在的等级阶梯前进，每一个人都可在某种程度上管理生产，并且可以以自己的工作来扩大自己生活活动的范围：这就是迁移的自由，这自然在哪儿也没有提到，并且也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每一个人都可以

利用工厂的一系列专门设施和机构等等来提高自己的技能，等等。这是提高自己的技能的自由。虽略有不同，但所有这一切都适用于城市和农村。

在直接经济领域情况就是如此。

日常生活中的特点是家庭的完全自由：爱的自由（不登记的婚姻自由），登记结婚的自由，离婚的自由——这一切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闻所未闻的。

在政治和国家管理领域，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批评管理中的缺点，可以在众多的各种各样的建设领域自由显示自己的创造性，选举自己的代表进入从上到下的各级苏维埃，在无数的社会组织和根据自由选择在不同的志愿团体和小组中自由工作；每一个人都有提升到苏维埃体系各机关的所有阶梯和政治等级，直到最高一级上去的自由。

在文化领域，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挑选教育领域，拥有教育自由、文化组织自由、智力和艺术创作自由、智力和艺术享受自由。

所有这些个体自由主要只受现有物质资源状况的限制。在共产主义下，即在非常富裕，生产力强大以及各种强制规范消失的情况下，继续扩大这些自由的基本历史趋势就成为无所不包的了，因而无需用自由来表述，因为自由已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范畴自然就完全消失了）。

与所有这些个体自由并行的是个人的发展，关于这一点我们已在专门的一章中谈过。所有这一切都沿着发展自由、个体在社会中并与社会一起获得物质和精神发展自由的路线前进。这不是法西斯的军营，不是封建化的资本主义专制的新形式。这不是柏拉图的国家，关于这个国家我国的皮萨列夫曾经这样写道：

“在柏拉图的国家里有官员、军队、工匠、商人、奴隶和淫妇，但没有人，也不应该有人。在国家机器中，单个的人只是螺丝钉、齿轮或者车轮的某种形式和单位；除了这种服务的职能以外，他在任何圈子里都没有任何意义；他不是儿子，不是兄弟，不是丈夫，不是父亲，不是朋友也不是情人……他是官方的财产，他同周围世界的任何人、任何东

西都没有联系……”^①

“刚愎自用的暴君——波斯的薛西斯一世^②、卡里古拉^③、多米提亚努斯^④，从来不想把自己的子民提高到养马场的水平。”^⑤

柏拉图的国家思想同当代刚愎自用的法西斯暴君的养马场和专制国家有某些共同之处。社会主义则远离一切兽行，把全社会飞速的前进运动同个人及其个人自由的飞速发展结合起来。

所有这些自由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物质的、本质性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为其实施提供了物质保障，就像劳动者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有公共场所、印刷机、纸张等等的保障一样。社会主义国家不把这些物质保障提供给诸如宗教自由这一类它所允许的（因为不可怕）自由。这种极端是可以理解的：社会主义国家允许这种自由，但它决不能成为宗教意识形态的载体，这种意识形态实质上是有害的，但已经几乎熄灭和死亡。但是，决不要认为上面我们已经把劳动者作为整体所享受的所有实际自由都开列出来了，包括其民族成分，包括妇女，包括劳动者，作为个体，作为各别的社会个人，也作为无数的组织。我们列举的只是群众和个人所实际感受到的最本质的自由，这是他们幸福富裕生活不断提高和发展的形式，其物质和精神力量、对自己力量的自信心、乐观主义、创造的形式。应当从这个观察点，从千百万人的愿望、追求、利益和感受来观察自由问题。谁想从抽象的“全体人”的自由来看问题，他就是停留在哥白尼以前的立场上，等于什么也不懂。在苏联没有剥削、经商、投机的自由；没有组织反革命力量的自由；没有鼓吹沙文主义、种族和民族仇恨的自由；没有采取反社会主义行动的自由，等等。但苏联有为自己从事创造劳动的自由；管理生产的自由；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的自由；组织和管理自己的国家，劳动者国家的自由，确

① 德·伊·皮萨列夫：全集，巴甫连科夫出版社1903年版，第2卷，第277页（文章《柏拉图的理想主义》）。

② 薛西斯一世（？—公元前465）——公元前486年起为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

③ 卡里古拉（公元12—41）——公元37年起为罗马皇帝。

④ 多米提亚努斯（公元51—96）——公元81年起为罗马弗拉维王朝皇帝。

⑤ 德·伊·皮萨列夫：全集，巴甫连科夫出版社1903年版，第2卷，第280页。

定其政策的自由；教育的自由；艺术享受的自由；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自决的自由；妇女、结婚、恋爱、离婚的自由；建设文明和富裕生活的自由；千百万人发展的自由；创造自身历史命运的自由。这些自由决定了群众的和组成群众的不断发展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这些自由是每日每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感觉得到的事实，不是一种“概念”，或者口号，或者抽象的东西，而是确定的不断充实的丰满生活，是一种进步运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运动不会遇到障碍：遇到的是另一种障碍，是社会主义会帮助克服的障碍，社会主义正是发展的一种形式，即保障“运动的自由”。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彻底理解下述解放过程：大量的人在自己的生活活动的所有领域一直向上攀登，随时感到自己的力量在增长，随时感觉到自己内心的振奋、个性的张扬、积极行动的可能性的增加。对我们这里自由不是绝对的，对我们这里没有诸如各种各样的反社会主义哲学体系的自由，千百万人对这一事实是不感兴趣的，也不会觉得是一种侮辱。对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官僚”（идеократия）（“单一思想”即一种意识形态的统治）的论据，千百万人一点也不觉得具有说服力。因为这里也在根据千百万人的经验检验如下的事实，群众思想的统一使我们取得了光辉的胜利，科学共产主义创造者及其继续者的学说是争取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斗争中的卓越武器。不过旧世界的所有真正伟大的历史遗产在我们这里都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进入了整个文化流通之中。已故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断言，经典哲学家的著作在我们这里被列入了共产主义 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①这不过是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无知攻击——不仅古代哲学家，还有资产阶级哲学家，不仅培根或斯宾诺莎或法国的唯物主义者，而且卡尔特西乌斯、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等的著作都刊印了成千上万册，其读者数量经常超过该著作的资产阶级读者。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是取消全部强制性规范。因此共产主义是无所不包的自由王国——包括社会、各种团体和

① 禁书目录。

个人。首先来自资本主义包围领域的危险消失得越快，通向发达共产主义的趋势就发展得越快。法西斯的垮台必将大大加速这些趋势。

如果共产主义是无所不包的自由的体现（事情正是这样），如果通向共产主义的历史道路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其发展和巩固是通过苏维埃民主的；如果自由的发展和普遍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一切也正是这样），那么所有自由的真正拥护者就应当走这条历史的道路，因为别无他途。

有目共睹，社会主义的自由要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制度的自由深刻得多，要更具群众性，更无所不包，更具“物质性”。它渗透到从物质生产开始的社会的全部生活。它具有个体、个体的组织、人群的大的分类（民族、种族、妇女）、整个社会等作为自己的主体（就对自身，对外部世界而言）。它不是宣言性的，而是物质性的。它不是静止的，而是变动的，即历史地发展的。作为整个社会主义社会整体、其组成部分直至各单个的个体的发展的形式，它把社会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它受到物质资源的限制，但物质资源在增长，因此这些限制将历史地消除。它受到某些社会残余的限制，而资本主义的包围和深刻的敌对态度又千百倍地加强这种残余的力量。不过历史将消除这种危险以及由此而来的限制。思想官僚不再成为“官僚”即某种强制规范的因素，但毫无疑问，世界观的统一将更加加强。然而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世界观并不是僵化的教条，它不断地发展和丰富。它自身就包含全面发展的萌芽，因为它是辩证的和唯物的。因此它自身就是真正科学和真正科学思维的真正自由的体现。因此，它将完全自由地向深广发展，这是一种不怕任何变革、任何思想争夺、任何大胆想法和思想流派的思维形式，只要它们来自对现实的分析。

毫无疑问，未来将给我们提出我们现在一无所知的问题，但是在不具备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去瞎猜这些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这伟大的、严酷的、多灾多难的同时也是大规模创造的时代有自己的任务，其中包括自由问题。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历史问题是社会继续发展的大问题之一，只有共产主义才能解决。苏联这人类进步的基本力量正走在这条道路上。

第十章

进步问题

关于进步问题，我们已经从纯理论角度分析过，我们看到，关于人类不断沿上升曲线发展（并且还是在世界范围内）的旧的流行观点并不正确：因为它们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无论从“世界”看，还是从曲线本身的性质看都是如此。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历史上不仅看到螺旋线的运动，还有循环运动，这在一些社会处于停滞、倒退和毁灭的时候都曾经有过。因此，在资本主义繁荣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反映了当时还年轻的阶级的乐观主义的关于进步的特殊学说，由于其抽象的普遍性而应予以否定。“Fortschrittslehre”^①本身是不能当作真正科学理论的。

然而，现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往往（在另一种社会基础上，在资本主义严重衰落和退化的时代）作出这样一种普遍的，但意义直接相反的结论：从来就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任何进步；当代世界“注定”，命中注定要灭亡的，正如许多古代文明灭亡一样。与没落的古代作大量的类比，为的是说明这一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这里有文明的物性，有都市主义，有经济衰退，有群众，有“民族的混合”，有宗教的衰落，有道德的沦丧，有对运动的嗜好，有歇斯底里，还有千百种其他的病态，它们都显示出必然的灭亡。当然，远不是所有资产阶级思想家都以这种

^① 德语：进步理论。

悲观的笔调来描绘当代的现实。如果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些流派和思潮来看，其情景是五光十色的，但大有教益。有一些（现在不是多数）继续相信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尽管遇到“暂时”的困难；另一些则相反，预言所有旧文明的灭亡；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在全力拯救资本主义，却假装反对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已经失去任何吸引力（这种欺骗语言表明，资本主义已经名声扫地，只好改变名称！），第四种人看到严重的没落症状，却全力败坏革命推动力量的声誉（而客观上只有这一力量才能引向真正的历史道路），与此同时，却提不出任何能够拯救世界的其他力量。总之，这里是一片混乱的图景。

这种混乱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文化危机的表现，对此无需大惊小怪。

旧文明灭亡了：（1）是由于内部矛盾；（2）由于国际性的战争；（3）由于这两者的结合。把“民族的混合”作为灭亡的原因（希特勒之流）是愚蠢的，这不仅是因为如果这样，那时世界上就根本不会有人，因为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纯粹的”种族、“纯粹的”民族，说它愚蠢还因为没落时代的“混合”并非原因而是结果，这不难从罗马的历史、马其顿的征战和古希腊文化、埃及、亚述、巴比伦等等的历史中看出，或者从较迟的时代，在西班牙人毁灭墨西哥文化（起初西班牙人并没有同蒙特苏马的臣民“混合”，而是干脆把他们斩尽杀绝），或者从英国人奴役印度中看出。

社会主义具有前所未有的完全特殊的历史前提，它消灭资本主义的矛盾，并将最终消灭战争。因此问题在于，用什么去推进社会主义自身的运动？它是否会意味着社会的停滞？不管怎么样，矛盾毕竟是发展的动力，就像黑格尔老人所说的，“*der Widerspruch ist das Fortleitende*”，摆脱资本主义矛盾是否预示着人类的退化，有如威尔斯在其一本乌托邦著作中所说的，娇生惯养的人们变成有天使的面孔，穿豪华的服装，但什么也不会做的漂亮的克汀病人？

这里总的情况是这样的：在威尔斯那里，在地下的奴隶劳动的基础上出现的寄生性的退化。社会主义的人是有创造性的积极的人，社会主义消灭一种类型的矛盾：人与人之间流血的矛盾、社会结构的矛盾，等

等，但这一切决不意味着它消灭了所有一切矛盾，实现了绝对的安静，即停顿。它并没有消灭外部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矛盾（“与自然斗争”），它没有消灭需求的增长与生产力的现状之间的矛盾，它没有消灭可认识与认识之间的矛盾，等等。过去把人的大量精力用于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现在它把解放出来的这些人力用于其他问题，其活动天地确实是无限的。

因此，社会主义不存在因内部矛盾、战争（它将不存在，但目前仍有此威胁）、寄生性的退化而灭亡的危险。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就显示出整个生活节奏和步伐大为加速，创造的能量得到空前发挥。必须指出，进步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即社会主义必然产生的要求。

我们先来考察不同领域中的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及其相互联系。

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决定了马克思所说的它们之间的“物质变换”。马克思写道：“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① 不过在每一个一定的历史社会里，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处于不同的相互关系之中，因此生产过程的刺激也不一样，如果我们从其所谓内部来看的话。在封建社会，生产和消费的相互关系是这样的，在相当程度上的实物经济状态下，生产的规模取决于封建主的需求，这是其上限，这是同停滞的原始技术（和整个不发达的生产力）完全相当的。资本主义是为生产而生产，根本不关心满足需求，而只关心利润。这里的刺激就是对积累的无限渴求。但资本主义也因此遇到了群众的有限消费，而这是同其特殊的结构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出现了危机。因此，这里已经出现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要定期通过危机来解决，它最终将炸毁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消除这一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消灭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这里产生了新的相互关系：生产是为消费而生产，但不是简单地消费，而是为群众性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5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

的迅速发展的消费而生产。可见，这不是退回到过去的实物经济的形式，因为无论生产力，无论社会结构，无论社会需求，都全然不同了。

生产的直接目的变成满足社会的需求。社会本身，过去的“群众”各个方面已经改观并成为生产过程的总主人，迅速地发展自己的需求。居民的人数必然增长，并且这种增长意味着生产力的增长。日益增加的居民的需求的增长实际上是无限的。

这里解决矛盾的办法是生产的推进，生产的发展，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这种运动实际上同样是无限的。这里还需要提一些补充情况：第一，自然资源的穷竭（例如石油、木材燃料，等等），这将促使转向其他形式的能源；第二，保护自然（森林、山区、湖泊、河流，等等）的广泛需求，取消纯都市主义型的生活，对享受自然和发展这种享受的需要——这一切都将大大增长，从而又提出许多新的大问题；第三，生产力发展的本身将创造出新的需求，这是事先根本无法预见的。

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指出，奢侈的概念已经完全变了，因为大众消费品与奢侈品之间的对立本身已经消失。可以预见到今后必然出现美化日常生活的过程，艺术渗透到从生产到住宅的日常生活中，这将要求不断改善所有产品的质量；也许从一定的时刻开始将越来越把努力的重心放在这一方面。如此等等。就我们所见，社会主义要做，准确点说，要不断地做大量的事。如果我们再回来看今日的大地，那么，例如取得光辉胜利的苏联，城市里住得还显得狭窄，农村里还住着几乎流传了千年的茅草房。这一切都要消除，要改建，弄干净，要亮出美妙的颜色。怎么谈得上停顿呢？……

因此，社会主义在物质生产领域为自己开辟了必然进步的纪元，因为生产力不断发展，需求在增长，劳动生产率在增长，剩余劳动的数量同样在增加，工作日大大缩短，等等。所有这一切全都是客观标准，因为它们展示了社会生活基础在扩大，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就其强度而言是与过去截然不同的，这就提供了使生活无限扩大的条件。

可认识与认识之间的矛盾在相当程度上是自然与社会之间物质矛盾

(也在作为认识主体的社会与作为认识客体的社会之间)的理论方面。这一矛盾不断在越来越新的基础上,在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再现,因为认识的过程是无限的。然而,这里重要的不是这种抽象的原理,而是过程的具体历史条件。这些特殊的历史条件是:

第一,生产力发展的进程,它在社会主义下的特点是非常高的速度;仅此一点就表现出现有的技术基础与技术的新要求之间的经常矛盾,这要由科学及其对工艺过程的反作用来求得解决。因此,生产力的发展直接推进个体活动,扩大其天地,深化其任务,以无比的力量向科学提出越来越多新的问题。

第二,被看作人的活动产物的有许多分支的科学学科,在积极创造的条件下在创造新的智力需求;正如一般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一样,一定形式的智力劳动将成为爱好的对象,迷恋的对象;斯宾诺莎的 *amor Dei intellectualis*^①将消除其神学的蛇足;对认识的热情将极大地增长,认识及其任务将成为享受的对象,生活的最重要目的之一,某些个体将专心致志地投身于此道;尽管科学取得一项项新成就,但可认识与认识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人的意识中扩大了,而这种矛盾推动认识的无限进程。

第三,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工作日不断缩短,这极大地增加了自由创造型的智力工作的可能性,全面利用个人的爱好和天赋。因此,不仅学会掌握整个生产过程,不仅加速提出并解决愈来愈多的新问题,并且为极大地拉长理论认识本身的半径,即为提出“长远的任务”,与培根·维鲁拉姆男爵所说的“能结果实的”任务相反的“闪闪发光的”任务奠定了基础。

第四,如我们所见,计划经济要求所有科学学科的综合,由于科学劳动是有组织的,由于科学是由统一的方法联合在一起的,因而其相互联系是非常广的,因此一个领域的发现能以最快的速度在其他领域得到反应。换句话说,科学各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和大规模的实践能取得最

① 法语:对神的理性爱。

大限度的效益。这样，社会主义在智力领域为自己开创了绝对的无限进步的纪元；科学劳动的生产率就像物质劳动生产率一样得到发展，而这也是一种客观标准，是不取决于任何主观评价的。

如果替科学胡吹，把非科学的魔法思维形式和无所不能的非逻辑的迷信加之于它，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普希金的同时代人、一位俄国独创的大诗人叶夫根尼·巴拉丁斯基早在现代直觉和“感悟”、直接体验和直观的拥护者之前就写过：

当人还没有用锻工炉、天平和尺子
去折磨大自然的时候，
他幼稚地倾听自然的预言，
虔诚地捕捉它的征兆；
他爱上了自然，而
自然也报以爱：
对他充满了友爱的关怀，
给他找来了语言。
感到灾难降临他的头上，
乌鸦向他通报凶险，
在要向命运屈服的时候
他果敢地弃绝这种邪念。
野狼从森林冲向他行走的道路，
竖起它的鬃毛，
预感到胜利，他勇敢地让自己的队伍
冲向敌人的阵营。
一对鸽子在他的头上盘旋，
预告了爱情的幸福。
在无人烟的荒野，他并不孤单：
有同类的生命在其中呼吸。
他轻视感觉，他相信智慧；

他深入太虚探寻……

大自然的心向他关闭，

大地上没有了预言。

这里无需认真分析这些说法。我们看到，没落时代怎么退回去求助于占星术、脏卜术^①、各种占卜术、先知、手相术士、颠僧、有灵者、预言家、神秘论者，信奉预兆、宗教狂热的启示，等等。但这只是思想的倒退。任何迷信都无助于实际掌握自然力，如果在其神秘的宗教外衣下没有隐藏着合理的知识因素的话。

然而，合理的知识的最高形式是科学及其哲学概括，它要由自己的成果，而归根结底由实践来检验：这样来认识自身的正确性，即其原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总之，社会主义意味着知识的无限进步。

还有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必将扼杀艺术，即扼杀对世界和社会的艺术—审美观，就像它扼杀对世界的宗教看法一样。没有比这种肤浅的观点更错误的了。宗教之所以消亡不是因为它一般地在情感上和智力上把人同自然力“联结在一起”，而是因为它把这些社会自发力量神化。神化的形式是把社会等级制，即奴隶制形式、“统治和服从形式”下的关于世界的思维和对世界的感觉移用到宇宙去。消灭社会生活中的这些形式，使自然和社会规律性服从于人的理性，是取消相应的意识形态形式即宗教的基础。但决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要一般地消灭人同自然和社会的联系——这种设想是愚蠢的。

另一方面，生活变得日益充实也不能成其为理由，有人说什么生活变得如此充实和有意义，甚至无需艺术来予以夸张；在社会主义下艺术夸张总是显得比生活贫乏，因此由于本身必然出现的乏力而消亡。

这一论据之所以不中用，是因为它在不存在边沿和界限的地方看到了边沿和界限。实际上，即使最有意义的和最充实的生活也不是历史的

^① 古罗马用牺牲的内脏进行的占卜。

绝对和终结。因此在每一个具体场合都存在变动的因素，在意识中被当作目的、希望、幻想、问题、未来的投影的总和。不过总的说来，为什么较为灿烂和有意义的生活不会有自己相应的艺术精华呢？相反地，可以说，历史上光辉的时代都提供了艺术的精华：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时代，与法国大革命和“资产阶级人类”的兴起相联系的歌德和席勒（歌德的《浮士德》是其时代的艺术百科全书，或按照普希金的说法，是其《伊利亚特》），等等。与其他时代相比，生活越是无比丰富，它就会得到越为无比丰富的艺术反映。如我们清楚地知道的，这对共产主义社会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不是计算机，而是完整的个体，即有发达的智力生活、意志的和情感的生活，与以往历史时代的人相比，他同自然和社会保持无限的密切的联系。

社会主义造就的精神文化的进步规模有多大，这从下列例子就可以看出。19世纪60年代，德·伊·皮萨列夫在其文章《文化的起源》中写道：

“我决不想在这里坚持斯拉夫主义观点并宣布我们的文明是虚假的和异国的。我们的文明不比所有其他国家好，也不比它们差；科学和艺术到处都生活在温室之中，为这些温室付钱的群众到处都关心着它们，就像关心埃及金字塔的内容，或者关心铁面具问题一样。英国的工人同不列颠博物馆有什么相干？德国工人同慕尼黑的雕塑展览馆有什么共同之处？巴黎穿短褂的人^①同法国科学院有何接触点？”^②

在我们的时代，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时代，这些话读起来会感到奇怪的：只要看一下我国博物馆、绘画和雕塑展览馆的参观人数，科学院的巡回报告会的听会者及其出版物的发行数量，就可以看出“昨天”和“今天”之间的鸿沟。

我们在另一个地方已经涉及下面这样一个问题：苏联还没有自己的普希金和歌德、贝多芬和达·芬奇。不过根本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太年轻。人民的所有有生力量都首先投入斗争和物质建设——这就是

① 指法国19世纪的工人和手艺人。

② 德·伊·皮萨列夫：全集，第3卷，第603页。

历史过程的规律性。然而，群众艺术文化的巨大发展为他们以后的出现不断创造基础。谁看不到这一点，不懂得这一点，他确实是“老天不给眼”。

有充分价值生活的不断扩大和人的完整性是艺术得到无限发展的历史前提，而这一原理是完全客观的。

因此，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进步是社会主义的“运动的规律”。至于人以及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类型，我们在这里也看到全线的进步。

因为社会主义解决社会和人的任务，使作为完整的、内容越来越充实的个人在社会中并与社会一起成长，个人拥有发展自身个性和越来越多样的生活活动的可能性。社会主义解决民族任务，提供多样性的空间，同时建立愈来愈多的统一。社会主义一劳永逸地解决“妇女问题”。社会主义创造统一的人类，人类的亲密友好，而在共产主义下将达到全面的自由（个人的和集体的）和所有外部发展条件的平等。

这一切不是抽象的理想，而是完全现实的历史趋势，所以共产主义的“完善”（历史的完善）无需仿照著名的以本体论证明神的存在的手法来为自己做“本体论”的论证；它是从真实的历史过程的观察中得出结论的。

不过，对人类社会来说是否也存在不可避免的老化，然后死亡，即因力量用尽而死亡的规律呢？

有很多人，其中包括傅立叶，都赞同这种猜想，甚至在恩格斯那里（《反杜林论》）我们也看到类似的说法。然而，我们认为，这种猜想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实际上，导致这一结论的抽象的理论设想是建立在同有机体类比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忽视了社会学所特有的“性质”。这正是我们认为整个“社会有机理论”是错误的根源。社会不是有机体：它是社会，正如它不是机器，有机体不是机器一样。正如不能把生物学规律移用于社会一样，也不能把青年、成年、老年以及由于衰老而不可避免的死亡的阶段“规律”移用于社会。此其一。第二，我们知道的所有社会死亡的情况说的都不是因“衰老”而死亡，虽然这种用语很流行。如果说西班牙人杀光了墨西哥人，这并不是因“衰老”

而死亡。如果说罗马帝国因奴隶制经济无法解决的矛盾而崩溃——在这里被压迫阶级无力取胜，它也不是较高的经济和文化原则的体现者，在这里这种特殊的局面还因所谓“野蛮人”的入侵而复杂化——这不是因为“机体”衰老而死亡，而是因为一个具体的历史社会由于其发展的特点和历史条件无力过渡到较高的阶段去。如果说，罗马人扼杀了迦太基人的布匿文化，那么这里一点也没有伟大的汉尼拔人民衰老和机体死亡的影子。如果说沉睡了几千年的老而又老的中国现在动了起来，并且在社会主义下一定会焕发青春，那么这里哪有一点点因衰老而死亡的影子？并且，实际上衰老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是什么东西衰老呢？是否所有的人作为一种类型大体上都一样“老”或者“年轻”呢？可以有条件地，即打个比喻，说某一生产方式衰老了，如果它作为生产方式要历史地死亡的话。不过一定的生产方式的死亡并不总是整个社会的死亡。封建主义死亡了，但社会过渡到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将要死亡，但社会将过渡到社会主义。还有奴隶制的罗马或者希腊同整个“古典世界”一起死亡了。由这些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生物学的抽象是不中用的，什么任务也解决不了。没有任何根据认为，社会有一条因衰老而死亡的规律。

不过我们认为，甚至对生物学的个人来说这一规律也决不是永恒的。一般说来，“永恒的规律”既是永恒的，也是不永恒的。有 a、b、c 的地方就会出现 A——这是规律的公式。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只要有 a、b、c，就会出现 A。在这个意义上，规律（任何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以及任何其他规律）是永恒的。但如果这些条件（即 a、b、c）不存在或者它们发生了变化，变成了 B (α 、 β 、 γ)，那么出现的就不是 A，而是别的什么。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个规律都不是永恒的，任何规律都是历史的。如果科学在什么时候找到制造活细胞的秘诀，那么它就能解决它们的再生问题，即个体不死问题，这里没有任何奇迹或者神秘可言。从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①到飞机的出现经过了多么漫长的

^① 希腊神话中的父子，他们用蜡粘上羽毛做成翅膀飞行，伊卡洛斯因飞得离太阳过近，蜡被熔化而坠落海中。

时间，好在任务还是解决了。我们怎么能说克服死亡的任务是根本无法解决的呢？不能这样说。

然而，有人会向我们指出，整个地球必然毁灭，而整个“人类”将与之同时毁灭。我们不能看得这么远，但我们认为这种毁灭决不是必然的，因为其前提是星际航行问题根本无法解决的。然而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证明，什么也无法证明。同地球变冷的时代相比，同那个时期的“人们”相比，我们还不及野蛮人，用我们现在的科学可能性去看极其遥远时期简直是可笑的。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乐观主义，而在于消除命对命定规律的拜物教，其非历史的解释以及绝对化，这是我们从过去继承过来的，是经不起任何批评的。

让我们回到较近的时期。要说一下，问题和任务提法中的历史性之表现，是伟大的任务在普遍的意识中往往被浓雾所掩盖，因为在日程上摆着历史地必须予以解决的另一一些更为迫切的任务。在残酷的阶级斗争和抗御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社会主义的战争时期，鼓吹人们的普遍博爱是可笑的。但最后取得了胜利，博爱就被当作新的任务提出来了。在物质上建设社会主义、克服成千上万的困难、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等等的时期，提出个人不死的问题是可笑的，议论这种问题也并不怎么可敬。而过几代之后，这个对许多人来说是悲惨的问题将成为科学的一个问题，并且它将作为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得到解决。科学的进步就表现在这里，它把越来越大胆和越来越“崇高”的问题提上日程，在另一个时代如果提出这一问题那将会是可笑的或者疯狂的……

所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打开了人类无限进步发展的前景。我们无法说清楚，在共产主义的怀抱中人类大家庭将会出现哪些形式。不过可以指出，如我们现在所想象的，共产主义也不是永恒的，因为只要采用某种新能源（例如利用原子能），就会意味着一场大规模的技术革命。不过这种技术革命不会招致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而只是对劳动关系进行合理的自觉的改造。人类永远不会退回到狼的生活。

所以，这里说的根本不是平淡无味的灰色的小市民所过的那种静止、停滞和生存的王国，就如封建浪漫主义作品和好斗的帝国主义，或

者眼下充斥法西斯主义动物园的其两者的杂种的唯美主义理想主义的鬣狗所描绘的那样。这里说的是无限进步，是永远前进的运动，是提出并解决愈来愈多的新问题，是充满创造和幸福的生活，在这里，生活、认识、爱、劳动、艺术创作中的悲剧原则将充满热烈的乐观主义和崇高的人性。

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内部监狱

公文第 13 号

资料

被捕人尼·伊·布哈林属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四处管理。

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内部监狱值班副典狱长（签名）

1937 年 4 月 7 日

第十一章

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的风格

众所周知，马克思提出了“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作为特殊历史范畴的“经济形态”及其特殊的“运动规律”的概念。马克思还认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与其相适应的“认知方式”（“Produktionsweise”和“Vorstellungsweise”^①），即思维的特殊类型、全部上层建筑形式的特殊类型、意识形态的特殊类型，换言之，“精神文化”的特殊类型。马克思自然清楚地知道（他第一个强调指出），社会分裂为阶级，此统一体一分为二，这个统一体是相对的，是对立的统一；马克思还强调指出，实际上并不存在“纯粹的”社会形态，其中总会有先前“生产方式”的残余。尽管如此，社会形态，即“生产方式”是实际存在的历史事实。现在大家都在谈论资本主义，但不要忘记，这种生产方式是马克思发现的，是他命名的。最近资产阶级理论家们加紧研究社会的“形态学”问题——形式问题，马克斯·韦伯提出自己的“理想类型”、卡尔·拉姆普雷希特^②提出“显性”思想、马克斯·席勒提出社会学所决定的认识方式^③、奥·施本格勒提出文化不同方面的形式统一，等等。施本格勒在其鼓噪一时的书中以其特有的奇怪

① 此词有不同的译法，如“观念方式”、“概念形成方式”，《布哈林论稿》中译作“表象方式”。也许译作“认知方式”更接近原意。

② Karl Lamprecht: *Modern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③ Max Scheler, op. cit.

手法写道：

“在微分学和路德维希十四世的王朝国家原则之间，在古代城邦国家形式和欧几里得几何学之间，西欧油画的发展前景和铁路、电话以及远程武器在缩短距离这两者之间，在对位器乐和经济信贷体系之间，谁知道存在着深刻的形式联系？”^①

再早一些，格奥尔格·齐美尔研究了“生活风格”问题^②，等等。马克思主义当然不能对施宾格勒的牵强附会的奇谈怪论负责。但事实是可敬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极其无耻地剽窃了马克思，然后随心所欲地强行“改造”它。

然而，让我们看一看第一手资料。马克思说的是同社会生产关系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特殊方式（“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③）。与之相应的是思想结合的“特殊形式和方式”。因此，可以谈论文化的统一风格，其中既包括物质因素，也包括精神因素，这构成了它们的统一。

至于马克思本人持这种观点，那是毫无疑问的。例如，他在分析封建生产方式时写道：“在这里，我们看到，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Lehns geber*），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同样也（*ebenso sehr*）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④

在另一个地方，马克思把与此相近的关系看作是“统治和奴役的个人关系”。因此，统治的个人联系类型——物质领域的奴役在“生活的其他领域”有其印迹。事情就是这样。如果我们完整地看看封建文化，我们就会看到，这整个文化是建立在体现统治—奴役各个环节的等级制原则之上的。生产关系就是这样构建的。国家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教会是这样构建的（把等级制搞得非常准确）。宗教和哲学是这样构建的

① O. Spengler, op. cit., B. 1, S. 8.

② 例如见：G. Simmel; *Philosophie des Geldes*, S. 480.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4页。

(我们记得,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整个宇宙都是分等级的)。艺术是这样构建的,所有的一切都渗透着等级制、官阶、上下级(典型形式是歌德式教堂)的思想。中世纪的一位歌手卡尔萨温关于欧洲的封建主义这样写道:

“封建社会生活的等级化趋势被十三世纪的法学家上升为理论和系统的程度……鼓吹者很清楚作为整体的社会是横向划分的,虽然有老爷和贱民之分。他们用圣徒的语言对农奴发号施令,命令奴隶服从自己的主人。上帝在大地上创造了国王、公爵以及其他一些统治他人的人。他们是神创造来使小人物服从大人物的。”

天上的等级制是同地上相应的。整个世界观是特别专横的,即浸透了严格的奴隶制的等级服从思想:个人形式的奴役统治。它是宗教化的。它的道德是无条件服从、忠实于主人;上层是贵族的自豪,忠实于氏族,把谱系神化,敬重祖先的“遗训”、氏族的光荣传统、高贵的出身;贵族的自豪和荣誉,对“下民”的鄙视,无所不包的传统思想,对稳定、稳固和永恒的歌颂,对神的崇敬和等级结构的生活;神的启示的统治,神的永恒真理,需要的仅仅是听从,如此等等。这也就是封建文化的风格。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摆脱了封建桎梏。它消灭了封建主义所特有的人和思想的“特殊结合方式”,“生产方式”和“认知方式”。它用“自由契约”、资产阶级的“自由个人”取代了“束缚”。用雇佣劳动取代了农奴制。但它建立了市场的自发权力,这是无人格的盲目的权力,同时又是工厂中的等级制的专横的权力。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政府性质就在于商品生产者形式上的独立。他们之间的普遍劳动联系是隐蔽的,单个企业中的劳动乃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这一事实表现在商品的“社会属性”、其价值上,而人与人的关系表现在物与物的关系上。由此出现一种现象,马克思称之为“商品拜物教”,即这样一种错误的思想,它看不到人与人的关系,而归之为物的神奇属性(例如,不是把资本解释为一种表现于物上的社会关系,而是看作具有“生产率”神奇特性的物,货币“带来货币”,“土地”产生地租,等等)。市场关系无

人格的、无名的力量，资本主义社会盲目的自发规律，也导致“认知方式”的某些特点——实体性的或者规范性的各种各样抽象的、模糊的范畴：这就是各种“力量”的形而上学的范畴；这就是像康德的绝对命令那样的规范；这就是“纯粹”科学、“艺术”等等概念。这里，关于这些由分散的、独立的智力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的社会起源、职能等等概念都不见了，出现了对人类创造物的拜物教：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神，抽象的和恶病质的、失去感觉和个性特点等等的神。但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的领导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正如军队需要军事指挥员的等级制一样，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managers）和军士（监工，foremen, overlookers, contra-maotres），在劳动的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资本论》第1卷^①）

可见，资本主义并不排斥等级制、“专制”原则，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认知方式另外一个特点。

现在不难理解，在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然后向军事警察型的法西斯国家资本主义转变的时候，在“认知方式”中等级制、“封建化”、官阶、“专制”的因素一定会增长。

我们试从这种总的观点出发描绘一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认知方式”。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正如任何社会的生产力一样，是技术即生产手段与人的组合。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与所有其他的、首先是过去的生产力有不同的特点。

第一个历史性的决定性特点是过渡到全面使用电力，电力把分散的一切联结在一起，它渗透到各个领域，保证形形色色的工艺过程在技术

^① 布哈林根据记忆引用。原文为：“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正如军队需要军官和军士一样，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在劳动的过程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9页。）

上的统一，推动它们在全社会的规模上的全面协同一致。

其次，完全特殊的重大的特点是，活的生产力——工作的人，整个生产力中人的“部分”因劳动过程中的合理的和自觉的主体的力量，第一次成为劳动过程中合理的、自觉的和决定性的主流。

与上述特点有密切联系的社会主义社会物质生产力的第三个特点是“机器的人性化”，即活的劳动支配死的劳动，这是作为物质生产力的组成部分的技术与人之间全然不同的另一种关系。^①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特点是非常清晰和表现于计划的统一，生产过程本身已经显示出这种统一，在这里不同种类的劳动从一开始就立即作为总的社会劳动的组成部分出现。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从总体上说是合理的统一，是作为有目的的、自由的即不服从于社会发展的自发规律的主体的社会，这我们在前几章已经不止一次地谈过。这是特殊的经济结构，这里经济与政治融合在一起，不知市场自发势力为何物，因为“市场”（即使在当今的苏联）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场了。另一方面，临时的和历史暂时的社会主义“等级制”不是剥削和“统治—奴役”（马克思语）的表现，而是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群众自我组织和自治的表现，这在专门的一章里已经解释过。其次，我们看到，在经济整体和工作多种性的统一的情况下，由劳动分工引起的人们的单一性在逐渐被消灭，越来越多地出现创造性生产的个人，其统一性和完整性表现于其生活活动的多种性。

由此可得出结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文化”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升华的商品拜物教，即形而上学的空洞抽象和空洞的形而上学的规范立足之地，包括首先与所谓“宗教意识”有联系的以升华形式出现的等级制范畴。

物质生产与物质文化同精神生产之间并没有隔着万里长城，实践同理论是联结在一起的，智力生产这里也有其特点，这就是：

^①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死的（“过去的”）劳动是不变资本的一部分。“过去的劳动和活劳动是两个因素，资本主义生产就是立足于这两者的相互对立之上的。”（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2卷第1册第292页）

1. 同物质生产和文化建设有密切联系；
2. 有计划地组织智力劳动的基本项目（手段、干部、选题的计划）；
3. 过去被分隔开的各种专业化的项目的合作和综合；
4. 方法与哲学概括的统一。

这就消灭了物质与精神二元论的历史基础，避免了空泛的结构和体系的产生，在这些结构和体系中，这样那样反映现实的科学抽象和符号变成了现实的主体，智力劳动的产物脱离了自己的社会基础，变成了外在的神秘力量，而脱离了“躯体”的“思考的灵魂”成了幻想的创造者和创造宇宙的巨匠造物主^①。当然，根本谈不上消灭各种学科和从各种各样的知识领域制造乱七八糟的东西；相反地，将从这些学科之间的自然联系和相互作用并联系其实践基础去理解这些学科，与此同时把它们看作是相互联系、方法统一的（即在对象方面和方法方面相互联系的）。这样，在这里组织、综合、统一蕴藏着具体的多样性。

出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是人道主义的崭新的和具有历史特点的形式。这里第一次创造出一种人，他不是畸形片面的“经济型”的人，而是完整社会中的有血有肉的完整的人。因此，处于中心的作为渗透一切的因素的是集体化的人和人的集体性。不取决于人及其意志的外部存在的世界——大自然，在这里被看作是物质（материя），它变成供人使用的物质材料（материал），成为实践改造、理论掌握、艺术享受的对象。技术这一生产力的物的组成部分“在人性化”。生产的方针是满足人的需求。科学不再被看作是纯粹的“自在”范畴，而是一种手段，其方针是满足世界上人的需要——包括物质的、精神的、感觉的、智力的，“低级的”和“高级的”需要。人自身在其发展、在其多方面的可能性、在其与其他“同仁”的团结联系中都被看作是目的本身。在人与人关系的所有领域中立足于个人尊严和对个人的尊重的共同性、团结、友爱、高尚的利他主义（不是作为强制的规范，而是成为本

^① “巨匠造物主”（Gnosticism）是罗马帝国时期希腊—罗马世界的一个秘传宗教诺斯替教中的神。

能)、友好、爱心、人性，一切为了社会的英雄主义和高超的才能——这就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最大特点。因此，这里决定性的东西也是多样因素中的统一的人类。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艺术的风格其特点是否定任何神秘主义和彼岸性。但这仅仅是其否定的一面。从肯定上说，它包含自然和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它们在变动、矛盾和统一中的全部多样关系，动态、矛盾和统一。因此，它没有排斥形式的多样性：包括史诗、抒情诗、浪漫主义作品、“小形式”、“大形式”，但认为宏伟的“大”艺术是最高形式，它能反映整个时代，反映“其所有的联系和中介”，这里形象不抹去概念，感觉不抹去思想，这里浓缩了伟大时代的全部丰富生活和全部丰富思想。正因为如此，这样一些人类天才的创作，这样一些出色地概括了人类发展的宏伟图景的作品，目前在苏联受到如此的热爱，如歌德的《浮士德》，在这里天才的诗人超越了阶级的界限，写出了人类的悲剧史诗；贝多芬的伟大交响乐，在这里同“命运”的抗争、心灵的奋斗、全人类胜利和欢乐的庄严结局迫使人的心灵为之颤抖，他们是未来社会主义伟大创造的先驱。深入民间艺术和叙事诗同样成为发展的出发点之一。R. 瓦格纳关于各种艺术综合起来和这些艺术同时也是共同的强有力的群众行为的梦想，在我们看来无疑是有前途的，因为社会主义发展的综合的联合趋势就是这样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艺术反映了细分的专业化、生活的贫困化、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本性、其代理人日益增加的悲观主义，等等，它把艺术本身切成小块，使形式脱离内容，把内容减到最少限度，把形式本身分解成若干组成部分，并把它们变成艺术的单个实体（“线条”、“装饰性的色点”、“口头乐谱”，等等）。一些人仅仅解决分解的色彩问题，另一些人则是解决五彩斑点问题，第三种人解决规模问题，第四种人解决“线的运动问题”。丰富的形式和多样性内容的完整性和统一消失了，丰富的生活消失了，取代它的是单个因素的扭曲的抽象，或者故意做作的“自在”的原始形式，搞得如此抽象与失去丰富感性内容，以至于一般人对此无法理解：它们的“深刻”确实是“深

无一物”。

社会主义引出的是集体生活的丰富和个人生活的丰富。因此把分成碎片的艺术重新收集在一起，但已经是立足于更为多样的和高级的生活基础之上，而这种综合的趋势乃是社会主义艺术的基本原则。

在处世态度上社会主义的特点也是整合的趋势、整体化的趋势。统一的社会、人类、完整的人等等，是同过去和现在往往在时间和社会空间上被分割开的那些特点的联合相适应的：在柏拉图那里，“道德”是按阶级分的；在法西斯分子那里，智力被赶出日常生活，遭到流放，被驱逐出国；形成为纯粹唯意志论的积极意志被放在上层，与发号施令的意志，追逐权力的意志相对立的消极的、执行的、服从的意志，属于“卑贱的工具”。

社会主义在这里也在整合人的精神力量，它把智力、意志、感觉和艺术创造（艺术性）联合在一个整体之中。社会主义的人是工作、思考、“有意志”、会创造的人。这并不是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同样“具有”上述品质——这样的假设显然是无稽之谈。这里个体的差异性是非常之大的。但这与构成职业、形成阶级，理论与实践脱节、思想与事实脱节、物质与精神脱节、精神与感觉脱节，与形成封闭的“门第”，与人的分散性毫无共同之处。

还必须指出，社会主义处世态度的另两个特点，它们与社会主义的人的社会生活有密切联系，这就是渗透到整个社会意识中的变动性和乐观主义。社会主义的物质生活基础（其生产力）是巨大的，非常活跃的，它以非常高的速度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全部生活的特点是不不断变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将像美国的都市生活那样疯狂得歇斯底里。恩格斯直接指出过大型城市将消失（《反杜林论》）。发展的速度将表现在合理即合乎目的的形式下的充实生活的发展速度上，其中包括同资本主义的机器主义和都市主义的消极遗产进行有效的斗争（同大自然的污染、噪音、单调作斗争，为阳光、光线、空气、绿色和水而斗争）。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处世态度是非常乐观的，因为它是进步发展

的体现，这种发展是生气勃勃的基础，是以法西斯走卒的鼓噪来加以掩饰的当代资产阶级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反题。

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在发展并将继续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其典型的和核心的特点是在世界多种多样因素的矛盾运动中，在其历史发展中，对世界普遍联系的认识。

辩证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外部世界的实际存在，把世界的统一看作是其物质的统一。但物质本身并不是一个没有质的整体，而具有质的多样性，从一种质向另一些质的转化，并且“精神”是按某种形式组织起来的物质的特性之一。世界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永恒的形式变换之中，一些质和形式消失而另一些质和形式出现，处于其永恒的形成（即由非存在向存在的过渡）之中。辩证唯物主义并不依据形式逻辑（它在一定范围内予以肯定），而是立足于更高逻辑，立足于辩证法，辩证法是矛盾的逻辑学，它从理论上掌握运动的形式，而不是依据形式逻辑凝固的、完结的，实际上是静止的抽象。因此，辩证唯物主义的抽象是具体的，它们本质上包含具体定义的全部丰富内容。世界的统一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不过这也是矛盾的统一。客体是历史地发展着的东西，也是矛盾的；对主体来说，它是理论和实践掌握的对象。主体也是历史—社会的主体，而不是资产阶级哲学中超历史的抽象的“我”。社会自身也是矛盾的统一体，不过是历史的具体的类型和形式的矛盾的统一体，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一定形式之间的基本矛盾，这些类型和形式不断地从一种过渡到另一种。等等。

多样性规律的特点是同世界质的多样性相适应的。但这决不会导致哲学的多元论。因为世界的统一在哲学上表现为包罗万象的必然性范畴，此范畴又表现为辩证法的普遍规律，立足于各种形式的必然联系（因果关系、从属关系，等等），而这些形式又具有表现世界质的不同的各领域特殊规律的形式（物理、化学、生物学、社会学规律，等等）。

认识是实际掌握世界过程的理论方面和理论延伸。认识过程是个历史过程，在时间上是无限的。认识如果符合客观实际，它就是正确的。

这种正确性，这种符合实际，由改造世界的实践来不断检验。

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

这里也不难看到“生产方式”如何反映在“认知方式”之中，较高的“生产方式”如何导致较高的、在认识上比先前关于世界的思维方法有价值得多的“认知方式”的。这里没有上升到宗教程度的“等级制”，没有对空洞抽象的拜物教。这里有运动着的矛盾的统一及其多样的定义，即被分解的、辩证地发展着的整体性。

这也就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风格原则。

不过，法西斯主义在叫喊“整体性”、“完整性”、“共同性”，等等。

确实如此，但问题在于，在法西斯主义那里，“整体性”是个骗局，就像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主义”那样。因为这是用铁链把对抗阶级和利益铸住的苦役制的虚假的“整体性”，以自己的等级制把人类社会的阶级和准阶级划分固定下来。作为社会的任何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个统一体：否则它就不成其为社会。但统一与统一、整体性与整体性是不同的：存在不同质的统一，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

封建社会是等级的统一体，在其金字塔的基层的是从事沉重劳动和遭受压迫的大批依附农群众，在他们上面的是一个阶梯：诸侯、封建领主、大公，最后是主要封建主——神封的帝王，地上的等级制延伸到了天上。

资本主义社会也是某种统一体。但这种“统一”是通过商品生产者的市场联系实现的，等级制实际上是在对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垄断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而形式上则是在自由契约的基础上。底层是雇佣工人、新的阶级，还有从封建制度继承过来的农民；上层是分散的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关于这种统一我们在黑格尔那里看到如下说法：

“希腊也不认识我们现代国家的抽象的权利，这种权利把个人孤立起来，准许他按个人的选择去行动（使得他主要地是作为个人而存在）。但它又像一种不可见的精神，把一切人结合起来——使得在任何一个个人里面，真正说来，既没有那种为了整体意识，也没有那种为了整

体活动；他为整体而工作，但是却不知道他在怎样为它工作，他只是关心于保存自己。这乃是一种分工的活动，在这种分工活动中每一个人只占一份；正如在一个工厂里面，没有什么人自己单独制造一件完整的产品，每个人只是制造产品的一部分，不懂得制造其他各部分的技能，只有少数几个人才把各部分装配成一件产品。”^①

黑格尔这里说的是市场联系的因素，但没有涉及阶级及其矛盾；他还存有由于 *laissez faire*^② 的无政府状态给“整体”带来普遍好处的乐观概念。然而，他看到此“整体”的相对性，虽然还不是全部相对性。

普遍的“孤立”被工人阶级的组织趋势和资本垄断联盟的发展所取代。由于与资本主义的危机和革命相关的历史原因，资产阶级所遇到的危险的增长，导致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它以自己的国家去反对社会主义。在这里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等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也是统一，然而，我再重复一下，这是法西斯的统一，它不仅完全没有触动最血腥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反而加剧了矛盾。

社会主义是消灭了阶级矛盾的真正的统一。因此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个风格是真正统一的风格，其矛盾是另一种类型的矛盾，与社会阶级对抗毫无共同之处。

这种正在发生和历史地发展的统一，产生出一种某些欧洲和美国观察家所不理解的现象，使资本主义各国的“个人”激动的许多“为什么”，在我们苏联这里却兴趣不大。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简单，在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文化总危机，许多“个人”和“个人”集团迷失方向，他们在寻找道路和出路。而在苏联这些道路对千百万人来说是非常清楚的，是经过经验检验的，人们干事并寻找把此事干得更好更快的方法。所以这里的兴趣是在另一个方向：我们没有任何危机，只有群众的创造工作，越依靠已经取得的成果，工作就越辉煌。

还是这位黑格尔，他在分析苏格拉底时代和苏格拉底学派时提出如下颇有意思的看法：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卷，第364页。

^② 法语：自由放任。

“当一个民族的宗教、法制、法律有效的时候，当一个民族的各个个人处在宗教和法度之中，与宗教和法度合而为一，共为一体的时候，是不发生个人自己应当做些什么的问题的。这可以说已经就在那里了，已经就在他本身之中了。相反地，当这种满足不再存在的时候，当个人不再处于他的民族的伦理之中，它的实质不再在他的国家的宗教、法律上面的时候，个人就开始关注自己了；他不再发现他所期望的东西，他不再满足于现状，不再满足于他自己的现状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产生下面的问题：什么是个人的本质的东西呢？”^①

当然，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意识的具体形式（例如宗教），而是一般意识的社会形式。资本主义危机动摇了这些形式，资产阶级社会的许多“个人”脱离了常规。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已经制定了新的形式（法律、规范、世界观），这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危机；这里的社会统一越来越巩固；这里的“个人”清楚地知道他需要做什么、走什么样的共同道路，因为他们早就在走这条道路，并且在胜利地行进。因此，相应的“为什么”在这里并不起巨大的作用。这不是文化不高的标志，而是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的标志；它们已经被生活所取消，社会意识所关心的是其他问题，因为用黑格尔的话说，个人“处于自己人民的风尚之中”。

下面有洞察力的话也是他说的：

“只有自由的民族才意识到整体并为它而活动。”^②

确实如此，只有在我们国家自由的人民拥有这样的意识，以巨大的热情为自己伟大的整体——苏联的利益而行动。

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人类统一和友爱的文化、无限进步的文化就是这样发展的。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136—137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364页。

第十二章

论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

最后——last but not least^①，我们要提出关于党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这是革命社会改造的最重要的杠杆。我们将考察这些问题，回答敌视我们事业的资本主义报刊广泛传播的反对我们的最重要的论据。

在以前的叙述中，我们谈过社会主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一系列牢牢争得的成果：大规模的建设工作、群众新的文化高涨、新的需求、个人的成长、完整的人的形成、自由和进步，等等。然而，为了理解这些有时通过痛苦的发展道路而得到的成果，有必要哪怕简略地看一下这种发展的基本杠杆——党和无产阶级专政。鉴于敌人正是把矛头指向它们，这样做就尤为必要。

社会主义是在这样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这个国家 20 年前是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其物质技术基础极“不成熟”，有数以百万计的小业主、农民和很大一部分由半农民和半手艺人组成的无产阶级。此外，俄国辽阔的移民区的特点是人们水平比较低，甚至过着原始的氏族生活。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在这样的发展起点上，用不到 20 年的时间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和大型

^① 英语：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

的机械化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国家，把原先人数众多极端分散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盘散沙的人群，变成意志坚强的积极文明的社会主义人民，他们做出了英雄主义、发明创造的奇迹。这在一直不断的阶级搏斗中展开的宏伟的改造组织过程具有自己的内部机制，本章就准备谈谈这一点。

显然，某种结晶准备的时期开始得要早得多。这就是党的组织，这是特殊的党，在战斗中成长的党，有理论预见和铁的战斗纪律的党。

列宁依据马克思的学说、西欧无产阶级的丰富斗争经验和俄国无产阶级的直接斗争经验，开始一块砖头一块砖头地构筑由精锐的久经考验的战士组成的战斗的党。在同民粹派、无政府主义者、后来的自由派、社会机会主义分子等等所进行的不断的思想斗争中——这些战斗有时深入到最复杂的理论问题，列宁为斗争的所有战线都提出了广泛卓越的理论方针。其组成成分之一就是关于革命主体、阶级、阶级的政党、同其他阶级的关系、无产阶级领导权等等的学说。

党是什么？党的必要性从何而来？它的产生来源于无产阶级本身的非单一性，其各部分的成熟程度不同：因为无产阶级一直是由农民、手工业者等等组成的，有不同的工龄、觉悟、一般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因此，必须分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即其最有觉悟的部队，代表了无产阶级的长远的和共同的、原则的利益，而不是暂时的、地方的、行会的、局部的利益。因此，党也是制定自觉方针、思想统一、斗争计划的思想实验室，它是无产阶级最紧密团结的队伍的组织，它也是整个阶级的教育者和领导者、群众行动统一的保障者。按照斯大林的定义，党本身是思想一致和行动一致的组织。

只有拥有这种真正铁的政党，率领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以自己的领导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政党，只有拥有建立在在对事变的深刻预见基础上的天才的列宁策略，才能取得胜利，掌握政权。

这样，我们看到下列胜利力量的相互关系：广大农民群众、无产阶级及其工会等等，无产阶级的党（先锋队）、党的领袖（先锋队的领导）。

领袖要成其为领袖，必须联系他们所领导的人；先锋队要成其为阶级的先锋队，必须联系这一阶级，成为它的先头部队；一个阶级要领导其他亲近的阶级，就必须联系这个阶级并不断地影响它，等等。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能够取得胜利。

胜利的事实本身就说明问题，但由此却得出极其荒谬的结论。似乎党在实施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或者（更为庸俗的说法）似乎领袖在实施对党和对阶级的专政，这是政治敌人常用的恶意渲染的废话。这种提法本身就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它割裂了领袖、政党、阶级之间的内在阶级联系。“党”对阶级的“专政”是什么意思？难道党是阶级外的力量？或者党是其他阶级？这显然是废话。所以如果说，从一开始在新的国家政权，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所有机关里，共产党人占据了领导岗位，共产党人在政府里决定政策，那么在过去和现在这都是通过最觉悟的、有经验的、富有学识的、忠诚的该阶级利益的体现者所表达的阶级意志的体现。

无产阶级专政镇压敌对阶级，领导农民（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方式），领导斗争和建设，而党通过自己的党员领导整个国家机关，保障整个战线行动的统一。

但对方在这里提出这样一条“论据”：苏联谈不上任何自由、任何民主，是因为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党。还断言，新宪法离1918年的实践更远，那时（按照他们的说法）站在“苏维埃政纲”立场上的政党还曾经合法存在：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孟什维克、所谓“革命共产党人”；而现在新宪法没有给其他政党以立足之地，也就是说——由此得出结论，苏联在政治上比1918年要少一些民主。

所有这些议论充满了谎言。在1918年，这是苏维埃政权以前状况的残余，例如在莫斯科起义的高潮中就存在几家立宪民主党的报纸。群众根据经验知道，在最困难的关头其他政党必然会破坏行动的统一，而行动统一是把社会引向共产主义的全面自由所历史地必需的。群众依靠自身的统一和自己领导的统一战胜了武装干涉者和白军。他们依靠统一

克服了饥荒。他们依靠统一打败了富农。他们依靠统一在争取大规模改造、重工业、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他们将依靠统一在反对临近的帝国主义分子进攻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多年经验说明这一点。而现在，在社会主义人民伟大团结之下，任何其他政党都是外国法西斯间谍的政党，没有任何群众可依靠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恶毒组织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只要回想一下我们先前关于苏联实际而多样的自由所说的一切，可以说，苏联存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的自由和最广泛的民主，不过只给人民，而不给反人民的法西斯间谍。

在苏维埃人民内部，阶级界限的残余正在迅速消除，这里没有各政党的基础，正如斯大林同志完全正确地说过的。反对他的这些说法的论据，奥·鲍威尔所发挥的论据，是不值一驳的：鲍威尔谈了各种可能的方针，谈了为较长期的或近期的用途分配资金，谈了预算开支的不同比例，等等。但所有这些问题都在党的范围内、在党外会议上、在各国家机关中进行讨论。而为其他政党打开的裂缝必然被敌人的间谍所利用，尤其是整个国际局势非常特殊。

就实质而言，应当把重心转向另一面，重申我们在论述自由的那一章所说过的话。我们苏维埃人民对其他政党及其可能的自由的兴趣非常之小，对此感兴趣的也许只有几百人。而千百万人感兴趣是除了我国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的实际自由，涉及劳动、休息、教育、文化发展、管理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生产等等的自由。作为发展形式的群众首创活动的广泛性及其不断的发展，也就是苏维埃民主的特性，这种民主同时也是无产阶级专政。新宪法取消了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暂时特权，仅仅这一条改革就已说明了人民的真正团结前进了多远。新宪法实施了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的选举制。新宪法实施了有保障的劳动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等，这是苏联全体公民的得到宪法保障的权利。这宪法的最后一个方面是个巨大的成就，其物质基础是国家及其财富、资源、资金和可能性的极大增长。世界上任何资产阶级民主都远远不能同发展中的苏维埃国家的民主相比。

如果没有体现无产阶级、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智和意志的统一领导力量，没有共产党，那么所有这些成就都是无法想象的。

从共产党产生组织文化。布尔什维克党是在整个俄国的并且也是代表俄国的唯一的一支体现了组织文化的全部宏伟而又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力量。俄国过去没有组织传统和范例。布尔什维克所展示的其队伍不可思议的团结与友好，他们通过教育和组织群众所发挥的群众的超人的能量，都确实是史无前例的。需要说一下，党善于不断地激发这种能量和意志去组织这些群众自身，抓住群众创造性和组织性的每一个例子，立即予以总结概括。这样，在全欧洲最缺乏组织性的人们在总体上成了世界上最有组织的人民。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世界历史事实，是任何说法都无法抹煞的。

从共产党产生政治文化。布尔什维克党依据马克思的学说，以列宁和斯大林著作丰富了这一学说，展示了并正在展示政治艺术的卓越范例。众所周知，早在古代就有人赋予了政治以特殊的意义。例如，亚里士多德说过：

“任何科学和才干（力量）都具有目的，此目的就是良善；此科学越出色，其目的就越好。但最出色的才干乃政治才干。”

布尔什维克最出色地显示了这种“政治才干”、“最出色的才干”。卓越的理论预见，出色的预测，与战略相匹配的宏伟规模，与策略相匹配的小规模；策略的极端灵活和果敢，特别是在历史急剧转变的时刻，这是空前的；清楚地认识敌人和所领导的群众，卓越的阶级分析，对整个民族问题的复杂性的估计；对现实性、特殊的具体性、每一种局势的特点的非常清醒的感觉；在保持对阶级敌人的不可动摇的原则性和原则上的不可调和性的同时又毫无偏见；思想大胆深远，同时又极其清醒地看到整个现实，直至“imponderabilia”^①——一句话，出色地运用辩证法——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的特点。但党不仅解决直接的暴力斗争（军事的和阶级的）任务，建设的政治，包括经济的、文化的、技

^① 意大利语：不确定的，难以捉摸的。

术的以及反对阶级敌人及其队伍的斗争相联系的其他政治，也在布尔什维克身上找到与其相当的体现者。在国际关系领域，布尔什维克的外交是无人可比的——这是公认的。但党的政治要求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不仅通过书本，还要通过日常经验。在这里党也可以为取得的非常成就而骄傲。这样，政治文化在我国成了群众的政治文化，就政治水平而言，苏维埃人民在世界所有人民中间无疑处于领先地位。来自布尔什维克党的还有社会主义智力文化。党把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其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提升为实际上的正式的国家学说。这个学说是过去和现在所有学说中最先进的学说，它名副其实地渗透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占领了意识形态的所有领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解放作用表现在越来越多的群众（他们已经摆脱了各种形式的宗教意识）现在已经具有了正确的世界观，它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极大地扩大了他们的眼界，解释世界并帮助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第一次深入到所有自然科学的心脏，因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是万能的方法。新一代的学者、研究者、政治家、教育家等等都要依靠不断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越来越丰富的方法论原则。

来自布尔什维克党的还有意志文化。还在革命前的时期在旧俄的所有集团和政党中布尔什维克已经以特殊的“硬石”的心理类型而著称。没有一个集团可以同布尔什维克相比，后者的毅力、顽强、不屈不挠精神非常突出，有别于“软弱的”、优柔寡断的、温情的其他“社会主义者”集团。在布尔什维克身上一点“马尼洛夫习气”也没有。他们钢铁般的毅力、意志的锻炼、英勇无畏、为夺取既定目标的顽强精神、善于从一定的理论前提立即得出实际结论的本领、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一定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本领，这一切都有助于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意志文化在我国尤为需要，这里由于一系列的历史条件这一因素特别少：所谓“斯拉夫精神”缺乏这种东西，并且东方情况也并不好些。党是意志力量的伟大容器，工人阶级，还有广大农民群众，是在它的影响和榜样下培养出来的。斯大林同志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接见中第一次使用了“非党布尔什维克”的说法，这一说法再好不过地说明了

党对成为“非党布尔什维克”的党外人士的影响。对群众的大规模改造还表现在这种意志文化的传播，这种文化的榜样就是联共（布）。这种意志文化是伟大的和最伟大的文化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所有这些领域，党是改造的先锋队、创始者、创造者和强有力的杠杆。而在其他领域党也是创造的思想、指令、口号和强大动力的提供者。因为政治深入到有组织的国家和社会中所有的社会生活的领域。

确实如此。让我们看看军事领域、武装斗争问题、苏联的国防问题。列宁早就依据马克思的卓越论述，全力提出布尔什维主义的武装起义艺术的必要性问题。列宁，然后是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了国内战争，显示了天才的军事才能。在战争中总参谋部作用重大。列宁顽强地研究军事著作，给予克劳塞维茨以高度评价，总结了拿破仑战争和世界大战。斯大林是军事著作、技术、组织、战略策略的大行家，超级的实际统帅。这样，党以自己的领袖为代表，过去和将来都在领导我们走向胜利。

拿生产技术来说。技术发展的强大动力难道不是来自党？难道不是党提出了国家电气化、机械化和化学化的宏伟计划？党在这里也是一支巨大的集中的力量，它甚至摧毁了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的保守主义，在史无前例的国家的技术改造中坚持了自己的规模、数量、速度、质量等等。在这个意义上，电气化、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汽车、飞机、无线电、初轧机和板坯机、专用机床、功率强大的火车头、地铁等等，都是我们党的产儿。在技术改造战线上，共产党人，还有共青团员，都战斗在第一线上。

拿艺术来说。难道不是党（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苏维埃国家的艺术就站在它的旗帜之下。并且这个口号越出了我们的国界，成为世界上所有革命艺术家、诗人、演员的财富。

最后，拿整个劳动文化来说。难道不是党提出了新的劳动态度（回忆一下共产主义星期六这一列宁天才眼光所看到的社会主义竞赛的第一批燕子）？几乎是奴隶式的劳动速度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国家。党这位文化革命的鼓舞者和领导者为教育群众进行了宏伟的，真正

浩大的工作。

当然，如果党不依靠广泛的群众组织和群众自身的创造，那就不可能取得如此光辉的成就。

在所有的劳动者的组织中，最广泛的无所不包的组织是苏维埃国家系统，即无产阶级专政。

苏维埃国家，苏维埃系统包含了绝大多数的城乡居民群众。这里集中了全国的组织力量：其武装力量、其针对敌人的镇压机关等这些直接从事阶级斗争的机关；其管理国家和经济的复杂机构：经济、教育、卫生、科学、艺术等等——这一切都属于国务活动的领域，一切都这样或那样地纳入全国计划。但这庞大的组织同时也是群众自我教育的伟大学校；通过苏维埃把无数的劳动者引入建设事业：男人和女人，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工程师和艺术家、一切种族、民族和部落；通过苏维埃每日每时进行大规模的创造工作。管理机关（人民委员部系统）没有脱离苏维埃生活，没有脱离整个群众生活，而是通过无数的联系形式同他们保持联系。

只要敌对阶级的残余、敌对力量的间谍、社会主义的危险没有完全消灭，作为社会政治形式的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削弱。因此加强和巩固苏维埃国家是其以后消亡的历史前提：只有到可以取消刀剑的时候，国家政权才会开始消亡，“对人的管理”为“对物的管理”所取代。

在文化革命事业中，苏维埃国家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通过国家机关把党在所有领域的政策予以贯彻执行，予以具体化和付诸实施，自然，党内政策除外。通过国家机关把党的各种各样的决定传给群众，并借助这些机关予以贯彻。倒过来，群众通过苏维埃政权机关提出自己的具体要求，通过它们贯彻自己的委托书，其中涉及无数改善生活、经济、管理、学校等等具体条件。国家政权机关在相应的范围内，以相应的形式处理扫除文盲、学校教育（从初级到高级）、科学研究、图书杂志事业、剧院、电影、广播、音乐以及其他艺术种类、体育运动、游览休息等等伟大的事业。这是强大的杠杆，其影响作用无论如何评价都不

会过分的。

这里不可能具体描绘苏维埃政权及其相应机构的全部文化功能。只想说一下，甚至我们的对手也承认我国大量投入于科学研究的组织工作，指出苏联所特有的真正的“对科学的崇拜”。

如果没有物质前提，没有根本结构的根本改变，那么要取得“精神文化”的成就是无法想象的。这在农村看得特别清楚，那里生产方式的变革（从基于“农户”经济的小商品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机械化大生产）为完全的文化变革，为习惯、兴趣、眼界、思维形式等等的飞速变化创造了基础。而生产方式的这种变革是在同富农的极其尖锐的斗争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全部杠杆的帮助下进行的，无产阶级领导了贫农和中农的集体化运动。

在前沙皇移民区，苏维埃政权在提高文化的事业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这里各种形式的民族自治直至加盟共和国的形式，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而有利于过去落后民族的联盟资金的重新分配，如我们所知道的，保证了发展条件平等化的过程。

总之，无产阶级专政是争取共产主义斗争中的最伟大武器，所以马克思认为自己的基本功绩（和他的学说的基本特点）是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阶级斗争的发展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在另一个场合已经谈过红军以及苏联武装力量组织的文化作用。这种作用确实巨大，它在国家整个文化比重中所占的分量是很大的。这样，在所有其他国家中，国家机关中体现压制、迟钝、死板、文化上的盲目的那一部分，在社会主义国家则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第一流的学校：包括“外部文明”和“内部文化”。

在说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在文化革命事业中的作用时不要忘记我们已经强调过的一个情况：在苏联，国家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不是寄生的赘疣，脱离社会，向社会发号施令，吸取其膏脂，把自己与社会组织对立起来的孤立的東西。在我们这里，“国家性”向“社会性”转变，或倒过来。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在这样那样地起国家外围机关的作用，同苏维埃和苏维埃机关保持密切联系。所以苏维埃国家的力量，实

质上就是国内所有组织的力量，是全体组织起来的苏维埃人民的力量。

保卫所有文化成果，防止敌对力量的侵蚀，并非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后作用。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这一职能。在我们的论述一开始的时候就已提出的评价的历史性要求，在这里比任何地方都合适。我们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人类的世界联合：我们只是朝此走去。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其中部分国家不仅敌视我们，而且疯狂地敌视我们。以法西斯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有最好战、最野蛮的一翼，它们每时每刻都在准备发动反对社会主义各族人民的战争。而真正的世界进步的中心已转移到了这里，转移到社会主义国家。相反地，法西斯国家显示出其精神生活越来越贫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常生活、意识形态越来越野蛮化。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革命相对应的，是那里出现的严重的文化反动，只有贪婪的国家机体中的军国主义的侵略牙齿，牺牲其他部分以异常的速度在生长。由此产生了保卫苏联，即保卫整个未来文化的历史任务。在目前的历史时刻这是无产阶级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历史走的不是一条笔直的道路，而是在各种大灾难中创造、培育、构筑和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它是由越来越有组织的社会以自觉的努力、由自己的国家和久经考验的党所领导的千百万人民的努力来建设的，而党集中了最先进的阶级的意志和智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改造过程的伟大杠杆，同时也是社会组织中的某种阶梯。革命阶级的组织是从党开始的，然后在党的周围出现其他组织，它们各有分给它们的职能和专门任务。从组织苏维埃国家开始，建立了全体劳动者（就其成分而言）的无所不包的组织，由于党的领导，这同时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与国家其他所有组织有联系的这些组织使群众的力量倍增，但正是这时候，这种有组织性的力量得到自己的最高表现，即当敌人被打败、危险消失、全部阶级界限消除、旧意识形态的全部残余消失、所有的胎记消退的时候，正是在这时候就不再需要党和国家了。历史过程的辩证法就是这样。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到无国家的社会，其高度组织性失去了任何强制的性质；“政治”永远消失，消失的还有等级制、权力、

法律、军队、监狱、法院，以及对人的发号施令。这当然需要以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对人的文化改造为前提。不过，如果说在革命 20 年内，或者准确点说，在两个五年计划内，在改造人的自身本性上迈出如此大步，那么毫无疑问，在下两个争取社会主义世界胜利的五年计划里将实现另一个大跃进，从社会主义的人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人，向无须任何笼头、任何强制规范、任何国家、任何政党的人的跃进。那时政治的终结就来到了。因为，同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相反，政治并非绝对善的载体，而是社会生活的暂时形式，是一些社会形态历史地必需的，但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由于不需要而将消失。这自然会使文化的武库发生不小的变化：既然社会的国家形式消失了，那么法律规章以及所有较高的“法律思想”都将消失；这需要以日常生活的一系列变化为前提；人与人的关系将文明得多、人性得多；更多的直接感知的整体利益；全面的自由；在“共同性”加强的同时个人的更大发展；在取消等级制和劳动分工的基础上任何“极权”的消失，等等。走向此目标的道路要通过大搏斗，要求有铁的纪律、党的领导，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因此，当前的任务是全力加强改造过程的这些伟大因素。

结 论

本书即将结束。这里必须交代一下，我们对资产阶级文化危机的分析远不是全面的，因为只分析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一个极端派别，即法西斯主义，而没有详细考察其他意识形态及其最近的演变，包括自由主义的演变、社会民主主义的演变，还有像我们在美国所看到的极其重要的现象。生活并不仅仅限于对立的极端，虽然正是这些极端及其斗争构成生活的动力。然而必须看到，在正在演出的世界舞台上，所有中间力量都将这样那样地被卷入斗争，这在目前已经是多少会思考的人都明白的。

资本主义的大危机已经出现：其全部文化在没落之中，它充满了致命的矛盾，历史之弦已经空前绷紧。

第一次大痉挛给了它以重大的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无产阶级革命，诞生了新世界的第一个巨大的绿洲——苏联。这就使整个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根本性变化，是开始了整个人类发展新纪元的变化。因为这里已经表现出人类所经历的危机的特点，正因为如此，所有的历史类比都找不到摆脱危机的出路。可以列举消灭了农民和佃农的大地产；在被罗马武器所摧毁的国家里招募来的奴隶军队；金融寡头；恺撒主义；家庭的解体；古希腊的才妓、男色、人口的减少；历史地迅速流行的神秘主义、东方的秘密崇拜、占星术、魔法、占卜、护身符、酒神节游行、乱坛；由暴食，也由饥饿引起的悲观哲学的传播；社会上层的淫逸腐化；王宫中的两面派行为、奸诈、多疑；奥古斯都垂死前的喊声：“我演出了一场什么样的人生喜剧？”以及其他许多可以很容易在当代资本主义没落现象中找到的类似东西。但就危机所要解决的大问题及其历史后果而言，这一切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在古典世界没有能体现较高生产方式的阶级，在推翻土地所有主、奴隶主和包税者的王国之后，不能组织起新型的社会。而资本主义创造了这样的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因此，在我们看来，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大灾难就是社会主义社会降生前的宫缩，这个社会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是帝国主义神秘的饶舌者的任何诅咒，任何魔法都无法消灭的。所有关于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或者单独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或者无产阶级不能从事积极的创造的工作等等的“论证”，都是在简单的、起码的和显而易见的事实面前所发表的可怜的反革命废话：社会主义诞生了，胜利了，成长了，成熟了，它还在取得胜利并正在准备新的胜利。苏联存在这一事实使得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转到另一个层面去了，并且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斗争，无比重要的是反对社会主义的物质斗争，首先是法西斯主义所从事的这种斗争。

法西斯主义是想在“更新过的”资本主义道路上使资本主义摆脱危机的一种绝望的企图，它借助于中世纪制度，使用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恐怖手段，以“社会主义”的假面具作伪装、搞蛊惑，求助于史无

前例的野蛮的民族主义等等手段。这些折中主义、恐怖手段、假面具、蛊惑，预先显示了其历史的必然灭亡的下场。有些人把野蛮的民族主义一时的成就看作是法西斯主义长期稳固的表现，这种看法的错误犹如那些把挑起世界大战的沙文主义看作是其强霸势力永恒的表现一样。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极权”（*тоталитарность*）和“统一”是一种神话，是在存在深刻的对抗和矛盾的“实质”下的“表面现象”、“幌子”。

相反地，苏联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极权（*тоталитарность*），即其整体性、统一、变动是这种统一的自我发展，这是得到经验证实的，是毫无疑问的，有说服力的。

法西斯主义没有提出一个新思想，没有贡献出一种新的文化珍品。它所做的所鼓吹的一切，都是从旧的破烂中捡来的，其原创性只表现在把这种破烂同从逃避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现代”任务结合在一起。法西斯主义创造了什么样的新型的人？*Landsknecht*^①型的人。提出了“新”型思维？“大兵思维”。“新的”文化价值？残暴的动物性。“新”社会？中世纪的等级制。“新社会主义”？“老德国鬼子”的普鲁士军队。“新”哲学？托马斯·阿奎那、雅科布·伯麦。如此等等。甚至“国家生物学”的普遍尝试实质上也是一条通向动物，通向本能，通向兽性的路线：这就是反对社会学的生物学的含义。在所有的领域都是如此。这是文化的大堕落，文化的野蛮化。

社会主义提出并实现真正新的文化价值：它创造新的完整的人，它建立真正完整的社会，它创造思维的新形式，它第一次创造个人；它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扩大真正的自由、发展的自由，它的进步是全方位的；它实现各族人民的友谊，它通向世界人类；它实际上消灭任何剥削，创造新的人道主义、真正人性的王国；它创造愈来愈多的财富和生活的多样化，全面消灭野蛮行径；它不是面向过去，而是诉诸未来并积极地创建这个未来。因此，这里存在当代的两极：这不仅是两种生产方

① 15—17 世纪德国的雇佣军。

式，而且是朝相反的道路行进的两文化。

关键问题是，法西斯主义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任何一个矛盾，而这些矛盾是会炸毁资本主义的；相反地，它加剧这些矛盾，它本身就是这些矛盾的体现者，最鲜明的表现者，因为它为工人建立苦役制度，因为法西斯主义的基本取向是战争。战争的 *Perpetuum mobile*^①、战争的永恒性、对战争的渴望、战争的必要性、战争的“净化”作用——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旗帜上所写的东西，但这也意味着，法西斯主义是对整个文化的威胁。当代的“匈奴”、“阴森的圣像破坏者”、“家鼠”决不是来自无产阶级这一方，而是来自炮火大王、将土地出租给大农场主的地主、总参谋部的军官。这就是真正的而不是虚构的历史，此历史赋予苏联一个世界性使命：保卫文化。

至于苏联走在真正摆脱总危机的道路上，这也为经验所证实：作为经济范畴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再存在；生产力的发展不存在障碍，没有生产过剩，没有失业，没有消费不足；剥削消失了；剥削阶级消失了；过去的无产阶级和过去的农民之间的界限在迅速消失；在意识形态领域，进步的思想运动以及新的事实的积累同保守的思维形式之间的矛盾消除了：后者为唯物辩证法的灵活形式所取代。如此等等。生产关系的革命改造是这一出路现实性的先决条件，而改造的前提则是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两极之间，在世界舞台上还有一个由较为“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所占据的广大的历史空间：大不列颠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国以及一些幅员较小的国家。这里也有其自己的“法西斯主义”，但不掌握国家政权，并在这些国家内部遭到相当有组织的力量，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反对：有共产党积极参加的人民阵线运动充分说明，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统治的教训并不是白费的。日本侵占中国和日本军阀的挑衅政策，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亚，希特勒的无耻侵略政策，德国和意大利对西班牙的法西斯武装干涉，德国公开走上新的侵略道路，它不断发出的

① 拉丁语：永动机。

威胁，其走得很远的掠夺计划——所有这一切造成了非常危险的局面。“最后战争”的辩护士所鼓吹的世外桃源像儿童的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尽管侵略国家的计划非常清楚，“民主”国家仍然实行退让政策，从而鼓励法西斯战争贩子完成一个又一个新的功业。

现在只有苏维埃国家是和平与文化的唯一堡垒。它不惧任何风暴雷电。社会主义国家的各个部分都得到了加强。它武装起来了，得到了训练，能够仅靠自己的力量击退任何进攻。这些力量足以粉碎西方和东方的外寇，只要其冒险的统治者敢于率领他们进犯我们的祖国，新世界的祖国，新人类的祖国的边界。那时历史的最终检验就来到了，就会发现幻想终究是幻想，而历史的基本规律将会为自己开辟出一条道路，尽管存在着偶然性。

因为军事冲突，即第二次世界灾难，将唤醒群众，解放出纳粹啤酒馆英雄及其盟友所梦想不到的力量。从1914年起发生了巨大变化，千百万群众积累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经验。整个力量对比变了，取代庞大的沙皇帝国这泥足巨人的是跨两大洲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吸引无产者、劳动农民、殖民地奴隶和被压迫民族的中心。中国也不再半睡半醒，在对侵略者充满仇恨的千百万人的心目中，中国是喷发的火山。欧洲的无产阶级不再幼稚地轻信自己的政府和无条件地信任社会民主党领袖，对他们表示了极端的的不信任。代替为数不多的布尔什维克的是人数众多的共产党。现代资产阶级从几乎无限信奉资本主义永世长存和完全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转向广泛流行的怀疑论和对未来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性的灾难不能不导致在一系列国家中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必然胜利，而灾难的制造者不能不受到惩罚。诚然，他们指靠自己的技术。然而与这种技术对抗的将是不下于它的现代技术，而人则是更为完善的人。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死的武器，而是使用武器的活人，那时就必然会看到，普鲁士军队的高傲和日本武士的骑士忘我，都无法与新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和大无畏精神相比。

真正关心文化命运的劳动群众和智力工作者，全体“进步人类”都深切关怀不让战争发生。不过如果纵火者发动了战争，那就必须在最

短的时间内达到最终目的——粉碎法西斯。在文化主力军即苏联的全面支持下这是能够达到的。苏联的支持是主要的和基本的，其他所有任务都必须服从这一任务。必须从这个角度去解决所有策略问题，也必须从这个角度去评估任何力量。因为全部国际政策，尤其是整个世界历史的“轴心”确实在这里。

苏联的作用是世界性的作用。这是部分实现的人类的世界性统一，是其一部分，其历史开端：此人类在其中、在苏联产生和成长，在其中“形成”。把世界革命的胜利看作是立即席卷全世界的一次性的、同时发生的单一行动，是毫无道理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包括无产阶级革命、被压迫民族革命和殖民地国家的造反。被生活所粉碎的托洛茨基分子关于苏联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理论，意味着取消革命。这一“理论”的“国际主义”是想把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使之服从后者的规律，即摧毁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它也使自己的信徒去扮演最恶劣最卑鄙的法西斯附庸的角色。在其他革命地区无产阶级遭受暂时失败的时候，苏联形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难道资本主义的危机已不再存在？难道革命进程停顿了？难道历史之河不再流动？不，不。“它毕竟在转动！”这种运动有自己的逻辑。新“一轮的战争和革命”意味着革命过程“在扩大的基础”上的再生产，这个基础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组织力量。

这种确定不移的历史进程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新的胜利。反对和平劳动的阴谋家们、横行无忌的法西斯冒险分子、热衷于侵略和发动战争的政客们，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必然会激起革命的反击，放开群众的力量，使他们的所有幻想和打算落空。无论如何可以坚信，过一些时间法西斯首领们夸夸其谈的“意识形态”废话，将会成为一堆令人厌恶一钱不值的充满血污的破烂。

能够看清历史前景的人们，为当代沉重问题所困扰的人们，真诚地想要捍卫文化、珍视人类进步的人们——所有这些人必须懂得，在短时间内彻底战胜法西斯主义的首要条件是苏联的奋不顾身的支持。

附录

布哈林：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①

1. 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社会主义。
2. 资产阶级和地主之间的矛盾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剥削关系。
3. 反对封建贵族文化的资产阶级文化和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
4.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和领袖。
5.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的行政干部问题。
6. 文化的提高和蜕化的危险。

要透彻地了解一个重大的社会现象，就必须从它的所有特殊性方面去了解它，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当人们“从一般的观点”来讨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时候，通常都满足于皮相的类比方法，满足于运用极其庸俗的（似乎“理论的”）陈词滥调、刻板公式和成规旧套，而这些东西的特点，除去令人厌烦的千篇一律以外，还有一个本原的属性：它们全都毫无用处。考茨基、列维、马尔托夫这帮老爷以及所有这一帮胆小的倒霉的“老婆娘”愈多地运用类比和历史对照的方法，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姑且不谈实践上）的完全无能，就显得愈加清楚，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从伟大的无产阶级学说上砍下来的一种内容贫乏、被歪曲、被糟

^① 本文是布哈林准备撰写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文化问题》一书的第一章。原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1922年第7—8期。

蹶，同时又加以粉饰的断简残篇。我们认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驳倒陈词滥调，并且指出——哪怕是极其概括地——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一切特殊性，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所依据的首先是陈词滥调，是极为无知的陈词滥调。但是，陈词滥调的危害并不因此变得小一些——成为阶级斗争史中最大背叛行为的社会民主党的实践非常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一点。

看来，革命的最一般的理论问题是关于成熟性的问题，说得确切些，就是关于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制度，或者是——内容完全相同的——在旧的社会生产和政治外壳内部的新的“生产方式的成熟”问题。对社会主义来说资本主义已“成熟”或者还没有“成熟”乃是哪怕只在口头上参加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一切政党、集团和组织所必须断然回答的一个问题，在政治上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帝国主义战争充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正是这些战争表明，在资本主义基础上世界经济不可能进一步发展了。社会民主党的、库诺夫的、考茨基—桑巴特的“马克思主义”却以否定的态度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来了个逻辑大翻个，使得美国最高明的魔术师都会感到羡慕。实际上，只提一下“老太婆”考茨基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他对革命的态度连续不断地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1. 战前。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我们进入了危机时期。我们正在走向战争。应该利用战争来进行革命变革。暂时别着急。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取得政权的道路》，巴塞尔宣言）。

2. 战争时期。国际是和平的工具。它在战时不能活动。不必着急。应该等待和平的到来。那时我们再让国际发挥作用。胜利自然会属于我们（考茨基的战时论文）。

3. 战后和平时期。哪里还能考虑革命呢？难道可以吗？在遭到如此破坏的情况下难道能在这种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吗？不要着急。需要等待。上帝看得见，胜利将属于我们。

这种不起作用的、毫无价值的絮聒，将会作为一种独特的“三段式”没完没了地重复下去，它充分说明了社会民主党谎言大师们的逻辑

和伟大精神的特点。

从前有个婆娘，
住在山顶榭树旁，
带着自己的好朋友
一起走向洗澡房。
瞧这个婆娘多么聪明有主张，
顺手还拿上一束丝瓜瓤。
这首歌，真无聊，
请你从头唱。
从前有个婆娘……

由于这的确是一首极其“无聊的歌”，同时它的意思又很明显，所以就不必再去多谈它了。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人们对这个问题还很少注意。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为了证明尚未成熟这一论点就同资产阶级革命作类比。他们说，在那里，事情确实已经成功。在那里，资本主义确实在封建主义内部发展成熟了。在那里，革命确实已成为客观上进步的因素，挣脱了桎梏，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因此，只要“撤掉首脑”，进行某种清洗，运走某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垃圾，便足以开辟整个社会迅速向前发展的时代。

如此说来，革命轻而易举，而且代价比较小，可是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的代价却大得多，这种情况就被机会主义者用作以下两点的证据：第一，证明资本主义根本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第二，证明俄国革命绝对不能得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称号。我们不准备在这里同我们的对手展开全面争论。但是，我们要注意他们的庸俗的陈词滥调。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他们风闻新的关系是在旧的外壳中成长起来的。但是要懂得这些关系是怎样成长的，就不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了。他们无休止地、令人厌烦地、糊里糊涂地重复着必须具备成熟性等等的说

法——他们沉湎于这样干，甚至不是几年，而是几十年了。可是要看到，什么是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的各种关系内部成长的特殊性，什么是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成长的特殊性，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是不需要的。无论在那里或者在这里，都需要“成熟性”。机会主义者的思想越不出这种公式化的提法。

然而，新的关系在这两种情况下的成熟过程是如此不同，如此各具特点，以致在其他许多方面也造成了极其巨大的差别。

资本主义是怎样在封建社会的怀抱中发展成熟的呢？它主要是作为一个在对抗封建领地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都市而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从城市向农村伸出千百万只触角，瓦解自然经济，冲刷旧关系，并且开始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世界。这里有什么特点呢？在这种新关系成长类型中，有什么是应该指出来的呢？这里的特点是：新的关系是整个地作为一个整体成长起来的。在“封建主义怀抱”中成长的，不单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物质骨架、它的物质机构和它的技术，不单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关系的最本质部分，而且还有这一切联系的整体。资本主义的一切等级制度，活生生的人们的整个阶梯，从壮工到工业中的低级领班，直到高级指挥人员和私有者寡头，所有这一切，在封建社会的范围内已经以现成的形式出现。换句话说，在地主制度范围内发展成熟的，不仅有新的技术，而且还有资本主义的现存的人的社会机构。

这里应该附带说明一下。社会民主党的学究们会篡改我们的这些论点，把事情描绘成这样：照我们的看法，资本主义在封建主义社会中已经完全发展成熟，已经达到自己的最高形式，达到它的最大的社会规模，以致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已经没有什么可发展的了。但是，把这种“思想”强加于我们是不成的。我们只断定一点：资本主义的组织，现存的机构是在封建主义范围内整个地，即同它的行政上层一起发展成熟的，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如果把这个时代同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或者同我们这个时代相比，资本主义关系的比重当然不很大。但是，我们在城市里已经一下子有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两极：有了资产阶级，也有了无产阶级。

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怀抱中成熟的类型是不是这样呢？

成熟的类型实际上能不能这样呢？

这是必须首先提出的问题。而且在这里——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会立即清楚，成熟的类型本身应是不同的，不可能和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时代中的类型一个样。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怀抱中“整个地”，即同生产机构的行政上层一起发展成熟。即使在资本高度积聚和集中、有庞大的无产阶级等等的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可以说社会主义并没有另外一个使它能在那里“独立”发展的经济领域。资产阶级处于上层而无产阶级居于其下的城市，是在对抗封建领地、大地产和地主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不是居于土地贵族之下，而是同他们平起平坐，并且是反对他们的。

社会主义在它和资产阶级工业的关系中所占的地位，却完全不同于城市在它和封建领地的关系中所占的地位。社会主义就是在城市这可恶的监狱里，在资产阶级之下并在没有自己的生产行政上层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这种行政上层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行政上层应该是无产阶级的。而这样的情况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显然不可能发生。在封建社会下，资产者已能在城市中执掌指挥生产的岗位。他们能够成为工业生产资料的垄断者，而且成了这样的垄断者。相反地，无产者，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执掌指挥生产的岗位，不可能占有工业生产资料。因为否则也就不存在资本主义了，这一点甚至任何一头两条腿的驴子也都能明白。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在资本主义内部整个地，即同自己的行政上层一起成长起来，社会主义在旧社会中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按照特殊的方式“成长起来”的，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中的成长情况不一样的。

一些特别“细心的”批评家可能在这里对我们提出大致如下的反对意见。

你们对问题的提法是不正确的。其所以不正确，是因为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必须先有两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是阶级的剥削关系，在这里谈得上机构的“上层”，因为“上层”是一个阶级的用语；相反地，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关于上层的问题本身就是荒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是剥削的关系。因此，不应提出等级的问题，因而也不应提出“上层”的问题。这种论据当然是不正确的。这有许多理由。

第一，并不是任何“上层”都属于阶级的范畴。工人阶级，就其成分、就其成员和组成部分的文化程度、政治成熟性、技术水平等方面来说，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工人阶级不可能用“诺夫哥罗德的市民会议”，用数以百万计的人手去管理（无论是在政治方面，或是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经济生活方面），它必然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通过自己的行政干部，通过自己的领导者去进行管理。但是，这种行政干部并不属于阶级的范畴。

第二，并不是任何阶级关系都是剥削关系。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是无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是统治阶级，也是生产上的指挥者。社会主义的这个初级阶段的特点是阶级的等级制依然存在，但是，这种等级制不具有通常的性质：居于上层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关于无产阶级，当然不能说它是靠剥削，譬如说，靠剥削隶属于它的工程技术人员而生存的。

第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整个体系要求有一个明确的所有制关系。在初级阶段，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无产阶级。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处于社会的上层的。

于是，我们现在得出的结论是：按照事情的本质，按照工人革命的特性，社会主义不能在资本主义内部“整个地”成长起来。它不能这样地成长，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内不能有无产阶级对于生产资料进行阶级的集体垄断的余地；它不能这样地成长，还因为在这个范围内无产阶级在整个生产上的指挥权，特别是它这个阶级的经济行政管理干部的指挥权都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成长和成熟起来的又是什

么呢？

第一，新经济的物质骨架，已经积聚和集中起来的生产资料，技术上可能的劳动调节过程；第二，无产阶级，它犹如一种最充分地体现劳动的社会性质的共同劳动的生产关系体系；第三，熟练的组织工作、行政工作、“指挥”工作人员（首先是技术知识分子）；第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将能成为未来行政机构的骨干的工人组织。

技术知识分子是所谓中间的上层指挥人员。但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技术知识分子是作为资产阶级的，反无产阶级的力量而成长起来的。可以教育技术知识分子养成新的精神，——而且正在这样教育他们，但是这样做，已经是资本主义联系瓦解时期的事了。在过渡时期，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劳动联系）在破裂，这是革命过程付出巨大耗费的巨大原因之一（关于这一点，请参阅我们写的《过渡时期经济学》）。

因此，把资本主义的“成熟”和社会主义的“成熟”进行“简单的”类比，却不去看这种成熟的类型之间的巨大区别，是荒谬的。这是一点。

由于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还有另外一个最根本的区别。

人们惯于“轻率地”把存在于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关系中的矛盾同存在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进行类比。在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推翻地主，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于是，大功告成。

然而，按照事情的本质来说，在这里使用类比是极其冒险的。因为这两种关系在这里完全不同，这两种“矛盾”毫无相似之处；并且，它们是根本不同的。

实际上，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这种关系是不是经济剥削关系呢？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中是不是被剥削阶级呢？这种事说起来可笑。正因为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中是同自己的上层一起成长起来，正因为城市的发展是和地主在土地上的专权同时并存的，正因

为资产阶级关系的两极已形成，所以根本谈不上被剥削的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之间进行着剩余劳动的瓜分。封建主掌握着国家政权，能够用不同的形式从资产阶级那里夺取一部分剩余价值。但是，创造剩余产品的不是资产阶级，处于被剥削阶级地位的不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享受不到全部权利，它由于封建主的经济政策而遭受损失，它把自己的一部分收入分给封建主。但是，它是作坊和工厂的指挥者，它是工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它是从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那里榨取剩余价值的阶级。

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之间的关系，不是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之间的关系。

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和保卫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之间，也就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有着全然不同的关系。这首先是经济剥削关系。

有人说，这是老生常谈，是尽人皆知的，为什么还要多费唇舌呢？

让我们假定，这是尽人皆知的。但这样就更加突出地表明，进行无批判的类比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从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这个“尽人皆知”的区别当中，除去产生所有的人或每一个人都确实知道的那些特点以外，还产生出一系列的特点，这些特点合起来就造成了不同的事变进程、不同的革命耗费和不同的问题。

首先必须指出这样一个根本区别：不受剥削的资产阶级放在封建主义的环境中已经能够在文化上高于它后来所推翻的阶级；反之，经济上受剥削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不可能在文化上高于它后来必须推翻的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

资本的积累在封建社会的范围内就已经开始了。早在“旧制度”遭到革命摧毁以前，“财富”就在资产阶级的手中积累起来；并且，这些财富是以货币的形式，在商品货币关系普遍发展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大家知道，用叮当作响的金属是什么都弄得到手的。

黄金说：“一切我都买。”

宝剑说：“一切我都拿。”

黄金说：“滚开！”

宝剑说：“我就走！”

因此，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制度内部就已经是工业生产资料的垄断者、生产过程的指挥者、资本主义积累的主体和积累的财富的所有者。在这个基础上，资产阶级文化在和它敌对的制度的范围内也几乎能够毫无阻碍地成长起来。封建主义绝对不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成为教育的垄断者。不仅如此，资产阶级还能在某种程度上以越来越大的比例发展自己的文化，因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大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转入了它这个资产阶级的手里。经济关系的新（同农奴制相比）制度的阶级体现者——资产阶级，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逐渐成为生产资料的垄断者，从而成为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同时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教育的垄断者。贵族的、“骑士的”学校，迅速让位于工商业学校。正是后一种学校得到了发展的保证，因为金钱已经成为可以左右一切的社会力量。而金钱则是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里。

在对比不同的阶级文化和讨论关于一般文化的问题时，可以把问题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关于某种文化所特有的、独特的标志和“原则”，关于某种意识形态的“风格”，关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基本趋向和方法等；第二，关于该趋向、方法和原则的研究深度问题，即关于该文化的集约问题；第三，关于这些意识形态和素养所掌握的人的范围问题，即关于掌握的广度、关于该文化的粗放领域问题。现在让我们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历史转折点和分界线来看一看资产阶级文化和封建贵族文化的关系。

方法和原则。十分明显，在封建主义范围内，资产阶级文化在它的结构方面就已经高于农奴制的文化。静的观点为动的（进化的）观点所代替，经院式的思辨哲学为自然科学经验的原则所代替，封建束缚社会的教条主义为“有思维能力的个人”的批判主义所代替。如果从文化的实际作用方面，即从文化帮助控制自然力达到何等程度（正应该这

样提问题) 方面寻找评判文化“高度”的标准, 那么, 这种新的资产阶级文化的进步性是不容置疑的。如果目前在资产阶级的合唱队中意识形态的领唱人竭力吹捧中世纪的思想家, 特别是神秘论者, 那么, 这只是资产阶级没落的征兆, 而决不是像头脑有病的现代没落分子所竭力描绘的那样, 找到了失去的“最高原则”。

文化的集约性。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 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拿托马斯·阿奎那来说吧——是一个相当完备的“完整的”体系。但是,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 法国的唯物主义者狄德罗等人的大《百科全书》是在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前写成的, 那大概就不会怀疑, 对于新的意识形态原则的研究的深度并不比相对来说停滞不前的封建社会中实际上受到限制的文化所进行的研究为差(为了回答可能提出的反对意见, 不妨顺便提一下: 如果说, 把“中世纪”看成一种历史上的失败这一旧观念是不正确的; 那么, 从另一方面来说, 推动“中世纪”前进的正是新的日益发展的资产阶级关系)。

文化的粗放。由于我们把封建文化理解为高水平的意识形态和素养, 所以封建文化就具有表现得露骨的等级性质。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国王的愚昧无知以及学者的寺院气和教会气。资产阶级文化的基础不能不更加广泛一些。所谓的“知识民主化”, 实际上还是在封建主义制度崩溃以前就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开始了。因此, 早在土地贵族这一国家的栋梁被推翻以前, 资产阶级在这方面就已经高于土地贵族了。

现在, 让我们把这种在文化上的对立情况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上的对立情况比较一下。

首先, 应该叙述一下必然决定着无产阶级的存在从而也决定着无产阶级文化的总的背景。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经济上、政治上受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是剥削的主要源泉, 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被榨取的能量的供应者。无产阶级的生活费用, 是使无产阶级作为人的体力能够再生产出来并发挥作用所必需的资料。

无产阶级的技能, 是执行体力劳动的最低限度的社会技能。整个来说, 社会结构的这一部分在其资本主义的外壳之下也只是照这样再生产

出来。应该正视事情的真相。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程本身对于劳动力的技能，对于组织的、指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劳动力的技能要求新的等级，所以就划分出一个新的社会集团、新的“中间”阶级：所谓技术知识分子，“新的中间等级”；而且，只有人数较少的工人贵族阶层才略为接近这一类型。这与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也随着技术的提高而整个获得提高的情况毫不矛盾。因为这里所谈的是以无产阶级为一方、以资产阶级及其技术知识分子为另一方的相对的文化水平。

“人人都应该安分守己”，这句农奴主的口头禅也完全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这个社会不仅再生产物质价值，而且再生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这种再生过程的纯经济方面可归结为对收入的资本主义分配，那么，这一过程的文化方面就归结为教育的差异。对教育的垄断完全符合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对教育的垄断起着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在我们的意识中还没有给以足够的估计。

教育的过程是生产熟练的“活机器”的过程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如果从事情的特殊方面来说，则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阶级的正在成长的一代进入不同的学校实验室受教育；上帝的归上帝，帝王的归帝王；税吏得到税吏应得之份；指挥的阶级把自己的子女送入高等和中等学校，这种学校无产阶级是无法进入的，正如他们无法垄断生产资料或占有剩余价值一样。

有人认为，技术员和工人之间的差别，作为一定的社会范畴的技术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差别，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就已经渐渐地消失，这种观点（相当流行）是完全不正确的。当然，如果在资本主义下工人阶级本身，至少是自己的各大阶层，就已经转变为技术知识分子，同技术知识分子融合为一体，从而在文化上成熟到可以胜任管理生产的职能，这会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外壳下，新的制度就会整个地成熟起来。这时，只须推翻资本主义私有者的寄生的、渺小的、可鄙的、无能的、徒具统治之名的上层，就大功告成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嘴里就能长出蘑菇来……

但是，可惜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不错，正如经济上不太内行的魏劳赫教授所说的：“到处都由机器代替了人的位置，而机器的管理却掌握在人的手里。机器在工作，而人在管理它。”^①

但是，工人对于机器或机器零件的管理活动，绝对没有推翻工人对于人和整个生产过程并无管理活动的情况。这种组织和指挥的职能，是留给另外一些集团和阶级的：留给非寄生的资产阶级（如德国的史汀纳斯、巴林、西门子、克虏伯这样的大托拉斯组织者，经济上的头号首领）和技术知识分子的。我们在不越出物质生产的范围内，毕竟应该承认，一个技术知识分子甚至只从数字方面察看也代表着相当大的力量。例如，1906年，在德国一些最大的企业中，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比例如下：

冶金业和矿业……	职员 1 人	工人 30—26 人
针织厂……	职员 1 人	工人 18—25 人
纺织厂……	职员 1 人	工人 12—10 人
造船厂……	职员 1 人	工人 16—8 人
机器制造厂……	职员 1 人	工人 12—4 人
煤气工厂……	职员 1 人	工人 9—4 人
化工厂……	职员 1 人	工人 7—6 人 ^②

无论如何，这些“枯燥的”数字是有相当说服力的。指挥、组织和运用高级技术知识的经验在这里积累起来，并且是工人阶级所无法得

① 罗伯特·魏劳赫：《技术，技术的本质以及技术与其发生作用的领域的关系》，德意志出版社，斯图加特和柏林1922年德文版，第34页。

② 罗伯特·魏劳赫：《技术，技术的本质以及技术与其发生作用的领域的关系》，第43页。

到的。^① 即使有个别工种的工人在熟练程度上接近于技术员，那也是人数很少的阶层（例如，电机工业的装配工）。但是，马克思早已指出的另一种趋向却表现得很突出，而且丝毫也没有被现代的资本主义技术所打消。“如果以前受过多方面训练的手艺人能完成生产工厂制成品所必需的全部工作，那么机器，特别是‘专用机器’，就要求进一步分工。因此，机器创造了现代的熟练工人，并且容许越来越多地使用甚至没有受过训练的劳动力。”^② 最近发生的情况是这样：“在这里（在更加经济地使用劳动力方面。——尼·布·）战争首先显示出了新的可能性。由于战争的动员和延续不断，需要日益增长地用少年和妇女的未曾受过训练的劳动来代替越来越少的熟练劳动力。为了使这样做成为可能，必须把生产进程划分得尽可能细一些，并且通过这个办法简化各个生产过程。这样一来，由于进一步分工，在成批生产的时候就有可能由未曾受过训练的工人的手制造出许多东西……第五等级（这四个字的着重号是我加的。——尼·布·）形成了。”^③

“健全的国民经济的主要条件，是要使每个人都满意自己的地位。”^④ “职业学校中所进行的训练，应该尽量简单，只包括属于职业知识的东西。”^⑤ “一个受过多方面训练的工人永远不能为自己找到合适的地位，因此永远不会感到满意。”^⑥ 毫无疑问，有着自己的内在逻辑的资本主义训练标准，就是这样的。不断地再生产出工人阶级这个文化低而人数最多的社会集团。

在物质生产的过程中，情况就是如此。而在商品流通的过程（比如说银行）中和意识形态的劳动部门内，无产阶级在熟练程度上所占的比

① “企业”采用“科学的组织”，只是加强了这种趋向。“这里揭开了工程师职业中的崭新一页：他不仅是物的设计者，并且还是人的塑造者……”（威利·赫尔帕赫《经济的精神力量》，《技术与技术》，第14年度，第1期，第10页）

② 罗·魏劳赫：《技术，技术的本质以及技术与其发生作用的领域的关系》，第36页。

③ 罗·魏劳赫：《技术，技术的本质以及技术与其发生作用的领域的关系》，第38页。

④ 吉斯塔夫·弗仑茨：《对泰罗制的批判》，柏林尤利乌斯·施普林格书店1920年版，第104页。

⑤ 吉斯塔夫·弗仑茨：《对泰罗制的批判》，第112页。

⑥ 吉斯塔夫·弗仑茨：《对泰罗制的批判》，第109页。

重就更小了。如果说，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工人毕竟跟劳动过程中的工程师还有共同之点，那么，在教授老爷给学生老爷们写公式的时候把粉笔递给教授老爷的堂役，就已经是完全置身于劳动的专门逻辑之外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学校、科学和艺术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拥有自己的“专家”，他们的劳动在这些部门中所占的比重是极其巨大的。

因此，工人阶级不能不成为在文化上深受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个机构压迫的阶级，这种受压迫的现象，对于夺得国家政权以前的资产阶级来说，是不存在的。

但是，主要由于工人组织有了发展以及投靠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详细论述）人数增多这两种情况，工人阶级终于能够制造出自己的意识形态的萌芽以及自己的无产阶级文化的萌芽。我们现在应该按照我们在比较资产阶级文化和封建文化时所根据的三个基本方面，把这种无产阶级文化同资产阶级文化作一对比。

方法和原则。毫无疑问，无产阶级文化就其结构以及方法和原则来说，是高于资产阶级文化的。由于共同劳动和共同斗争的关系在生产中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原则推动人类的全部知识在共同观点下的联合。无产阶级提出这个原则是要反对这样的分工，这种分工把文化完全分割成各个不同的部门，在资产阶级的意识中抹煞它们的联系，妨碍这些不同部门的综合，而这种综合则是资产阶级白白努力寻找而始终不能找到的。其次，无产阶级指出一切“文化珍品”的实际意义，从而消灭资产阶级思想家所信奉的盲目崇拜。无产阶级用社会技术的合乎目的原则代替了各式各样的“绝对命令”和“绝对理想”。无产阶级把进化的观点扩大为革命的观点，消除了资产阶级对动力学原则的限制，并且充实了它的内容。不言而喻，无产阶级继续了革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的和依靠经验的倾向，而在现代资产阶级那里，这种倾向已为神秘主义、神智学、通灵术和宗教所提供的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代用品所代替。

文化的集约。如果说，无产阶级文化就其原则来说是较高一筹的，那么，它的集约性——这里谈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却远远不如资产阶

级文化。无产阶级没有担任指挥生产的职务。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组织者不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首先是在社会的阶级斗争中发展自己的文化的。因此，无产阶级首先发展的这个方面的文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这里无产阶级建立起自身文化的基础，而马克思的最有天才的学说就是这方面的最优秀典范。然而，无产阶级不能培养出自己的自然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农艺师、艺术家、建筑师、地质学家、生产组织者、熟练的专业发明家、数学家、诗人、法学家、银行家、演员以及诸如此类的干部。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无产阶级在这方面不能像它在社会理论和实际政治方面那样提出同样多的自己的东西。无产阶级在它的存在中没有解决这些任务的条件，它只能极端概括地指出日后解决这些任务的办法——仅此而已。同资产阶级拥有的东西比较起来，这实在少得可怜。仅仅在社会科学方面，无产阶级可以同资产阶级相匹敌（这里说的是文化的集约性）；另外，在实际政治方面，无产阶级还可以创造出在熟练程度上相等的，有时甚至较为优越的干部力量（例如，凯塞林伯爵说，苏俄拥有一批世界上最优秀的领袖，这是不无原因的）。但是，总的说来，无产阶级落后很多。

文化的粗放。从阶级观点来看，也就是从社会阶级的尺度来看，无产阶级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存条件，在这里也是注定非常落后的。要为这种思想举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只需提一下这样的事实就够了，即“资产阶级偏见”犹如阿尔卑斯山一样压在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头上，然而资产阶级却很少有人由于“无产阶级的偏见”而遭受痛苦。有人会说，不过，在这方面过错在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学校和教会等等。一点不错！资产阶级制度的这些机器俘虏了整个无产阶级大军。如果我们认为谢德曼、诺斯克、托姆·肖和龚帕斯等人是叛徒的话（在实际政治方面，这是完全正确的），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是被资产阶级文化，被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联系和意识形态联系的全部总和从工人中间培育出来的可怜的产物。但是，除去（在上层）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受资产阶级控制以外，我们还看到无产阶级最广大的群众在技术、教育、政治等方面极其“缺乏训练”的情况。总结：在资本主义

制度的范围内，无产阶级可以为未来的文化作出一些极其天才的暗示，为人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卓越的条件，但是，无产阶级这个文化上受压迫的阶级在这种范围内不能把这些条件发展到能够培养自己去组织整个社会的程度。无产阶级来得及训练自己去“破坏旧世界”。它只有在自己专政的时期，才能“改造自己本性”，并且成熟为社会的组织者。由此产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额外耗费，此类耗费，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革命所没有的。

但是，这里不由地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在文化上虽然不可避免地落后，可是无产阶级用怎样的方式创造出比资产阶级进步的文化基础呢？无产阶级又用怎样的方式终于产生出自己的政治思想家干部和领导者干部呢？

我们在这里要转入关于阶级、政党和阶级的其他组织以及关于所谓领袖的问题。我们必须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仍然使用比较的方法，也就是要这样看待上述几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观察它们在资产阶级那里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观察它们在无产阶级那里是怎样形成的。因为，正如我们以后所要看到的，在这里也有着巨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对无产阶级提出了资产阶级革命所不知道的问题，并且使无产阶级遇到资产阶级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危险。

但是，我们需要先谈一下总的意见。

任何一个阶级的组织都是出于加强该阶级实力的需要而产生的；一切组织的实质都在于，从组织这里得到的力量就其大小来说要比单纯用算术把各个组成部分的力量加在一起的总和大。同时，阶级的组织并不包括阶级的一切成员在内，组织和阶级并不是完全相等的。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具体分析起来，阶级就其整体的成分而言并非是单一的。

阶级在同一个组织的成员的社会技术熟练程度（例如，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他们的文化水平、阶级类型的纯洁性、政治成熟性等等方面都不是单一的。由于政治斗争——归根到底是夺取政权的斗争——是“最高的”、最根本的斗争形式，所以，十分自然，一个阶级的政党

或者政党的变形（例如，雅各宾俱乐部），是最成熟的阶级分子的联合，阶级可以通过这些分子最正确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因此，把政党和阶级对立起来是极端荒谬的。

由于组织（其中包括政党）的成员不是单一的，就产生了建立领导者（领袖）集团的客观必要性，政党（或是该组织全体）通过这种集团表达自己的意志。关于这一点，我们暂且谈到这里为止，下文我们还要从另一方面来谈关于领袖这一非常复杂的问题。

现在还要预先指出一点。各个组织一方面给阶级增加补充的力量，一方面为阶级发展自己的文化和选出自己的领导者创造补充的条件，这是十分清楚的。工人阶级，虽然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却以它的生存的另一面（在它的文化修养仍然不可避免地得到提高的情况下，在不大的地区上的集中和积聚，工作的集体性等）显示出了它在团结自己的队伍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力量。这个阶级在数量上的不断增长和它的群众性，以及这个阶级的劳动的集体性，是使组织成为可能的两个基本因素，这使得受压迫受摧残的情况能局部地得到补偿。

这种受压迫的情况，除我们在上文曾经提到的以外，还具体反映在两个特殊的现象中。

第一，资产阶级不需要敌对阶级出身的领袖，可是，无产阶级却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作为自己的领袖。

这是从上述全部分析必然得出的结论。在封建主义的条件能获得文化上的出色发展的资产阶级，从自己的队伍中培养出最“高级的”思想家干部（哲学家和学者等）以及自己的政治领导者。当然，这里面也有从其他阶级投靠来的人，但是，“本阶级的”、“出身纯正的”人相对来说占很高的百分比。而无产阶级，过去和现在都要困难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把其他阶级、首先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当作自己的最高领导者（领袖、思想家），这是绝对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无产阶级的最有概括性的和最正确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学生所制定的。直到现在，我们在理论和高级意识形态环节领域看到的只是知识分子。不错，经过一段时期，后来在工人阶级的

广大群众组织中也培养出所谓“工人官僚”，即工人出身的领袖这一整个阶层。但是，知识分子仍然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就拿英国和英国的王会来说吧，在复杂的“工人”干部系统之上的是一批费边社社员，他们也正是思想的供应者。由行政管理人员出身的工会中的机会主义领袖对于政治或其他“高级物质”等基本问题的答案是：“我们不考虑这一点，有维伯或某某教授替我们考虑。”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造就了大量工人阶级出身的工会和党的官僚干部，但是，居于最高一级的，是修正主义集团，这个集团是由一个彻头彻尾知识分子集团——《社会主义月刊》编辑部发展出来的。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只再举一个谈谈。俄国社会民主党成立时，它的基本领导干部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职业革命家”。可以认为确定无疑的是，知识分子流入机会主义工人组织队伍中的人数特别众多。但是，也决不能否认真正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斗争立场上的知识分子所起的领导作用。这是第一点。

第二，资产阶级领袖和资本主义的普通资产者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别比较起来并不特别大，可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和普通工人之间的这种差别却要大得多。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资本主义的资产者在他们的社会生产制度下（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受到高等教育，至少是中等教育的训练。他们的收入保证他们有享受“文化生活”的基础。他们在生产、流通和意识形态的劳动部门所担任的角色，使他们获得应有的训练、素养、知识和经验等，也就是说提高了他们的熟练程度。他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精神气质”、职务的类型都同执行领袖职能的人相似，并且相当接近。无产阶级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无产阶级的领袖，特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人（“院士”），往往受过很多的智力训练、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然而，阶级的普通成员却和这个水平有着极大的距离。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甚至“工人官僚”，往往都没有无产阶级因守在“机床旁边”而特有的那种本能的和自发的集体主义情绪。所以，在这里心理上的差别就

比在资产阶级那里的相应情况下所具有的差别大。

总之，我们可以确定，早在工人阶级夺得政权以前，也就是在它成为统治阶级以前，它在很大程度上就处于其他环境出身的领袖干部领导之下。

现在，我们越过残酷的公开斗争阶段，转入新阶级掌握政权的时期，也就是转入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某种社会平衡状态的时期。夺得政权的阶级肩负着极其重大的任务。它成了社会的组织者阶级，成了当前历史基础上的社会领导者。它的斗争的范围扩大了，它的职能极端丰富起来。现在所必需做的，已经不仅是领导一个阶级，而且要以社会的规模从事分为无数部门和专业的有组织的“积极性工作”。为此，需要一些极其多种多样的组织者和设计者干部。

于是在这里，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和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之间又出现了巨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是我们上文分析过的那些现象的继续和后果：资产阶级大体上具有它自己的管理国家的行政领导干部，或者具有就一般文化训练而言几乎已能胜任这种工作的人物，而无产阶级却必须长期地在经验中学习，因此他不得不大量地利用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与它敌对的力量。

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在其全部范围内对文化力量的需求是很大的：让我们想一下，工人革命为自己提出了多么巨大的组织任务！因此毫不奇怪，吸收“老牌的”文化力量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而且从历史上来说也是必要的。认为没有技术知识分子和其他知识分子也能对付过去的观念，是非常可笑和绝对幼稚的。这是一种有害的幻想，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队伍中绝对不容许这种幻想存在。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来，不能否认这种情况隐藏着无产阶级革命所不可避免的一个极大的危险，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在的”危险。我们说的是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蜕化的危险。

不能根据资产阶级比地主文化高这一个简单的原由来谈论资产阶级国家以及资产阶级的执政的领导党（或各党的联合，或俱乐部，等等）的蜕化。相反地，无产阶级国家和工人阶级政党蜕化的危险，却正是因

为工人阶级虽然具有原则上最高的文化形式，但是工人阶级就其文化水平来说毕竟比资产阶级要低得多。

人们常常重复人所共知的历史上的一个例子，说得确切些，历史上的许多例子，例子的内容是当一个胜利的野蛮民族定居在文化较高的部落中的时候，过了一段时期实际上便成了战败者，因为他已经接受了“战败”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甚至语言。较高的文化、灵巧机警、熟练的技能、技术上的优势、实际的训练、确定方向的能力等，这一切，通过无数的途径，通过微小的分子运动，使胜利的民族所习惯了的生活内容和社会联系瓦解、蜕化、变形、改造，在这种情况下胜利的民族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投降。

无产阶级所处的地位同这种野蛮民族很相似。它的文化“在原则上”比较高，这是不够的！在这里解决问题的不是这种原则上的高度，而是这种或那种文化的活生生的、起作用的代表和体现者的数量和质量。这才是重要的。这在任何历史争端包括劳动和资本之间的重大争端中，都是极其重要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初期，文化力量的显著优势不是在无产阶级这一边，更不是在专门的无产阶级文化这一边。不应忘记，被迫同无产阶级一起工作的知识分子力量，甚至其中那些自愿参加工作的力量，虽然带来极其必需的好处，毕竟只有（我们强调指出的是，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旧文化的经验。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极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力量在心里不相信计划经济、劳动的社会调节、社会主义在技术经济上的优越性及其在经济上的合理性。所发生的一切在这些人看来是一种不健康的、奇怪的不正常现象，是必然要消除而且将会被消除的。在他们心目中不存在作为调节工作的原则的社会主义。而且在他们的经验中也不可能有任何这类的东西。任何不可避免的对于资本主义的让步，他们都表示欢迎。并且，他们将以同样高兴的心情欢迎每一个轻率的，完全多余的，反而是“健全的资本主义的”步骤。可以概括地把这个问题这样解释一下。我们假定，任何技术上的或是经济上的任务（задача）（我们现在所喜欢说的是“задание”），用旧的方法和新的方法都能解

决。关于新的方法，从理论上可以明显地看到，它是可以解决任务的。但是，没有实际经验，没有实际工作者，没有执行任务的人，没有“粗胳膊的人”。然而，“粗胳膊的人”却不习惯于这样干，而习惯于自己的一套办法。于是，问题经常用旧的办法解决，因为不这样，就什么也干不成。当然，另外有一套旧的方法并没有害处，而且在缺乏社会主义实际工作者的情况下也还必须这样。但是，大家知道，“量”有转变为“质”的狡猾性质。在直接生产的领域内，情况是这样的。在意识形态的领域内，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在这里，文化上的差别，“新”与“旧”的斗争，应该说是更加激烈的。大家知道，意识形态决不是没有力量的、“微不足道的东西”，而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它们的社会功能对意识形态的各个阶梯，一直到诗歌、到抽象哲学，并不是毫不关心的。在本阶级的具有经得住考验和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世界观和对世界的感受（因为感情的领域也起着巨大的社会作用）的干部不够的情况下，在这里甚至不管“不完全是我们的”专家干部的自觉愿望如何，也可能搞垮新社会所需要的上层建筑。自然，这里说的不是灾变或一次解决的变革等，而是极其微小的、往往是无限小的运动，这运动在连成一个整体的时候就形成一条非常明确的发展路线，即使不是真正的倒退，无论如何也是离开社会主义而趋向一种新形式的旧的阶级社会。

这里还应该提到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工人群众本身的文化落后性，尤其是在普遍贫困的情况下，即当分给行政管理和领导干部的消费资料（不管愿意不愿意）一般必须大大超过分给普通中等工人的数量的时候，甚至那部分由工人群众从自己队伍中推举出来的干部人员，也会发生严重脱离群众的危险。诉诸工人出身和无产阶级美德本身并不能成为消除产生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的论据。因为我们应该知道并且懂得，在像我们时代这样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阶级一般都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形，而且在原则上绝对没有排除旧阶级的某些部分完全变形并从其中形成新阶级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脱离”群众的干部人员能够（但不是必然这样，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被他们的文化较高的担任指

挥职务的同事所同化，并和他们一起变成新统治阶级的萌芽。不言而喻，如果无产阶级政权由于国家的经济落后性和不利的外部环境，对资本主义作出重大让步，并且不阻挠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心和与之相应的人们的集团的增长（例如，正像俄国在其完全不可避免的“新经济政策”制度下所曾发生的情况一样），产生这种悲惨结局的可能性就会加大。在这里，不论新阶级是在其处女般纯洁的状态中组织成社会的基本阶级的，还是这个阶级本身将会成为“新经济政策的”寡头，也可以说是从侧面成长起来的新资产阶级的附属品，这在实际上是完全没有差别的。这些差别将与我们的后代有关，而在目前我们将会让他们去解决一些适当的任务。至于我们的任务则在于，根本不容许这样“进化地”恢复剥削关系。

上述危险是一切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这种危险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实在在地显露出来，原因很简单，没有任何一次革命像俄国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走得这么远。这一点就足够让那些名叫马尔托夫、考茨基、列维或其他什么的社会民主党坏蛋们写一些证明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必定要变成资产阶级政权的书、小册子和文章的了。当然，这老爷们在遇到任何危险和斗争的情况下立刻会想起各式各样的念头。他们预言，无产阶级一取得政权就会彻底垮台。他们预言布尔什维克将在同协约国的斗争中灭亡，他们在发生危险时卑鄙地随风转舵。当饥荒的黑翼笼罩全国的时候，他们就完全忘却了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如此说来，现在，当无产阶级即将承担新的任务，虽然不是直接战斗的、军事含义下的“突击”任务，却也是极其复杂和困难的任务时，这些勇士们又在预言另一种灭亡，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就是斗争。但是，如果说，在某种新的社会平衡确立以前，这是多多少少公开斗争的一种形式，那么，在以后的阶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这个斗争就在文化战线上、在较量技术的灵巧和能力、组织经验和素养的战线上，以及在社会上层建筑各个部门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战线上具有小冲突，但就其整体来说是大冲突的形式。由于所有这些过程都是在人

们的一定的技能中固定下来的，而且进一步发展的进程取决于人的数量和质量，因此，这种文化上的斗争首先是争取行政管理方面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干部的斗争。只有那个能够从本阶级推举出足够数量的管理人员、组织者和思想家来引导社会按照确定的阶级路线前进的阶级，才能享有（用“隆重的文体”来说）同志社会并领导社会的历史权利。因此，在革命的一定阶段，争取干部的斗争不但从“一般”建设事业来看，而且从今后社会阶级的前途来看，都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

下文我们将指出无产阶级怎样才能解决这个任务，以及他们应当怎样克服上述的危险。

第一次发表于1922年。郑异凡译自
《进攻》文集，莫斯科1924年版。

选自《布哈林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上册，第37—62页

布哈林：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①

同志们，我选择《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这个题目来向你们演讲，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目前这个问题可以说已经由一大批同志和组织完全自发地提上了日程；第二，因为这个问题对于像你们这样的听讲者正好是最有关系的。

请你们允许我在讲到本题和提出问题之前先讲几句开场的话。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目前都在经历着一个非常独特的阶段；可以大致把这说成是革命向前发展过程中放慢速度的阶段。在俄国的情况下，这一阶段是同新经济政策这样一个现象联系在一起的；就国际范围来说，这一阶段的特点和表现形式是：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已在垂死挣扎，但是除了在俄国以外，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取得胜利。俄国无产阶级是唯一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我们的情况目前在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敌人中引起形形色色的想法、意向、感情、思想倾向等等。拿我们的敌人来说吧，我们看到，他们根据俄国的国际生活和国内生活中的一系列事实得出了所谓共产主义已经破产这一斩钉截铁的结论。我们的敌人，首先是社会民主党人是这样考虑的：绝望的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杀人犯的影响下曾经尝试在俄国进行一场十分巨大的历史试验。不出所料，这一巨大的历史试验以失败和破产告终了，这也是社会民主党人预言过的。大张旗鼓地宣布的那些口号在苏俄已经没有地位了。租借政策、同资本主义大国的贸易关系、出租和五花八门的所谓“新经济政

^① 1923年2月5日，在彼得格勒所作的报告的速记记录。

策”取代了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日益转变成凌驾在工人阶级之上的外来的空壳，从根本上说来已不再同无产阶级有任何关系了。我们的敌人说，我们在俄国所有的无非是波拿巴主义的一种形式，因为是一个脱离了工人和农民群众的布尔什维克集团在统治着国家。共产主义的破产是明摆着的。而这一破产——我们的敌人这样说——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的。据说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于，俄国是一个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很不发达，而且是半亚细亚式、半野蛮的无产阶级，这样的国家当然不能像布尔什维克所主张的那样实现历史的飞跃，跳过它的历史发展预先决定的那些阶段。俄国曾经尝试进行这一飞跃，不过当然是掉进了泥坑，摔下了深渊。人们不能废除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不能依靠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来进行一场胜负难料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个无产阶级的全部生活条件和全部根源都同半亚细亚式的、半封建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绝没有为完成正确解决社会主义革命所提出的问题这一任务作好准备。

我们的敌人在国际政治领域中是怎样判断的呢？他们看不到仅仅苏维埃共和国的存在这一事实就已经产生的那一巨大的革命影响，而是作出了和上面类似的结论。他们甚至把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缓慢的发展速度也要算在俄国革命和我们党的账上，他们声称，正是共产主义在俄国破产的情况，例如俄国的饥荒和生产力的严重破坏，阻碍了国际革命向前发展，在这一方面恰好又应当由布尔什维克负责，正因如此，人们现在不得不进行一次决算，决算表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作为世界观和作为实际政策领域的共产主义不折不扣地等于零。我们的敌人就是这样断定的，他们对我们党从一开始进行的政策普遍是这样评价的。

现在，请你们允许我讲讲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朋友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我们的加引号的朋友；另一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首先是我们的共产党员们。我们的加引号的朋友（在俄国方面）是旧的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首先是路标转换派，他们没有作出国际社会民主党人作出的那种结论。他们没有说人们必须反对现在的苏维埃制度，他们也没有说社会民主党人说过的许多其他的话，但他们同时又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朋友，因为他们同我们的友谊是建立在一种经过特别深思熟虑的、自

党的打算之上的——这种打算是错误的，但是它的根源在于深信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敌人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他们把我们在俄国的情况大致设想成这样：俄国革命，也就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历史意义在于，工人阶级及其领导政党——布尔什维克党——有能力从反对旧制度的人中造就出坚决的、勇敢的、毫不容情的、钢铁般的干部，他们有勇气承担扫清摧毁旧制度的肮脏马厩的任务。

他们把沙皇的机构、半腐朽的资产阶级打得粉身碎骨，他们摧毁了已经彻底腐朽的俄国知识阶层，这些知识分子只会高谈阔论，就上帝、魔鬼和类似的毫无用处的东西争论。他们改造了全部国家机器，唤醒了最低下的人民阶层，并这样为发展一种新的类型的资本主义，为创造一种新的、一种掠夺性的、厚颜无耻的、没有贵族纹章、没有旧的资产阶级偏见的资产阶级开辟了道路。这种新的资产阶级是不依靠政府施舍为生的，这种资产阶级像军事共产主义时期“背口袋的人”一样，备尝艰苦，饱经风霜，还常常蹲在契卡的牢房里，他们经受了这些考验，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和性格，现在作为一种新型的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是一个厚颜无耻的、胜利的、精力充沛的、自信的、精通生活、不依靠任何施舍的资产阶级，正因为如此是一个新生的、年轻的、精力充沛的“美国式”资产阶级。

这一类型的“朋友”，这些重新学习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是这样考虑的：现在反对苏维埃政权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现在在俄国引起混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相反地，必须支持苏维埃政权，必须逐渐钻进苏维埃机体的毛孔里去，参加苏维埃建设的机构，在那些机构里到处安插自己的人，缓慢地但是坚忍不拔和牢固地改变苏维埃国家的构成，正像路标转换派的一个著名代表人物所说的那样，依靠微小的内部变化，通过一再用新的人代替来改变苏维埃机构的构成，使共产主义政权的全部政策“遭封妨碍而陷于失败”。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得到这样一种状态。表面上仍旧维持我们的一切装饰、红旗、国际歌、苏维埃政体等等，但这一切的内容已经不一样了，它将不是反军国主义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了，而是将反映那一新的资产阶级阶层的期待、愿望、希望

和利益，这一阶层将持续增长，不断加强，并且将通过缓慢的组织变化来改变苏维埃国家的整个构成，逐步把它引向纯粹资本主义政策的轨道。路标转换派认为，那时，俄国发生的革命的全部历史意义就看清楚了。它的意义恰恰在于消灭依靠沙皇政府的施舍而生活的日异腐朽的资产阶级，由于俄国革命的结果，旧的资产阶级被一个新的强大的美国类型的资产阶级代替了，这个新的资产阶级什么也不会害怕，它将打着用国际词句掩盖着的民族旗帜前进，走向一个强有力的、伟大的、新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俄国。

这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打算，他们的秘密想法，他们的内在意图就在于此。他们同情我们，但是他们并不是因为把我们作为共产党人而追随我们才这样做的，而是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狡猾的打算，他们把牌押在我们的内部蜕化上。

现在请你们允许我谈谈我们自己人中间存在的那些想法。一部分我们自己的同志和一部分工人阶级有些动摇，并且怀疑我们对内和对外的方针是否正确。从表面现象看来，我们在这里看到像这一新的资产阶级的实际成长这类的情况。我们看到，我们在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决定性的攻击之后不得不开始退却。与这一点相联系，目前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的确，是否也许会发生我们的敌人所预言的那种情况，他们是否确实还是有道理的，我们面前是否也许确实出现了很难克服或根本无法克服的困难呢？脑子里出现很多这类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在我们生活的进程里，在我们俄国社会生活中的事件的进程里是有一定现实基础的。因此同志们，我们作为整个党的代表，无论如何必须对这种重要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

你们也许会问我，这一切同文化问题有什么关系，因为我的报告的题目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同志们，你们根据下面的全部说明就会看到，所有这些问题都同我的题目有直接关系，因为我们的命运、我们实际上注定要经过的那一历史道路，归根到底历史上既定的任务的解决——这一解决将首先取决于在我们的情况下如何解决文化问题。这一命题，这一主题，也将是我今天的报告的主题。请你们允许我现在转过

来对我们的敌人进行一些反驳。

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敌人用来证明我们不可避免要崩溃的第一个论点是依据两个事实：首先依据革命的巨大耗费这一事实，其次是依据我们的新经济政策。他们根据这两件事实推论出共产主义的破产。我们在这里必须首先从相反的方面给我们的敌人算一笔账，就是说要问他们：你们这些可爱的人，资本主义的境况如何，它的健康如何？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温度计放在它的左腋下，那么它的资本主义自我感觉将怎样呢？如果我们提出这一问题，那么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完全明白，按照资本主义原则来解决当前的任务和问题，是一件明显行不通的事。所有的（不折不扣是所有的）最近这几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在我们已经有了几年所谓的和平状态以后目前在欧洲发生的事件以最显著的、几乎是大吹大擂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在缔结了一系列条约——凡尔赛条约、塞弗尔条约等等——之后，我们不但没有看到，关系有所调整，而是相反，目前所有的人，甚至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都胆战心惊地等待着整个欧洲被卷入一个空前灾难的漩涡。我根本不提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已经预言过了。但是，让我们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知识分子的广大阶层，首先是德国的，然后是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你们将看到，在他们的全部著作中目前都流露出一种不安的担心，这种担心越来越明显了——为全欧洲规模的整个制度的命运担心。你们很了解，甚至一部分优秀的资产阶级教授，比如说英国的凯恩斯、曾任意大利部长的尼蒂、曾任法国部长的卡尤，今天一致提醒他们本国的政府，提醒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要注意欧洲即将发生的事件，在他们看来这些事件是加倍阴暗的。

另一方面，如果你们观察各大国在经济领域和纯粹政治领域所执行的政策，并且客观地加以评价，那么你们就会看到它们在怎样努力地从事泥潭里脱身出来，哪怕只是爬出来也好。西欧就是这样一个泥潭，它们怎样努力缔结一系列协定，它们怎样召开一个接一个的会议，朝不同的方向探索和勘查地面，却丝毫无能为力。欧洲的整个社会机构散了架，全世界一片财政混乱，物价飞涨，证券市场猛涨猛跌，这些情况都是空

前的。你们自己看看每天的报纸，德国在发生什么事？资产阶级不能按正常方式进行统治了，他们想找一个代用品。这种代用品是使关系更加激化的手段，例如，占领鲁尔区。他们想找一种新的蛊惑人心的政体，这在目前表现为所谓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资产阶级尝试并且力图按照完全不正常的方式进行统治，他们甚至尝试用蛊惑人心的方式和利用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一部分中等阶层，有时还利用一部分农民，鼓动他们出来参加政治生活，给他们提供蛊惑人心的口号，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对此完全清楚——却会造成他们自己毁灭自己的结局。

不管你们从哪些角度来看这些事情，你们到处都会看到同样的情况：冲突增加，经济混乱增加，国际关系乱成一团，地平线上已出现一场新的、惊人的、大规模战争的魔影。要知道在这一战后时期，在资产阶级统治领域里只有一条线是“向上”发展的——空前的新的战争发明：无人操纵的战舰、能从一个房间里操纵并且根据需要投掷炸弹的无人驾驶飞机、美国的巨大战斗机队、法国的能够用火药保护整个法国海岸的巨型大炮，还有人类天才在这一领域的与此类似的其他表现。“进步”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冲突是不可避免要积累起来的——自由主义的教授们也承认这一点——那么也很清楚，人们面临的前景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最可怕的前景，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能够用这一战后和平时期发明出来的最完善的毁灭武器把它本身的文明的残余彻底消灭——如果工人阶级不加阻挡的话，它是会这样做的。

这样的前景（如果人们还能把这说成什么前景的话）过去已在人类历史上现实地存在过，这是无可反驳的事实。我们知道，在古代，像亚述和巴比伦这样的具有伟大文化的强大国家是怎样崩溃、怎样被彻底消灭，从地球的表面被抹掉的，因为它们在当时的社会经受不了的流血战争中弄得精疲力竭了。有什么担保、有什么保证能说现代社会不会完成这一全面消灭人类的高尚任务呢？对此是没有任何保证的。目前，在资产阶级的最优秀部分中，在现在坚持反军国主义路线的学者和新闻工作者中普遍存在着忧虑，这种忧虑是向未来领域的突进，是资产阶级优秀代表人物对国家政策的大胆的理解，他们揭开了这一未来的帷幕，看

到了它的全部赤裸裸的惊人的、悲惨的景象。如果我们现在从这一角度出发，走到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敌人和来自纯粹资产阶级阵营的敌人面前，向他们提出如何按照资产阶级世界的标准和方向解决当前任务的问题，那么我们必须在这里充满信心地说：不，先生们，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你们的事情，因为在你们的道路上只有一种前景——欧洲灭亡的前景，然后还要把这同一情况转移到世界的其他地区，漆黑一团，完全绝望。你们不妨看一看不久前我们的敌人是怎样处理这些问题的。曾经是共产党员而现在是叛徒的保尔·列维刚刚不久前警告德国工人阶级不要夺取政权，他提到俄国作为自己的论据。他说，俄国的工人夺取了政权，为此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只要看一看那里的破坏和饥荒等等多么严重就知道了。德国也将发生同样的情况。工人阶级一旦掌握了政权，就将立刻遇到像财政状况这样糟糕的一个资本主义机器的精致的和敏感的工具。我们将看到马克价值猛跌，1美元将值100马克。自从列维发表这一声明以来，才过了整整四个月，根据昨天的报纸——我还没有看今天的报纸——1美元已略微超过40000马克，也就是说，马克的下跌已是列维预见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时会出现的情况的40多倍。因此，如果人们认为列维的计算是正确的，那么现在就可以说，我们可以进行40次以上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样还比我们进行革命而遇到的情况代价更小，没有自己的政权的德国无产阶级的处境，就像一个人一面被施蒂纳打耳光，另一面被法国帝国主义打耳光，而所有的阶级包括施蒂纳本人在内又都被法国帝国主义打了耳光，因此他们不得不从口袋里拿出手帕来擦掉从鼻子里流出来的血。

因此，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由此看得很清楚，由于继续实行资本主义而产生的耗费，在这一时代和在这条彻底绝望的道路上产生的混乱，不能使任务得到解决。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伴随现象，即生产力大大降低和受到惊人的破坏，还有如此迫在眉睫的危险，以致只有一个简直不能在最基本的数量范围内进行计算的人才会心安理得地主张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解决一切问题。在人类面前十分清楚、明确和明显地出现了这一任务：或者转向新的社会发展的途径，哪怕付出最沉重的耗费作为

代价，因为这里是有前途的，这里真正展开了一条新的道路，可以避免把人类引向毁灭的那些巨大危险——或者仍旧留在旧的途径上，但那时就会清楚地看出，人类没有出路，人类将像一系列古老的人类文化曾经灭亡的那样灭亡。由此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在西欧，首先是德国的大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中间（资本主义的这一本身内在消耗并自取灭亡的倾向在德国表现得最尖锐），为什么我们恰恰在资产阶级最伟大的思想家中间看到转向种种思想体系的情况，而这些思想体系是离开地球并把眼光完全朝着天上或者只看自己的肚脐眼的。我们在资产阶级人士中间看到这一巨大的思想潮流，即脱离地球，深深陷入心理观察，追求来自东方、来自托钵僧、来自宗教等等、等等的神秘启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征兆，这种征兆在人类历史上已多次出现，它表达了对当时社会的灭亡的预感。同志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敌人的反驳是十分可悲，甚至简直是卑劣和无聊的原因。他们看不到最重要的事物，看不到整个人类目前遇到的非常大的两难处境，如此巨大的悲剧性矛盾，他们不能把握在人类面前出现的那些问题的全部巨大规模；他们像是咬我们后腿的小狗一样，不能理解以如此可悲的方式用翅膀掠过全世界的妖怪。甚至当他们试图走近我们并且就某些微不足道的事来刺激我们时，比如说就我们的新经济政策等等，那时他们与其说是提出一个对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正确分析，不如说是表露他们内心的秘密的愿望。一句德国谚语说得很对：“愿望是思想之父。”你想要什么，你就把它当作一种分析、一种客观的逻辑的分析放到发生的事情里去。这里发生的也是同样的情况。当我们的敌人说共产主义已在俄国破产时，他们用什么来论证呢？是说我们俄国存在资本主义。很对，是存在。但它是存在于我们经济的社会主义因素的中间，存在于我们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因素的路线办事的积极意志的中间，而且还有不断的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谁将在这一斗争中取得胜利呢？他们这样说和这样想：我们希望资本主义胜利。他们就这样表述：资本主义已经胜利。

但是在哪里曾经这样说过呢？有谁说过这场斗争，它的历史进程的最后结局是完全有利于耐普曼的呢？有谁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永远

处于后退状态，决不会向这些分子发动进攻呢？支持这一观点的论据是在哪儿说出来的呢？根据欧洲的虚弱状态（那里的工资现在已开始下降，而我们这里却开始提高），根据德国、奥国等地发生的知识分子的崩溃，得出的结论是另一种的，出现一种完全不同的前途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就是说，苏维埃俄国在恢复元气的时候将成为新的美国，但不是在这个词的资产阶级意义上说的，而是在这个词的无产阶级意义上说的。任何斗争都要冒一定的风险，不管是军事斗争、革命斗争，还是经济斗争。但是谁如果在斗争的进行中自己就已经宣布自己要失败，那么他就是不想取得胜利。谁现在说我们已经一切都完了，耐普曼将把我们吞掉，那么他就是希望这些耐普曼取得胜利。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从这一角度来说，我们在这里举出的反对意见也只是显得幼稚可笑的原因，如果从总的前途和当前的伟大任务的角度来说，这些反对意见就显得可悲了。但是，有一些反对意见是必须加以考虑的，尽管它们是由于对整个工人革命的性质极端不理解而产生的，是由于对革命进程中的特殊性质极端不理解而产生的，这类反对意见的表现形式是一系列反对我们的补充论据，我将尝试证明这些论据统统是建立在彻底错误的基础之上的。

我现在要分析一个反对我们的论断，这就使我们同今天报告的题目离得很近了——我到现在为止讲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开场白的性质——另一方面，这一分析又将揭示出我们的政治敌人的主要错误，他们指出工人革命的巨大规模的耗费，企图根据这一耗费来证明在一个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我在这里不打算停留在我们的著作中已非常频繁地讲过和写过的内容上，我在这里不打算阐述全部的重要论据，这些论据归结为：不应当把俄国从它同世界经济、从同西欧经济的普遍关联中，从整个欧洲经济以及从而从西欧经济的整个循环中割裂开来，我们的革命只是欧洲革命的一部分。问题的这一方面已有过足够的说明，我不打算涉及了，我在这里想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来解释这一问题。我要在这里提出一个论题：敌人在反对我们的论据中拿资产阶级革命来进行类比，他们认为这种类比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全都本质来说，这种类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当作证据。我将证

明，无产阶级革命不仅由于它的阶级内容而同资产阶级革命有区别，而且由于它的全部进程具有如此特殊的特征并在随便哪一个国家都将不可避免地具有这样的特征，这就使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任何类比都不能成立。

敌人中间是这样考虑的：拿资产阶级革命的经典类型，比如说，法国大革命为例，可以看到，新的资产阶级如何推翻封建地主统治。在这场内战中当然有耗费，但是这一资产阶级革命的伤口是比较小的，国家很快就开始恢复元气，重新站了起来。但是俄国革命表明，出生时的阵痛、内战的耗费、新统治者缺乏经验和技巧的情况是如此严重，以致使人认为，新的统治者在俄国自己暴露出来的无能的证据就证明了国家还不成熟。我在这里提出一个论点，即任何无产阶级革命，在随便哪一个国家里，即使在一个资本主义极度发达的国家里，它的耗费也将同任何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有区别，其相差的程度是无法估量的。

这首先是因为，任何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时的方式，是同资本主义社会在封建农奴制社会内部产生时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敌人特别喜欢引用马克思的一个著名论点，即任何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当这个社会的因素还未在旧的关系内部，在旧社会内部成熟以前，都不能取代旧的社会形态。因此，他们可以说，当俄国布尔什维克实行他们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时，这无非是试图使一个怀孕的妇女生下一个完全没有成熟的婴儿，既然婴儿不是在第第九个月，而是在第二个月出世的，这当然是一次毫无用处的早产。这一论据是我们社会民主党敌人的主要论据。我请你们注意这第一点，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让我们来观察一下，资本主义是怎样从旧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内部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又是怎样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出来的。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十分清楚和明确地看到二者在成熟的类型上已经有很深刻的区别。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内部发展成熟起来的，正像资本主义是在封建农奴制制度内部发展成熟起来一样，但是问题在于它们是怎样发展成熟的。这一差别是原则性的差别，是特别深刻的差别。我们的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敌人没有发现这一

点，他们根本不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提出这一问题，我们就立刻看到这一区别，当然只是在我们愿意看到它的情况下才会看到。

资本主义社会是作为整体，从根基到顶端，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还在封建主义制度统治的时候，资产阶级在自己的工厂里就已是发号施令的阶级，而工人阶级在他们的工厂里还要服从资产阶级。人们可以把资本主义社会描绘成一把梯子，梯子顶端站着发号施令的资产阶级，中间站着工程师、工匠和熟练工人，下头是工人阶级的非熟练部分——这一整个社会等级制阶梯连同它的发号施令的顶层在封建社会内部就已发展成熟了。资产阶级已经在封建地主制度的政治统治的外壳下，在工厂中，在手工工场中指挥着工人阶级。现在你们问一下自己，是否甚至在一个资本主义已发展到极点，看来再也不能向前一步的国家，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呢？你们问一问，是否能设想这样一种情况：在一个极高度发达、已经达到其发展终点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将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长时的那样作为一个整体成长起来。你们立刻就会明白，这样的一个假设是双重地无意义的，是彻底没有价值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工人阶级必须自己作为指挥者站在上头，或者以本阶级的代表的身份，或者以本阶级优秀分子的身份，或者以本阶级的领导者即党的身份，或者以随便哪一种其他的方式，在这一情况下这是无关紧要的；同样十分清楚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结构和过渡时期结构的主要标志是这样一个标志，即工人阶级在旧社会的外壳下支配生产关系。

这样的情况是否能出现呢？这种情况当然甚至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能发生，因为怎么能设想有一种资本主义制度会让工人阶级在工厂里发号施令呢？怎么能设想即使在最成熟的资本主义机体里，工人阶级能作为生产的领导者站在另一个阶级之上呢？这样的假设是荒唐的。哪怕只假定这种可能性会出现一秒钟，也会是纯粹的痴人说梦。

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封建社会内部的发展成熟、诞生和形成，同社会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发展成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情。资本主义完全是在旧社会内部成长起来的，而

社会主义连同其指挥的上层人物无论如何不能，在哪怕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完全成长起来。这是一个基本的和原则的区别，我们的敌人没有一个人曾经哪怕是把这一区别拿出来讨论过，但是由此却产生整整一系列后果，我在下面还要讲到。

由此首先产生如下的区别。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地主阶级，但它不是受剥削的阶级，它推翻封建制度，但它是作为受到地主的政治权力压迫的阶级而进行攻击的。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内部不是受剥削的阶级，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是受剥削的阶级——这一点完全用不着进一步证明，因为这已是人所皆知的了。由此还产生一个情况，这一情况同问题的本质的关系已很密切。这就是说，由于这一十分深刻的区别产生了如下的情况：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内在文化方面不是受压迫的阶级。相反，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内，在封建主和地主的政权的外壳下，是一个在文化上比被它打倒的那个阶级还要高得多的阶级。在城市里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在他们同以农村生活为基础的地主进行斗争时，已经用精密知识和科学充分武装起来，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力量和具有专门技能的力量可供利用。他们住在城市，拥有正在发展中的商品资本主义关系的强大手段即货币。他们在封建地主的统治下已经积累资本，并且在积累这笔资本的同时搜罗了现存社会的全部文化精华。难道在封建制度之下封建地主是学校的真正主人或者教育的独占者吗？没有这样的事。在封建统治的外壳下，技术人员、学者、实验室研究者等等已经处于新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领导和控制之下，已经被它掌握了。这个新的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但是已经成熟到拥有第一流的文化力量了，它就文化水平来说比它被迫去推翻的那个阶级高。这一情况是按照铁的必然性由社会成熟过程的两种类型——资本主义社会在封建社会范围内和社会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的成熟过程——的差别产生的。

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成熟起来时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呢？

没有，也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假定在某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内，甚至在最漂亮、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内，工人阶级在文化水平上能超过

被它打倒的资产阶级，这简直是纯粹的谬论。这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它使工人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并从而在文化上都处于奴隶依附地位。断定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能提高到某一个比资产阶级文化水平更高的阶段，那是十分可笑和荒谬的。工人阶级之所以是被压迫的阶级，之所以是最彻底革命的阶级，正是因为它在一切方面都受到压迫。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或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例如波格丹诺夫，提出了这样的论点，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自发性本身能使工人阶级愈来愈有教养等等，并且把这当作证据来反驳我在这里提出的论点，但他们这样做是大错特错的，因为他们在这里把完全不同的事情混淆起来了。

无产阶级在发展过程中在文化上提高了吗？完全正确，它是这样的。在机器生产中是否比手工工场要求更有教养的工人呢？完全正确。但是在工人从手工劳动转到机器劳动并且在这一基础上获得更大的熟练程度、更多的技巧和知识等的过程中，在这一时期中，站在工人之上的那些阶层，首先是技术知识分子，一定不会再满足于算术的基本知识，而是要掌握高等数学的知识。大家都趋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工人在文化上提高了，指挥的阶层提高的程度还要大，并以这种方式保持他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统治和他们的为社会所必需的职务。因此，如果把工人阶级在文化上的提高当作论据，来证明工人阶级能够并且也的确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成长为一支比它所推翻的那一阶级在文化上更高的力量，那么这不是什么论据，谁想把这看成论据，就是完全错误的。

这样对比着观察不同社会的不同的发展类型和不同阶级的状况，还会发现某些值得注意的情况。我举出以下一点：如果资产阶级向封建统治发动攻击，那么它所需要的为它效劳并帮助它同地主进行斗争的来自旧阶级的叛逆者的人数要少得多，因为它本身在封建社会内部从自己队伍中培养出了这些文化力量。而工人阶级呢？工人阶级不折不扣地在一切国家里——对全世界工人运动的观察证明这一点——到处都选择来自其他阶级，首先是来自知识分子的人做领袖，而这种情况是完全不可避免的。

没有一个工人党，没有一个工会组织的占有发号施令地位的阶层是完全不由来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组成的。当然，在这一方面，改良主义的党和革命的党存在一定的区别；但是即使在最革命的党里，比方说在我们的共产党里——我们无须隐瞒——有一个确定的领导上层，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来自另一个阶级的人组成的。怎么来解释这一点呢？根据我已经对你们讲过的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就可以解释——工人阶级在文化上受压迫的地位使它不能像资产阶级所做的那样从自己内部产生足够数量的领袖。

但是如果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如果它必须管理社会，那么它一定会从自己内部为管理和行政等等培养出一大批应有尽有的力量。由此就完全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这样的情况，好也罢歹也罢，它必须利用不属于本阶级的力量，程度和数目比资产阶级利用来自封建社会的人要大得多。你们看到，在这里，一件事是怎样同另一件事在逻辑上因果相连的，一件事是怎样同另一件事在逻辑上互相联系的。我们在这里必须首先详细地论述这一文化上的对比。让我们撇开经济成熟程度的差别，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问题上，你们会看到，不用几分钟这一问题就将显露出它是整个革命的中心问题。请你们设想一下：必须详细地考察这一文化对比的问题。我用如下的方式来论述这一问题。我把这一文化领域分成三个小问题，解决了这三个问题，整个问题的答案就有了。我提出以下这些问题。首先是文化原则的问题——这种文化将产生什么新事物；其次，这一新文化传播得多远，它包括哪些人——用一个外国词来说，这就是文化领域的粗放性问题；第三个问题是，这一阶级文化加工得有多深，或者这一加工的集约性，这些新原则的集约性问题。我要从这三个小问题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在这方面，封建社会范围内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内的无产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

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关于文化原则的问题或分题。我不可能在这里对它进行详细的考察，只能提出几个简短的要点，以便使人理解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如果我们观察老的封建的地主文化，我们就会看到，它的基础、它的原则基础（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它的轴心，是由两个

因素组成的。第一是不折不扣地到处都暴露出来的整个文化的极端停滞，这是从封建社会本身的停滞，从它深刻的保守主义产生的。由此就产生了整个文化生活受传统支配的情况。所谓的批判的思考受到了压制，也很少抬头，在随便哪一次思想意识争论中主要论据是援引圣经，援引这一种或那一种教义，援引祖先的某些传统。这一停滞状态到处盛行，无所不在。这一封建文化的第二条原则是等级原则——权威原则，这是容易证明的。它强调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那种生产关系的反映、等级原则、诉诸最高权威的原则是极端敌视任何批判的考虑的，这一原则在科学领域和随便哪一种构思的领域，都导致到诉诸传统并把这一传统承认为最高权威。这两条原则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封建地主文化各原则的整个轴心。

那么资产阶级在这方面带进了什么新事物呢？他们破坏和扫除了旧的封建相互关系，这就是所谓的个人解放。资产阶级在他们起来冲击封建主义社会时所宣布的自由首先是贸易和剥削的自由，它同时也是对宗教教义、圣经和教会势力的权威进行批判的自由；粉碎天主教会的是破卵而出的资产阶级个人，教会曾经通过征税阻挠他进行自由贸易和自由建立他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产阶级个人朝气蓬勃，精力充沛，钱包里许多金币叮当作响，它用胳膊左挤右撞，打开一条路来，摧毁了封建社会，直到把它彻底消灭并且把政权拿到手里。这一新的阶级在文化方面的主要事业是什么呢？就它的原则来说，它站在更高一层。如果我们现在来考察它的文化，那么我们就要问：它们带来的新事物是比旧的事物高明还是不比它高明？就原则来说它无疑是更高明的。因为社会的向前运动不能依靠基督教会或另一种教会的教义；为了破坏旧的宗教信仰及其概念，必须在经济领域对自然界进行精确的分析，必须有批判的思想，必须有批判以及研究我们的现实的经验，首先是研究自然界的经验。这就是社会作为整体在向前发展时所需要的东西。因此从新文化的角度来看资产阶级站在更高一层。但是从传播这一文化的角度，从它所支配的人的范围的角度来看，资产阶级也比封建社会站得高。我已经对你们说过，资产阶级拥有最熟练的社会工作者（如果可以这样说的

话)。城市中发展起来的一切，城市关系的整个范围，浮现到表面的、向前推进并且带动其他的东西，都处于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从资产阶级能够支配的人的范围来说，它同样也比封建制度优越。最后，从制定新文化的原则的角度来说，资产阶级也是优越的。只要想一想，还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资产阶级就已经有了一部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者的百科全书，其中由新阶级的代表者从不同的方面概括了、制定了和精确表述了全部新文化。这是这个新阶级的一部完整的文化法典，巨大的文化法典。因此，这一资产阶级就制定新文化的原则来说也比它所冲击的那一阶级站得高。

现在，请你们十分冷静地从这三个角度来观察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地位。工人阶级目前把某种新事物带进了这一领域吗？我坚决说，是，而且从原则的角度来看，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比资产阶级的阶级文化高。在这一问题上，就新文化的原则来说，我认为以下的论点是反驳不了的：工人阶级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已经带来了比旧的资产阶级文化更高的东西。为什么？在这一方面的新事物是什么？在这一方面首先以下两个互相联系的论点是新的。第一，正如工人阶级有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倾向一样，它也有克服文化和知识的生产方面的无政府状态的倾向，这就是说，他了解，为了使一切所谓的文化价值的各种科学分支发挥最大的效果，必须把它们综合起来，产生一个共同的世界观的体系，各个文化的分支的结合和计划性以代替无政府状态——这是无产阶级文化的第一个原则。资产阶级由于专业化（专业化又是以无政府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因此不能认识这一点。由此就产生第二个情况，即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如学者等等不懂得任何一种理论学说的实际意义，而工人阶级却出色地懂得一切——从应用力学开始直到抽象的认识理论——的实际价值。它懂得，在这里，一切都有实际的价值，它们或者是作为同外部自然界斗争的工具为某一个阶级或整个社会服务，或者是一个阶级掌握的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武器。工人阶级是认识这一实际价值的。为什么这是更高的原则呢？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一认识提出了一个对科学、文化等等的新的看法。我要举出下面这个

重大的例子：如果我们掌握政权，那么我们当然必须知道，我们应当比如说为生物学，为纺织工业，或者为香肠生产支出多少。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我们必须权衡这一或那一领域、从香肠生产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产的实际价值。所以，十分自然，我们在这方面即在这一文化的、思想的领域，也像在纯粹经济和管理的领域一样，将同样有一个计划经济。

因此，我们的文化原则是更高的。我们将不会受偶像支配。难道是上帝、命令、义务或某种荒谬的东西强迫我们去做我们的工作吗？无产阶级政党的每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成员都知道他必须做什么和为什么要做，他从来不像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代表者在某一领域，比方说在伦理领域（这是知识的领域之一）所想的那样去想。资产阶级的动摇不定的阿谀奉承者总是问自己，正像罗普申问自己一样，是否可以杀死一个人，是否可以开枪打死一个警察局的盯梢。但是我们说，一切都取决于某种实际的考虑，即对于革命的进程、对于实现这些或那些任务是否合适。我们把我们的道德关系和科学看成我们为了把人类引导到新的、更高的发展形态而同自然界、同有害于人类的分子进行斗争的工具。我们的斗争就在于此。我们的思想体系和我们的新文化（我们是它的体现者）的崇高之处不是在于我们力图从更高一层的力量方面取得对我们的行动的批准。它是在于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坚持文化的价值，像一个好的司机在走一条坏路时那样掌握它，我们的力量就会增长。在于我们意识到，不是上帝抓着我们的领子，或者康德的绝对命令掐住我们的尾巴，而是我们自己站立着，引导着并向前进，我们给文化价值指出方向，支配着它，因此不是它带着我们走，而是我们带着它走，我们的力量的“崇高之处”就在于这一对力量的意识，在于对集体力量利集体意志的强有力增长的这一感觉。人们在同人类曾经知道过的原则相比时称之为更高的那些原则就在于此。

让我们举出同文化相联系的其他问题。如果我们涉及其他问题，我们立刻就会意识到我们的弱点——原则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就其原则来说站得比资产阶级文化高，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已经摸索到这

些原则的萌芽。

但是这些原则的传播和它们的加工完成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在这一方面我必须说，我们同资产阶级相比真是个孩子。必须承认这一点并且清楚地认识这一点。我们拿文化的粗放性问题来说吧，这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内用我们的文化影响工人阶级。我只给你们举一个例子，一个证据，你们立刻可以看出我们的处境是多么可怜。在这一方面我们将发现整个的工人阶级大军处于资产阶级偏见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影响之下。这是事实。追随社会民主党的人也就是那些仍旧抱着资产阶级思想不放的人。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们的工人妇女中相当大一部分仍旧拉着工人们去找神父吗？可以举出例子来说明好些国家的整个工人阶级处于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束缚之下。从另一方面来说，找出处于无产阶级精神影响下的资产阶级集团来吧！没有一个统治的资产阶级是处于工人阶级的思想影响之下的。这说明了这一相互关系之间存在着非常深刻的差别。工人阶级的最先进阶层提出新的原则，但是说到传播这些原则，那么在这方面工人阶级还只是一个光着屁股到处乱跑的小娃娃。工人阶级有一支小小的先头部队，它就这些原则进行思考和提出新的东西，但是这些新的文化原则的传播是微不足道的。

现在，让我们从新文化的这些原则的定形和巩固的角度来看看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这种定形方面工人阶级在哪里能显示自己的能力呢？只有在一个地方，只有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只有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工人阶级才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学生为代表，赋予无产阶级所带来的那种新的原则以外形。在其他领域里呢？在其他领域什么也没有。无产阶级制定了自己的文化原则，是从无产阶级的地位出发的，也就是从它和资本的斗争出发的，也就是说，这里首先出现的是社会科学。无产阶级在社会科学方面还多多少少有一点本领，而在其他方面呢？在其他方面是没有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奴隶地位把它的力气耗尽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里，工人阶级不可能指挥生产，同样，他在这个社会的范围里，也不可能给自己造就技术员、工程师、发明家等等。有过个别的情况，但不多！但是有几只燕子还不算

春天。这完全是由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里极低下的地位造成的。

假如我们把上面所说的一切概括起来，我们就算出这样一笔账来：工人阶级的原则比资产阶级文化原则更高些，但是，就这些原则的传播来说，它不行！就它的形成来说，也是一样。不过，事情取决于活生生的人的斗争，而不取决于没有人的躯体、只有骨骼的原则。如果我们问一下：这两者相比，也就是说，在封建社会范围内的资产阶级同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的工人阶级相比是怎样的？我们可以准确无误地总结说：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内部成长起来时，它的文化力量比起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的文化力量高得很多，工人阶级在文化方面比那个要被它推翻的阶级渺小许多、许多，许多倍。

由此，可以得出两件对于我们革命的前途来说是主要的、决定性的东西。第一，很清楚，当这个阶级掌握了政权，深刻地摧毁了资产阶级统治时，由于它的文化程度低，将要不可避免地做出很多错事，显得十分笨拙，而且在一切领域里都会这样。所以，有本领的人就要对它进行怠工。由此就产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耗费，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未曾有过的，换句话说，那些被纯粹归咎于俄国的经营不善的，或者归咎于也在我们历史中起了伟大作用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人革命的耗费，那些巨大的耗费对于任何工人革命都是绝对必要的，这是由工人阶级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地位造成的。

这是第一。第二，由此也产生另一个情况。在随便哪一个国家的任何工人革命在它的发展进程中都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的巨大危险，即那个革命、那个无产阶级国家和那个政党的内部会发生蜕化。因为，假如工人阶级在文化上落后，却又掌握了政权，那它不可避免要利用在社会上与它敌对，但在文化上却高于它的其他社会力量。由此就出现复辟的可能性。这是路标转换派指出的前景，我已经有幸谈到这一点了。任何工人革命都将面临这个危险的前景，其中也包括美国的和德国的工人革命。问题在于观察和研究这个危险，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摆脱危险。解决的方法很清楚。你们看到，关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的文化问题，

在一定的革命阶段会成为整个革命的中心问题。我是以完全清醒的头脑，用习惯的说法就是凭自己的责任感说这些话的。我们革命的结局，归根到底将取决于这一点。

我觉得，以上所说的情况，为评价所谓过渡时期，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作用和意义提供了新的线索。旧的论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作为整体已经成熟了的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成长到立即就能管理整个社会的程度；而且，既然实际的发展不是这样，就得出结论说事情恰恰没有按应有的情况发展。我曾说到社会民主党反对我们的论据，这一论据正是依靠以下论点的。如果工人阶级干了错事，碰到了各种类似知识分子怠工、革命的额外耗费等等现象，那就应当说，旧社会还没有成熟到能诞生新社会的程度。

按照我的分析，我觉得，这样说是没有错误的，无产阶级的这类错误和额外耗费，并不只是俄国革命所特有的。它们在俄国不可避免要达到巨大的规模，在俄国存在着俄国经济的落后性和俄国无产阶级本身在技术、文化方面的落后性，尽管无产阶级具有高度熟练的革命能力。从我的报告里可以看出，工人革命的这些额外的巨大耗费，将不可避免成为所有工人革命的特性。但是由此我要说，这个分析为评价整个过渡时期提供了某些新的线索。可以从上面的论述得出这样一个理论方面的结论。可以说——我在这里完全是抽象地说，是指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而言，并且要再一次强调，这不仅是对于俄国工人革命而言——我说，可以提出这样的论点：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成熟起来，这个阶级有能力砸碎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器，剥夺资产阶级，镇压内部敌人的反抗，也就是镇压资产阶级残余的反抗，镇压它的正在进行反抗的、有时是疯狂反抗的部分。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工人阶级不可能作为一个善于全都完成新社会的组织职能的阶级成熟起来，不可能全部完成，也不可能单独完成。由此可见，从这个观点去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我们可以说，过渡时期的任务、职能（假如可以这么说的话）作用正是在于：工人阶级在这个过渡时期成长为一个产生所有这些文化力量的阶级，成熟到一个能够管理社会的阶级；在这以后，在

全面共产主义的社会里，在无产阶级专政非取消不可的时候，在老的阶级划分的残余消失的时候，阶级也将消亡。

让我们从毫无诗意的观点再来看看这个问题。我们在研究有关无产阶级文化能力的问题时得出结论说，仅仅有一个新的文化原则是不够的，需要这些文化原则的活的体现者。问题就在这里：需要这些文化原则的活的体现者。换句话说，需要有一定的由活人组成的干部队伍。这些新的文化原则会在他们身上扎根，积累，集合，深入到他们血液中。要知道，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活的机器。我们可以把资产阶级教授看作某种活的机器，这种机器的用处在于从自己身上把资产阶级文化的能量向一切方向辐射，把这种文化传授给别的阶层，通过这些辐射充实那些从资产阶级观点看来应当加以改造的人。或者按经济学的说法，像资产阶级教授这样有高度技能的人，是生产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生产资料。无论在创造这些文化财富的意义上说，还是在用这些资产阶级概念、思想等等灌输进别人脑子的意义上说，都是如此。对我们来说，也必然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在这方面，在我们面前，有广阔的用武之地。假如我们愿意工人革命最终取得胜利——我想，这一点是我们所有人都愿意的——那么，我们会清楚地看到，我们面前还有些个人的改造问题，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敌对的思想意识影响之下，需要把他们变成这样一些活的机器，它们将在自己所有活动中——不管他们是管理工厂还是在什么学校里教书，指挥军队，还是在其他成千种可能的场合，都能按照新的原则，按照新的无产阶级思想指导自己。如果我们有了足够数量的这样的人，解决问题是一个样子，如果这样的人不够，解决问题就又是一个样子。这是十分清楚的。

假如你们从这个观点来看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那么你们就会用另一个表述方式重复我已在这个报告的第一部分说过的话。这件事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和条件下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和基础，一方面是生产资料的垄断；另一方面是把武器集中在统治阶级手里的垄断；第三方面，垄断教育。如果工人阶级不打破教育垄断，那么，它成熟为用自己的力量统治全国的阶级的可能性就被堵

塞了。由此可见，根本不能设想，也不能幻想，无须破坏和击溃资产阶级对高等学校的垄断，就能生产工人阶级出身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这样高水平的文化干部。这一点，我再重复一下，是很清楚的，无需任何争论的。由此我们必然得出结论说，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成熟为这样一个文化力量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里，工人阶级没有力量打破教育垄断。如果设想资产阶级只是靠赤裸裸的暴力维持，或者说只是依靠垄断生产资料，这是肤浅的，完全缺乏批判的，不正确的。资产阶级在生产资料方面的垄断同它资本主义社会中在高等学校中、在教育方面的垄断地位是一致的，因为在它手里掌握着这个施加文化思想影响的强大机器。不言而喻，如果工人阶级给自己提出成长为这样一个阶级的任务，即它应当自己组成这样的阶层，那么它就应当打破这种垄断，但是只要它还没有把国家机器和国家政权夺取到手，它就不能打破这种垄断。我觉得，整个过渡时期最重要的时代特征之一就在于此：用我们通常的说法就是，造就出身于劳动人民本身的有高度技能的干部，或者更确切些说，首先造成出身于工人阶级的干部。如果这个任务不完成，就会把其他任务全搞糟了。那时工人阶级就不可能完成我们交给它的历史任务，那时一切都将表明只不过是我们的幻想罢了。

因此，现在社会民主党人用来吓唬我们的那些捏造出来的说法就是毫无意义的了，就是绝对反革命的了。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主要理论家卡尔·考茨基最近发表的一本书里，有一处值得注意的地方，他说得简单、清楚，并且毫无顾忌地、完全恬不知耻地背离了马克思的基本理论。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宣布，在社会主义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之间，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相反，考茨基说出这么个理论：在社会民主党统治和资本主义之间必然有一个联合政府时期，而这个联合政府应当代替我们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请你们从我在这个报告中捍卫的观点来看看，请看看考茨基的这种修改，这种对马克思的理论的篡改。很清楚，就算联合政府是某种过渡阶段（就我们所知，这是完全不必要的），那么这个过渡时期（考茨基式的）一丁点儿任务也不可能完成。它之所以不能完成任务，是由于很简单的原因。在资产阶级的

政府里放进那么两三只社会民主党笨驴，这一丁点儿也不能推动新的阶级前进，也不能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使这个阶级有改造自己本性的可能。你们知道，马克思有一处说到，为了取得最终的胜利等等，工人阶级必须忍受国内战争和各民族之间的战争的时代达15年、20年、50年之久，以便改造自己的本性。这个过渡时期就是这样一个时期，那时我们工人阶级要以各种方式改造自己的本性，首先是用这种方式改造，即从自己的总的人力储备中分出若干受过一定文化、思想、技术和其他训练的人们的队伍，并且——这在一定的发展阶段是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从高等学校培养出来，进入其他的生活领域。这样就可以帮助解决必然落到工人阶级肩上的伟大任务。

这样，你们看到：从这种观点来看，过渡时期的意义恰恰在于，为了使夺取了国际政权的、同时忍受着贫困的工人阶级，通过使自己的成员接受文化教育，训练出一批干部，从而使工人阶级可以用自己的强劲手腕管理整个国家，可以把自己信赖的人作为有高度技能的人派到各个岗位上。那些它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做不到的事，在过渡时期它都能做到。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它完全关上了门的事，它在自己专政时代第一次获得了做这些事的可能。尽管正因如此，才有国内战争无尽无休的耗费，有最初阶段国民经济的巨大失误，有经济上的巨额开销，但是我们必须克服这一切干扰，因为我们归根结底要依靠新人打下某些基础，这些新人将按新的规律引导历史发展的进程。按照这个观点，现在就应当走向所谓过渡时期，也就是工人专政时期。工人专政会打破资产阶级对教育的垄断，单凭这一情况就应当建立工人阶级专政，因为创造新社会基本的、人的社会资本就是在这里形成的。

现在，我再来分析一下我在这一报告的第一部分中刚刚提到的问题，它是我今天报告中的主要问题之一。这就是关于任何工人革命必然遇到的那些危险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地位，使它必须利用敌对的或中立的（如果能够使其中立的话）社会力量。但是这样仍然不能解决任务，因为任何时候、任何对敌对的或中立的社会因素的利用都伴随着危险。我们可以举这么一个粗略的例

子。假定你们有从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出身的某一阶层或某个人，有一支技术力量，他们甚至愿意与工人阶级政权合作，他们接受工人阶级专政，自愿遵照作为领导的工人政党的吩咐和命令行事。这里说的完全不是自觉的欺骗或怠工，那是容易解决的，而说的是某种更广泛的东西。假定你们要完成某种经济任务，它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去完成。从有组织的经济观点看，共产主义的、正确的路线是完全清楚的，技术组织的原则是完全清楚的，但是缺少能够贯彻这些原则的足够数量的人手。相反，却有足够数量的人，他们诚心诚意地愿意利用现有的一切，而在灵魂深处却不相信新制度的未来；他们的全部过去的经验和技術素养都倾向于按相反的途径解决这些任务。在类似的条件下，这样一个人会怎样行动？这样一些人，甚至是我们的人，会怎样行动？他们按阻力最小的办法行事（“不管怎么着，开头总过得去”），他们作出的决定，将是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作出的决定只有毫厘之差，但是如果这种不正确的决定，这种略微不正确的决定积少成多，你们得到的将是它们的总和，它们的累计、它们的普遍化。这就是相当巨大的误差了。

这就是内部蜕化的危险性，这个内部蜕化的危险性必然和所有的工人革命紧紧相联。这里的问题在于怎样和它斗争。我要在这里十分坦率地提出关于这个危险的两个亚种——一个是原有的，另一个是具有较为普遍性质的。可能发生什么呢？可能发生的是，我们利用的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新阶层的一部分在一定的条件下，会用自己的文化知识战胜我们。列宁同志在自己的一次演说中，曾经举过一个历史上的例子，这个例子我也在自己的演讲中几次引用过，这个例子很浅显，它很好地说明了事情的实质。这个例子是取自历史上的常有的事：像教科书里说的那样，某些很野蛮的部落攻击和征服了某个具有较高文化的民族。他们简单地击溃了文化高的民族，简单地破坏了他们，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这些占据高位、压迫着文化较高的民族的胜利者，被人家从下面削弱了。几十年过去了，几百年过去了，可以发现，过去的胜利者掌握了被他们战胜的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和信仰。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每次都是这样发生的：社会的必然性要求比征服者所能提供的技

能更高的文化力量来执行职能。那时，文化较高的阶层（被征服的）有意无意地，在一丁点儿一丁点儿的很难觉察的过程中，一小步、一小步地实行渗透，掌握了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并且在有组织的过程中，无须经过任何灾变，不知不觉地、缓慢地站到自己的胜利者的位置上去，并使他们在一切方面实际上服从自己的影响，从而把他们同化了。这种事也可能发生在工人阶级身上。工人阶级可以简单地镇压敌人，工人阶级可以彻底粉碎资产阶级集团，在物质上可以把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有可能被自己敌人的文化更高的力量从下面吃掉。不是在战斗里，不是在厮杀中，不是在彼列科普，而是在一种缓慢的、逐渐发生的社会演变的过程中。你们现在完全清楚地看到，这种事怎么会发生，为什么能够发生，又为什么这种危险必然摆在每个夺取了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面前！假如这事发生了，那时就会从技术知识分子，从一部分新资产阶级，具体说，从工程承包人、商品供应人、承租人和其他人，甚至加上我们自己工人政党中的一小部分人中产生某种新的阶级，而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完全脱离无产阶级的总的基础，转入一种新的社会形态。那时，我们就会处于列宁所举的历史例子的那种状况。

重复一下，对于工人革命，这是最大的危险。在我们俄国的条件下，指出这种危险是完全必要的。当列宁同志在自己出色的演讲（如果我没记错，那是去年在冶金工人大会上）中说到共产党人的妄自尊大时，许多共产党人听了很激动，几乎感到受了侮辱——怎么能这样说党员呢！这样说流过血的党员呢！列宁同志在这里是击中了要害。假如我们俄国工人阶级没有意识到，它同资产阶级相比是不学无术的，它就会把自己的事业彻底输光。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从这个观点来看，大谈特谈无产阶级的美德是不正确的。现在，在当前的情况下，正确的策略是要大声疾呼：我们什么也不知道。这样才能大大鼓舞我们在这方面的劲头。

我答应过谈谈这同一个危险中的第二个危险问题。实际上，我们面前的这个危险有两个不同的分歧。第一，从和我们敌对的或半敌对的社会阶层中，可能产生新的、高高在上的阶级，对于这个阶级来说，工人

阶级变成了被剥削阶级，从部分耐普曼（按俄文说）中，从部分我们利用的知识分子中，可以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还有另一个可能是更加本质性的危险，我认为也应当坦率地、毫不掩饰地谈到它，这是我的职责。我要在这里提出以下论点：甚至无产阶级出身和异常粗糙的手以及其他优秀的无产阶级属性，也不能保证他们不变成新的阶级，因为我们如果设想一下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工人阶级出身的人中间有一部分脱离了工人群众，他们凭借这种出身而长期占据垄断地位，那么他们也可能变成特殊等级，也可能变成新的阶级。因为大革命的时代、大变动的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这时候不能依靠革命前的旧阶级；相反，在革命之后，旧的事物摧毁了，旧的阶级粉碎了，变形了，等等，从其中可以形成新的阶级，从原先的阶级中可以产生完全相反的阶级。这是革命的标志之一。特别是这么深刻彻底的革命更是如此。这个革命，可以说，把自己的触须一直伸到人类社会的最深处。所以，在工人政党面前，在我们俄国党面前，问题在于用什么办法使这些有害的抵抗陷于瘫痪。你们看得很清楚：直接的危险是从异己的阶层那里来的危险。怎样和它斗争呢？根据上述所有那些论点，这是十分清楚的。这个问题要用文化力量在数量上的优势去解决。

如果我们培养得出，如果俄国工人阶级培养得出（我一点也不怀疑它培养得出）足够数量的干部，可以逐步地、在日益增长的程度上取代来自旧知识分子和旧职员的干部，那它就消除了第一个危险。也就是说，正是在这个进行种种组织的、思想意识的、行政的等等分子的斗争的战场上，我们将拥有同样多的或更多的文化机器。而且，如果他们在质量上不比旧的低，数量上又比旧的大，那么在这盘棋上我们就赢定了。这是我们应当解决的第一个最基本的任务。因此，高等学校以及文化问题的解决，现在对于我们是最紧迫的、最为大众瞩目的任务之一。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们看成可有可无的玩意或是奢侈的东西。不能！这可是关系到革命的前途的。而第二个危险，同志们！是更为深刻的，或者是更具有普遍性的危险。我已经讲过，这个危险在于，你们，你们这些听讲的人，以及我们较老的一代中的一部分，有可能变质。那

么，在这方面究竟有什么保障，我们在这方面的政策的基础又是怎样的呢？只有一个办法，它在我们的政策得到正确运用并且这个政策具有正确原则的情况下，恰恰也能最终保证我们胜利。如果能保证从工人群众本身中经常输送人员到新的工人知识分子中去，并且使这种输送源源不断，与日俱增。形成来自工人阶级的补充阶层，我们就会胜利，我们就会在这方面排除这个深刻的危险。也就是说，可以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工人阶级送进高等学校的第一批队伍形成了小圈子。后来受高等教育的，也只有他们的儿子、孙子、重孙、玄孙，那时就将形成一个排他的集团。尽管出身于工人阶级内部，却又作为教育的垄断者进行统治。那时就将出现一个巨大的危险，他们在这里就会变成一个蜕化了的新阶级。但是如果有一批又一批规模愈来愈大的新的工人阶级分子经过这种巨大的学校实验室的改造，得到越来越多的技术训练，那时，我们就能消灭这种危险，就能预防它。

这样，如果从长远看我们的工作计划，那么第一个任务就是造就新干部，这是为干部构成而进行的斗争。谁将是干部成员？我们的人，还是敌人？如果最后干部成员中占压倒多数的是我们的人，第一个任务就解决了，而我们将在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里解决它。我们下一步的任务是保证这批干部同经常增加的新力量保持联系，不使这批干部把自己封锁起来，成为垄断的特权阶层。如果这个任务解决了，那时就意味着，我们是踏踏实实地走向共产主义。那时，有知识的人和没有知识的人之间的矛盾也消灭了。而这是整个事情中最重要的一点，最有决定意义的一点。那时，有知识的人和没有知识的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本身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将失去原来的意义。

你们看到：解决这个问题应当极其小心，特别应当防止有时在我们这儿多少得到传播的那些思想，或者那些情绪。例如，有的人没有充分思考过这整个问题，他看到耐普曼时就是这种态度。他说：“让我们再一次把他的牙敲掉。”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两万次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随便在哪个城市制造大镇压，根本不费劲。但是现在应当明白，

完成任务和克服摆在我们面前的危险，不是用机械的办法，不是用再次敲掉牙齿的办法，而是用训练我们的人才成为我们的干部的办法。我们党内曾经同工人反对派等等进行过争论，这现在已经过时了，那时有些工人反对派的同志采取了阻力最小的路线。我说，我们可以两万次再做这种敲掉牙齿的事，简单地进行镇压，这不是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就得从我们自己人中间分出这么一些人，他们什么都懂，什么都会，而且干得不是比那些在某些方面对我们有危险的人坏，而是比他们好。这是今天我们在文化工作领域的政策的中心点。我们应当明白，为了培养我们需要的干部，必须雷厉风行地办事。我们应当明白，解决这个任务，不能用简单的镇压和强制方法。必须明白，这里需要的是内部的、深刻的改造。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那我们无疑将会完成自己的任务。

现在请允许我说说比较具体的东西。上面说的全都正确，可是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属于什么样的心理类型的人？为了保持胜利，我们需要多少人，什么样的人，他们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头脑？我们需要一支在很大程度上由工人阶级出身的人组成的干部队伍。他们应当有怎样的心理特征？我已经在莫斯科的一次与此大致相同的报告中阐述过这一论点。现在我们需要属于这样心理类型的人：在马克思主义修养方面，应当具有俄国旧知识分子的好素质，眼界广阔，对事物具有理论分析能力，又有美国人的务实本领。我们需要属于新的心理类型的人。我国的旧知识分子，哪怕是出身于工人的，都具有理论分析和善于概括的优良品质，但是他们绝大多数手脚笨拙，不会动手干活，丢了裤子拉了背带，在实际生活中什么也不懂。现在应当把它们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在所有我提到的好的素质方面，要加上这种务实本领。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心理类型。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加上美国精神。

当我们刚刚掌握政权，开始管理俄罗斯国家这架巨大的机器时，我们处于自己的胚胎状态是不得已的。我们只能成为万事通，什么都做：“只要下命令——我就会当助产士。”今天在前线，明天就到了另一个地方，等等，总算好歹把事情处理了，因为革命这个学校给了我们巨大的精力。当然，也做了些错事，有时捅个漏子，不过总算勉强对付

过来了。我们整个干部队伍就像俄国古罗斯封邑时代的流浪民族似的，我们现在应当过渡到定居方式。我们应当明白，现在应当一下子并且永远地停止说大家什么都能干了。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专家，他们可能对别的部门一窍不通，但对他们研究的事物却很熟悉，而且一点不假，就像在这部门工作的旧资产阶级专家那样熟悉，或者比他们还强。这是极其需要的。需要我们的每个专家同时也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他明白一切，明白而且听见了革命的精灵的翅膀在空中颤动，因而能够遵循我们党引导俄国社会前进的那条轨道，同时也需要他能够负责，并且通晓自己的本行。因此，现在必须进行专业化，并停止一切有关从妇女病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万事通的废话。这种类型的人我们不需要。这是一种有害的类型，应当同它斗争。此外，同志们！从另一方面看，也很清楚，在我们当前的文化经济计划里，某些环节具有巨大的意义，另一些环节的意义小些。在当前，高等技术学校的意义最重要。这是第一位的，它将决定事业的成败。顺便说一句，我并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我在莫斯科作了报告之后，一大批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学生决定离开共产主义大学去进技术学校。这太过火了。但是，就整体来说，应当明白，工程师和技师比什么都重要。在这一方面，我们应当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最令人满意的类型是那种完全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优点和必要性、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的类型，他进入高等技术学术机构时，就知道正是在这条战线上首先将要发生我已经有幸提请你们注意的那些战斗。

最后，我还提出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说说我个人的观点，并且只由我个人负责。我说过的所有那些话，在党员方面等等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但是我要说的这最后一小部分，大多数领导同志是不会赞同的。这就是由于无产阶级文化派而产生的那次争论。这是个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问题。看来是两种观点在斗争：一种观点断定，现在，在我们俄国条件下，必须学会读书，学会识字，这是现在最基本的。饭后要洗手，要学习文化，这是主要的，决定战斗的，而其余的一切，都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之类臆想出来的废话和空话。第二种观点，

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观点，它对识字等等问题没有涉及，没有阐述，却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制定和实现新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原则上。

我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既然我们管理着我们所有的群众，俄国所有的劳动人民群众，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从我们和这些群众（这是工人阶级加几百万农民的总和）的关系方面提出问题，提出我们进一步的任务问题，那么最重要的任务是清楚明白的：必须教会他们读书、写字等等。如果我们问道我们能给教育战线提出预算，这个预算又该怎么分配，给这一项多少，那一项多少，第三项多少？那么很自然，在这个巨大的教育事业上，我们应当把我们能拨给所谓文化战线的全部经费的很大百分比用来进行这种初等的扫盲教育，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个问题的提法不会引起任何反对。如果，比方说，我们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他们就会犯很大的政治错误。因为很自然，我们要解除我说过的那一危险，就必须有基础。我们必须提高广大的工农各阶层，使他们达到新的文化水平，使他们同新的干部结合起来，因为大家不能一下子都进入天堂。而如果出现下面这种情况，我们就不可避免要垮台，如果我们一批人只是游游荡荡，不会读书，不会写字，而另一些人却具有真才实学，那时蜕化就不可避免。因为即使我们在恢复经济方面的那些技术和经济任务，我们也无法在生着虱子和没有文化的状态下完成。既然我们提出了关系到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文化政策问题，那么，从各方面来看，这都是个基本的政治任务。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如果我在农民大会上讲话，那是一回事；如果，比方说，到红色教授学院去讲话，那又是另一回事。在那里我不能整整四个钟头去说什么饭前要洗手，会后我也不能简单地戴上帽子就走，我得在实质上回答他们应当怎样解决他们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怎样设想本阶级的科学的前景，等等，在那儿不能躲躲闪闪。所以我说，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也应当花一些钱。在整个预算中，这应当占我们的人力、物力的多大部分呢？让我来作一个对比。你们知道，当我们开始管理我们的经济事务时，我们的政策是摇来摆去的，一会儿我们强调这个，一会儿强调另一个。拿我们的经济计划来说吧，它是一个由许多环节组成的链条，如果我们拼命把所有力量都

放在一个环节上，就会把别的环节弄断。所以，高明的经济管理——我们现在已经做到这一点——就是在我们分配人力和物力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对某个战线，也就是某个环节特别着重，打算在那里比在其他环节投入更多的力量，那么这时我们也不忘记那些细小的环节，因为常常有许多大的环节依靠这些小环节，缺少一个螺丝帽就能弄坏整个机器，虽然从数量上看起来，一个螺丝帽在整个机器的构造上是个无关紧要的东西。这里的情况也一样。现在我们应当生产新的人。很可惜，整个人类社会就是这么安排的，没法一下子把所有的人都变成教授和工程师。只能通过这样可能的途径，先培养一批干部，由他们再培养其他的人，以下类推。首先是我们党的领导干部，要使他们精明练达起来，然后是其余的人，然后是另外一些人，这样就逐步把全体人民都训练出来了。没法不这样做，没法一下子把所有的人都变成红色教授，一下子把每个伊凡诺夫都变成红色工程师。这是做不到的，这是空想的任务。在全体人民还受训练以前，必须在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实践的将军们下面建立一支军官队伍，然后，建立一支军士队伍，一支过渡性队伍，等等。如果我们现在只教所有人学文化，而不培养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教授（姑且不说自然科学方面的教授），那么教课的就不是我们的教授，而是其他的、异己的教授。而他们要教谁呢？教那些中间环节，那些最不成熟的群众。那我们就在这儿把事情搞坏了。我们就从另一头把链条弄断了。应当在广泛的战线上开展文化工作，主要的注意力要放在消灭文盲上，但不应忘记熟练干部，必须注意培养他们，使他们成为更加熟练的干部，使他们可以把自己的知识经过这个链条传授给下一阶层，使整个机器运转起来。应当这样提出问题，正确的解决方法是，既然我们讲的是在千百万人中间的政策，我们就应当强调消灭文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另一些比较狭窄的、培养我们的干部和技术力量的领域，也不应当提出另外的问题。那些问题我们也应当解决，我们不应忘记这个领域。

我的报告快结束了。我想说几句结束语，作几点总结。这几句话是这样的。同志们！我们是在对许多事情无知的情况下，开始了我们的革

命。我们开始我们的革命时，还没有想到革命会带来的那些巨大的困难，必须十分清楚地、准确地、坚决地说明这一点。可是现在，一大批我们的敌人走过来说：你们错了！事情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样，耗费很大，流血很多，失败不少，等等，所以你们破产了。我们要说：谁都可以叫唤，就是你们没有资格叫唤。你们的情况糟糕得多。我们有前途，我们看得见出路，我们有意志、愿望，我们面前有大道，而你们什么都没有，你们哭去吧！叹气去吧！抠自己的肚脐眼吧！求上帝去吧！你们会变成没有什么用处的、可怜的、老朽的、淌鼻涕的老头。我们应当说：我们受尽磨难，我们知道做这一切有多困难，我们比你们更清楚，在我们道路上有怎样的危险。见鬼去吧！旧的神像已经砸碎了！知识之门已经打开了！我们造就新人，而且不用从前的办法，是用另外的办法。这是不应当忘记的。

人家对我们说，俄国革命什么也没有带来，我们非常贫困。这完全是事实。但是我们现在感觉到，大地的汁液已经进入我们体内，流入我们的血管，升到我们的头脑里。我们的头脑开始用另外一种方式工作了。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感觉到这一点。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还没有提高到足够的水平。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俄国人民，这个臀部宽大的妇女，她从前对村子以外的事什么也不知道，现在已经被唤醒了，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她可不仅知道罗莎·卢森堡和马克林是谁，她还知道任何一个法国市侩不知道的事。就拿俄国农民来说，他们过去对自己宅院外的任何事都不知道，现在他们被改造了，他们想到的不仅是自己的宅院、自己的村子或是村庄，甚至也不仅想到莫斯科，还想到伦敦，想到巴黎。我们再拿占领鲁尔区来说吧。这一时期，我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了农村群众许多来信，这说明群众对于鬼知道在哪儿发生的各种事件都作出了反应。这意味着，头脑的改变是很巨大的，只有纯粹的糊涂虫、思想上的饭桶才对它估计不足。我们确实知道，我们现在是凑凑合合地培养一些干部，他们可能犯错误，但是终究是会进步的。不是吗，不久以前，德国大使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他说，是啊！你们这里的听众，比我们的共和国参议院里要像样些。我们

自己也在这些代表大会上看见了，我们有一支新的工人干部队伍正成长起来，他们处理问题是很深入的。在我最熟悉的经济理论领域里，就有许多同志比我懂得多，而他们是出身于工人的。同样的现象，在理论的、实践的各个领域里，到处都有。

我们看见，我们的群众已经再生了。他们尽管贫困，还是前进了，他们对一切都感兴趣。国家政权使他们有可能进入高等学校，他们开始学习了。如果这些干部将明白自己的责任（而我相信他们会明白），那我们就要说，和这个新的、革命培养出来的人民在一起，和这个新的、革命培养出来的、将取代老一辈的青年在一起，我们会胜利，我们会克服一切障碍，并且要向所有那些哭鼻子的人宣布：你们这些可怜的小人物！你们那时使我们烦死了！你们妨碍我们工作！而我们却把旗帜拿到手里，把自己的事业进行到底了！

殷叙彝译自《无产阶级及革命和文化》，
彼得格勒 1923 年版。

选自《布哈林文选》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上册，第 69—106 页

布哈林：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①

同志们！在对文学政策的若干问题作出决定之前，必须先对下述情况有所认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剃刀的刀刃上行走——如果一般来说，这种提法是对的话，那么，同其他问题比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就要更加善于在刀刃上行走。你们可能站在完全正确的立场上，但只要你们执行政策时差之毫厘，就会在政治上干出蠢事来。为了不致作出某些轻率的决定，我打算用这一警告开始我的发言。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深思熟虑，必须完全根除那种通常说的“大轰大嗡”的方法。然而，事实上，同志们，你们现在却正在按这种方法行事。瓦尔丁同志说，“在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上到处充满了中央委员会的精神。”对不起，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在你们的代表会议上，毫无中央委员会的精神。我们还知道，你们公开提出了抗议，反对关于让沃隆斯基同志重返《红色处女地》杂志工作的决定。每逢作出实事求是的决定时，你们就反对一气，还说什么中央委员会的精神在你们头上缭绕。这种说法似乎不符合实际。你们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纠集了一群无产阶级作家去打着中央委员会的精神这个旗号，尽管你们无权这样做。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你们这样做是错误的。其次，为什么你们要滥用老头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名义呢？我想，而且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好的。我将在这里谈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世时我所持的立场，然后，我再讲一下不同意我的

^① 本文是1925年2月布哈林在中央委员会讨论文学问题的会议上所发言的速记记录稿。

意见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立场。

我首先要谈的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我将尽可能地把我当时观点说清楚，然后再谈谈列宁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在这次争论中，托洛茨基同志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明确地论证了他自己对文学、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喊声：“那么，波特列索夫呢？”）。没有必要把波特列索夫也牵扯进来，因为他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提出这一问题的。托洛茨基同志的观点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他完全忽略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长期性。这是第一点。第二，他忽略了在各个不同国家中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平衡性。比如说，我们已经夺取了国家政权，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是在有许多敌人包围的具体条件下存在着的。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将是漫长的，因为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是不平衡的。在一个国家中已经夺取了政权，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则尚未夺取政权等等。在这方面，先决条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延长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不平衡。因此，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总的来说，以统治阶级的形象和面貌为标准形成起来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将具有自己的特征。这个意思还可以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夸大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速度；或者，用另外一种说法，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这个理论体系中，夸大了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速度。他的理论错误就在这里。他正是从这一政治错误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的。他把事情设想成这样：所有阶级都同时向共产主义迈进，既然无产阶级专政削弱得最快，比实际情况快得多，于是无产阶级的若干特点便起了变化，变成人类共性和未来共产主义的特点。未来共产主义文化的这一特点发展得相当快，比脱壳而出的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快得多。然而，还可以提出第二个问题：一般来说，在文化方面是否有无产阶级独有的特点？我认为有。不过，这个问题已经谈论过多次了。我要说，波格丹诺夫在这方面说的并不全是坏东西——他有一些很正确的好的想法。可以说，是一种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的精神（波格丹诺夫是这样称呼它的，你们怎么称呼它都可以）同正在进攻的

革命无产阶级的战斗特征的结合。从人类共性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特点并不全都具备共产主义性质^①。其次，无产阶级还有一些特点，都市主义的情绪、城市的特点——这些并不是共产主义的特点，因为共产主义是要解决城乡矛盾的。这些特点立即会泾渭分明地把人类共性和无产阶级个性区别开来。一方面，这些特点是这样一种结合，即这种集体主义加上革命性，加上城市；另一方面，它又是另一种结合，它不同于资产阶级的都市主义，不同于马利涅蒂^②等人的未来派的都市主义。这是完全清楚的。在文化方面，无产阶级是有其特点的。毋庸置疑，这些特点将不可避免地被固定并记录下来。在城乡矛盾尚未完全解决的那一段历史时期内，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未能完全解决城乡矛盾也是自然的事情——这个时期将给整个文明打上烙印，包括文学在内。不管我们如何实行消除城乡矛盾的政策，无产阶级文化的成长过程还是比它消亡的过程快得多。在这里，无产阶级文化的消亡和积累这两条曲线相互交叉。托洛茨基同志认为，无产阶级文化的消亡比形成快，而我认为正相反，无产阶级文化的形成比它的消亡过程更快。自然，这里说的不是直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部过程，而是指相当长的一定的发展时期。

现在我应该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③是反对这种无产阶级文化观点的。他同这种观点作斗争是事实。我曾经维护过我在这里谈过的立场。现在你们都点头同意我说的，那就让我讲下去吧。而且你们自己也知道，归根结底，我没有任何理由诬蔑自己。所以，我要说明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最坚决反对这一系列观点的，他在同我的几十次谈话中都提出过反对意见。他给我写过一些便条，甚至“怂恿”雅柯夫列夫同志写文章。雅柯夫列夫是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直接指示写那篇文章的，列宁事先读过那篇小品文。瓦尔丁同志！我就这件事曾同列宁谈过。当时我提出了最后通牒，我说，如果他坚持要在《真理

① 比如，同人们进行斗争的心理，阶级战士的心理并不是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的特点。

② 马利涅蒂为意大利人，是19世纪末资产阶级文学流派——未来派的创始人，对俄国未来派有影响。

③ 即列宁。

报》上刊载雅柯夫列夫的小品文的第一稿，那么，我将给以极其尖锐的反击。于是，弗·伊·劝雅柯夫列夫在文章中删去许多看法。这曾经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你们还要站出来说，伊里奇是“同意我们的意见的”。何必这样呢？我谈谈我对弗·伊·^①的立场的理解。他在有些地方曾经谈到过无产阶级文化问题。他写过几篇就民族问题反驳李普曼和谢姆柯夫斯基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曾谈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文化。如果我们想全面研究这个问题，那么就on应该仔细想一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说出下面这句话时，他是怎样想的：“你们带着你们那些废话见鬼去吧”等等。我谈谈我是怎样为自己解释这句话的含意的。也许（我不说想必，而说也许）弗·伊·认为，无产阶级文化的时代会出现。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对这个问题高谈阔论，大喊大叫并要公众注意，那么，我们反而会把这一事业葬送掉。时机尚未成熟，现在还必须从字母学起，学会洗手等等。他认为，没有必要高谈阔论，因为我们在实践中实现它之前，高谈阔论依然是高谈阔论。在我同弗·伊·争论过的所有问题中，有两个问题至今我也不同意他的观点，这就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和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不过，应该说一下，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弗·伊·在最后写的论合作社的文章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这以前他认为，还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有的只是社会主义的小岛，而其余一切都是国家资本主义，甚至这个小岛也被淹没了。现在他认为，我们正在壮大起来。如果把这种观点继续阐明下去，那么，他会这样说：“是呵，如果我们的小伙子们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没有问题啦，那么，他们肯定不会把社会主义建设成功。所以，应该往后面拉他们一下，喂，别骄傲自满，我国还没有社会主义呢。”正是这种想法决定了他的论据，他的论据应成为解决教育我国干部这一重大的社会教育任务的行之有效的推动力，这一教育目的是必须使干部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骄傲，有的放矢并用尽全身之力拉车前进。这就是弗·伊·的实际指示。我个人不同意这种理论上的提法，但我完全同意

^① 即列宁。

其实际结论。应该接受这一指示，在解决一些基本问题时，应该重视这一指示。没有必要说什么列宁曾经支持过我们，这是胡扯。

让我们实际运用一下这个标准。我举伐普^①的宣言，根据瓦尔丁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为例加以说明。第一点是：

一、“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强大武器。如果马克思的指示，即‘任何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永远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无产阶级的统治则不能允许非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包括非无产阶级文学继续占统治地位。如果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期内不逐步掌握一切意识形态阵地，它将失去统治阶级的地位。在阶级社会中，文艺不仅不可能是中立的，而且它还积极地为一定阶级服务。”

这是完全正确，绝对正确的原则。下面接着写道：

二、“如果这一切对于一般阶级社会来说是正确的，那么，它对于我们现时代——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在各阶级之间进行最尖锐的战争的时代来说则是双倍地正确。这就是为什么下述说法是一种反动的乌托邦，即认为似乎在文学领域内有可能实行各文学思想流派之间的和平合作以及和平竞赛。布尔什维主义同这一反动的乌托邦进行了不断的斗争。”

在这里就有理论上的错误了。第一个大前提是，文学不可能不隶属于阶级斗争的规律。这绝对正确。第二个前提是，如果这一切对于一般阶级社会来说是对的，那么，它对于战争和革命的现时代就双倍正确。这一前提对不对呢？对。接下去谈的是什么呢？接下去谈的是苏联社会内部的政策。这个问题讲得就不对了。为什么不对呢？这很简单。我国社会有两个摩擦面——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外，我国社会面对的是资产阶级世界，在这方面，阶级斗争是尖锐化了。对内，应如何提出问题呢？在这方面暴露了对下述情况的无知，即在国内，我们的政策一般来说不是推行加剧阶级斗争的路线，而是相反，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斗争的政策。这是基本的。根据中央委员会的直接指示，同托洛茨

^① 伐普（ВАПП），即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

基同志辩论时，我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在论反对派的经济纲领的文章中正好谈到过这个问题。谁也没有提出过坚决反对的意见；相反，所有的人都承认我说得对。阶级斗争正在消失吗？没有。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怎样说的呢？他说过，我国社会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合作的社会，资产阶级也可以参加这一合作。过去什么时候提出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允许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合作呢？从来也没有提出过。那么，这里出现了什么情况？出现了阶级斗争职能的某些辩证的改变，正因如此，我们才允许资产阶级参加合作。请同志们好好地想一想实际情况吧。我们曾经不得不让步，以便让这些阶级去填补我们无力填补的漏洞。他们是在一定意义上、一定时期内来填补漏洞的。我们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来对待这些阶级的。如果你们把小商贩赶跑，这也会给我们带来经济上的损失。这些理论原则对不对呢（喊声：“这也是相对的。”）？我认为这是对的。为了弄清楚这一切，应该把这个问题同另一个问题即领导问题区别开来，这是不同的两个问题。大家都必须记住这一点。我在这里谈的问题，当然，也有可能被人们庸俗和肤浅地加以解释，正如社会民主党人那样。正是在这方面需要在剃刀的刀刃上行走。我想对你们谈谈关于奥托·鲍威尔的情况，虽然这与本题无关，但还是很有意思的。他是这样来描述我们的社会的。他说，开始时，确实出现了那种情况，即在苏俄确实存在过无产阶级专政，现在，这一专政已经被苏维埃共和国的三种力量的联盟——农民、工人和新资产阶级的联盟所代替。苏维埃政权反映的正是这种力量上的平衡，而且重心不断地从无产阶级一边移向其他阶级一边，于是，他举出新经济政策之类为例，说什么重心从无产阶级移向庄稼汉了。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不对。为什么不对？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因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被简单地混为一谈了——即社会上的联盟和政权中的联盟。我们在社会中同农民结成联盟，这就是说，我们的政权是依靠庄稼汉的，但我们的政权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它可能有官僚主义弊病等等，但它毕竟还是工人阶级专政。我们可以允许新资产阶级在我们社会中出现，允许它跟我们合作，但决不允许它接近政权。我们作为主体，作为政权，可以机动灵活地行事。我们对

待农民的态度完全不同于对待新资产阶级的态度，我们正是通过这一办法来维护在我们这个社会，在我们当前面临的条件下，在现在这个时候作为领导力量的专政的职能。

所以，同志们，大家都很清楚，事物发展的总的前景同一般形式下的战争与革命时代提供的前景完全不同。这个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是什么意思呢？从你们的提纲的观点看，这就是点燃阶级斗争。

瓦尔丁：不对。

布哈林：那又作何解释呢？如果不是这样，那又何必把这一切写成文章，推行自己分裂社会的路线呢？如果愿意的话，我将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一点。在你们的说法中，没有把资本主义国家同苏维埃国家的观点区别开来。如果你们说这指的是苏维埃国家，那么我就要说，难道对资本主义国家不也可以这样说吗？完全清楚的是，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大错特错了。

罗多夫：形式各不相同。

布哈林：形式各不相同，这是什么意思？形式各不相同这首先就意味着，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采取的是使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形式，而在苏维埃国家中则完全相反。这一点本来是应该说清楚的，这两者是迥然不同的。

我应该继续说明的是，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结论。阶级斗争在进行，但形式不同了。我又提出了一个准确的公式。对待农民采取改造农民的方针，而对待新资产阶级则采取利用，加上从一定时期起和平排挤的方针。当然，我们不号召采取暴力行动。所有这一切在我引用过的那些文章里有非常准确的表述。这一事实在你们的什么文章中有过反映吗？二者必居其一。如果你们要来决定政策，那么这一重要的说法就应该在你们的提纲中有所反映。我现在要问，有这个反映吗？我断定，没有这个反映。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呢？我们对待各阶级的一般政策也应该适用于我们的文学界，但应作很大的“修正”，因为文学界有其他领域中所没有的很重要的特点。对比一下，各不相同。专政不是消失了。一般来说，瓦尔丁的下述说法是对的：在文学界必须提出领

领导权问题，但是，恰好在这方面应该注意我提出过的在保证无产阶级领导作用条件下各阶级的结合问题。

领导权问题无疑是存在的，它甚至日益重要了，但是，我们也遇到了一系列麻烦。麻烦存在于下面一些事实中。同志们，请你们注意听我对这一基本区别的解释。不只是现在，还在很久以前，当我同“岗位派”辩论时，当我作了那个“岗位派”的许多同志们常常提到的报告时，我就提出了一个应该说明一下的理论上的想法。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怀抱中，我们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成熟起来，但决不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成熟起来的。由此出现了下述情况：当我们取得政权时，我们通过自己的斗争和直接的革命变革，我们便夺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领导权。我们已经有了这个领导权。我们是在巷战中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得这一领导权的，这一斗争已经作出总结，总结了我们的过去的组织工作的成就，政治上的磨炼和政治经验，总结了为进行胜利的革命而必备的一切特点。然而，当我们接触到艺术、科学和其他领域时，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成熟到可以独掌领导权了呢？我确信，还没有。既然我们还没有成熟，既然我们正处于虽已取得政权，却尚未成熟到可以掌握文化领导权这样一个时期，那么，同志们，完全清楚的是，我们应该提出取得这一领导权的任务。或者像我说的，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文学和文化等领域中争得社会领导的历史权力（喊声：“对！”）。

于是，从这里就产生了关于取得领导权的方法，关于不致在这方面犯错误以及关于与同路人的斗争等等问题……如果我的话确实是对的，那么，十分清楚，不应提出“岗位派”提出过的提纲，说什么把国家出版社交给我们好了，我们将把文学界整肃一番（瓦尔丁：“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你们早就采取这样的态度了，而且你们自己的全部活动和方针都有这种倾向（听众席上的喊声：“我们一直承认领导权原则。”）。你们承认的是伐普的领导权原则，不要自欺欺人了（瓦尔丁：“要拿出证据来，而我们有证明文件。”）。就这样，你们提出了这种垄断原则，尽管你们没有任何权力这样做。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应该这

样提出问题的：“请先建设，然后再领取报酬。”在这里，在目前情况下，领导权问题同政治领域中的情况不同，那么，在这方面它同政治有无一定的共同点呢？我认为有。有工人阶级及其无产阶级评论家们从社会意义的角度评价文学作品的毫无争议的 leadership。这是一开始就有的。这是我一开始就能够看到的東西，尽管我不是什么专家，对艺术形式和风格问题一窍不通。从社会革命的观点，我可以看出来并说出来，这个人黑帮分子，那个人自由主义者。一般来说，从总的情况看来，我们已经成熟到有权掌握历史领导权的程度。在这里我还是要区别对待不同的问题。各种专门性的问题，这是一回事；基本问题，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在对社会进行批判性领导的一些问题方面我们已经成熟了，与此同时，在其他问题方面我们尚未完全成熟。整个问题在于，要提出一些可以使我們成熟并取得在历史上存在下去的权力的方法。

现在，这里就出现了“同路人”的问题、非无产阶级作家问题。这里立即涉及两个问题。对他们的政治态度问题和同他们在文学上的联合问题，这是同一个问题，而第二个问题则是有关我们自身的自我教育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同时解决，因为他们是互相以某种社会关系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岗位派”的错误何在呢？首先，我们对待“同路人”的态度怎么样？第一个方面是社会评价方面。我们对待同路人的态度是由对待有关社会政治力量的总的态度决定的，与加剧阶级斗争有关。在这里我们是否应该加剧阶级斗争呢？不应该。对农民，我们必须改造他们，对明显的黑帮分子，则应彻底消灭之。对同路人应该这样——对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应该改造，而对另一部分人则应予“驱逐”。这样做对不对呢？如果这完全正确，那么，在组织上就不应像农村党支部的某些共产党员所做的那样——他们对待农民就像对待牲口一样。你们的立场就是农村党支部那些人的立场，他们由于农民未交统一的农业税，就去“压榨”近半数的农民（瓦尔丁和罗多夫：“拿出证据来。”）。当人们又喊又叫的时候，你们却说，拿出证据来，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证据可言呢？罗多夫同志，您怎么啦，还是小孩子吗？如果这样辩论下去，当然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瓦尔丁：“应该拿出证据来进行辩

论。”) (拉斯科尔尼科夫: “这不是批评问题, 而是政治问题。”)。这是批评问题, 因为批评是政治的一部分。在改造人的问题上, 应该有一定的分寸感, 但你们既没有丝毫的分寸感, 还采取了过火的策略。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我们的自我教育, 教育我们自己人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一般方针是什么呢? 应该首先指出自己的缺点。我可以这样来归纳这方面的问题。在我们的文学政策中有两大偏向: 一是共产党人自大狂, 一是丧失立场。不能说其中哪一种偏向好一些, 这两种偏向都有害。但是, 如果有时可以说我们的某些同志犯了那种可以称之为丧失立场的错误, 而且这种错误并非客观环境使然; 那么, 从另一方面来说, 我们现在很大的一个偏向是共产党人的自大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你们最近这次代表会议, 你们在会上攻击了我对杰·别德内依的文章所作的解释 (瓦尔丁: “我今后还要攻击。”)。您用这个可吓不倒我。问题的实质在于, 基本错误就在这里。所以必须同这种共产党人自大狂进行斗争。要反对这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深恶痛绝的共产党人自大狂。这是他的政策的核心。这种共产党人自大狂现在对文学界比对任何其他部门都更危险。为什么比其他部门要更危险呢? 原因很简单, 我们在这一领域中尚无自立能力。如果你们举一个我们已经取得了99%的成就的部门来比较一下, 那么我们在这一部门中什么也没有, 尽管我们吹嘘说取得了50%的成就。而在这个我们还没有什么成就, 尚无自立能力的部门中, 却出现了共产党人自大狂——这意味着, 我们从起步走的时候起便可能把事业毁掉。所以, 如果让我们选择, 让我们说, 哪一个更有害或更有利, 是那个骂我们的弟兄, 说我们还一无所有的人呢, 还是那个说你们是大地的精华的人呢? 我看, 更有害的恐怕是那个说你们是大地的精华的人。因为, 如果我骂无产阶级作家, 这绝不意味着我暗中否定他们有权发展自己, 这只不过表示: 请注意, 不要骄傲, 因为骄傲是最危险的东西。罗多夫同志, 难道不是您把几个人毁掉的吗? 难道我们不知道, 您周围的那些人和弟兄在一切方面都在沿着最普通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文丐道路进行自己的探索吗? 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可以举出一千个例子。

罗多夫：我们正同这种现象进行斗争。

布哈林：关于这个问题您还是住嘴吧。这里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

我现在谈谈与领导问题有关的组织工作和谈谈有关这一领导的界限问题。我觉得，在这方面《在岗位上》杂志的同志们把领导问题简单化了。关于领导问题，我应该说，我们暂时还不可能实行全面领导，因为我们还有一系列东西不懂，而且我们确信，在比较长的时间内我们也不可能学会这东西。我举一个别的领域的例子——新生活领域的例子。能够说我们在这方面是否否认一切领导的吗？中央监察委员会甚至曾试图逐章逐节地制定一个文件，但是，后来还是不得不把这些章节收回来了。必须原则上说，这件事是由我们领导的。但是，难道能够这样说：让政治局作个决定，规定每一个共产党员可以有几个妻子吗？扎尔金德同志曾试图这样做。他说，如果一个共产党员遗弃了妻子，就让他妻子出席支部大会，支部大会将作出决定，这个共产党员是否站稳了阶级立场。我认为他这是胡闹，这是市侩的劣根性，是多管闲事。那么，在文化领域中，我们有没有类似问题呢？肯定是有的。我说不上未来的家庭形式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男共产党员可以有几个妻子，而女共产党员可以有几个丈夫？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要党来“领导”是不可理解的。是不是原则上可以说，我们永远也不过问这个问题呢？不可以。对文学来说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我可以说，从总的方面可以决定一系列问题，党将在这方面作出必要的结论，但是，在一系列艺术的形式问题上，在形式、风格的创造等问题上不能作这样的结论。如果你们这样提出问题，如果你们说事情就是这样，那么，请允许我斗胆地由此作出结论，而结论将是下面这个样子。你们曾力求躲避的形式问题对艺术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吗？我要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我们是否应该说，我们对下述这些问题是很感兴趣的，诸如创造新风格问题、这些不同风格的共存问题、多样化的可能性或者是否有可能建立综合性的艺术形式问题？我们对这一切感兴趣还是不感兴趣呢？感兴趣。但是，我们能在在这方面提出详尽无遗的指令吗？不能。如果在这方面我们不可能由政治局直接进行领导，那么，我们将如何加强这一工作进程呢？也许你们以

为可以通过无产者的无性妊娠达到吧？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这只能在分子的运动过程中成长，我们将在这里开辟最广阔的竞赛天地（听众席上的喊声：“正确。”）。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你们在这方面就要放弃自己的所有主张。瓦尔丁同志声言，似乎在上次会议上，就在这个会议厅中我说过，政治局未给普希金下达过如何写诗的指令，因此瓦尔丁得出结论说，似乎我主张无产阶级文学也应该通过贵族文学那样的方法来培植（瓦尔丁：“不是从形式上，而是从内容上。”）。我说过，政治局未给普希金下达过任何如何写诗的指令，既然如此，请你们好好地想一想。我说过关于新的风格问题，这是个非常重要和专门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在下述情况下得到解决，即党不是把所有人都攥在一个拳头里，而是使大家有可能展开竞赛。“岗位派”的同志们，如果把权力交给你们，你们将提供一些什么可能性开展竞赛呢（听众席上的喊声：“我们是宽宏大量的。”）？如果你们先证明，你们确实能够宽宏大量地对待别人，就可以把权力交给你们，但是，要知道，你们那里明明写着，说布尔什维克的美德就在于不可以宽宏大量地待人。你们听见了关于“不可宽宏大量”的说法，但你们并不知道声音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为什么而发的（听众席上的喊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但是，文学形式问题等等——难道这不是意识形态领域吗？我承认，迄今为止我并不知道，这是属于经济基础或者生产力领域。不过，要知道，其他一切都属于意识形态领域。

我再重复一下主要意见。我想，不应煽动斗争的激情；我想，不应加剧瓦尔丁同沃隆斯基之间的阶级搏斗，在这些搏斗中沃隆斯基代表的是女性的消极一方，而瓦尔丁则代表男性的积极的另一方。然而，在不点出具体人名的情况下，我必须非常明确地指出，现在应集中注意力进行反对共产党人自大狂的斗争，在这一战线方面，我们应铁面无情。我们应在提纲中提出为竞赛开辟最广阔的天地。为什么你们认为，中央委员会一定要把自己像发针一样别在某一个团体身上呢？组织起一千个、

两千个团体吧，除莫普^①之外，能成立多少文学小组和团体就成立多少吧。你们以为，政治局必须跟在每一个文学团体身后并把它们都像别针一样别在宣传部身上吗？第一，这样一来，瓦累依斯基会因此而患精神病；第二，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我认为，党的一般路线是应该有的，这一路线在精神上大致应与我刚才讲过的话一致。至于谈到具体问题和课题，那么，这方面需要最广泛地开展竞赛。我在这里应该说，瓦尔丁同志并未站在他原来想站的岗位上，您在文艺政策方面所处的地位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经济政策方面所处的地位是一样的。我主张进行一般的领导和开展最广泛的竞赛，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我们才能解决这次会议提出的问题。

原载苏联《红色处女地》杂志1925年第4期。

王燎译自英国普瑞德克斯出版社

1979年俄文版，郑异凡校。

选自《布哈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册，
第338—352页

^① 莫普（МАПП）：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

布哈林：当代文化的基本问题

——1936年4月3日布哈林在巴黎苏联文化研究会上的报告

A. 鲁巴金博士把我的报告译成法文，安德列·马尔罗欣然同意校订译稿，在此谨表谢忱。

尼·布哈林

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正经历着一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大的世界性危机，这是整个文明的危机，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这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它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当代世界的分裂、苏联的诞生仅仅是大规模的社会改造的开始。

反映这个危机的社会生活的真实过程，出色地证实了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对所有这一切曾预言过。怎么能同意在法国知识分子中十分流行的观点呢？他们认为精神文化不取决于物质文化，认为两种文化是独立的说法，这种西方观念，是同被称之为东方观念的共产主义观念对立的。是否还需要证明，马克思主义首先是西方文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体系，直接来源于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的古典哲学。不仅如此，众所周知，最具有唯灵论特点的文化出现在印度的宗教的和哲学的观念之中，这种观念，主要是东方观念，是对感性世界的否定。然而，东方（包括中国和印度）如同西方，也

存在唯物主义倾向。希腊出了个德谟克里特，法国有一代杰出的唯物主义者——难怪德国法西斯分子认为百科全书派时代乃是人类的原罪。

没有不与唯心主义观念——可惜，尚有许多知识分子信奉这种观念——矛盾的东西，我们所经历的文化危机就是这样。有些学者和艺术家在为精神文化“担心”，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他们幼稚地认为，好像马克思主义者有意贬低这种文化的意义，低估这种文化。总之，这里说的是这种文化的起源。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过香肠的制作优于麻布，或者说德国的货币流通优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任何一个了解达尔文进化论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说过，意识现象比无机物低级。相反地，我们明确无误地强调，人和人的大脑是从较为原始的形式产生的，生物体是从无机物产生的——这与或多或少已被变形的圣经传说的崇拜者是对立的，按照圣经传说，神灵历来凌驾于物质的深渊之上。

当代文化危机的演变其过去和目前的情况如何呢？那种宣布精神生活独立于经济的命题有什么价值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应当对事实加以研究。我们来考察一下事实的意义。

作为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总危机和从苏联诞生时起发生的世界分裂决定了精神文化的危机，使精神文化朝两个方向发展。

不难理解，资本主义危机表现在什么地方，或者这种危机是怎样在意识形态体系的危机中体现出来的。

在经济领域，我们看到技术高速进步的思想危机——极力以阻碍技术发展的思想来代替技术高速进步的思想；提出“重新农业化”、回到土地上去以取代工业化方向；原先对世界市场的崇拜变成了对新的重商主义和经济孤立主义的宣传；“经济力量的自由竞赛”与“自由放任”公式被粗暴地代之以国家的严格规定的口号；经济个人主义、对个人首创精神的辩护让位于对促使垄断化和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的政权的赞美；服从“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的思想被政治强权和强制思想所取代。

这整个“意识形态活动”直接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目前阶级状

况，它直接受最近几十年来经济变化的制约。这很难理解吗？

至于政治生活，我们正面临民主自由国家的危机，这一危机是同资本主义的危机状态直接联系着的。由此产生法西斯主义，也由此产生法西斯帮会国家的整个意识形态、极权思想、帮会等级的实行、“恺撒主义”、鼓吹生活军事化、军国主义的思维，等等。

这种“意识形态活动”，同样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危机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联系在一起。这难以理解吗？

在更高的概括性的意识形态体系方面，我们正经历进化思想的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技术进步思想危机和资本家中间的悲观情绪；我们正经历“独立的个人”思想的危机，以普遍的军营思想来取代它；我们正经历整个基督教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在传播法西斯国家的“种族主义理论”、“新偶像崇拜”、“公开的兽行宣传”（奥·施宾格勒^①的“猛兽”）；我们也正经受着法律平等思想的危机，我们看到，正代之以永恒的等级制，而为了巩固等级制采纳约瑟夫·德·梅斯特尔^②、戈比诺^③、尼采甚至圣西门的思想；我们正经历“法律”危机，到处崇尚“暴力”、“威力”等等；正经历理性认识思想的危机，到处崇尚“本能”、“血的呼声”、“下意识”、“直觉”等等；我们正经历理智的危机，“唯意志论”、特殊形式的“积极化”、“弥赛亚说”、社会神话之类盛行。

使这些意识形态观念回到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上去，为当今的“精神活动”找到物质基础，难道就那么难吗？

显然，在上列每一个意识形态原理的周围都汇集了由之引申出来的许多思想和主意。但是，基本轮廓已十分清楚，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危机，看到作为资本阵线的急先锋或突击队的法西斯国家的形成，资

① 奥·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著有《西方的没落》等。

② 约瑟夫·德·梅斯特尔（Joseph de Maistre）（1753—1821）——法国政论家、政治活动家、宗教哲学家，19世纪上半期欧洲极权主义和君主政体运动的鼓吹者和思想家之一。

③ 戈比诺（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1816—1882）——法国社会学家、作家、种族主义和社会学人类种族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本是竭力通过反对工人阶级的先发制人的国内战争来维护剥削世界的；我们可以看到，危机在这里得到了其意识形态上的表现。

正是这一点，我们首先要较为详细地考察一番，然后才能去谈人本身的问题，说明社会主义文明为这一问题提供的解答。

一、怎样摆脱危机、战争和剥削

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物质基础是使社会生产力从束缚它的羁绊中解放出来，也就是摆脱必然伴有危机、战争和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法西斯主义也确信它能克服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并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建立新社会的问题，照法西斯制度拥护者的说法，法西斯制度已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某种特殊的、独立的社会，某种第三种社会形态，并且是更高级的社会形态。

法西斯主义在经济方面提出些什么呢？

首先，它把基本生产资料留归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掌握，如同把武装力量留归前大本营一样。没有一个法西斯国家破坏私有制原则，在那里，私有制还被看作是一种社会职能（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攻击的只是信贷资本，而将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柱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法西斯主义对农业特别优待（也就是说对“大地主”^①、大土地所有者、富裕农民特别优待），把维护“地产”（des Badens）看作是维护最保守的原则；宣传阶级间的中世纪的宗法关系，以便按照中世纪的方式确认以“帮会”或“职业”形式出现的阶级的存在。不过，法西斯主义改换了这些阶级的“招牌”，把资产阶级称作“工业的管理员”，把工人叫做“人民同志”（Volksgenossen）。法西斯主义认为，只要赞美“光荣劳动”和“忠于领导人”，就可以用语言的魔法去“消除”阶级间的现实矛盾。

在所有法西斯国家，以及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与群众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这是危机最深刻的原因——完全保存着。国家的经济

^① “大地主”（“лендлорды”），指的是出租土地给大农场主的大地主。

孤立主义决不意味着“自我孤立”，而是为扩张的目的而加紧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组织。经济孤立主义原则来源于“战略的、民族的，最后是经济的”原则（桑巴特^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法西斯国家的“总体经济”与社会国家的提法是同“总体战”的思想是一致的。整个经济被用来为超经济目的服务。这种经济成了奈马尔克^②所说的“目标经济学”（мета-экономика）。当法西斯主义魁首给人们以“和平”许诺时（这种许诺只是骗人的），所有实际措施都服从于诸如鲁登道夫将军的“总体战”^③理论，鲁登道夫断定，“和平总的来说只是一种特殊的状态，仅仅作为‘总体战’的准备才具有一定的意义（Daseinsteht）”（鲁登道夫：《总体战》）。

这样，法西斯主义完全没有触动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根本毛病：私有制、剥削、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危机和战争。不仅如此，它还大大加剧了其中的某些矛盾。伴随它对群众所作的个别让步的是名副其实地消灭其先锋队，使与军国主义有关的一切得到无限扩大。因此，法西斯主义以略加刷新的形式复活了“社会君主制”的旧的反动梦想，即叫做“警察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看到的是垄断资本主义封建化一类的东西，杰克·伦敦^④笔下的“铁蹄”统治。法西斯魁首们模仿至圣的罗马君主，企图建立自己的禁卫军，以借助于下等社会阶层来挽救现代奴隶主的统治。要知道，尤利乌斯·恺撒就是卡提利纳阴谋^⑤的参加者。但是，我们今天的无产阶级，既不是古代世界的平民，也不是那时的奴隶。现在根本谈不上长期地回到罗马帝王的辉煌时代，甚至也谈不上回

① W. 桑巴特（Warner Sombart）（1863—1941）——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新康德主义哲学家。

② A. 奈马尔克（Alfred Neymarck）（1848—1921）——法国统计学家。

③ E. 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1937）——德国陆军上将。“总体战”观念就是由他于1935年最先提出的，成了法西斯军事学说的基础。

④ 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76—1916）——美国作家，著有《铁蹄》（1908）长篇小说等。

⑤ 卡提利纳（Catilina）（公元前约108—前62）——古罗马大法官，曾任非洲总督，公元前66年和公元前64年两度竞选执政官，皆失败，遂以废除债务为诱饵拉拢一批不满者阴谋发动武装暴动，被当时罗马执政官西塞罗揭穿而未能成功。卡提利纳本人于公元前62年阵亡，大法官之职由恺撒担任。

到其衰落时期。何况，一方面法西斯主义的外交官们在其讲演中提出“德意志和平”的口号，同时却尽其所能促使毁灭一切的战争灾难时刻尽快来临。

因此，现在是以人类文化的存在本身来押宝。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是挽救这种文化，应当使之摆脱危机、战争、剥削和枷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用这种枷锁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束缚文化本身的发展。

我们来从头研究一下，社会主义文明准备用什么办法使人摆脱生活的机械化。

二、生活的非机械化问题

生活的非机械化是现代文化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资本主义在生产中实行机械化和合理化，使大量的人变成了“单个零件的制造者”，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马克思）；资本主义使生产过程变得死气沉沉，完全丧失人性，使之丧失任何“创造的乐趣”；它使开机器的活人依附于死的机器。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更加强了这种趋势，使之成为普遍的趋势——在技术上采用生产线，把全部作业分解得很细，但仍维持原先的工作时间。生产线的使用、垄断资本主义建立的官僚组织的巨大发展、资本的非人格化形式、职员大军的建立、物对工作者的普遍统治，所有这一切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变形，他们被迫过着极其可怜的生活，这种生活是按照节拍进行、经过仔细计算的，既没有主动性，也没有创造性，人与人们的差异只在于其编号的不同。这种趋势随着资本主义的衰落而加剧。自从资本主义的垄断形式和危机转变成类似自动机制时起，资本主义就开始衰落了，这些变化也使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失去创造的刺激因素。反对这种日益机械化的，既有想通过社会主义来解决生活机械化问题的工人阶级，也有“唯

美主义”知识分子（约翰·拉斯金^①）、画家（高更^②），甚至有颓废派哲学家、统治阶级出身的诸如公开鼓吹抛弃技术的施宾格勒以及凯泽林^③。

根据这些意向，就可以得出多少经过伪装的反技术结论，这正是法西斯主义所欣赏的。但是，不应忘记，反法西斯主义一方面号召回到土地上去，回到更简单、更原始的生活方式中去，甚至回到手工业方式去，另一方面却又支持技术治国倾向，要求保证新技术拥有相应的领导干部，因此鼓吹空想的“可控制的资本主义”。

那么，法西斯主义真正提供的是什么呢？它真正建立的是战争型的机械化生活体制。这种体制的最新成就是种族主义的婚姻条例、绝育的实践等等，在这里机械的条例侵入了人们生活的最隐秘的部分。

社会主义正在解决生活的非机械化问题，同时加强生产的机械化。如果弄清了使用机器的反资本主义性质，那就容易理解这种所谓的怪论。现在在苏联，机器已能大大缩短工作日。机器不是作为资本的一种物质力量参加我们的生产，而是起人手中的工具的作用，是人用以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在这里是人统治物，而不是物统治人。机器与劳动是分开的，是听命于人的，人在自觉地管理统一的操作过程。在这里，所有细小工序都有其意义和重要作用。工作的人自己创造其空闲时间，自己提高生活水平，他自己发明，自己创造，他很清楚个人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的意义与重要性。他第一次由劳动的客体变成劳动的主体，他恢复了自“我”，战胜了整体的“我们”。

在农业中，社会主义机械化的革命性作用尤其大。在这里，机器使人摆脱了野蛮的宗法制度，摆脱了对自然力的奴隶式的服从；使人摆脱了“农村生活的愚昧”，为在历史上第一次文化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

① 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艺术理论家、艺术派画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② P. 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接近象征派与“现代派”的风格，有《浅滩》、《啊，你妒嫉吗？》等作品。

③ H. A. 凯泽林（Hemman Alexander Keyserling）（1880—1946）——德国社会哲学家。他的思想曾在一战后甚为流行，其研究方法是非学院式的，著有《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日记》等。

件。法西斯主义使人变成机器，社会主义使机器人性化。法西斯主义企图用回到土地上去的中世纪的办法医治“过度的机械化”；社会主义则相反，它到处在使生产机械化，使生存的经济基础机械化。社会主义以此使人变成了不依赖于自然力的较为独立的人，为建立真正的自由王国创造了前提。

三、新人的培育

现在我们来看看，苏联文化打算以何种方式来培育真正的完整的人的问题。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劳动分工在阶级对抗基础上达到极限的社会。

换句话说，在这种社会中，作为人就本质而言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有一定阶级、一定职业的人，因而是一定的生理和心理类型的人，同生命的全部表现有一定的关系的人。这种社会典型的的东西，不是生产的专业化，不是独立出来的职能的多样化，不是机器与劳动工具的极端专业化，也不是生产的具体形式，而是这样一种事实，即这些独立的职能实际上被永远固定在一定的人身上。

此外，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方面，我们发现缺乏统一性——目的的统一性与方法的统一性。阶级，城市与乡村，职业与专业，这就是资本主义实现其实际的历史运动的诸范畴。这种情况需以形成对立的两极为前提：一极是指挥的职能，另一极是执行的劳动；大都市主义的神经衰弱和农村的野蛮落后；没有智力劳动的体力劳动和没有体力劳动的智力劳动，等等。我们看到活生生的人为无数人格化的职务所取代，并达到庞大的规模。在这里人是不存在的，他从内部被分成各个部分，每一部分又在常常是非常狭隘的孤立的环境中过着孤立的生活。

阶级的划分是人们离群索居生活的基本形式，这种形式具有深刻的对抗性，充满着利益上、生活经验上和完全对立的世界观上的差异。唯心主义宣布智力活动是离单调的物质生活而独立存在的；与此相反，我们认为，思维形式本身及其基本品格总是相应的社会环境的一种职能。

甚至像马克斯·舍勒^①一类的哲学家们也不得不承认思维社会学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众所周知，舍勒在其《认识的形式和社会》（*Die Wissensformen und die Gesellschaft*）一书中，考察了概括性思维的形式因素与社会阶级状况中的差异之间的依存性。所以，很明显，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在最本质的意识形态的公式中观察到社会的分散性。

把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开的深深的鸿沟，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有阶级划分的所有社会形态，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都始终存在的。从这一观点来看，那些实质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被称之为智力劳动者的只是其很小的一部分。看看这一现象在哲学中的反映是很有意思的。在绝大多数哲学体系中，“主体”、“我”的概念没有运用到作为人的人及其丰富多彩的活动，更少运用到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社会集团的人，没有这样做，仅仅涉及人生存中智力和静观方面的干巴巴的抽象的东西；人的“活动”是被动的；如果人进行“创造”，那么他制造的只是抽象的幻想和幻想的抽象。马克思用“思维的主体”的说法给予这种抽象以毁灭性的批评。劳动的极端分工也反映在科学中，在科学中，狭隘的专业化把科学本身分割得支离破碎；在艺术领域，它起了破坏性的作用。艺术已走进了死胡同，这种死胡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活经验的日益狭窄造成的，随着生活变得狭窄、贫乏，艺术失去了自己的内容，出现了对“纯形式”的探寻，一些特殊成分被当作本质的东西。到了这种地步，艺术也就完了，因为它已陷入了自己吃自己的境地。例如，绘画因主张审美的“纯粹原则”而走进了死胡同，不得不去突破这条界限；建筑学努力追求最简单的几何造型；而雕塑走进了表现主义的死胡同。本应全面反映丰富多彩生活的伟大艺术衰落了，正如人在资本压迫下衰落了一样。这样，社会形态学在精神文化形态学中得到了相应的反映。

但是，法西斯主义提出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大问题呢？它提出的“总体”是国家的总体——这种国家拥有无限权力，统管一切，把人的

^① 舍勒（Scheler）（1874—1928）——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价值哲学、意识社会学、哲学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著有《关于人类的永生》、《同情的本质和形式》等。

裂变固定下来并使这种裂变发展到骇人听闻的程度。

那么，法西斯主义做了些什么呢？

它保存私有制，它以帮会的形式使阶级永世长存，它的原则就是称之为“精英”的等级。法西斯主义强迫回到中世纪的生活原则中去，即等级社会中去。根据种族主义的社会组织理论，无产阶级被鄙视为下等的、粗俗的阶层，而精英则是上层人士，社会的高贵机体；在民族成分中，在“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中，阶级被固定下来，而阶级又在变成等级。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和组织者（从施宾格勒、秦梯利^①、施幡^②、帕雷托^③，直到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荒木贞夫^④）公开承认“贵族原则”，宣称这是自然规律。

需要一劳永逸地准确说明，这里指的不是捍卫幼稚的纯理性主义的人与人的平等观。马克思主义从来只把平等看作是在消灭社会阶级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条件上的平等。不言而喻，从来也不会有才能、天赋、美貌等的平等，而这是个好现象。

但是，法西斯主义在国民教育事业中也搞阶级、剥削、垄断，并借助于新名词来掩饰这种做法。法西斯主义采用“极权”方法，以培养武士精神，愚弄被列入下等范畴的劳动群众。毫不奇怪，法西斯主义宣布自己是尼采的信奉者，用特勒耳奇^⑤的贴切说法来说，尼采竭力“使

① G. 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1875—1944）——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唯心主义哲学家、新里格尔主义者。他建立了所谓行动主义的体系，认为只有行动思维才是唯一的实在；主张个人应该“完全”服从国家。

② O. 施幡（Othmar Spann）（1878—1950）——奥地利唯心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西斯主义思想家。他发展了哲学和社会学中的“普遍主义”理论，其核心是被解释为初始现实的整体性。

③ V. 帕雷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功能主义创始人。试图用数学方法论证一切经济因素（包括价格）的相互依赖关系，提出“社会精华”更替的概念，认为社会进程的基础是创始力及社会精华争取权力的斗争。

④ 荒木贞夫（1877—1966）——20世纪20—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家法西斯化的主要头目及思想家之一。1931—1934年任陆相，1938—1939年任文相。1948年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5年获释。

⑤ E. 特勒耳奇（Ernst Troeltsch）（1865—1923）——德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著有《历史主义及其问题》（1922）、《历史主义及其胜利》（1924）、《基督教会和团体的社会学说》（1912）等书。

浪漫主义残忍化，而使犬儒主义浪漫化”。法西斯主义将“帮会国家”当作一种政治制度，企图用虚饰和中世纪帮会的文章来掩饰资本统治的加强。诚然，法西斯主义企图消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中，它用直接贬低理论的意义做到这一点，但在理论上它又贬低思维工作的意义；至于实践，法西斯主义把它变成机械性的练兵方法，把这种方法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这种恺撒式的和御用军式的努力丝毫也没有减弱变成等级、职业的阶级的保存与加强，简而言之，没有减弱所有使人裂变的一切。

社会主义则正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在其不断发展中，在其向共产主义演变的时候，并不能满足于废除阶级，社会主义还要消灭城市与乡村、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矛盾；它要消除作为统一整体的劳动分裂的现象；社会主义要建立统一的社会，消灭国家，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在逐渐消失，它在事实上培养完整的人。

直接仔细考察一下苏联新人正在不断形成的过程是很有意思的，其物质基础就是可控制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其本身，包括它的总和及组成部分是各种不同因素的综合，这包括技术、经济、科学和战略以及所有在社会生活中起某种作用的因素。因此，劳动的分解与专业化在这里必然补之以各种不同因素的综合。这样就形成了无所不包的一元化的趋势，这种趋势的精神体现就是历史过程中的所谓 Logos^①，其动力和推动力则是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苏联的目前发展阶段，还不能消除劳动分工，如果在实践上全面提出这种问题，那是荒谬绝伦的。各种种类的劳动，现在的文化素养和技术素质还不够高，工艺过程的自动化程度还不够发达，劳动生产率还增长得不够，现在还不能做到每个人都能顺利地从事各种工作的劳动。但是，现在实际上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鸿沟已经消除，由于采用社会主义的机械化劳动及其具有计划调节的性质，农村大大地接近城市了，现在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统一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的百分比在不断增长，由此产生的群众与知

① 拉丁语：理性。

识分子之间的差异也在逐渐消除；可控制的经济本身正在各级经济管理岗位上把实践与理论、思想与行动、技能与意志结合起来，因为计划是核算的产物，是思想的综合，同时也是应该实施的准则。苏维埃的等级制摒弃了与群众格格不入的东西，因而具有其历史意义，作为一种过渡现象是有道理的。苏联的反对者断言，似乎我国正在产生新的阶级，这是不值一驳的，苏联整个社会发展所特有的基本过程，是越来越多的新的人民阶层不断增长的充分参加文化生活的过程。在这里，任何一个阶级都不能垄断文化。群众与知识分子的界限在日益消失——这一事实驳斥了帕雷托提出的精英轮回理论，帕雷托认为，阶级统治在不断更新。

这样，在历史上首次形成了完整的人，人的需要和活动范围在其发展中达到了极度的多样化。只有社会主义文明才能着手解决，也只有它才有能力解决这个宏伟的历史任务。

四、人类的再生

人类的再生也是文化领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人类的统一问题、历史的普遍性问题等等其本身就已非常有意思。在这里应当指出，现在好多人赞成人种——生物种类（*homo sapiens*^①）产生的多中心论。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认为，那种认为资本主义以前时期人类就已形成一个整体的世界历史观念是不对的。这种观念常常被列入“不断进步”的理论，被称之为“历史哲学”的东西就是立足于这一理论的。但是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因为那时即使是几个大的社会群体之间也没有任何接触（例如克尔特人与印加人之间、斯拉夫人与玛雅文明之间、贵霜人与墨西哥人之间、诺曼人与澳洲人之间，等等）。这种观念之所以不对，还因为某些“文明世界”相互之间的接触是偶然的、非常特殊的、不经常的、不频繁的，如果一般说来存在这种接触的话。最后，这个观念早就是错误的，因为，就像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所指出的，与进步要求相反，经常出现倒退现象、倒退的运动，

① 拉丁语：人类。

伟大的文明世界消失了，几乎没有留下痕迹。

另一方面，也应当坚决抛弃孤立的“形态学”社会理论，互无联系的毫无共同之处的社会机体按照形态特征联合的理论，这种形态特征顺从注定的法则，按照生命的道路从小到大，直至死亡。发展这种理论的是施宾格勒及其追随者。顺便指出，这种理论的完整形式是由俄国保守的斯拉夫主义理论家丹尼列夫斯基^①提出的，他对另一个沙皇制度的辩护士和正统派分子——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②有很大的影响。这种理论的逻辑环节存在有上百年之久，但这种理论在各方面都是错误的。它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的理论基础是有缺陷的——这是生物类比法，它把生物规律用于具有特殊质的特点的特殊的社会现象；它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只注意特殊性，而没有看到由同一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共同性；它之所以错误，还因为——最后一点，但并非不重要的一点——这种理论是与事实相矛盾的，多数场合下并不存在施宾格勒所说的那种隔绝，比较语言学、对文学的分析、对“世界宗教”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十分出色的证据。

人类的相对统一性，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形成世界市场之后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只有在国与国之间的物质联系和经济联系不再是偶然的、世界性的贸易交换引起密切的文化接触、真正世界性的思想交流建立之后，才有可能。

但是，如我们所指出过的，这种统一是极其相对的，这不仅是由于存在阶级的划分，而且还由于国与国之间是敌对的。我们看到，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现代战争——这是笼罩在现代文化头上的最可怕的威胁。

① 尼·雅·丹尼列夫斯基（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Данилевский）（1822—1885）——俄国政论家和社会学家、泛斯拉夫主义思想家。他在《俄国与欧洲》（1869年）一书中提出一种像生物机体那样发展的各自独立的“文化历史类型”（文明）的理论，认为斯拉夫类型是崭新的类型，其思想是为沙皇大国沙文主义进行辩护的。他的政治经济评论见诸《丹尼列夫斯基政治经济文集》（1890年）中。

② 柯·尼·列昂季耶夫（Коста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Леонтьев）（1831—1891）——俄国政论家、作家、文学批评家、后期斯拉夫派。他认为主要危险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因为它会使生活“小市民化”；宣扬“拜占庭主义”（宗教、君主专制、等级制度等）和俄国同东方各国结盟。

法西斯主义为解决这个问题做了些什么呢？

它没有提出任何多少经过仔细研究的作为人类统一的“总体性”理论；相反地，它在这里的实践是最大限度地激化矛盾（鲁登道夫的“总体战”）。至于理论论证，靠的是“种族理论”，现在还在利用戈比诺、张伯伦^①和瑞典教授茹·切连^②的著作中得到大肆宣扬的这一理论。

我再重复一遍，我们并不持幼稚的种族“自然”平等论（就像个体平等论一样），也不把权利平等概念同性格与真正的属性的拉平混为一谈。种族主义理论的最严重错误就在于它缺乏历史根据。文化水平和由这一或那一民族（甚至这一或那一种族）创造的文化珍品的总量，决不是由稳定的生物特征（头发的颜色、颅骨形状、脸形，等等）决定的，甚至也不是由这些特征的总和来决定的，而是由物质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决定的。

正因为如此，各民族与种族间在文化领域的相互作用才有可能。最古老的文明似乎是黑人的文明，根据苏联学者瓦维洛夫^③的考察，最古老的小麦栽培不是在大河两岸找到的，而是在埃塞俄比亚的山区高原上找到的。弗罗贝尼乌斯^④的著作《未知的非洲》同样谈到发达的黑人文明。伟大的中国文明是日本整个文明的基础，尽管现在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们认为中国人是下等种族。

心理属性的特点也同样如此，它们首先是社会和历史关系的功能，而非头发颜色的功能（我们眼中的“诗人、哲学家的民族”在变成“士兵的民族”）。这并不妨碍种族主义理论断定，在生物学与历史学之

① H. S. 张伯伦 (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 (1855—1927) ——英裔德国人，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种族主义社会学家，法西斯思想的主要先驱之一。

② R. 切连 (Rudolf Kjellen) (1864—1922) ——瑞典政治学家，曾在哥斯堡大学、乌普萨拉大学任政治学教授，其思想在德国流行很广。著有《政治学》、《政治体系大纲》、《国家组织是生命的一种形式》等著作。

③ 伊·尼·瓦维洛夫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Вавилов) (1887—1943) ——苏联生物学家，现代选种生物原理学说和栽培植物发源中心学说的奠基人，苏联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和第一任院长，乌克兰科学院院士。他曾组织了对地中海沿岸地区、北非、北美洲和南美洲各国的植物和农业考察，查明这些国家境内栽培植物形态形成的古代发源地。

④ L. 弗罗贝尼乌斯 (Leo Frobenius) (1873—1938) ——德国民族学家，曾研究非洲各民族的文化，提出文化是独立的社会有机体理论。

间存在完全平行的现象，力图使现存种族间的不平等现象永世长存，硬说这种不平等是固定不变的生物学形成的。很明显，按照这种解释，种族特点与某一种族文明特点的具体结合的选定和组合将取决于某民族的法西斯主义的利益。

这种理论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在优生学上是有害的（例如比较一下“北方型”的范·德·柳贝和非洲人后代的伟大的俄罗斯民族诗人普希金），从政治观点来说是有罪的。这种理论是战争和暴力的真正思想根源，因为它宣布，征服政策对“统治民族”来说是完全正常的，在“统治民族”面前，所有其他民族只不过是奴隶而已。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人类的再生。社会主义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抽象的思想。这是保护人种、保存人的真正历史的必要的客观条件——与人的真正历史相比，以前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史前史而已：世界经济的生产力已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超越了相互竞争的孤立的国家体系。从文化的观点来说，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再生体现着文化的世界性综合趋势。独特的地中海文化传统可获得印度和中国的丰富遗产，思想的传播将异常迅速。

在苏联形成的良好的民族关系是未来世界联系的萌芽。苏联的经验从实践上证明了各族人民生活的这种伟大改造是可能的和富有成效的，这种改造将以推广到全世界而告终。

五、社会与个体（个人）问题

知识分子特别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社会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对这个如此一般，如此抽象地提出的问题，可以通过对不同社会结构所作的历史分析给予回答。由于这些社会结构如同个人自身一样，其相互间的差异是很大的，因此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内在机制也是各种各样的。

现在，资本主义在分割劳动的个人，像我们前面指出过的，把个人变成“零件的制造者”，变成号码，无产者的个人不断受到压制，无论是在生产过程中、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作为一个公民的生活中都是如此

(必须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中,无产阶级享有形式上的权利,但没有达到基本生活目标的实际可能性)。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及其“技术性失业”等等,更加缩小了无产者个人发展的余地。资产者个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用桑巴特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精神”——敢做敢为、进取、首创性、随机应变的绝对自由、买卖自由、个人经营的自由和巨大的推动力,所有这些“经济人”的本质被股票社会、托拉斯、财团、国家资本主义组织、国家垄断、官僚政治及规章条例所排挤——这就是使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受到压制、遭到破产的体制。

知识分子的代表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流派,其中很大一部分投到了技术治国论和法西斯主义的一边,自由职业者中的许多思想家宁可或者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或者去维护自由主义的旧堡垒。法西斯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把反个人主义倾向捧上了天,它把万能的“总体国家”置于一切组织之上,这个国家除领袖们和“最高元首”(Oberführer)外,使所有的人都丧失个性。在这里,群众丧失个性是同对“领袖”的颂扬成正比的。墨索里尼在《言论集》中发挥了一种思想,认为没有任何不受国家支配的有价值的东西——有物质价值或精神价值的东西。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之一迪特里希宣称:“现实的有生命的东西……这不是个人,而是种族、民族、国家。”由这个论点还得出一个论断,即“新观念”是由“唯一的、举世无双的创造性天才”发明的。这样,绝大多数人就变成了简单的执行者,服从强加于生产、日常生活、家庭、生理、思想等等生活的一切领域的统一纪律,服从国家用惩罚手段来维持的纪律。道德的根本标准只有三个:忠于“民族”或“国家”、“忠于领袖”和大兵精神。墨索里尼把这三种美德提到神话或宗教的高度(《言论集》),希特勒和荒木贞夫则大谈上帝的旨意,这就完全恢复了马克斯·韦伯^①所创立的古埃及神权政治的模式。

法西斯主义的个人与社会的全部观念,其理论上的软弱无力表现在什么方面呢?首先必须指出,认为只有共同体(如民族、种族,等等)

^①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著有《古代世界农业史》、《新教徒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经济和社会》等书。

而不是个体才是唯一存在的现实的说法是荒谬的。这种肤浅的反辩证法的对立只适用于那些发明了这种对立的人。孤立的个体——这是一种真正的幻想——是18世纪理论观念的产物，是一种“原子”，像物理学上的“原子”，“自在的原子”，它在同其他原子的物理的相互作用下组成社会。这种物理数学的和纯理性主义的观点是完全经不起批评的，它曾遭到马克思的彻底批判。完全确定的现实存在的是社会的人，“社会和历史”的人，是完完全全的社会的个人。这是曾使亚里士多德称之为“zoon politikon”的人，即社会的动物。法西斯主义在其理论中可以说是抹去了孤立的人及群氓中的人，因为它只重视那些“创造文化的社会阶层”、“精英”、“贵族”，他们形成一种封闭的等级，犹如埃及的祭司和印度的婆罗门。

别尔嘉耶夫^①先生是一个现代基督教理论家，不久以前还非常接近法西斯主义，宣扬“不平等的哲学”，认真地把苏联说成是“魔鬼制”国家，他建立了一整套的理论，从个人的观点来观察现代社会，将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别尔嘉耶夫认为，法西斯主义的“总体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两个作用相同的列维坦^②，活的个人成了它们的牺牲品。别尔嘉耶夫先生反对整个庞大的组织体系，照他的看法，这些庞大的组织吞没了人的个性；挽救人的个性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人的自我完善和建立基督教的人的共同体。

在别尔嘉耶夫先生的论证中，除了赫·斯宾塞^③在其反对社会主义（他将社会主义看成是未来的奴隶制）的斗争中早就提出过的结论外，不是实质上，而纯粹是从表面上来看待整个问题的。

这个问题的深刻提法只能从个人本身的内容、其内在生活职能的贫

① 尼·亚·别尔嘉耶夫（1874—1948）——俄国宗教神秘主义哲学家。试图把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同新康德主义结合起来，后来又从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寻神说，转向按宗教生存主义和人格主义来解释的个性哲学和自由哲学，转向基督教的末世论。1922年被驱逐出境，有历史哲学、创造哲学、社会哲学方面的著作。

② 圣经中的巨大的怪兽。

③ H.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论创始人之一，社会学中的有机学派奠基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家。著有《综合哲学》、《心理学原理》、《社会学原理》等。

乏性或丰富性、多样性或单一性出发，也就是从人的“个性”或“个人共同体”的内在内容的观点出发。

如果从这个方面提问题，那么很明显，一切都将取决于集体的性质，取决于它的结构，取决于它的形态，取决于它发展的内在规律。不能提出“一般组织”问题，更不能像别尔嘉耶夫先生那样断定，个人的、人的特性同任何客观性之间存在原则差异，这种客观性就其本质而言，是“非个体的和非人性的”。这样的思想倾向只会使本应证明这一思想的论证变得荒谬绝伦。它只会导致存在孤立的人、不掌握语言（因为语言只存在于社会之中）、没有创造任何文化的野蛮人的结论。但是，歌德（尽管鲁登道夫夫人现在把他叫作共济会会员、世界主义者，甚至叫作杀害席勒的直接凶手——什么都叫上了！）早就认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紧密团结的极大重要性。歌德在给席勒的信中写道：“自然界之所以难以捉摸，是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了解它，只有整个人类才能了解它，但是由于这个可爱的人类从来没有结成整体（beisammen），才使自然界能成功地同我们捉迷藏。”^①

这样，保证最大限度地战胜自然界（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集体，正在增加群众的理论经验和实践经验，扩大群众物质的和精神的需求，丰富其精神和情感生活，为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创造和成功地发展完整的个人。这样的集体是最高积极成就。

社会主义不仅不与个人发展相矛盾，而且相反地，从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起它就成为个人发展的必要前提。个人的发展、个性的发展，这决不是扩大个人主义，我们在个人主义中看到某种把人们分开并使之互相对立的东西。我们所追求的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当然，“一般个人”这个概念本身只有在阶级矛盾消失时才能成为历史合理的概念。无产阶级的敌人中的个人毫无疑问要经受考验，感受到无产阶级国家的整个“压力”。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绝大多数的苏联人正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沿着进步的道路前进。在西伯

^① 歌德的引文根据尼·布哈林的《歌德及其历史意义》一文译出，此文载《论文集》一书，莫斯科—列宁格勒1932年版，第158页。

利亚、中亚、高加索、远东和极北地区等等原俄罗斯移民区，在农民中可以看到人的个性的普遍觉醒和解放。所有的人都得到发展，但这不是群氓，而是多种多样的有各种差异的复杂的整体。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也出现了个人同样迅速发展和精神生活同样丰富的现象。

法西斯主义的卫道士把自己的“等级制”吹捧为多样性的体现。最反动的俄国教授之一康斯坦丁·列昂季耶夫曾经抱怨圣彼得堡准备拆除破旧房子、禁止穿俄罗斯衬衫等等，从而消灭五彩缤纷的生活色调。但是，生活的多样性并不总是表现为一模一样。圣奥古斯丁也说过，存在恶是为了强调善。但是，社会主义不想要这样的多样性，也不去赞美恶，社会主义建立另一种生活的多样性。社会主义制度不存在阶级的“多样性”，贫富的反差、危机与繁荣的交替、频繁战争，等等，然而，它创造有完整价值的人的多样性。在这方面，我们来回忆一下傅立叶的天才思想是很有好处的，他提出了人的情感、爱好、志趣、向往、能力和才干的多样性这个大问题，尽管他的思想是空想的。我们在苏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和我国群众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中可以看到这种多样性的鲜明体现。不仅如此，我们有充分的信心相信会出现一个已实现了的共产主义的社会，那时社会将不再承受同资本主义及其一切后果作斗争的重担。

六、自由问题

为了理解同社会现象有关的任何意识形态或口号的真正内涵，必须了解其作用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何在。这是避免废话和盲目崇拜的唯一方法。这特别适用于自由的概念，因为正是在这里，在对待变成真正“自在之物”的、根深蒂固的概念上的盲目崇拜尤为厉害。

既然自由这个概念是在阶级分立的社会中产生的，我们就必须首先明确问题本身，以便准确地知道这里说的是什么：自由——给谁的（给哪些阶级或集团）和反对谁的；自由——在社会生活的哪个领域或哪些领域里；最后，从自由的社会意义的观点，即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自由的这种或那种形式。

具有民主形式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前提是工人阶级享有形式上的自由，但完全缺乏自由的物质基础，因而是有限的自由。这也就是社会关系基础本身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从形式上说，所有的社会阶级都享有所有权。然而资本主义所有制（垄断资产阶级所拥有的）的存在是决定要对这种所有制形式从法律上予以保护的基础。

理论上存在资本家与工人间的“自由契约”，他们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但是实际上，由于经济所迫，工人不得不同意这种“不利的”契约。

理论上工人拥有上大学的权利，但实际上，工人无法这样做。如此等等。

在政治领域，同样在理论上说，形式上是平等的，但是经济体制和国家结构及其特殊机制只保证资产阶级掌握实际权力，虽然让社会下层享受“民主自由”，如言论自由，出版、工会和集会等等自由。单个工人不能自由获得工作，失业者同样不能自由获得工作，工人没有领导、管理国家的自由；工人也不能自由获得教育，不能自由地了解最重要的文化珍品。但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这种矛盾对资产阶级来说是不存在的，资产阶级拥有法律规定的和没有规定的享受自由的一切物质保障。

法西斯主义消灭一切民主自由，它只把自由给予它自己的“唯一的政党”和支持该党的组织。作为阶级社会的一种现象，法西斯主义只不过是危机时期所固有的垄断资本专政的特殊形式。社会下层（不属于贵族等级的）在生产过程中完全处于服从的地位，他们所遭受的剥削也没有减轻；此外，他们不再拥有民主自由——无论是罢工自由，还是思想自由。他们既没有反对资本家的自由，也没有反对资本家的国家的自由。在现实生活中，所有这些限制可能是不明显的。只要群众还不明白法西斯主义（它的党和国家）的终极目的对他们是一种危害，阶级调和的幻想由于非常具体的历史原因会成为一种十分现实的力量。但这些都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的这种新形式的客观涵义：这就是给资本主义精英以自由，同时对群众进行全面的奴役，并有组织地从肉体上消灭其革命先锋队。

无产阶级专政公开宣布给社会下等阶层以自由，反对给反革命以自由，因为在决战关头问题在于粉碎敌人，也正是这种现实决定了整个行动路线。由此出现了“自由的专横”，这个问题早在法国革命时期就提出来了。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专政从一开始就是无产阶级民主，这种民主从物质上保证了千百万人的全部自由，也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他们的灵活性。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使无产阶级的特权成了不需要的东西，从此开始了苏维埃民主发展的新阶段。

如果仔细看一下民主的基本要素，那么可以说，只有苏联才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这些要素，是完完全全的实现，而不是虚构或文学上的杜撰。我们第一次看到人民是如何形成的（因为阶级已不再存在），也就可以第一次来谈论人民的意志（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民意志是虚假的：狼和羔羊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也可以第一次谈论人民主权（因为在资产阶级国家中，这只不过是金融寡头主权的化名而已）。消灭阶级不是在口头上和虚构中进行的，就像在法西斯制度下所做的那样，而是在事实上，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进行的，同时还要进行技术和经济的改造，以及大规模的教育工作。在苏联，每一个单个的劳动者，众多的集体组织，每日每时都感觉到其个人的影响和集体的影响在增长，他们的物质力量、技术力量和文化力量在增长。苏联的道德和生活激情也就表现在这里。而这不是文学（在这个词的坏的含义上），也不是列宁所说的政治闲话，这是一项有千百万人参加的建立其自身生活的巨大的创造性工作。这是一种发展的伟大自由，这种自由是由许多自由组成的，包括在劳动中、日常生活中、国家机构中、城市中、农村中、家庭中、民族关系中、学校中的自由，简言之，无所不在的自由。党和国家的目的，从客观和主观的观点来看，都是与群众的利益发展相一致的。在苏联还存在某些社会主义的敌人，其切身利益是与群众的利益背道而驰的，被群众看作是最大自由的东西，他们却看作是完全缺乏自由。但他们所说的，只能证明断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

自由问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社会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

一个有组织的合理的经济，消除了经济发展中的不合理和自发的成分，这是自由发展中的一个新的进步阶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这样表述了这一思想及未来运用这种思想的前景，他说：“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之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①

随着共产主义的胜利，工作日将缩短到最低限度，国家将消亡，强制的外部形式将消灭，这时表现在各个方面的普遍的自由王国就会到来。

七、进步问题

但是能不能说，我们所说的全部问题的出发点是关于进步可能性的错误观念，是一种对想象中的不断完善的幼稚信念呢？

在资产阶级的上升阶段，人们把进步理论视为思想宝库，视为基本的绝对真理，而现在却完全否定这种理论。这种理论被施宾格勒的循环论所取代，他的前驱中（要审慎得多）有维柯：关于独立形成的、形态不同的各有组织社会的青年时代、成熟时代和必然衰落时代的理论。社会的发展及其衰落——这是它们的命运。它们不能引入同一序列，因为它们有质的不同，它们只是生活形式的不同类型，它们连续不断地更替构成了历史的洪流。

我们已经指出，不断进步这种幼稚的乐观理论是经不起批评的：伟大的文明消失了，多次出现衰落和停滞的时期。但也不能由此作出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

论，认为不存在进步发展的时代，在我们前面什么也没有；也不能说，火葬场已向西方文明敞开大门。

在现代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哲学中，命运思想只不过是深刻的内在悲观主义的理论表现，这种悲观主义以离奇的方式与极端的积极主义和唯意志论交织在一起。这种命运，实质上什么也没表达，但从法西斯主义的观点来看应能取代科学分析，施本格勒的诡辩术离这种科学分析相去甚远。尽管施宾格勒对马克思并不友好，但在他的议论中凡是明智的东西，都直接取自马克思。这就是社会生活各个极不相同的方面相互依赖的思想，此社会生活使社会达到形态上的统一。显然，施宾格勒在这里没有看到辩证的矛盾，在其论述中常常企图作些反常的不大能令人信服的比较，但这种思想本身已是个积极因素。但决不能以此说明施本格勒的作为整体的全部观念。对事物实际情况的分析，使我们预见到不是社会的死亡，而是社会具体历史形式的终结，是必然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已经开始的过渡，向高级社会结构的过渡。这里说的不仅是向更高的生活方式过渡，而且是向比今天更高的生活方式过渡。

是否可以一般谈论这种更高的社会形态呢？这会不会使我们陷入主观主义呢？在这一领域能不能有什么客观标准呢？

我们认为，是的，是可以的。在物质领域，这样的标准就是社会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长，因为它们决定剩余劳动量，而整个精神文化又取决于剩余劳动。在人与人之间直接的相互关系领域，这样的标准就是挑选创造性人才范围的广度。只有当劳动生产率很高、挑选人才的范围十分广阔的时候，才能最大限度地使最大多数的人达到生活上的内在的丰富，这些人不是算术的总和，而是活的整体、社会的集体。

如果从我们的立场看一看两种截然对立的社会制度——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那就可以毫不费力看出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性、停滞性以及老朽性。它打仗，只向后看，它企图稳定腐朽的经济关系，稳定宗法的社会联系，把工人变成家仆，为家庭规定严格的规章，同时使妇女成为完完全全的奴隶，它立足于这一保守的基础之上，渴望发动“胜利的战争”。

社会主义是向前看的：它不断实行技术革命，创造极高的发展速度，为人的创造解放出越来越多的新的潜能。它为不断进步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它快速地产生越来越高的需求，提出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它特别活跃。在社会主义下，人们不安于已取得的成就，而是一代接一代地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越来越自觉、越来越高尚地追求生活。

戴隆斌 译

尼·布哈林给安娜·米海伊洛夫娜· 拉林娜的信

(1938年1月15日)

亲爱的安努施卡，我的宝贝：

我给你写信的时候审判即将开始，给你写信的目的有三点，不管你读到、听到多么可怕的东西，不管对我说了些什么，也不管我说了些什么，你都要勇敢地、平静地对待这一切。让全家人做好准备。我既为你担心，也为其他人担心，但首先为你担心。决不要生气。要记住，苏联的伟大事业仍然存在，而这是主要的，同它相比，个人的命运是过眼云烟、微不足道的。你面临着巨大的考验。我亲爱的，我求你采取一切措施，绷紧全部心弦，但不要让它们绷断了。不要同任何人闲扯任何东西。你知道我的状况。你是我最亲密、最亲爱的人，所以我用咱俩间最美好的一切请求你尽最大的努力、倾全部的心思去帮助自己和全家人度过这可怕的阶段。我觉得，不必让父亲和娜佳读到这几天的报纸，让他们暂且像睡着了那样。还有，你自己看着办吧……自己安排一下，给自己想个办法，以免发生意外的可怕震荡。既然我提出这种要求，那就请你相信，我饱经忧患，其中包括提出这一要求，一切都会发生的，这是伟大的重大利益所要求的。你知道，我给你写这样的信要花多大的代价，不过我写信的时候深信，我只能这样做。这是主要的、基本的、决定性的。这短短的几行表达了多少意思，你是懂得的。像我所请求的那

样去做，要控制住自己，就像石雕像那样。

我非常为你担忧，如果允许你写信或者就以上所述给我写几个令人放心的字，那就会多少减轻压在我心头的这一重负。

这一点我求你啦，我亲爱的朋友，我恳求你了。我的第二个请求要小得多，但对我个人却极端重要。将向你转交三份手稿：

1. 数量很大的哲学著作，计 310 页（《辩证法概论》）；
2. 小诗集；
3. 小说的头七章。

它们需要用打字机各打三份。父亲可帮助加工诗歌和小说（诗歌附有设想，表面上很混乱，但可以理清楚；每一首诗都要打印在单张的纸上）。

最重要的是不要把哲学著作弄丢了，这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写成的，我往那里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同我过去的著作相比，这是非常成熟的作品，并且与那些著作不同，自始至终贯穿着辩证法。

还有另一本书（《资本主义文化的危机和社会主义》），其头一半我还是在家里写成的。你设法把它找出来：它不在我这里——如果丢了，那太可惜了。

如果你收到手稿（好多诗歌是为你写的，你从中可以感觉到我对你的眷恋），而如果允许你给我写几行或几个字，也不要忘记提一下我的手稿。

现在畅谈自己的感情，不是地方。但是你从这封短信可以看到，我是多么无限深情地爱着你。在我这艰难的时刻，请你用完成我的第一个要求来帮助我。不管审判的结局如何，无论如何，宣判后我将看到你并能够吻你的手。

再见吧，亲爱的！

你的科利卡

38 年 1 月 15 日

又及：我有你和孩子的照片。替我亲亲尤尔卡。还好他不会读报。

我也很为女儿担心。关于儿子哪怕写几个字——大概已长成小孩子了，然而还不认得我。拥抱并爱抚他！

郑异凡 异

安娜·拉林娜：关于尼·伊·布哈林的 绝笔信

当我在“祖国”医院读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信的时候，我很难表达我的心情，这封信是写成后过了 54 年才到我手里的。对读者来说不过是历史的东西，对我来说，却突然变成了今天。突然间，我回到血腥的大恐怖的大地上去了。

在被捕前的日子里，我们的住宅简直像一座死屋，没有一个活人敢来这报纸每天都指责犯了骇人听闻罪行的家庭。只有奥古斯塔·彼得洛夫娜·柯罗特可娃敢于这样做，她那时是尼·伊·在《真理报》的秘书。奥古斯塔·彼得洛夫娜绰号柳莺，她那瘦弱的身材令人想起小鸟，现在仍然健在。

打破住宅死一般沉静的往往是信使，送来照常是内含诬告布哈林的供词的邮件，有三次邮递员按铃送来鲍利斯·帕斯特尔纳克的信件和罗曼·罗兰的电报。

1937 年，在召开不祥的二三月中央全会（不仅对我们不祥，而且对数百万人的命运来说也是不祥的）之前不久的一天，我和尼·伊·正在办公室，突然进来三个人。他们通知“布哈林同志”（他们就是这么说的），他得搬出克里姆林宫。尼·伊·还来不及回答，电话铃响了，是斯大林说话：

“你那里怎么样，尼古拉？我的意思是，过得怎么样，亲爱的？”

“我得搬出克里姆林宫。我绝不想住在克里姆林宫，我只请求给一个地方，能放下我的藏书。”

那一刻，尼·伊·未必关心他的藏书。已经清楚即将被捕，但看得出，尼·伊·想继续同斯大林谈下去，他早就徒然地想跟他通话了。

“你让他们见鬼去吧。”——柯巴说着，放下了听筒。来人立刻走了。把尼·伊·从克里姆林宫搬走确实没什么意义，再过几天，柯巴就在监狱里给他提供了最后的住所，而一年后连这个住所也不需要了……但斯大林不能停止游戏。

这个游戏已经延续好久了，尼·伊·却不理解。还是在1935年春天，尼·伊·出席军事科学院毕业晚会。斯大林举的第一杯不是为军人干杯：

“同志们，让我们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干杯，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热爱他，而谁要老记住过去的事，那就让他滚蛋。”

要知道，“无产阶级的 *секрета*”那时候还没有准备好。现在看到在苏共中央发现的叶若夫的“理论著作”《从派别活动到公开反革命》，那里有指控“右派”——托姆斯基、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基本论点。叶若夫在1935年已着手写作。斯大林亲自修改了这一著作。

回过头谈尼·伊·的办公室。我们去办公室事出有因。尼·伊·让我帮他找书桌上的一张小字条，这是他在1928年或者1929年春发现的。开完政治局会议后，尼·伊·发现他用来做笔记的铅笔从口袋里掉出来了。他回到开会的房间，寻找铅笔，在地上发现一张小纸片，是斯大林手写的：“需要消灭布哈林的学生们。”显然，柯巴写下这字条是供自己用的。尼·伊·决定在抄家以前把它处理掉，以免受到伪造、盗窃等各种各样的指责……我们找到了这张字条，我把它毁了。这是抄家前销毁的唯一的一份文件。我大为震惊，问尼·伊·：

“就是说，你已经知道斯大林会干出什么？”

“我想他是决定把他们同我隔离开，以此消除我的志同道合者。现在我不排除他会把他们统统枪毙掉。”

尼·伊·同他的学生之间充满爱、忠诚和尊敬的友好关系的历史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

“我这无辜的脑袋还会株连成千上万无辜的人。”或者：“历史不会容忍卑劣行径的见证人继续存在。”他在“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对此现在有人予以嘲笑，但是尼·伊·在那时候还能指望谁？

尼·伊·的信虽然纯属私人信件，但具有历史意义。一个大家知道的问题：为什么那些在莫斯科公审中的被告人承认自己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而为什么人民还相信了这些东西，例如布哈林的“供词”被看作是坦白交代。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我就不提“一般老百姓”了）看出，审讯案是人为炮制的。伊利亚·爱伦堡告诉我：甚至米哈伊尔·柯尔佐夫也建议他去瞧瞧“自己的朋友”，用的是对布哈林鄙视的语气。而不久等待他的是同样的遭遇。E. A. 格涅金是著名的政论家和外交家（顺便说一下，30年代初他在《消息报》的国外部工作），也没有能逃过镇压，他在自己的书中写道：“我发现，在爱伦堡回忆录中提到的那些似乎头脑清醒者的天真幼稚，当代的读者全然不信。”

布哈林（并且不仅仅是他一人）知道前两次审讯案中的被告人在自我诽谤，他无法想象，这些人为什么要自我陷害，提供通向死亡的口供。他不相信现在已经众所周知的事实，脑袋戴上了安全帽。这就是注定要遭厄运的人的心理状态，否则他就会失去进行斗争的动力。

有一次，我问尼·伊·季诺维也夫为什么要杀害基洛夫，他回答说：“他们也要杀我和阿列克谢（李可夫），已经杀了托姆斯基，可见他们什么都可以做出的。”

他就是用这种铁的逻辑思考的，而这种逻辑从来没有得出过正确的结论。不过，尼·伊·的看法一天之内会出现多次变化。在他看来，错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腐化的机关，它们利用这种诬陷追逐名誉和奖章，并且没完没了。过错还在于斯大林那病态的多疑症。他也不排除斯大林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施加压力，但他认为罪魁祸首是审讯案中的诬陷者，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他猛烈攻击他们，大骂他们。这样做的并非他

一人。下面是1936年8月22日托姆斯基自杀前写给斯大林的信：

“我写信给你，不仅是写给党的领导人，而且是写给老战友，我的最后一个请求是：不要相信季诺维也夫的无耻诽谤，我从来没有同他一起参加过任何集团，我没有搞过任何反党阴谋。”

“老战友”对他表示了感激：逮捕了他的妻子，枪毙了他的两个儿子，第三个儿子尤里·米哈伊洛维奇也遭到迫害，在这以后瘫痪了将近十年。

尼·伊·的信中说：“要记住，苏联的伟大事业仍然存在，而这是主要的。”现在，对我来说，这句话听起来是悲惨的。或者：“一切都会发生的，这是伟大的重大利益所要求的。”

尼·伊·觉得，1935年整个意识形态氛围开始变了。由于有了新宪法草案，他指望出现社会的民主化。新宪法草案中有关法律部分是布哈林起草的。尼·伊·不是向后看，而是向前看的。面对法西斯的攻势，苏联是和平的支柱。1935年中期，共产国际终于采纳了布哈林早在1929年就提出的方针：第七次代表大会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和社会党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一延误是无法挽回的，法西斯在德国取得了胜利，但应当打断法西斯的进攻。

还在1923年布哈林在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上就谈到当时在巴伐利亚出现的希特勒组织的危险性。1934年2月，在第17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指出了德国的危险，当时斯大林根本不想予以认真对待。这时，布哈林已经不是政治局委员，被剥夺了任何权力，但他的这一说法几乎是对斯大林报告的国际部分的挑战。布哈林的最后一个报告是1936年4月3日在巴黎做的《当代文化的基本问题》，也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把反个人主义倾向捧上了天。它把万能的‘总体国家’置于一切组织之上，这个国家除领袖们和最高元首外，使所有的人都丧失个性。在这里，群众丧失个性是同对领袖的颂扬成正比的。”

当然，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尽管当代的读者自然会想起这个名字，并且不下于希特勒。也许布哈林这里用的是伊索的语言，是在暗指

柯巴？我知道尼·伊·的性格，对此表示怀疑。不过，斯大林一定把尼·伊·的话看作是针对自己的。

报告对人道主义给予极大的关注。尼·伊·说：“社会主义不去赞美恶。”在开始大规模恐怖闹剧的时候，拒绝赞美恶无论如何是不能同斯大林所建造的“社会主义社会”相容的。

绝笔信中所说的“不管对我说了些什么，也不管我说了些什么”，听起来特别可怕。这意味着，毫无疑问，他决定投降了，他决定在审讯中让自己按照刽子手的要求行事。原因之一是明显的：在法西斯进攻前夕他不想以揭露叶若夫刑讯室的勾当去败坏苏联的声誉。不过对我来说，这种解释是不够的，还存在摧毁布哈林的其他重大因素。

我获悉，6月初他已在起诉书上签字。在狱中侦讯期间就不断地送来一批批针对他的诬告性证词、职业奸细的供词，其中就有他的前学生B. 阿斯特洛夫，此人早在20年代末就被格克勃招募。侦查员列夫·谢宁威胁说，如果他不屈服，就要去迫害他的亲属（而这是最可怕的惩罚）。在尼·伊·的牢房里安插进内务部萨拉托夫州管理局局长，其任务是记住他讲的每一句话（在新西伯利亚的隔离所对我也是这么做的）。最后，有12—14个侦查员审讯过布哈林，他们不断地更换。对抑郁症使用了刺激剂，这也可能使他意志消沉。叶若夫和维辛斯基，还有代表政治局的他的“朋友”伏罗希洛夫参加了做尼·伊·准备受审的工作。一切都是遵照斯大林的指示行事的。我相信，曾向他保证留他一命。我认为，他也相信了这一点，尤其是上一次审判并没有把索柯里尼可夫、拉狄克、拉可夫斯基枪毙，还让他们活着，我觉得，这是留给布哈林以及其他人的诱饵。不久，他们就不经任何审判被消灭了，拉可夫斯基是最后一个，死于1941年。

1988年，英国使馆前工作人员F. 罗易·马克林来看我，他已经是一个老头了。他是来祝贺布哈林恢复名誉的。他告诉我，他每天都去听审，他是头一次看到这样的被告，他用笼统的词句表面上承认自己的罪行，而实际上没有承认任何具体的东西。他还说，审讯的速记记录没有完全反映同维辛斯基的全部搏斗。

布哈林在审讯中说，“被告的供认乃是中世纪的法学原则”，这意味着不仅为自己辩护，而且也为那些提供反对他的口供的人辩护。所以，如果就维辛斯基而言，“不管对我说了些什么”是多么漂亮，那么就布哈林而言，“不管我说了些什么”，毕竟没有让审讯的组织者得到所想得到的东西。

在法庭记录中有布哈林的一句话：“世界历史是世界法庭”。当代历史也证实，他是多么正确。没有必要去驳斥在各种出版物上流传的蓄意捏造的东西，例如说他是俄国农民的敌人——在集体化和剥夺富农问题上，他是斯大林的最大反对派并因此而遭罪。不过在《消息报》上看到某些说法，还是令人痛心和不快的，尽管是个别的、不是故意的，也不是出于恶意，而仅仅是由于不了解情况。《消息报》是尼·伊·最后的工作场所，他在那里是那么尽心尽力地工作。正是这种“刊误”，清楚地显示出今天历史虚无主义之严重。

为纪念奥·Э·曼德尔施塔姆诞辰 100 周年，诗人安德列·沃兹涅先斯基于 1991 年 1 月发表了论述他的文章。那里有这样的语句：“布哈林是帕斯特纳克的崇拜者，他在报刊上同叶塞宁的崇拜者托洛茨基展开论战。斯大林维护马雅可夫斯基。而只有曼德尔施塔姆没有找到庇护人。”在作出这样尖锐对立的结论的时候，怎么不去看看诗人的夫人娜·雅·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忆录！娜捷施塔·雅柯夫列夫娜写道：“奥西亚辉煌的一生要归功于布哈林，如果没有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的积极干预（他还把基洛夫争取过来），他那本 1928 年的诗集是不可能出版的。去美国旅行、住房、口粮、以后的出书合同……所有这一切都有布哈林插手……”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尼·伊·曾设法使被捕的奥·Э·的兄弟获释。但在 1934 年写了关于斯大林的诗之后，尼·伊·本人也失宠了。

在《消息报》75 周年的纪念号上，关于布哈林这样写道：“是他签发了刊载可耻的审讯的可耻的报告。”

不错，到 1937 年 1 月 16 日止，每一号上都标明主编：尼·布哈林。不过从 1936 年 8 月起他已不签发了。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并

且现在我有证明文件。美国历史学家、布哈林传记作者科恩不久前在档案里发现了布哈林给《消息报》的一张便条：“致维里柯德伏尔斯基同志并转党的会议”。布哈林表示歉意，因为他不能“参加作为编辑必须参加的会议”。他解释原因说：“昨天给政治局委员们送去一封有事实、有分析等等的长信。在信的末尾我写道，只要不撤消对我的指控，我无论在体力上、精神上还是政治上都无法去上班工作。”日期是：1936年8月28日。然而，尽管《消息报》上刊登污蔑布哈林的材料，但报纸主编仍署着他的名字。

现在时代不同了，从今天看，尼·伊·就像是外星人。他的“发财吧”的号召，他所说的“用未来的砖头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他的供销、信贷合作社，他的长入社会主义，他关于把个人、集体、群众、社会和国家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思想，现在谁也不需要了。

在看待过去的时候，要看政治活动家的真实面貌，以及迫使他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的环境，可惜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关心这一点了。但愿能够这样看待布哈林这位历史人物。

郑异凡译自《消息报》1992年10月13日

布哈林狱中遗稿首次问世感言

[德] 弗拉迪斯拉夫·赫德勒

露特·斯托里亚洛娃

“第一号所制造的恐怖，首先在于他可能是正确的，所有被他杀死的人即使后脑勺打进了子弹，都不得不承认，他很可能是正确的。谁也拿不准，只好上诉于他们称之为历史的那个开玩笑的权威。”

尼古拉斯·萨尔曼诺维奇·鲁巴肖夫

“党只答应一件事情：在胜利以后，在不会起有害作用的时候，秘密档案的材料将会公布。那时候全世界会了解这场木偶双簧戏的背景是什么。我们现在得按照历史教科书来表演……”

预审法官 格列金^①

在1937年2月和3月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朝排除他在权力斗争中一切潜在敌手的目标又走近了一步。^②1929年他已和

^① 这两段题词引自英籍匈牙利作家阿塞·库斯勒1941年写的以苏联公审案为内幕的小说《中午的黑暗》，鲁巴肖夫和格列金都是小说中的人物，鲁巴肖夫的原型就是布哈林。这里采用的是董乐山的译文，见该书中译本1988年作家出版社版第14、259页。

^② 全会速记记录发表在《历史问题》杂志上（1992年第2—12期；1993年第2、5—10期；1994年第1—2、6、8、10、12期；1994年第1—8、10期）。

他在联共（布）最高领导层中的追随者为打倒布哈林进行了准备。^①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三次全会上，第三次莫斯科公审的场景已经设计得愈来愈精确了，而这次审判的主要被告就是“全党喜欢的人物”布哈林。斯大林不断催促，要求安全部门加紧工作，把“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斗争中耽误的四年”补上。到那时为止，一直担任内务人民委员的亨利希·亚戈达已被撤职，由尼古拉·叶若夫接任。1935年被提拔为苏联检察长的安德列·维辛斯基也同样全力以赴，准备罪证材料。布哈林在面对日益无耻地对他展开的毁谤运动时无意地证明了已经起草好的“起诉书”的核心内容是荒谬的，从而使即将举行的公审的“分镜头”有可能落空。看到这一点，斯大林被迫做出举行这次公审的决定。

布哈林被指控为联共（布）党内右倾反对派的代言人，在那次全会上经过与会者的同意，立即由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

在俄国的档案公开以前，布哈林一生最后几年特别是“预审拘留”期间的情况很少为人所知。甚至他的遗孀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拉林娜在回忆录中也只能描述她丈夫被捕时的情况并且说明，布哈林在狱中是被允许写作的。预审法官拉扎尔·柯甘本人此后不久也被捕，他曾向拉林娜提到布哈林在写一篇论述法西斯主义统治下文化衰落的稿子。更加详细的情况她就知道了。布哈林被捕后她很快也被捕，被放逐出莫斯科，判处在劳动营服劳役。布哈林的所有家庭成员都遭株连，受到迫害。

布哈林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恢复名誉以后，他的夫人立即发表了她背诵下来的布哈林“致党的新一代领导人”^②的信，这封信已被人们看成是布哈林的“遗言”。

在苏联改革年代，关于布哈林提出的针对斯大林路线的替代路线的

^① 尼古拉·布哈林：《1929——大转变的一年》。弗拉迪斯拉夫·赫德勒和露特·斯托里亚洛娃翻译并加导言和注释，1991年德文版。

^② 参见安·拉林娜·布哈林娜：《我早已过了20岁：回忆录》，戈迪根1989年德文版第428—430页，《“没落的人”——他们究竟是哪些人？》，柏林1990年版，第12—13页。

讨论中，曾屡次就布哈林拒绝作为反对派出现的问题发生争论。布哈林是真的一直保持异端的身分还是最后终于向斯大林投降了？一些政论家和历史学家硬把“机会主义”强加给布哈林，并且还提出涉及各个方面的广泛论证。1991年，关于1933年对布哈林进行的党内审查的档案向研究者开放，根据这些材料的印象我们提出如下的想法：苏联的一些共产党人在看到社会主义的错误发展的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对这一制度进行改革是不可能和没有意义的。乔治·卢卡奇后来在他的《社会主义和民主化》^①一书中评价失败了布拉格之春时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但是布哈林并没有接受这种认为改革不可能的论点，他也不可能接受。后人应当根据这一假设来研究他的著作和他在共产国际的工作。1988年在西方和东方开始的关于布哈林的争论可以这样继续进行下去——布哈林是属于对行政命令——官僚主义制度提出替代方案的思想先驱之列，还是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未能突破那些年代的思想模式，对这个问题，只有在这样的讨论取得结果时才能作出回答。^②

1991年以来，多次有人提出的布哈林已在1932年与斯大林和解的意见是没有根据的。^③从那时以来又发表了许多材料，例如《辩证法概论》部分章节^④，他与夫人诀别的信，1937年12月10日他给斯大林的信，1938年他的请求赦免书^⑤，长篇小说《时代》^⑥以及他为他曾计划出

① 乔治·卢卡奇：《社会主义和民主化》，弗兰克·本泽勒和吕迪格·达能曼编辑出版，法兰克福1987年德文版。第一个德文版书名为《今天和明天的民主化》，布达佩斯1985年版。

② 弗·赫德勒：《内幕。共产国际的“内部残杀”》，见特·贝尔格曼和玛·克斯勒编《共产国际的兴衰》，美因茨1992年德文版，第103页。

③ 弗·赫德勒：《尼古拉·布哈林在决定性的1932年。论斯大林路线替代方案的限度》，见《对替代方案的思考。反映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问题的各种批判的、解放的社会理论》，柏林1991年德文版，第115—117页。

④ 《哲学问题》1993年第6期，第18—73页。

⑤ 参看弗·赫德勒和露·斯托里亚洛娃：《1938年10月15日尼古拉·布哈林给夫人安娜·米哈伊洛夫娃·拉林娜的诀别信》，见《德国工人运动史国际学术通讯》1993年第4期；《1938年12月10日尼古拉·布哈林给斯大林的一封未为人所知的信》，见同一杂志1993年第1期第20—25页；《布哈林给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请求赦免书》（1938年3月），见：库恩·米克洛什《布哈林及其敌友》，莫斯科1992年俄文版，第465—466页。

⑥ 尼古拉·布哈林：《时代》（长篇小说），B. J. 弗勒辛斯基作序并加注释，1994年俄文版。

版，但迄今仍未问世的狱中著作俄文版写的序言，^①这些材料使讨论重新展开。^②一个核心问题再一次被提出来：布哈林是否坚持了他针对斯大林路线提出的替代方案？^③

只要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库和克格勃档案馆中保存的关于“布哈林案件”的预审档案和审判档案还没有完全开放，就始终会给人们留下推测的余地。在俄国最近出现的伪造的布哈林遗著中有《共产主义 ABC》和《法西斯主义 ABC》，都是 Terra 出版社出版的。^④后一本书的跋把布哈林描述成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先驱。但是，考虑到 1933 年到 1936 年期间布哈林在苏联和国外发表的论文，这些论断只能使人感到荒诞不经。

毫无疑问，布哈林的遗孀和女儿向基础出版社提供的手稿将有助于使关于这位理论家的遗产的争论具体化。

关于《社会主义及其文化》的研究著作（1937 年 3 月 26 日动笔，1937 年 4 月 7 日以后完成）^⑤与《辩证法概论》（献给十月革命 20 周年）、长篇小说《时代》（1937 年 11 月 12 日动笔）一样，都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预审拘禁期间写成的。

布哈林在 1937 年 12 月 10 日给斯大林的信中提到他在《辩证法概

① 参看斯蒂芬·科恩：《尼古拉·布哈林的狱中著作。既不赞扬也不谴责，而是理解》，见《独立报》1995 年 11 月 3 日第 5 版。

② 关于布哈林的“斯大林主义”，参看：亚历山大·康恩《与斯大林告别》，见《日报》（斯德哥尔摩）1993 年 5 月 4 日第 4 版。

③ 汉堡的《社会主义》杂志就这一问题在 1993 年第 9、12 期和 1994 年第 1—3、5 期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④ 《红星和卐字。布尔什维主义和俄国法西斯主义》，1994 年莫斯科俄文版。

⑤ 这一著作的各章和监狱管理处的文件保存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库的档案文件中：卷宗第 3 号，第 24 目，第 428 号文件以下各页的正面和反面：第 1 章连续写在 1—9 页正面。第 2 章连续写在 1—9 页反面。第 3 章连续写在第 10—18 页正面。第 4 章连续写在第 10—18 页反面。1937 年 3 月 26 日第 1447 号值班记录：致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四处处长、三级国家安全委员库尔斯基将军的信，第 19 页。第 5 章连续写在第 20—28 页正面。第 6 章连续写在第 20—28 页反面。1937 年 3 月 31 日第 1550 号值班记录：致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四处处长、三级国家安全委员库尔斯基将军的信，第 39 页。第 9 章写在第 40 页正面。第 10 章连续写在第 40—47 页反面。1937 年 4 月 7 日的收据，第 49 页。第 11 页写在第 50 页正面。第 12 章连续写第 50—57 页反面。结束语连续写在第 59 页的正面和反面。

论》中着手研究社会主义文化。他说：“我在其中写下了许多有用的东西”。^①

当1937年4月布哈林在紧张工作后将可以付印的手稿交给监狱管理处时，他仍始终希望“预审”能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希望能够获得释放。为了给这一时刻作好准备，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为今后的活动拟订了工作计划。他继续写作在被捕前已经开始的关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论著的第一卷。这一手稿迄今下落不明，它显然是为解释他参与起草的1936年苏联新宪法而写的。

对很快获释的希望——当时还没有开始审讯——反映在他的论文的十分平静和恰当的措词中。1932年以后，布哈林在他以《论文集》^②为题的一系列论文中，经常阐述自己的社会主义设想并且继续探讨他在伦敦和巴黎的演讲中涉及的论题。他于1937年3月至4月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中写成的关于《社会主义及其文化》的手稿很少表现出他在1937年12月给斯大林的告别信中的那种矛盾心情；它也完全不带他在《致党的新一代领导人》的告别信中所包含的那种感情，这封信是他在1937年莫斯科公审的被告们提出对他的指控的影响下，在他被捕前不久口授给他的夫人的。

布哈林曾一再这样概述他的行动框架和思想框架：无条件地支持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可以举两个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试验进行考察的德国人为例，莱昂·福伊希特万格和恩斯特·布洛赫都曾提出与布哈林相似的论证。这三个人都拒绝安德列·纪德对苏联的批评。

如果我们拿本书与当时党的决议和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

^① 弗·赫德勒和露·斯托里亚洛娃：《1937年12月10日尼古拉·布哈林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信》，见《德国工人运动史国际学术通讯》1993年第1期，第25页。

^② 这一组文章包括1927至1931年间写的12篇论文，1988年由莫斯科“书籍”出版社重印出版，附有尼古拉·莫斯科夫琴柯的一篇跋。莫斯科夫琴柯概括叙述了20年代末苏联的思想状况，并且简要说明了布哈林从1929年4月到1930年6月联共（布）第16次代表大会时的政治生涯。他推测布哈林当时的想法是要说服党的领导相信他的忠诚并且打算用这一组文章来证明这一点。

我们在《尼古拉·布哈林的生平和事迹》（赫德勒和斯托里亚洛娃著，美因茨1993年德文版，第120—124页）中指出了布哈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与斯大林模式的区别。上述事例所涉及的忠诚并不等于他背弃了自己的替代方案设计。

史简明教程》的理论部分相比较，就会发现，布哈林在本书中所关注的论题是理论家们到那时为止一直忽视或者仅仅粗浅涉及的。这就是：衡量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标准，社会主义文化的物质基础，对“全面的人”的培育，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社会主义下生活中的矛盾的多样性，平等和等级制问题；自由和社会进步以及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这也是他在参与起草苏联新宪法时连带加以认真研究的论题（这一宪法后来以“斯大林宪法”的名称载入历史）。

贯穿本书的红线是：社会主义必须为书中所说的发展方向创造物质和精神前提条件并容许其发展，只有这样它才能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30年代中期的苏联社会科学家中，这种观察问题的方法已经不再流行了。布哈林在他的论述中却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理论的“元层面”（*Metaebene*）（他在书中仅仅简要描述了这一元层面）。这就使他能够把总路线和趋势、理想和现实、自由和对自由的限制贯通起来，提出一些疑难问题以供讨论，尽管他在这样做时是十分小心谨慎的。

布哈林在极少的情况下也涉及他作为预审犯人的生活情况和处境，例如在关于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思考的部分描述了苏格拉底和他的门徒的命运。在粗心的读者看来，布哈林插进这一节只是为了强调社会对个人的优先地位。在手稿中，有从博埃齐^①和塞涅卡^②的著作中的富有启发性的摘录以及布哈林关于有意义的生和死的评注。但是，布哈林未能排除关于完美的生活和不完美的生活这一问题，尽管他很想这样做。不过对他说来，世界历史的悲剧性形态已是属于过去的事。

手稿对社会主义计划中的社会对立和政治矛盾并没有加以掩盖。这一事实证明它不是一部为错误辩护的著作。我们还应当一再考虑手稿产生时的条件。如果考虑到布哈林与此同时还需要为审判作准备，那就可以说他在预审拘留期内所写的每一篇著作都有它本身的历史。

监狱管理处在今年多的时间内允许布哈林写作——当然事先是得到斯大林批准的——这件事是否有一定意图，对此进行猜测是多余的。在

① 罗马新柏拉图派哲学家。

② 罗马哲学家，新斯多葛学派最大的代表人物之一。

这一点上布哈林也显出比他的控诉人高明。在预审拘留期内写成的任何一份手稿都无法被用来为公审服务。这些著作的一部分是他的理论遗言，他通过这些著作和他的自传留下了关于他朴实的、不作任何辩解的从事革命决心的证据。

布哈林在他写给苏联最高苏维埃的第一封请求赦免书中着重提到这些著作，声称这是他思想转变的证据。^①他在狱中是有时间重新考虑和修正自己的思想的。从他一生的经历来看，他是会这样做的。布哈林不愿意承认：一个再生的布哈林对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来说也会是一个再生的，因而有更大的危险；而他的反对者很久以前就已比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了。

布哈林的狱中著作与他给斯大林的告别信及向最高苏维埃请求赦免书一样，都是这位在联共（布）最高领导层的权力斗争中遭到失败的理论家的晚期著作。他所想到的和写下的一切都是在深渊的边缘面对死亡时的产物。布哈林是1938年莫斯科公审的最著名的被告，他曾经徒劳地希望得到赦免。

向最高苏维埃请求赦免书的作者自称在预审拘留期间已变成一个新人，因此请求允许这个人活下去。这位预审犯人在总书记生日前夕写信给他，请求以自己的夫人作为人质来换取自己的自由，却不知道她已被捕并关在劳动营里了。他已不再像是《致党的下一代领导人》的信的作者了，在那一文件中阵线是分明的，善和恶区分得清清楚楚。但是，如果把他向最高苏维埃的请求赦免书解读成纯粹的投降声明，对他是不公正的。他一直到最后都在使用计谋，并且也曾产生效果：预审法官不得不一再推迟公审。

迄今，关于布哈林囚禁时的文件还没有完整的目录。从文献中提到的和叙述的或者已能见到的材料来看，还不能精确断定全部文件的规模。在克格勃档案馆中有一部分预审过程中留下的档案（审讯和对质的

^① 布哈林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请求赦免书发表在库恩·米克洛什《布哈林及其敌人》一书的第465—466页上，另见瓦伦丁·柯夫廖夫《斯大林的两个人民委员》，莫斯科1995年俄文版，第262—266页。

记录)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看守所作的关于情况的值班记录。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中有1962年平反委员会发现的1938年从审判中剔除的档案。早就宣布要出版布哈林30年代的通信或公开迄今严格保密的联共(布)中央全会的速记记录,例如1936年12月全会和1937年6月全会的速记记录,但始终未能兑现,因此研究工作对此也无法使用。^①过去和现在都未弄清楚1938年莫斯科公审时宣读的起诉书的最初文本是否还存在。^②在布哈林研究的必备材料中,还有一些尚未发表的文件线索需要我们寻找。

1929至1937年间有关布哈林的材料不仅涉及组织方面的问题,而且还揭示了党的领导内部心理上的紧张关系。关于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的建设日益尖锐化的理论在实践中意味着:在清洗掉矛盾体现者的同时矛盾本身也就被消除了。

公审承担了重要的、使制度保持稳定的职能,它起了代替社会发展的推动力的作用。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与布哈林一同在“右派与托派联盟”的审判中受到指控,托洛茨基接过了他提出的解释“蜕化的新阶级”的模式,并以此为根据来批评斯大林。但布哈林的反驳和批判却属于另一种类型——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人的。布哈林也没有提出任何他所特有的、具有独创性的观点来反对斯大林。这就是说,他和托洛茨基不同,他没有摆脱布尔什维克的党的观念。布哈林对党所要求的领导权和党所起的领导作用从来没有提出过疑问,他的目标是从内部进行改革。因此,他始终以列宁概括论述的社会主义设想的宣传家著称。布哈林以这种方式保护自己不受到在党内组织派别和提出政纲的指责。因此,针对他的批评总“只是”限于说他偏离方向。布哈林从来没有怀疑过“总路线”。

^① 最后一次提到“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库”中保存的布哈林档案包括书信已被移交给“俄国现代史文件收藏和研究中心”的是埃拉·马克西莫娃的文章《来自过去的阴影:为什么斯大林的档案仍旧不能开放》,见《消息报》1995年第208号,11月2日,第5版。

^② 尤里·穆林:《“布哈林案件”是怎样伪造的:附有安·拉林娜(布哈林娜)的跋》,见《近代和现代史》1995年第1期第61页。起诉书的最初文本见:关于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审理的“右派和托派反苏联联盟”案件的新闻报道,1938年3月2—13日。苏联司法人民委员部出版的完整的速记报告,莫斯科1938年俄文版,第5—37页。

布哈林在1937年2月至3月的中央全会以前和会议期间，在预审拘禁期间，以及在1938年的公审中，在直面对质时都没有背离他在1929年定下的已经经受考验的这一基调。这是他进行辩护的基础。因此，那些用来对付他的门徒的很有成效的手法都不得不被放弃。

《社会主义及其文化》可以被解读成他对叶若夫在1937年2月23日中央全会上所作的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案”的报告的反驳。叶若夫谈到布哈林反对联共（布）的斗争的三个阶段。其中最重的指控是说布哈林在1930年至1937年期间也没有放下武器。布哈林反驳这一论断的战略的一部分是，用全力证明自己对共产党的忠诚。

布哈林在2月至3月的中央全会上向他的同志们问道：“难道不允许我把各人的证词拿来互相对比，指出其中的矛盾吗？”他同时强调“这是留给我的唯一的自我辩护的方法。”^①正是由于他坚持只谈事实，并且避免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提出任何批评，他就迫使叶若夫对证词中的荒谬之处作出解释，从而打乱了对他指控的安排。当叶若夫一再陷于守势时，斯大林干预了讨论：“你必须设身处地从我们的角度考虑……你必须证明一切，不要仅仅使用惊叹号和问号。”^②斯大林朝着布哈林说：“我相信契卡人员是细心和诚实地工作的。”^③

布哈林的战略起初是成功的：他力图尽可能躲开对他的打击，使它们落空或者进行反击。但是真正的导演不是他，而是处于幕后的斯大林。

为了取得成功，布哈林还必须使他的反对者的另一个论题失效：他必须证明，他所阐述的理论既不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异端邪说，也不是以复辟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由于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大部分对他的论证不加理睬，所以他直接诉诸斯大林。但是如果把这仅仅看成是

① 《历史问题》1992年第4—5期。关于布哈林在中央全会上的表现可参看：露·斯托里亚洛娃和弗·赫德勒《一个剧本的最后一页：关于不久前发现的1937年12月10日尼古拉·布哈林给约瑟夫·斯大林的最后一封信的思考》，见《新德意志报》1994年6月24日第14版。

② 《历史问题》1992年第4—5期，第36页。

③ 《历史问题》1992年第4—5期，第34页。

一种屈服的姿态，就会是太轻率了。

由于布哈林能够击退一些攻击，1937年2月25日对他进行攻击的方向再一次改变了。如果说他们不能指出布哈林一直到1937年都坚持不同意见，那就必须把这一时限提前。于是，首先改写了他与列宁的关系的历史。由于缺乏这一方面的证据，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要求内务人民委员部利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档案。

但是，布哈林在这一点上也没有屈服。他在发言中谈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为时再次声称自己受到诽谤，中央全会速记记录在这一处注明会议厅中出现骚动。^①这是由于布哈林提到，被告们起初会承认一件事，然后否认，然后又再次承认，这就是说被捕的人清楚地知道期望他们说出什么。全会会场上有人插话，质问他是否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有所怀疑。他对此回答说：“是的，就像你们每个人在听到叶若夫的提纲中提到那里揭发了多少双重间谍时肯定都会怀疑一样。”^②

《致党的新一代领导人》的信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布哈林诉诸党的干部并且表述了这一观点：安全机关只要受到委托甚至也会捏造出毁谤斯大林的材料。他这样做不是偶然的，布哈林认为已不可能违背大多数党员的意志而掌握主动权。对布哈林来说，斯大林是最高的裁判者，只有他才能使布哈林放弃绝食。但是斯大林也需要布哈林活着，一个死了的布哈林不能扮演在公审中安排给他的角色。关于这一角色，导演和妄以为自己是演员的傀儡的想法是不同的。

对第三次公审的准备工作研究与说明，一再改变的场景安排和揭示预审中采用的刑讯办法同样重要。布哈林之所以决定采取防御战略，是根据这样一种认识：联共（布）不是一个内部团结一致的均质的党。这个已经蜕化成宝剑骑士团的党，这个听命于斯大林的坚如磐石的党，是30年代的产物。布哈林和托洛茨基都在国内战争时期或新经济政策时期体会到，当共产党人把赌注押在把苏维埃政权献给世界革命祭坛的可能性上时，他们的遭遇是什么样的。

① 《历史问题》1993年第2期，第5页。

② 《历史问题》1993年第2期，第8页。

布哈林的理论论文表明了他用对手的逻辑来反驳对手的能力。“谁不和我们一起走，谁就是反对我们”，这在当时是一个广泛流行的口号。布哈林企图从这一口号的矛盾中找到解救办法，但是在反对他的“党内同志”的斗争中他不能打这张王牌。

狱中著作反映了忠诚的知识分子在不放弃自己原则的情况下究竟能在党的内部走多远。布哈林的失败证明，这一冲突只有以这些忠诚的知识分子从世界上消失为代价才能解决。

殷叙彝译自德文手稿

跋

布哈林早在 20 年代初就打算写一部本论述社会主义文化的专著，但仅仅开了一个头，就因为事务繁忙而中断。但他并没有忘记这项工作，30 年代中期，鉴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他下决心继续社会主义文化问题的写作。为此，他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收集有关资料，并在法国作“当代文化的基本问题”专题讲演，这实际上是他的一个详细的写作提纲。到 1937 年 2 月中央全会召开之前，布哈林已经写出《资本主义文化的危机和社会主义》的第一卷。可惜在抄家的时候被没收，该卷从此迷失，至今不见踪影。被投入监狱后，布哈林继续这一专题的写作，完成此书的第二卷《社会主义及其文化》。这是布哈林狱中写作的三部著作中的第一部，其中涉及社会主义社会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诸如社会主义的标准问题、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问题、培养完整的人的问题、平等自由和进步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多样性问题，等等。其中许多问题是苏联时期理论家没有涉及过的，也是斯大林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中没有涉及过的问题。

为便于读者较全面地了解布哈林在社会主义文化问题上的观点，本书在“附录”中收入了他的一些相关文章：20 年代初准备撰写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文化问题》一书的第一章《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译自《进攻》文集，莫斯科 1924 年版），以及就这一问题所作的报告《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译自《红色处女地》杂志 1925 年第 4

期)，1936年在巴黎所作的报告《当代文化的基本问题》（戴隆斌译，郑异凡校）。布哈林给妻子安娜·拉林娜的信和拉林娜事隔半个多世纪看到此信后所写的短文《关于布哈林的绝笔信》，涉及此书的写作情况及其命运（译自《消息报》1992年10月13日）。德国学者弗·赫德勒长期研究布哈林问题，我们曾有幸一起开过学术会议，他写的《布哈林狱中遗稿首次问世感言》详细介绍了有关历史背景，特请殷叙彝先生从德文译出，以供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布哈林的三部狱中遗稿早在20世纪末已译成中文，由于种种原因在几家出版社积压了十来年，衷心感谢重庆出版社重点图书编辑室曾海龙、吴昊、王晓静等同志为出版这套书所付出的辛劳。

郑异凡

2015年于北京

人名索引

A

阿拉克切耶夫，阿·安·（1769—1834）——沙俄专制制度代表人物之一，亚历山大一世时期任陆军大臣，以专横残暴著称。阿拉克切耶夫主义指军警暴虐制度：35，93

阿里斯托芬（约前 445—前 385）——古希腊诗人、戏剧家：37

奥古斯都（前 63—公元 14）——公元前 27 年起为罗马皇帝：152

阿奎那，托马斯（1226—1274）——中世纪烦琐哲学代表，西欧封建主义思想家。多米尼加人：131，153，166

B

巴甫洛夫，伊·彼·（1849—1936）——俄国和苏联生理学家：65

巴拉丁斯基，E. A.（1800—1844）——俄诗人：122

柏拉图（前 427—前 347）——古希腊哲学家：20，38，58，90，110，136

鲍威尔，奥托·（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第二半国际（1921—1923）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23—1940）的组织者和领袖之一：144，218

贝多芬，路·范·（1770—1827）——德国音乐家：7，124，135

别尔嘉耶夫，尼·亚·（1874—1948）——俄宗教哲学家，人格论代表。1922 年被驱逐出境。1924 年起侨居法国，出版宗教哲学杂志《道路》（巴黎，1925—1940）：6，87，242，243

别林斯基，维·格·（1811—1848）——俄文学批评家，革命民主主义者：63

波德莱尔，沙·（1821—1864）——法国诗人：71

伯格森，亨利（1859—1941）——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自觉主义代表：6，23

伯利克里（约前 490—前 429）——雅典统帅，公元前 444—前 429 年（公元前 430 年除外）为民主集团领袖：124

伯麦，雅可布（1575—1624）——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51，153

勃洛克，亚·亚·（1880—1921）——俄诗人：48，76

博埃齐——罗马新柏拉图派哲学家：265

布尔加柯夫，谢·尼·（1871—1944）——俄宗教哲学家，经济学家。第二届国家杜马议员（1907），代表立宪民主党。1918 能接受神父职务。1923 年起移居国外：14

布留索夫，瓦·雅·（1873—1924）——俄诗人，俄象征主义奠基人：91

C

成吉思汗（1162—1227）——元太祖：43

D

大卫，爱·（1863—1930）——德国社会民主党活动家：14

丹尼列夫斯基，尼·雅·（1822—1885）——俄国政论家和社会学家、泛斯拉夫主义思想家：238

丢勒，阿·（1471—1528）——德国画家：62

多米提亚努斯（51—96）——公元 81 年起为罗马弗拉维王朝皇帝：114

E

恩格斯, 弗·(1820—1895): 60, 73, 81, 106, 125, 136, 173, 197

F

凡勃伦(1857—1929)——美国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 65

费尔巴哈, 路·安·(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 60

费希特, 约·戈·(1762—1814)——德国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115

冯特, 威廉·麦克斯(1832—1920)——德国心理学家、生理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 实验心理学奠基人之一: 106

弗兰克, 谢·路·(1877—1950)——俄国宗教哲学家: 48

弗罗贝尼乌斯, L.(1873—1938)——德国民族学家。曾研究非洲各民族的文化, 提出文化是独立的社会有机体理论: 239

傅立叶, 弗·玛·沙·(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37, 74, 103, 125, 244

富勒, 理·巴·(生于1895)——美国建筑师和工程师: 36

G

高尔基, 马·彼·(1868—1936)——俄国和苏联作家, 社会活动家: 32

高更, P.(1848—1903)——法国画家, 后期印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232

戈比诺, J. A.(1816—1882)——法国社会学家、作家、种族主义和社会学人类种族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228, 239

歌德, 约·沃·(1749—1832)——德国作家: 7, 38, 75, 89, 124, 131, 243

格尔申宗, 米·奥· (1869—1925) ——俄国政论家、文学史家和社会思想史家: 22, 23, 87

果戈理, 尼·瓦· (1809—1852) ——俄国作家: 82

H

海涅, 海因里希 (1797—1856) ——德国诗人和政论家: 5, 21, 76, 91

汉尼拔 (前 247 或前 246—前 183) ——迦太基统帅: 126

黑格尔, 乔·威· (1770—1831) ——德国哲学家: 11, 23, 37, 51, 63, 74, 99, 110, 140

胡斯曼 (1848—1907) ——法国作家: 73

荒木贞夫 (1877—1966) ——20 世纪 20—40 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家法西斯化的主要头目及思想家之一。1931—1934 年任陆相, 1938—1939 年任文相。1948 年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5 年获释: 235, 241

J

吉尔伽美什——苏美尔国 (前 28 世纪) 乌鲁克城半传说性的君主: 51

纪德, 安· (1869—1951) ——法国作家: 16, 83, 85, 264

居鲁士二世 (前? —前 530) ——公元前 558 年起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第一代君主: 47, 55

K

卡尔萨温, 列·普· (1882—1952) ——俄国宗教哲学家、中世纪史学家。1922 年被驱逐出境: 131

卡尔特西乌斯 (1596—1650) ——法国哲学家、数学家: 115

卡里古拉 (12—41) ——公元 37 年起为罗马皇帝: 114

康德, 伊· (1724—1804) ——德国哲学家: 8, 29, 57, 75,

102, 115, 132, 196

克劳塞维茨, 卡尔 (1790—1831) ——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历史学家: 147

卡提利纳 (前约 108—前 62) ——古罗马大法官, 曾任非洲总督: 230

凯泽林, H. A. (1880—1946) ——德国社会哲学家, 其思想一战后甚为流行: 232

L

达·芬奇, 列奥纳多 (1452—1519) ——意大利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工程师、学者: 62, 124

拉法格, 保尔 (1842—1911) ——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 第一国际成员: 77

拉甫罗夫, 彼·拉· (1823—1900) ——俄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革命民粹派思想家、60年代民主运动参加者: 81

拉姆普雷希特, 卡· (1856—1915) ——德国历史学家: 129

拉斯金, 约翰 (1819—1900) ——英国的艺术理论家、艺术派画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232

莱辛, 泰· (1872—1933) ——德国作家和哲学家。被法西斯分子杀害: 72

李锡尼——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罗马国务活动家: 22

查理 (1452—1485) ——英国国王: 55, 68

列昂季耶夫, 康·尼· (1831—1891) ——俄国作家、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 后斯拉夫主义者: 5, 48, 74, 238, 244

列宁 (乌里扬诺夫), 弗·伊· (1870—1924): 4, 40, 66, 77, 91, 142, 203, 214, 246, 267

列日涅夫, 阿· (1893—1938) ——俄国和苏联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 54, 63

卢斯塔维里, 绍塔——12世纪格鲁吉亚诗人, 史诗《虎皮武士》

(亦作《虎皮武士》)的作者: 45, 52

卢梭, 让·雅克 (1712—1778) ——法国思想家、作家: 81

鲁登道夫, E. (1865—1937) ——德国陆军上将。1935年提出“总体战”观念, 成为法西斯军事学说的基础: 230, 239, 243

伦敦, 杰克 (1876—1916) ——美国作家, 著有《铁蹄》等: 230

罗森贝格, 阿· (1893—1946) ——德国法西斯主要战犯之一: 71

罗斯福, 弗· (1882—1945) ——1933年起任美国总统: 66

罗斯托夫采夫, 米·伊· (1870—1952) ——俄国古希腊罗马史和考古学家。十月革命后移居国外: 46

M

马尔萨斯, 托·罗· (1766—1834) ——英国经济学家, 提出马尔萨斯人口论: 14, 90

马基雅弗利 (1469—1521) ——意大利国务活动家、历史学家: 62

马克思, 卡尔 (1818—1883): 2, 14, 32, 59, 71, 88, 101, 129, 226, 248

梅斯特尔, 约·德· (1753—1821) ——法国政论家、政治活动家、宗教哲学家。19世纪上半期欧洲极权主义和君主政体运动的鼓吹者和思想家之一: 71, 228

门捷列夫, 德·伊· (1834—1907) ——俄国化学家: 7

密涅瓦——罗马神话中的科学艺术女神、女战神, 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 53

米歇尔斯, 罗伯特 (1876—1936) ——意大利籍德国人,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16, 17

明斯基, 尼· (1855—1937) ——俄国作家: 68

莫洛赫——古代腓尼基等国以活烧儿童为祭的太阳神: 88

N

拿破仑一世 (1769—1821) ——法国皇帝 (1804—1814?): 89, 147

奈马尔克, A. (1848—1921) ——法国统计学家: 230

尼采, 弗·(1844—1900) ——德国哲学家, 唯意志论和非理性论的代表人物: 71, 93, 228, 235

O

奥韦狄乌斯 (前43—约18) ——罗马诗人: 2

P

帕雷托, 维尔弗雷多 (1848—1923) ——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庸俗政治经济学数学派代表人物, 洛桑大学教授: 16, 235, 237

培根, 弗·(1561—1626) ——英国哲学家: 89, 92, 115, 121, 278

皮萨列夫, 德·伊·(1840—1868) ——俄国社会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革命民主主义者: 113, 124

普列汉诺夫, 格·瓦·(1856—1918) ——俄国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活动家、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普希金, 亚·谢·(1799—1937) ——俄国诗人、作家。7, 38, 39, 74, 77, 122, 124, 224, 240

Q

切连, R. (1864—1922) ——瑞典政治学家, 曾在哥斯堡大学、乌普萨拉大学任政治学教授。著有《政治学》、《政治体系大纲》、《国家组织是生命的一种形式》等著作: 239

齐美尔, 格奥尔格 (1858—1918)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康德的追随者, 教授: 102, 130

恰达耶夫, 彼·雅·(1794—1856) ——俄国思想家和政论家: 20

恰亚诺夫, 亚·瓦·(1888—1939) ——苏联农学家, 俄农业经济思想中所谓组织生产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14

秦梯利, G. (1875—1944)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唯心主

义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者：235

R

茹可夫斯基，瓦·安·（1783—1852）——俄国诗人。俄罗斯浪漫主义创建者之一：77

S

塞涅卡，卢·安·（前5—65）——罗马哲学家、诗人和国务活动家：22, 23, 265

桑巴特，威纳尔（1863—1941）——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提出者之一：2, 158, 230, 241

莎士比亚，威·（1564—1616）——英国戏剧家和诗人：68

舍甫琴柯，塔·格·（1814—1861）——乌克兰诗人、艺术家、革命民主主义者：45

舍勒，马·（1874—1928）——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价值哲学创始人之一：115, 234

圣西门，昂·克·（1760—1852）——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03, 228

施宾格勒，奥·（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著有《西方的没落》等：38, 129, 130, 228, 232, 235, 238, 247, 248

施蒂纳，麦·（1806—1856）——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无政府主义理论家：88, 186

施潘，奥·（1878—1950）——奥地利唯心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99

斯宾塞，H.（1820—1903）——英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论创始人之一，社会学中的有机学派奠基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家：242

斯大林, 约· (1879—1953): 3, 30, 41, 60, 142, 253, 269
 苏格拉底 (约前 470—前 399) ——古希腊哲学家: 23, 139, 265

T

特勒耳奇, E. (1865—1923) ——德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 著有《历史主义及其问题》(1922)、《历史主义及其胜利》(1924)、《基督教会和团体的社会学说》(1912) 等书: 235

帖木尔 (1336—1405) ——中亚国务活动家: 55

图拉耶夫, 鲍·亚· (1868—1920) ——俄国东方学家: 47, 49, 50

汤因比, 阿· (1889—1975) ——英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 44

维柯, 詹巴蒂斯塔 (1668—1744) ——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美学家: 247

W

瓦格纳, 阿道夫 (1835—1917) ——德国经济学家: 76

瓦格纳, 理查德 (1813—1883) ——德国作曲家, 指挥: 87, 135

瓦维洛夫, 伊·尼· (1887—1943) ——苏联生物学家, 现代选种生物原理学说和栽培植物发源中心学说的奠基人, 苏联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和第一任院长, 乌克兰科学院院士: 239

威尔斯, 赫·乔· (1866—1946) ——英国作家: 118

韦伯, 马克斯 (1864—1920) ——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著有《古代世界农业史》、《新教徒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经济和社会》等书: 15, 30, 129, 241

维贝尔, 阿· (1868—1958) ——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麦·维贝尔的弟弟: 20

维贝尔, 麦· (1864—1920)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维伯, 悉尼 (1859—1947) 和比阿特里萨 (1858—1943) ——1892 两人结婚, 均为英国经济学家, 工人运动史学家, 工联和所谓费

边社会主义思想家。悉尼是“费边社”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加入工党政府（1924、1929—1931）：111, 112, 174

乌斯特里亚洛夫，尼·瓦·（1890—1938）——俄国政治活动家、立宪民主党人（1917年起）、政论家，路标转换派思想家之一：5

X

希特勒，阿·（1889—1945）——德国法西斯头子：77, 118, 154, 235, 241, 256

席勒，弗·（1759—1805）——德国诗人、剧作家：27, 124, 243

谢林，弗·威·约·（1775—1854）——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110

薛西斯一世（？—前465）——公元前486年起为阿契美尼德王朝国王：114

Y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26, 43, 81, 145, 151, 242

亚历山大（前356—前323）——公元前336年起为马其顿国王：35, 47, 55, 118

伊拉斯谟，罗·（1469—1536）——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者，语言文学家和作家：62

伊林，伊·亚·（1882—1954）——俄国宗教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代表。1922年移居国外：48

约斯特，威·（1852—1897）——德国民族志学家、旅行家：38

Z

张伯伦，H. S.（1855—1927）——英裔德国人，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种族主义社会学家，法西斯思想的主要先驱之一：239